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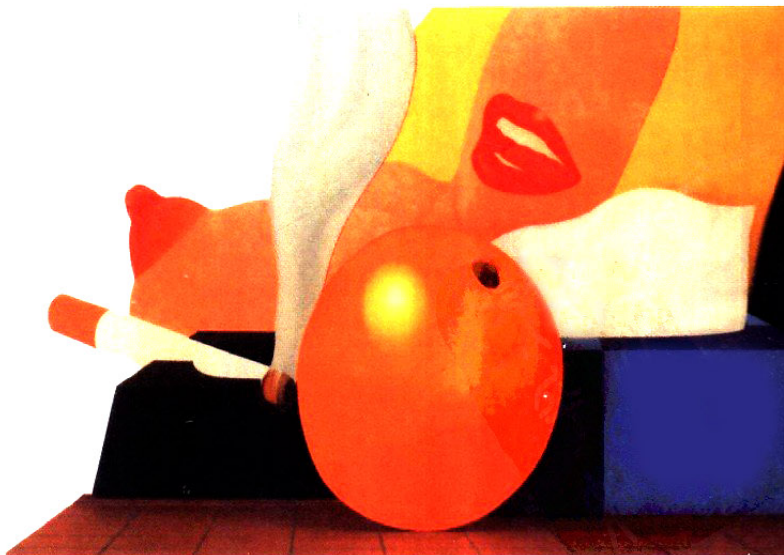
文汇译丛 · 深度探访

THE POWER OF BEAUTY

Nancy Friday

美貌的诱惑

[美] 南希·弗莱迪 著
杨宁宁 译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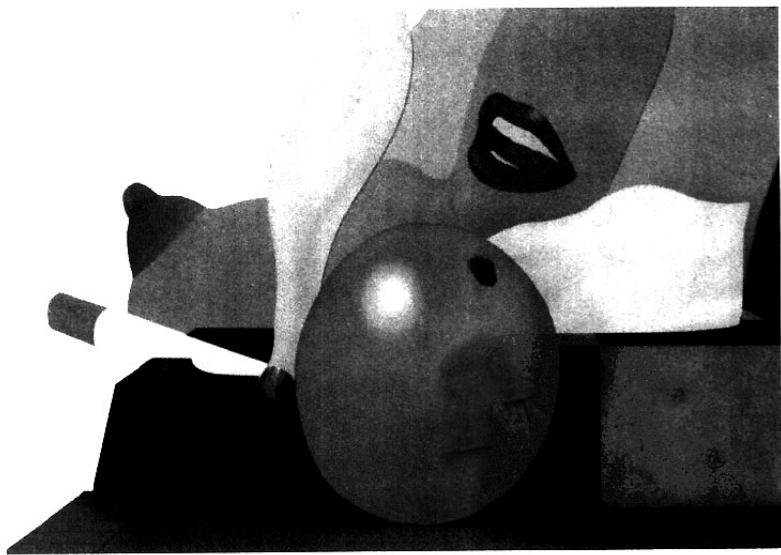
文匯出版社

THE POWER OF BEAUTY

Nancy Friday

美貌的诱惑

[美] 南希·弗莱迪 著
杨宁宁 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貌的诱惑/[美]弗莱迪著;杨宁宁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4. 1
ISBN 7-80676-437-2

I. 美... II. ①弗... ②杨... III. 社会生活美
IV. B83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106 号

图字:09-2002-517 号

Copyright © 1996 by Nancy Frida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Norman Pearlstin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美貌的诱惑

著 者/[美]南希·弗莱迪

译 者/杨宁宁

责任编辑/陈今夫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浦东联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360 千

印 张/14.875

印 数/1—8000

ISBN 7-80676-437-2/G·240

定 价/2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凝视的目光	(1)
母亲的眼睛	(1)
心目中的小宝宝	(10)
谁不爱抱漂亮的婴儿	(19)
凝视的目光和形象焦虑	(23)
分离:人生新的开端.....	(30)
摆脱理想化的母亲 /女人.....	(41)
育儿室里的男人	(49)
第二章 羡慕与妒忌	(62)
美的阴暗面	(62)
“我要吃她的心!”.....	(75)
幼年的竞争:“漂亮的的就是好的”.....	(80)
幼儿训练:保持清洁(和美貌).....	(92)
可怜的阴道,饱受诬陷的玫瑰.....	(96)
第三章 创造自我的年代	(108)
体验自由,表现自由	(108)
银幕上的自我.....	(117)



友谊和排斥·····	(120)
寻找理想的自我·····	(129)
反面角色的作用·····	(134)
学做男子汉·····	(137)
如胶似漆的女孩们·····	(141)
第四章 青春之舞:少女 ·····	(147)
美貌和青春之恋·····	(147)
青春期:“告别童年”·····	(155)
神殿,还是阴沟?·····	(161)
自慰的好处·····	(171)
忍气吞声的女孩·····	(175)
母亲和女儿的竞争·····	(179)
女孩群体与无竞争条款·····	(189)
寻找父亲的眼睛·····	(197)
第五章 青春之舞:少男 ·····	(206)
男孩的模样:我们亲爱的冤家·····	(206)
“做个男子汉!”·····	(213)
青春的骚动和男孩的困惑·····	(217)
不再妒忌阴茎·····	(226)
男孩的愤怒·····	(229)
“我是你童年时失去的父亲”·····	(235)
第六章 女权主义与美貌 ·····	(241)
“身穿夏装的女孩”·····	(241)
杰克斯裤子和扭摆舞·····	(244)
神奇胸罩和强力套装·····	(251)

谢谢你,古特马赫医生	(254)
革命的扮相.....	(259)
性解放和妇女运动.....	(267)
女权主义、男人和美貌	(271)
女人的墨水,女人的血	(284)
成功女性的服装.....	(299)
否认竞争.....	(307)
第七章 镜子里的男人.....	(319)
外公的衣橱.....	(319)
养家活口的人.....	(324)
女人眼里的男人.....	(332)
男人饥饿的眼睛.....	(339)
“交媾的凝视”.....	(345)
幻想中的做爱.....	(350)
工作场所的美貌:求爱还是性骚扰?	(352)
镜子争夺战.....	(360)
其貌不扬的富豪和依附权贵的美女.....	(369)
男性美的未来掌握在女人手里.....	(379)
第八章 性器官与自我形象.....	(389)
阴茎:过去、现在和未来.....	(389)
第九章 改变年龄的双重标准.....	(398)
婚外恋的是与非.....	(398)
回归少年时代,让妒忌见鬼去!	(406)
战胜性恐惧.....	(415)
好巫婆 /坏巫婆	(417)



美貌的诱惑

漂亮地显示我们的实力·····	(430)
“好巫婆”的穿着打扮·····	(435)
解开爱和钱之谜·····	(444)
王子、艺人、裁缝、婚礼：找回失去的自我·····	(453)

文汇译丛·深度探访



《裸猿》

[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著 刘文荣译

定价：16元

本书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的成名作，也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学术新著。作者把人类称为“裸猿”并以动物学家的眼光对人类基本行为的起源、模式和功能加以考察，从而揭示出人性中的动物性一面，同时又从这个角度对人类进化至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书既是一部观点新颖的学术名著，又是一部风行世界的畅销书。



《人类动物园》

[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著 刘文荣译

定价：16元

本书是莫里斯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书中从动物学观点出发对现代都市生活和现代人的行为作了考察。他认为，当今人类像监禁于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被监禁于现代都市这个“动物园”里，由此产生了凶杀、自杀、吸毒、同性恋和滥交等一系列当今世界的通病。此书一出，随即引起轰动，成为人们竞相购阅的畅销书。



《亲密行为》 [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著 刘文荣译

定价：18元

本书是莫里斯的一部引起轰动的畅销书。作者从动物学家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亲密行为，如两性亲密行为、社交亲密行为和自我亲密行为等，作了细致入微的科学考察和精辟独到的科学分析，从而揭示了人类在亲密行为中的关系和动机。本书知识面广，立论新颖，直指人的本性，又极具趣味性，各层次的成年人读后，都会大有收获。

文汇译丛·深度探访



《我与妒忌》 [美]南希·弗莱迪著 刘文荣等译
定价：28元

为什么某些人会莫名其妙地恨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莫名其妙地恨某些人？为什么女人常常抱怨男人，却是为了喜欢他们？为什么男人喜欢女人，却又常常把她们抛弃 这一切 往往就是因为妒忌。妒忌几乎无处不在 却很少有人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在这部风格独特的大众心理学著作中 著名女作家南希·弗莱迪为您现身说法 向您敞开心扉，述说她自己隐秘的妒忌心理，以及，她对这种心理的研究与理解……



《罗曼蒂克心理学》[美]纳撒尼尔·布兰登著 孙尚奇译
定价：16元

罗曼蒂克爱情的特性是什么？两性关系如何才能成为自我发现的途径 成熟与不成熟爱情的不同是什么 性在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罗曼蒂克爱情就需要性专一吗 我们又如何面对情爱中的嫉妒……作者认为 罗曼蒂克爱情不是幻觉，而是一个证实我们存在的机会，是一种历险，一种挑战，是我们许多人升华自我走向成熟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独生子女》 [美]苏珊·纽曼著 贾明译
定价：19元

讲述精彩的发现和家庭故事，纽曼博士让人们了解她的研究并提出实际的忠告，使得本书成为目前同类主题中最受欢迎的畅销作品。对于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或者正在选择生多少孩子的父母来说，本书会给你清晰而独特的洞察力。



《西方文化之旅》刘文荣著
定价：36元

西方文化经历了五个时代，即：远古的直觉时代、中世纪的信仰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求知时代、17至19世纪的创造时代和20世纪的反省时代。远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两者的冲突和融合构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经过大约两百年的演变，最后形成真正成熟的西方主流文化，即以“世俗理想主义”为特征的西方近代文化。本书以此为经线，以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四大文化领域为纬线，以最简洁的方式概述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

第一章 凝视的目光

母亲的眼睛

我是个渴望引人注目的女人。别人的目光就像空气和食物一样是我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多地感到摆脱这种目光的需要，虽然我毕生都在竭力使别人看到我、注意到我的存在。

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爱与恨，隐藏与暴露，凡此种种。谁不渴望能向整个世界展示自我并得到众人的宠爱。然而，在慷慨地显露出那么多脆弱的自我之后，又有谁愿意忍受世人的审判和唾弃。还是把一切都藏起来吧。可是这样一来，又有谁会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呢？

其实，哪个人不是赤裸裸无遮无盖地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那些互相矛盾的需求都来自我们所遭受过的一点一滴的拒绝。我们爱过——不，爱是后来才学会的。我们一生下来就渴望别人的关注和抚爱。为了重温最初得到的这些关爱，我们会面对镜子解开衣服上方的几粒钮扣，偷偷对自己看上几眼，然后又扣好衣服，把自己安全地藏起来。可惜，爱是个极不可靠的东西。一旦堕入情网，所有的钮扣都会被解开。而遭人拒绝的危险也

随之而来。凝视的双眼是爱的许诺。而我们最恨的往往是我们爱得最深的人。是啊，当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向他们敞开之后，他们怎能抛弃我们，把目光移向别处？这种感情真是充满了激烈的矛盾。难怪谋杀案的首要嫌疑往往是同受害者关系最密切的人。

别人的眼睛就像是一面镜子，而我与这面镜子的关系就常常处在一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之下。我非常在乎这面镜子，非常在乎别人如何看待我和我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包括我对丈夫的承诺。

也许你会说，我所说的这一切都跟你无关，因为你既不是时装模特儿，也不是喜欢整天照镜子的人。也许你已经开始讨厌我的虚荣心。不过别忘了，你的人生也是由这面镜子塑造出来的。我们谁也无法逃脱外貌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我们以后会选择一种脱离镜子的生活。但是，不论我们生下来时是穷人还是富人，是耶稣基督还是无名小卒，在人生的最初阶段，我们无不渴望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

也许你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因为你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退出这种基于外貌的竞争。但是你不能否认自己曾经渴望得到别人的爱和关注。如果今天你已不再期待这些东西，那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感到厌倦和失落。也许你在竞争中输给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也许你掉进了无人关注的深渊。有谁愿意记住这种痛苦的经历？也许，你赢得了胜利，却遭人怨恨。妒忌可以变成一把杀人的利剑。

美貌的魔力无所不在。它像一道强大的电流，将饥饿的眼睛导向欲望的对象。“让我好好看看，让我仔细瞧瞧！”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大市场，各种交易都以前所未有的引人瞩目的方式进行。大街上招摇过市的半裸的人体，餐厅里形形色色露出很多肉体的时装，还有那自家客厅里的电视屏幕——所有这一切都

向我们发出同样的信息：“看我！”

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曾经有过那样的年代，人们看重的是善良、慷慨和同情之类内在的美德。这些东西现在都过时了。今天我们以包装来展现自己的身份。谁还在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美德？“看我！不然我怎能确信自己的存在？”我们的时代是包装决定一切的时代。虚荣就是一切。相信我吧，你也是其中的一员。

从我们诞生的那天起，讨人喜爱的外貌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东西。母亲对婴儿关注得越多，孩子健康成长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母亲越是关注和满足婴儿的需求，她在孩子的眼里就越显得美丽善良，尽管母子双方可能都不怎么完美，孩子可能太胖或太瘦，母亲也可能相貌平平。这正是早期文艺复兴绘画给我的印象。每当想起那些画里的母亲和孩子，我就仿佛在他们互相凝视的眼睛之间看到一道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的金光，它使母子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变得完美无缺。

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光彩夺目的绘画所表现出来的母子之爱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激动，尤其是那些圆形的和类似电影镜头的画面。这类作品似乎为观者提供了一个钥匙孔，让他窥视或欣赏画中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在那幅令人心碎的肖像画《皮埃塔》里，圣母玛利亚抱着死去的儿子耶稣。他的头靠在她的胸前，就像小时候那样。几年前，有个人因为用大铁锤破坏塑像而被捕入狱。据他向当局交代，他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在那座塑像里，“圣母玛利亚眼睛朝下，没有看着耶稣。”

当我还是个学艺术史的学生时，我最不愿看的就是圣母和圣子的画像。比起拉斐尔那讲究均衡充满激情的杰作，我更愿看冷峻而不对称的后文艺复兴风格主义绘画。因为我不愿看到拉斐尔画里的婴儿所享受的那份快乐。对我这个没有享受过这种幸福的人来说，即使是圣母和圣子之间的那种神圣的快乐也

会使我感到妒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永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正是那道将圣母和圣子的眼睛连接在一起的金光。20年前在写作《我母亲/我自己》这本书时我无意之中又看到了那道金光。当年我年轻脆弱，甚至不愿承认圣母和圣子之间互相凝视的目光是如何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正是在这凝视的目光中，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旅途。“当我们睁开双眼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自己也会成为被人观看的对象；”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写道：“当别人的目光和我们自己的目光相交时，我们就对自己的存在深信不疑了。”我们一出世就渴望得到爱的目光。充满了爱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沉浸在爱的温暖怀抱之中。一旦这一影像转化为心目中的自我，我们就会觉得何等心满意足！这就是自尊心的源泉。

奇怪的是，今天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我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早期文艺复兴的绘画中所看到的那道神秘的金光，为此事，我曾请教过许多艺术史专家、博物馆馆长和大学里的艺术史教授。也许，我所看到的不过是无意识的幻觉。也许，那如此牢固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并不是我在画中真正看到的东西，而是我梦寐以求却未曾得到的东西。

有时我会对丈夫说，“让我们离开这里吧。买个农庄，同动物呆在一起，弄头越南猪来养养。”我对梳妆打扮已感到厌倦。我多么希望别人都能像小狗邦戈那样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地爱我。忠心耿耿的人绝不会在乎你的外貌。他们爱的是你的内心，他们比你本人还要看重你的真正价值。当然邦戈那无私的爱也离不开对我的依赖——没有我，它会饿死。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坚信，即使不给它吃，邦戈也会爱我。不论我穿什么衣服，邦戈对我的爱都不会改变。

难道我就不能摆脱外界的影响，依靠内在的力量来生活？

今天早上我同老朋友迪克通了电话。迪克每天都在我开始写作之前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怎样同作家交谈，因为他曾经帮助一个他所爱的人成为作家。他告诉我这个人昨天夜里自杀了。我记得他们两人合拍的那张照片。他们都是非常英俊的男子。照片里，我那朋友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他的情人，而那一位则将整个脸对着相机的镜头。迪克将自己所有的能量都献给了他所爱的人。为了他的成功，迪克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遗憾的是，那人越是成功就越是怨恨自己对迪克的依赖。他爱迪克，羡慕他，最后，他终于恩将仇报，抛弃了迪克。他们分手后，那位作家的写作生涯就一落千丈。不久前，他做了一次极其成功的美容手术，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再也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迪克告诉我。看来，那人的内心其实是一片空虚。

我常常希望自己不再抛头露面，并且改邪归正重新做个“好”南希。那个名叫南希的可爱的小女孩虽然没能从母亲那里得到圣母般的关爱，却总是默默地忍受着，把怒火深深地埋在心底里。有一次，我被一张照片深深地打动了。照片里，一架巨大的喷气飞机正在空中给一架小飞机加油，看上去就像一头大母牛在给小牛喂奶。这使我想起圣母和圣子。要是耶稣没有在圣母那充满了爱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影像，他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来完成那神圣的使命吗？

“总有一天，我对丈夫说：“我要收回我写过的那些书。我写了那么多关于性、母爱的两重性、妒忌和羡慕之类的东西，我要祈求上帝饶恕我。”我的丈夫并不以为这有什么奇怪。他喜欢我写的那些书。他知道，那个喜欢涉足禁区的“坏”南希同那个在主日学校从不缺课的“好”南希一样，其实是同一个女人所拥有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自我。而我的写作灵感恰恰来自于这两者之间没完没了的斗争。丈夫把我比作英国女作家多丽斯·莱

辛。在《金色的笔记本》这部小说里，莱辛是这样描写一个爱上她的男人：“他看到了我。”多年前 当我还没有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知道男人的目光所拥有的那种魔力了。

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开始寻求男人的目光。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从未见过面的父亲那样促使你迷恋于来自男人的爱的凝视。我一生都为失去父亲而倍感失落。要是我没能成为一个作家，我心中的这块空白就永远也无法填补。他在哪里？他是谁？为了保护我和她自己，母亲什么都不告诉我，什么都不让我看。我想做个好女儿，所以我什么也没问，因为我更需要母亲。就这样，我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中长大，既没有享受到他那关爱的目光，也没有在他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我的身体和脸、理智和性征。也许他是个性情冷漠、不喜欢孩子的人，也许他不会喜欢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唉，这一切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由于对父亲的一无所知，我只好在想像中将他不断地理想化。

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父亲的名字，也没人对我说过“别提他”这样的话。但是从记事的时候起 我就知道不能问“他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只能在想像中体验我和他之间可能会有的那种爱。我只能从母亲家的那些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我的外婆是个美人，她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当然，还有外公、姨妈、舅舅。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些人就是心目中的众神。他们从高处向我微笑。在我的眼里，他们都具有令人神往的魔力，都像我所崇拜的那些四五十年代的电影明星那样光彩夺目。

如今我的屋子里摆满了母亲家那些亲戚的照片。他们个个都很漂亮，都是我幼年时期的最爱。我把自己视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并相信我和他们无论在身体和性格上都一脉相承。从他们在埃尔摩洛哥餐厅里的迷人风采以及外婆骑马的姿势里，我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表现欲。虽然我从来就不是个美人，虽然那时我梳着小辫、戴着金属框架的眼镜，但我仍旧认为自己很漂亮。

亮。一定是老照片上的那些人使我变得如此自信。

外公和舅舅们并没有对我扮演父亲的角色。是我自己把他们当作父亲的替身。母亲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无条件地、毫无怨言地允许我从其他男人那里寻求爱。也许这算不上什么礼物，但是我敢肯定，在挤满了医生诊所的那些病人中间，许多人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爱他们，也不允许他们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爱和亲密无间的感情。

妈妈常说，她产后一出院就把我交给了保姆安娜。在我的想像中，当时的情景就像是一部黑白电影：汽车在家门口停下，安娜从疲倦而忧伤的妈妈手中接过我。妈妈年纪轻轻就成了单身母亲，她一定巴不得有人帮她带这第二个孩子。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死了，反正在我的记忆之中，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

安娜是个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后代。她有一双强壮的手臂，我在她的怀里感到非常安全。她的厨房就是我的天地。在别人也开始注意到我之前，安娜的目光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在安娜眼里，漂亮的脸蛋算不了什么。她欣赏的是勇气和冒险。在乘过山车的时候，我们总是坐在最前面。她给我梳小辮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照镜子。我长得不像妈妈那样漂亮，不过安娜从来不对我的长相说三道四。在如此宽容的目光下生活，当然不需要照镜子。

“安娜讨厌我。”姐姐至今还在抱怨。这话当然不对。安娜确实最疼我，可那是因为姐姐和妈妈特别亲近。大概是因为她们两人都见过父亲吧。共同的秘密将她们连在一起。

妈妈也有自己的秘密。她是长女。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她的母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如此怀念死去的爱妻，以至于竟然对女儿的美貌视而不见。这多少影响了她的自信。

外公对女人的容貌有他自己的标准。妻子去世后，他仍是众多女人追求的对象。他选中的女子都是身材娇小的美女。不

论是否真心实意，她们都对他百依百顺。我们这个家族里有很多身材高大、我行我素的女人，然而可怜的妈妈对自己的外表却是那样缺乏自信。直到今天，她仍不愿别人看见她的手，因为12岁那年当她在客人面前演奏钢琴时外公说她的手“太大！”想想吧，要是别人不喜欢你的手，你还能弹好钢琴吗？

在外公的六个孩子中，妈妈同他关系最近。我上大学时，她特地离开查尔斯顿迁往北方，搬到离外公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为的是能陪他打桥牌，晚上同他一起去游安大略湖。毫无疑问，外公很爱她、需要她呆在自己身边，而她也竭力使他满意。不幸的是他从未真正看到她的可爱之处。“唉，爸爸……”她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生气。人就是这样矛盾。

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得到父母重视时，每个人都会出于生存本能而竭力接近他们，不过也可能做出相反的反应。记得有一次，我特地从幼儿园带回自己作的一幅画送给妈妈。我站在楼梯口呼唤她，那时她正急匆匆地往楼上走。我多么希望她看到我、看到我为她画的那幅画啊。可是她什么也没看见，径直走进了自己的卧室。这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从那以后，我就决定再也不去想方设法引起她的注意了。为了惩罚她，我把自己得到的所有的成功、奖励和好成绩都献给别人，特别是外公，但就是不给她。

当时我5岁。我对自己说，我一点也不在乎她怎样看待我的成功，现在轮到我冷落她了！可是事实上，我是非常在乎的。人就是这样矛盾。

10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敢作敢为、讨人喜欢的女孩。我知道如何用唱歌、跳舞、讲故事等方式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和喜爱。在我家的墙上有一张照片，照片里的那个女孩戴着眼镜，牙齿上装着矫正钢丝架，穿着旧的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那就是10岁时的我。我那时可真行，居然能在逆境中求生，并且为自

己赢得了不少好处。可惜没过几年情况就变了。我开始努力使自己符合某种既定的模式。我所竭力模仿的那种女孩，她们对镜子的信赖远远超过对内在力量的依靠。当然，再好的镜子也比不上男人的眼睛。那正是我特别需要的东西，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亲，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今天，像我那样的童年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了，因为有太多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在美国，生活在永久性单亲家庭中的孩子的数量在 1993 年已达到 630 万，占 18 岁以下人口的 27%，比 10 年前上升了 70%。可是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减轻失去父亲对孩子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人们能够，而且必须竭力适应这种生活。但是，尽管大人们不愿谈论那些令人痛苦的事情，他们也应该让孩子了解真实情况。掩盖着的秘密不会消失，它会永远留在阴暗的角落里，永远留在孩子的心里。

当我们渐渐长大，我们会寻找父亲的替身。我最先找到的是上帝慈爱的眼睛。这并不是因为我有特别坚强的信仰，而是因为我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在主日学校里，我看到全能的上帝向我们发出慈父般的微笑。他赐给每个孩子同样的爱，从不偏爱任何人。圣经故事就像电影一样有趣。我们纵情地放声唱着赞美诗。我至今还记得“跟随灵光”中的所有诗歌。多好的大家庭！那么多的欢乐和友爱！为了奖励我的热心参与，主日学校赠给我好多图书。受过坚信礼后，我以同样的虔诚坐在圣菲利普圣公会教堂的长椅中。教堂那迷人的墓地同我家只隔一道墙。

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我都是圣会中的一员。在这里，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宽宏大量。当然，人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自己是好人。如果他们做了错事，他们会感到有罪，感到羞耻。虽然在圣会里只有我是一个是单身家庭的孩子，可在那些父亲母亲的眼里，我和其他孩子一样正常和健康。在教堂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自

幼就有这样的能力：要是生活中缺少了什么，我就会从其他地方寻找补偿。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说，乐观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如果真是这样，我真该为此好好感谢我的祖先。

不过，对性的渴望最终使我离开了教会及其慈爱的目光。要是我能把青春期旺盛的能量用在智力和社会活动中，也许我会更理智地作出选择、更好地设计自己的生活。可是，当时我却觉得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和上帝及其教诲格格不入，虽然教堂的布道并没有把性说成邪恶的东西。不论在教堂、学校还是家里，人们对性保持沉默。也许罪魁祸首正是这种既不赞扬也不警告的沉默。这好比交给我们一辆新汽车的钥匙，然后对我们说好好享受吧 责任自负。

小时候，我很少照镜子，现在我却渴望在男孩子的眼睛里找到自己。我把一个 12 岁女孩的所有渴望都倾注在他们身上。我想要的并不是和他们做爱，而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承认，希望他们需要我、爱我。我必须在男人或者上帝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看到得救的希望。我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尽管我的选择是无意识的。这就是自我分裂的开始，它使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孩成为心理上的瘸子，使她变得沉默寡言，并且抑制了她的进取心和好奇心。在性生活上 她也迟迟不懂得如何避孕、如何保护自己。

说句公道话，我那时结交的男孩们并没有要求我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同我一样，他们也告别了童年的梦。传统使他们相信 男人的价值在于成家立业、解决各种问题 在此之前 他们首先必须战胜对漂亮女孩的恐惧感。

心目中的小宝宝

也许你很难相信外貌改变了你的一生。根深蒂固的卡尔文

主义使我们避免过分看重人的外貌。我们坚信对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要一视同仁。然而，哪个母亲不在十月怀胎期间就渴望生个漂亮的小宝宝？许多人甚至早在几年前就在梦中看到了那可爱的小脸。

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自己独特的外貌，它来自心灵的深处，并成为我们独特人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父母那充满了爱的凝视，它使我们的的心灵充满了阳光。如果我们不能由于自己独特的外貌而得到关爱，那我们幼小的心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如果妈妈眼里所看到的只是她理想中的孩子而不是真实的我，那我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感到安全吗？

当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满怀着期待从一双又一双的眼睛里寻找自我，直到有一天，我们有幸将眼光转向内心深处并在那里看到真正的美。

得不到关爱的婴儿会发出愤怒的哭喊。这在成年人身上也不难看到。想想吧，当我们爱上某人，眼巴巴地等着他来到我们身边、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向我们许诺永恒的爱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惶恐不安啊。当我们得不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又是怎样像小孩子一样气得发狂。

心理学家梅拉尼·克莱因认为，襁褓中的我们虽然热爱母亲和她那美丽的乳房，但我们更妒忌她的权力并对此愤愤不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狠咬母亲的乳头。克莱因真叫人受不了，她把我们描绘得如此可怕。第一次看她的书时，我一气之下把它扔得老远。不过，我们也不断地意识到，母亲总是尽量地满足我们的要求，抱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盖被子。这一切都使那些由妒忌而引起的愤怒得到了缓解。于是感激之情为我们打开了通向爱的大门。我们今天也会以同样的心情妒忌某个我们爱得发狂的人，因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使我们进天堂或者下地狱。克莱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吃奶的时候没有学会爱的话，

长大后就更加困难。

我们在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时都会以求生存的本能来对抗。小时候，当我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成为妈妈的掌上明珠时，我就打定主意惩罚她。好吧，我才不在乎呢，我对自己说。我会想办法叫别人爱我。其实我心里难过极了。她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为什么看不见这样一个出色的女儿！人就是这样矛盾。

我们对自己的母亲又爱又恨，这种矛盾的感情可以持续多年。我们不愿承认对母亲的愤恨，把它藏在肚子里。一有机会，我们就把它发泄在自己所爱的其他人身上。其实，我们的母亲虽然不是十全十美，却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就会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寻求十全十美的爱。不幸的是，世界上有谁能满足我们这种苛求呢？

理想的做爱是双方在满足对方的需求之后都能脱离对方回归自我。只有当我们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依恋之情才会使我们感到甜蜜。如果在坠入爱河时丧失自我，把对方看成决定自己命运的主宰，我们就会使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就是恨得咬牙切齿，其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离婚往往变成一场血战，我们大肆发泄多年来积压的怒火，恨不得将对方活活烧死。

可怜的小宝宝！怎样才能使你平静下来、心满意足地接受自己亲爱的妈妈？也许成年后我们会在其他人身上找到爱。不过，越来越多的女人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们拒绝爱任何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男人。”她们断言。她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同她们的早年经历有关。如今女人们都轻易地把感情生活中的所有不幸都一鼓脑儿归咎于男人。我们不再依靠男人来养活我们，所以乐得将他们变成出气筒和替罪羊。工资待遇问题，性骚扰，外貌决定论，凡此种种——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那些无信无义、见异思迁、满脑子自我的男人们造成的。

在那日益兴盛的女子同性恋世界里，我们试图在其他女人的眼里寻找从婴儿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完美的自我。我们试图同其他女人一起重建那种我们从母亲那里得到过或未曾得到过的亲密无间的感情。女人的身体使我们想起圣经里的人间乐园。这里没有长满了毛的胸部以及样子和气味都叫人心惊肉跳的阴茎。与此相反，女人的身体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不是吗？那柔软的肌肤和乳房曾是我们无比舒适的枕头；那对乳头曾经养育过我们；还有那可爱的肚子，我们曾将小小的身体缩成一团，偎靠在上面睡过多少好觉。这一切就像重新回到妈妈身边。不幸的是，在爱情上，女人不见得比男人更可靠。于是我们大失所望，天堂一下子变成了战场，正如《女士》杂志的一篇文章所说，“长期以来，相互攻击这种令人讨厌的现象在女子同性恋的群体中屡见不鲜。”

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大量诸如此类的故事：由于别人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看待我们，于是我们怒火中烧，直到某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作家们从自己的回忆中挖掘素材，他们将自己的过去活龙活现地再现在读者的眼前。他们使我们热泪盈眶，因为我们在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这点上，没有人做得比田纳西·威廉斯更成功了。他不断地在家族史中挖掘他所说的“美的祸害”，或者在自己的经历中挖掘美的缺憾。随便举几个例子：《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可爱的青春小鸟》、《玻璃动物园》——他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涉及美貌和狂暴的怒火？他有近视的毛病，当他挣到足够的钱后，就去动了手术。多年后，每当提起这事，他仍会怪笑一声，“难道您不觉得那次手术使我变得更英俊了？”不过，他照旧写他最熟悉的东西——美貌、狂怒以及失去的爱。

60年代初，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结婚和生孩子成了过时的话题。马路上很难看到怀孕的女人，甚至男人也成了怀疑的

对象。一个女人如果同男人有密切关系就很难加入妇女解放运动，因为她们认为新女性靠的是事业上的成功。我的朋友简1971年住在纽约，当她挺着大肚子去上班时，感觉就像犯了罪一样难受。

现在，怀孕和生孩子又成了时髦的事。怀孕的模特儿趾高气扬地阔步在 T 型舞台上，大肚子电影明星的半裸体照片出现在国际性流行杂志的封面上。当一个女人在公共场所给孩子喂奶时，你可以听到周围的其他女人发出羡慕的叹息声。有些女权主义者撰文抱怨当初妇女解放运动没有鼓励她们生孩子，现在就是想生也不可能了。

早在孩子出生之前，未来的父母们就在心目中勾画小宝宝的形象了：体型、性别、头发的颜色。我们希望孩子能体现我们心目中理想的自我形象，即使我们实际上并非如此完美。布雷泽尔顿研究院的南希·波伦博士是专门研究怀孕妇女的。她说，“所有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前都有意无意地在心里为孩子画像。在怀孕的最后 3 个月里他们会想到 3 个不同的孩子：一个是十全十美的小宝宝、梦中的小王子；还有一个是有缺陷的孩子，这可能同父母自己的感情危机、家族中的某种遗传特征或者夫妻之间的冲突有关；另一个就是母亲肚子里真实的孩子。我们试图用谈话和谨慎的提问来帮助她们缩小现实和想像之间的差距。”

“那么，要是孩子出生后的样子同父母期望中的小宝宝不一样呢？”我问道。

“那么做父母的就必须接受现实 真心实意地承认，‘这就是我的孩子。’只有这样，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才能建立在互相信赖的基础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感到自己受到轻视、得不到父母的承认和关爱。”

事实上，父母对每个孩子的感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这

同孩子的外貌有一定的关系。不是吗？孩子们在不同的时候出生，他们各不相同。上帝并没有使做父母的无视他们自己以及孩子的外貌。

有的家庭看重美貌，有的则看重善良、坦诚和成就。然而，不论在什么样的家庭里，外貌在生活中总会占有一席之地。不是吗？当成年人俯身看着新生的小家伙时，他们的眼睛多半是充满了爱，但他们的视觉却往往有些偏差，他们只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东两，对那些不愿看到的东两则视而不见。

田纳西大学孟菲斯生殖遗传学研究室主任舍曼·伊莱亚斯预言，将来人们不仅可以选择胎儿的性别，而且能够决定他们的孩子将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今天我们选择性别，”他说，“明天我们按照设计方案来制造孩子。”这么说，难道未来的超级父母们将坐在某种类似于专门用于美容手术设计的机器前，精心“设计”未来的超级宝宝？而当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定购漂亮宝宝时，我们会不会像谈论金钱的力量那样来坦率地谈论美貌的魔力？

直到今天，大多数父母仍希望有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第二个是女孩。然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性别和外貌上使父母大失所望？在我的朋友中有一对夫妻，他们在生了个儿子之后盼望能有个女儿。他们全家人都长得相貌出众，然而第二个孩子不仅在性别上使他们失望，而且“皮肤有点发绿”。做母亲的至今还常拿这事开玩笑。

“我生下来时鼓着一双大眼，看上去像个青蛙。”儿子笑着告诉我。

“瞧他现在长得多帅！”他的妈妈骄傲地笑着，因为他现在是全家最漂亮的。

大约 10 年前，当我着手这项研究时，他正在大学里读书。他请了假开了 4 小时的车来接受我的录像采访。看来他很少有

机会向人诉说自己的感受。他的青蛙眼和皮肤上的青绿色在两岁时都消失了，但是人们有时还会叫他“青蛙”。他从不埋怨自己的家庭；他们一向互相关爱。我告诉他，我小时候有时会因为无法发泄的愤怒而在睡觉时磨牙齿。

“在梦中我的牙齿全都掉了下来，”他说，“这样的梦我不知做了多少次了。”

就这样，为了不伤害母亲，我们在梦中毁掉了自己的牙齿。我们爱母亲、不愿把她视为坏人。可以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由于父母不喜欢他们的性别和外貌而在夜里磨牙，所以牙科医生要定期在这类病人的嘴里安装塑料护牙套。

今天，他已经是个成年人，能够应付自己的感情。他把早年的愤怒融入了新的自我形象——校园造反派。他受不了当下盛行的那些“政治正确”的言论。妇女是受害者吗？他可不那么看。至于结婚，眼下还没那种愿望。他使我想起自己当年的样子 焦躁不安 对钱兴趣不大 但是渴望探索人生。

不是吗？几天之后，他将去克罗地亚参加救援难民的工作。他走后，我给他寄去一张便条，上面有一段我最喜欢的电影对话 那是约翰·加菲尔德对初次相遇一个女子说的：“你既漂亮又冷静 而且与众不同。”我的朋友不会相信自己是个美男子 但他肯定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虽然不是同代人，但是他和我却谈得十分投机。我们两人都有一肚子“说不出口”的愤怒 似乎命里注定要承受这一重负。

在提到父母对孩子的失望时，心理学家阿维瓦·韦斯伯德指出，“父母流露出来的失望情绪即使是无意识的，也会使孩子觉得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根据南卡罗莱纳大学的一项研究，如果母亲不情愿要肚子里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在出生后 28 天内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孩子的两倍以上”。虽然这项研究还不够全面，但有位流行病

家从中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面临更多的有害于健康的危险，包括受到大人的虐待以及在认知能力、社会交往以及感情的发展上受到阻碍。”

今天，比起其他不那么显眼的品质来，外貌似乎变得格外重要。我们好像站在十字路口：时尚和美容广告铺天盖地，猛烈地冲击着卡尔文派基督教的道德规范，而与此同时，我们口是心非，仍不忘重复父母向我们灌输的那套道德说教。

孩子们渴望坦诚的谈话。在学校里、电视上、高速公路边的广告牌上，孩子们感受到美貌的巨大力量。我们常情不自禁地说：“你真漂亮！”然而没有一个成年人愿意公开谈论美对我们的强大吸引力。做父母的也不愿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妒忌受到宠爱的小妹妹或班里的漂亮小女孩，以至于想抠掉她们的眼睛。不错，我们知道妒忌是罪恶的东西，应该把它清除掉。这种念头使我们感到羞耻，它们像恶魔一样撕咬着我们的灵魂。老师常说，“你们要做善良和宽宏大量的好人。”可是所有这些教诲都抵不上一双最新款式的锐步运动鞋对孩子们的诱惑力。在家里，大人们都假装把外表看得无关紧要，而孩子也被迫使自己适应这套谎话。

精神病专家埃塞尔·珀森认为，母亲在怀孕期间“常把自己的许多感情和愿望转移到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她还说，“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最常见的梦想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实现我们自己没有实现的幻想……这种情况类似于我们对心目中的爱人所产生的种种幻想。两者都涉及一个在对方出现之前就已形成的幻想，其中既有有意识的成分也有无意识的东西……不论未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想像中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它都会影响母亲同孩子的关系……如果母亲不能根据现实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的幻想，她就会对孩子产生失望甚至怨恨的情绪。如果她恨自己的丈夫、父母或者同胞兄弟或姐妹，她就会把孩子

看成是这些人的克隆。”

父母是怎样看我们的，对此我们每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即使没人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想像出在怀孕期间，父母心里期待的是什么。生活中许多事情会影响我们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外貌，即我们在父母眼里的形象。它会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在美容医生的诊所里看到过一种镜子。我们可以在镜子的一面看到自己熟悉的面孔；镜子的反面则显示出我们在别人眼里的形象。“天哪，这么丑！”我一看镜子的反面就大叫起来。美容外科医生谢里尔·阿斯顿说：“我们自以为知道别人怎样看我们，其实并非如此。”那么，哪一面镜子里的脸更真实呢？如果父母在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对他们的小宝宝心满意足，使我们从小就拥有一个美好的自我形象，说不定我们就会在镜子的两面看到同样的面孔。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照那面镜子，因为我们有健康的自尊心，它的核心就是有良好的自我感觉。

“即使是生下来就有缺陷的孩子也可以健康发展，”南希·波伦说，“父母的关爱和养育使他们觉得自己很美。他们有能力超越自己的外貌，因为很早就有人使他们看到自己的价值。”

然而，为了使孩子们相信，比起昙花一现的漂亮面孔来，仁慈、慷慨和善良这些内在的品质更为宝贵，我们是否应该首先承认美的诱惑力？今天，美貌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时装模特儿成了时代的偶像。不久前，婴儿穿的罩衣、围裙和漆皮制的玛丽·简鞋子居然成为时尚，成年女子们争先恐后地穿起了婴儿的服装。真是不可思议！看来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我们渴望理解幼年时期的感受。

与此同时，特大的乳房也变得时髦起来。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不只是半遮半盖或透明衣服后面的裸体，还有舔着女人乳房的男模特儿、给孩子喂奶的女模特儿。她们穿着昂贵的衣服，

敞开胸部，让怀里的婴儿和窥视者都能看到……看到什么？我们的真实面目？当新千年即将来临，我们的社会开始解体时，我们也许凭着直觉看到自己又回到婴儿时代，穿着婴儿的衣服，幼小的身体还没有成熟，一切都将从头开始。也许我们企图在裸露的乳房和婴儿的服装里寻找自己能够接受的形象。

我们的文化正在向幼年化的方向发展。我们不愿让自己看上去像个成年人。虽然生孩子又变得时髦起来，但是没人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妈妈。那些对成年人的一切都嗤之以鼻、热衷于盗窃少年时尚的男男女女们，迫不及待地穿上疯狂的裁缝们通宵达旦炮制出来的任何东西。然而，如果没有成年人，就不会有合格的父亲和母亲，童年的快乐也就不复存在。对孩子们来说，童年的魅力在于世上还有许多等待他们去发现的秘密。可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电视把一切都暴露在我们眼前。只有美和外貌这个难解的谜将伴随我们进入下一个世纪。

谁不爱抱漂亮的婴儿

人人都爱抱漂亮的小宝宝，并且更多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只要想想广告画里那可爱的格伯宝宝是怎样使我们着迷。那长着酒窝的小脸蛋和嘟起的小嘴巴好像在对我们说：瞧，我多漂亮！快来亲我！快来爱我！

在那些研究婴儿对成人吸引力的实验中充当研究对象的人都是幼儿园和儿科病房的专业护理人员。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要求他们对任何一个啼哭的婴儿都一视同仁地给予爱抚和照料。然而漂亮的孩子还是免不了比别人多占点便宜。

妈妈们也难免偏爱漂亮的孩子，给他们更多的微笑、亲吻和

爱抚。要是一生下来就拥有美的魅力，那该是一个多么幸运的开端！

别以为只有女人才会这样。有一项研究发现父亲对婴儿的关爱程度也同婴儿对他的吸引力密切相关：“宝宝越是长得逗人喜爱，就越能得到爸爸的关爱。”

心理学家朱迪丝·兰洛伊斯研究过产后尚未出院的母亲同婴儿的关系。她的结论是，“孩子的长相越讨人喜爱就越能得到妈妈的关注……到了产后三个月……漂亮的女婴得到妈妈更多的亲吻、更多的微笑和安抚、更多亲热的搂抱。”

美的魅力无处不在，我们对“漂亮”宝宝的面部特征似乎也有共同的标准。心理学家凯瑟琳·希尔德布兰特在一项研究中用了六套不同年龄婴儿的面部画像 三个月、五个月、七个月、九个月、十一个月和十三个月。每套包括一系列类似的画像，相邻的两张画像之间在前额的形状、眼睛的位置、虹膜和瞳孔的大小、鼻子的长度和大小、嘴巴的位置和大小以及面颊的大小上只相差一毫米。研究的对象是成年人。当他们被要求在这些画像中找出他们认为最漂亮的孩子时，他们的判断大多是一致的：漂亮宝宝都有小小的脸蛋、高高的前额、大大的眼睛和瞳孔。

至于婴儿，他们也喜欢看到漂亮的脸。根据兰洛伊斯的另一项研究，不管孩子的母亲是否漂亮，婴儿都会更长久地注视着漂亮脸蛋的人。一岁大的孩子，不管是白人、黑人还是拉美移民的后代，都喜欢同漂亮的陌生女人和漂亮娃娃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外貌在各个年龄层再次引起人们关注时，这类有关婴儿容貌的研究成倍地增加。那年头时装设计师身价百倍，成了社会名人；模特儿也开始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偶像。但是，研究者们居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刚刚出生的小不点儿身上。他们在这些小家伙身上倾注了这样多的期待，这一现象本身就包含了一些永恒的、非常有趣的东西。

那些新的科研成果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们具有客观性，它们剔除了个人情感，传达了真理和理智。对于美貌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理解受到感情和冷酷的事实这两方面的影响。80年代，当我开始研究这个题目时，朋友们问我：“不错，美貌确实存在。可这有什么好说的？”我当时也有些吃不准，不过我知道，“美”这个藏在密室里的尤物又一次穿着高跟鞋、涂着鲜红的指甲油在大街上昂首阔步了。前面提到的那些研究都是15年前的事。今天，再也不会有人责问我或其他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人为什么要如此焦虑地观察外貌对生活的影响。

“让我看看。哟，真漂亮，我真想把你一口吃下去！”我们常用这样贪婪的口气对孩子或情人说话。漂亮的脸蛋使我们激动不已，我们迫不及待地渴望用美来填补我们空虚的生活。没有美我们就无法生活。我们的眼睛像饿汉一样搜寻美丽的形象；与此同时，我们也渴望别人关注的目光。

窥视者的祈求“让我看！”和自我表现狂的渴望“看着我！”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我是不是越扯越远了？其实不然。发生在育儿室里的情景在孩子的一生中会重复出现，成功和失败的种子就是在这里埋下的。我们有必要密切观察成年人和婴儿之间目光的接触以及这种接触对孩子的一生所产生的影响。当心理分析家引导我们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时，我们就会向他们讲述童年时发生在育儿室里的事情。难道我们就不能通过观察婴儿来更好地理解成年人的心理状态？比如说，美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可以说微乎其微，然而，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热切地渴望它？

“他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有张漂亮的脸蛋而已。”我们有时会说。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我们无法记得一周岁之前的情况。实验证明，我们只能记

得三四岁时发生的事情。但是，许多事情也许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比如，我记不得父亲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当时家里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我在场，他也在场。他长得很帅，至少别人是这样说的。

妨碍我们回忆过去的最大障碍是：我们害怕再次回到育儿室。因为那时我们是那样弱小，母亲在我们眼里就像巨人一样威力无限。我们渴望她的爱，但不知道是否能够得到她的爱。就是在今天，虽然我们已经是 30、40 或者 50 岁的人，我们仍旧不愿回想母亲对我们的冷漠或溺爱。当我的密友们听我朗读本书的一些章节时，他们就会回想起很多已经遗忘了的事情和夜里做过的梦。昨天，在去滨江大街食品杂货店的路上，杰克把我拉到一边。

“我一直觉得自己同兄弟姐妹不一样，”他说，“我觉得父母之所以偏爱他们是因为他们长得比我好看。昨天晚上听了你书中的那几段，我就想起妈妈曾经告诉我，我生下来的时候看上去像个‘小日本’。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后来一直认为这就是她不喜欢我的原因。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外貌在我们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子。”

“可是你也长得很帅啊，”我说，“而且你是几个孩子中最成功的。”确实，像许多人一样，为了弥补幼年时的缺憾，杰克发展了那些比漂亮外貌更为持久的才能。昨天晚上他给母亲打了电话。今天的杰克已经变成了母亲心中的太阳。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叫我‘小日本’。你猜她怎么说？‘我那时没有经常抱你，那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他摇着头，微笑中带着几分凄凉。他不是那种喜欢诉苦的人，不过，幼年时的经历使他对自已的外貌十分敏感。出门前他一定要在镜子前仔细察看并要求自己：领带必须系得端端正正，裤子必须烫得笔挺，皮鞋必须擦得锃亮。

抱怨母亲是最要不得的事。受害者的心态使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自己的母亲。我们不是把她理想化，就是低估自己，或者由于渴求未曾得到的关爱而像孩子一样依恋她。

写作使我逐渐摆脱了幼年时期的愤怒和恐惧以及成年后对容貌的过分追求。为了弥补童年时未曾拥有的美貌，我为自己买了多少漂亮衣服啊！其实，童年时的丑小鸭并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么难看。那时，在一个充满了漂亮女人的家里，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我常想：“……要是咱家有个男人就好了。”一般来说，我为自己选择的服装都是为了得到男人的赞赏。

壁橱里的衣服越来越多，连我自己看了都晕头转向。心血来潮时，我会跑到阁楼上或地下室里，那里的杉木衣橱里挂满了过时的衣服。有一次，一条 8 英尺长的架子居然被过多的衣服压得塌了下来。上门修理的木工生气地说，“你应该在挂衣架之间保持两英寸的距离。”他给衣橱钉上更多的支架，同时毫不客气地指责我的购物欲。现在，每次打开壁橱的门，我都老老实实地遵守这条两英寸的规矩。

这并不是说我不再添加衣服了，而是对服装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原先以为漂亮的服装能使我光彩夺目，能把别人的眼光都吸引到我身上来，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服装反而成了我的一大负担。夜里只要一闭上眼，我就看到壁橱里的衣服成倍增长、堆积如山。这使我不禁想起神话故事里的傻姑娘们，她们每天夜里将大量的亚麻纺成金子，可是一到早晨，那些金子又变成了一文不值的亚麻。

凝视的目光和形象焦虑

上大学的时候，我决定主修艺术史这门专业，因为在上第一

堂课的时候，我就被早期文艺复兴绘画中圣母和圣子相互对视的眼光所深深打动。我在他们的眼睛之间看见一道难以描述的金光。这就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那些专门研究母婴关系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们称这道“爱的目光”为“凝视”。

对于这神秘的“凝视”我的心理分析医生丹尼尔·斯特恩提供了极其富有诗意的临床分析。我在他那里接受了长达5年的心理分析。当时我的生活正处在危机之中，熟悉的生活正在土崩瓦解，新的生活仍在黑暗中挣扎。在他的诊所里有一个房间，在那里，他观察、录像和记录母亲和婴儿之间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间婴儿观察室的隔壁，坐着我这个小孩子。我挑逗地交叉着两条长腿，那件杰弗里·比恩紧身连衫裤的领口开得低低的。在我们交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笑嘻嘻地试图诱惑他，只是偶尔因幼年丧父而略感悲伤。

10年后的今天，我在收集研究资料时发现了丹尼尔·斯特恩写的一本书《一个婴儿的日记》（1990年版），书的封底印着他的照片。不受诱惑的丹尼尔，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再一次进入了我的生活，因为这本书讲的是我们在婴儿时期所享受的凝视的目光会怎样决定我们长大后看待自己和别人的方式。

凝视的目光是所有爱情歌曲的主题。请听斯特恩在他的书里是如何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写婴儿对母亲的感情：

看到她的脸，就像进入一个美妙的世界。我在这里看到蓝天、白云和清清的河水。她的生命力和灵魂就是空气和阳光。这里常常风云变幻，但此时此刻却异常平静。不论是那优美的曲线还是柔和的脸颊，一切都纹丝不动。她在哪里？她在哪里？我心里发冷，害怕极了。我四处寻找有生命的东西。

找到了！她的整个生命都在眼睛里。

那双眼睛深深地吸引着我，那充满激情的目光使我陶醉。

渐渐地，她的脸又活了起来，发出美妙的光。它像一阵清风，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心像张开风帆的小船，随着她快乐地漂流。

不久以前，行为学家们还在说乳房是婴儿看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如今，研究婴儿的专家们都认为，当母亲给婴儿喂奶时，由于乳房离婴儿太近，婴儿的眼睛很难对它聚焦。而这时母亲和婴儿眼睛之间的距离大约有 10 英寸，这是聚焦的最佳距离。

“对婴儿来说 眼睛就是灵魂之窗。”斯特恩说，“在出生七周的婴儿眼里，眼睛是母亲脸上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他可以在那里看到她的整个心灵。”

渐渐地，孩子也把自己的眼睛看成灵魂之窗。当别人注视着他的眼睛时，他才会觉得别人真的看到了他。名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受侵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会看着众人眼睛上方的某个地方。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避免同对方的目光相交，使对方无法看到他们真正的自我。

斯特恩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 6 岁的小女孩在游戏中用手蒙住自己的眼睛。“如果你问她，‘我看得到你吗？’她会说，‘不！’毫无疑问 孩子知道你看得见她。她说‘不！’的意思是，‘如果你看不到我的眼睛 你就看不到我。’这就是说 只有看着她的眼睛 才算是真的看到了她。”

在南非，当一个祖鲁人碰到另一个祖鲁人时，他会说，“Sawubona，”意思是“Hello”。如果按字面意思翻译的话，就是“我看到了你。”

对婴儿来说，母亲脸上最能吸引他的是眼角的形状、瞳孔和眼白以及眉毛和皮肤之间的明暗对比。斯特恩认为，“这些东西

锁住了婴儿的目光，引起母亲和婴儿之间的对视，使孩子进入母子之间丰富的内心世界。”

直到三四岁的时候，眼睛对我们来说仍旧是最重要的东西。研究人员曾做过一项心理分析实验。他们要求一些三四岁的孩子画人像，目的是为了论证这个年龄的孩子倾向于把嘴巴视为人体形象中最重要的东西。结果是，绝大多数孩子都画了眼睛。

斯特恩强调，“相互对视在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体验。”当一方的眼睛在对方的左眼和右眼之间来回移动、对方的眼睛也以同样的方式看着他时，双方都能从对方的眼睛里“感受到思想的反射”。如果没有这样的对视，“双方之间就不会有如此特殊的关系。”如果我们在婴儿期间就与母亲有过这种心心相印的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就会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所爱的人。

除了情人和婴儿，人们通常只能对别人的眼睛直视几秒钟，因为沉默的对视会唤起强烈的感情，使人感到尴尬，甚至产生敌意。当两只野兽互相对视时，如果弱的一方不把目光移开，强的一方就会发起进攻。与此相反，凝视的目光却将情人和婴儿与对方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也许浪漫的爱情始于眼睛而不是心、性器官或脑子，”海伦·费希尔说，“因为凝视的目光引起会心的微笑。”我们生来就会解读脸部表情。在出生后的头3个月里，我们就能对别人发出微笑，我们的眼睛就能与别人的眼睛持续地对视。眼睛好比是一面镜子，它对我们自我形象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自己，如何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

婴儿并不需要母亲每时每刻都呆在身边。重要的是，孩子需要母亲的关注，需要看到她的微笑、尤其是那充满了爱的眼光。从母亲的眼睛里，婴儿获得了自信，看到了自己美好的影像。

与此同时，孩子也对母亲发出会心的微笑。观察婴儿的研究人员发现“视觉关注”和微笑是同步增长的，“两者对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都是不可缺少的。”

难怪有些母亲希望孩子永远留在她们身边。婴儿在大约六周后就会盯住母亲的眼睛、捕捉她的目光。对母亲来说，这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婴儿的眼光同丈夫的不一样，因为小家伙是全心全意地依恋着她。“这孩子是我的。”她开始觉得自己像圣母那样善良和宽厚，而且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很美丽。

在此之前，她从未从男人那里得到这种感觉。有多少次，她曾想用手指托住男人的下巴，把他的脸转向自己，盯住他的眼睛，对他说：“知道吗？我再也受不了了。你对我视而不见，你对我一无所知。”可是这种愤怒是无法表达的，因为她渴望对方看到的不仅仅是漂亮的头发或者性感的嘴唇，而是她本人。

当婴儿长到3个月大的时候，眼睛的焦距已经变得同成年人的差不多长。当母亲在房间里走动时，他的眼睛能够追随母亲的一举一动。当他长到半岁大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开始从人的脸扩大到其他有趣的东西。母亲已经不再是孩子视野中唯一的焦点。此时此刻，是捧住孩子的脸、试图重新抓住他的目光，还是心满意足地看着他把眼睛转向其他的东西？总有一天，孩子会学会爬、学会走，然后离开母亲去寻找一个独立的自我。亲近和分离，两者之间能否达到微妙的平衡，这将决定孩子将来能否找到爱和建立一个美好的自我形象。

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经历。例如，有的母亲对婴儿的长相感到失望，因为他使她想起家庭中某个她不喜欢的人，或者嫌他长得不够好看，因而自尊心受到伤害。这样，她对孩子的注视就会反应迟钝，她同孩子的亲密程度也会受到影响。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母亲成为十全十美的人。我的意思是，一个好母亲应该慷慨仁慈，给孩子足够的爱和关注，使孩子产生

良好的自我感觉，学会爱自己、爱别人。这是母亲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这就是生命。当孩子一周岁左右时，母亲的爱就变成了人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了它，孩子长大后就不会担心自己不够好看或可爱，也不会因缺乏自爱而丧失爱别人的能力。

婴儿时期同父母的关系决定了我们成年后能否做到在恋爱的时候不指望占有对方，在接受别人的爱的同时保持独立的自我。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就不会为自己在恋人心目中的形象而担惊受怕，也不会由于恋人向别的女人看上几眼或者没有守在我们身边而精神崩溃。

在写了 25 年关于母子关系、妒忌、羡慕以及性爱的书之后，我深信同外貌相关的种种苦恼都和我们婴儿时期同父母的关系有关。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的影响，但是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世界上最能引起女人妒忌的是看到自己所爱的男人“瞅着另一个女人”。其实他只是看看而已，而我们却妒火中烧，担心别的女人比自己更可爱、更让他着迷，担心他随时都会把我们抛弃。我们骂男人是无赖、无耻的好色之徒；他们只对一件事感兴趣；他们喜新厌旧，见了漂亮女人就蠢蠢欲动。实际上，是我们把自己的幻觉强加于人。我们把男人想像得太强大了。

如果我们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和自我形象，我们今天就不会为了自己的容貌而担惊受怕，徒劳无益地为它耗费这么多的金钱和心血。良好的自我形象来自于我们在婴儿时期所感受到的无条件的爱。有了它，我们就会放心地让自己所爱的男人欣赏别的女人。因为我们知道他为什么爱我们，这种爱不会由于他对别的女人看上几眼而改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魅力所在。早在婴儿时期，我们就在爸爸妈妈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我们知道自己是我们的掌上明珠，谁也不会夺走他们对我们的爱。这种美好的自我感觉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这就是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所说的“基本的信任感”。

今天，我们有能力养活自己，所以用不着像母亲当年那样依赖男人的赏识。我们甩开了没心没肺的男人们，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懂得如何赏识我们。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其他方式——时尚、花样翻新的服装和不断变换的发色——来寻求那梦寐以求的自我形象。

如今，上班的女人越来越多，在家带孩子的越来越少。发生在过去 25 年中的巨大变化进一步促进了关于婴儿的研究，因为发生在女人生活中的革命（这一革命也改变了男人的生活）打开了育儿室的门。看吧！这里没有圣母玛丽亚。当然，像圣母那样十全十美的母亲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然而，如果女人没有其他的角色可以扮演，如果女人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她们就只好呆在育儿室里。把母亲的角色理想化就是为了让她们心满意足地呆在家里。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性革命使女性大开眼界。她们在性生活的领域里公开地打破了母亲们的清规戒律。可是，一旦让她们说说自己对性爱有过什么样的想像，她们就会觉得自己犯了罪，她们的脑子就像上了一把锁。在那个充满了矛盾的年代，我们大胆地反抗传统的性压抑。有趣的是，我们敢做却不敢想。在追求性自由的同时，母亲的形象仍旧在无意识中使我们产生犯罪的感觉。是啊，我们现在仍旧觉得自己有罪。

为了弄清婴儿时期产生的问题，我们必须将它同妇女走出育儿室联系起来。婴儿时期的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可是，由于我们一直把母亲想像得十全十美，我们就看不到这些问题。我们在有些方面过高估计女人，在其他方面则贬低她们。我们对男人也不例外。我们让他们掌握经济大权，却不承认他们还有其他的天性。

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来改造我们的育儿室。这里有母亲，也有父亲。孩子可以从来自父母双方的凝视中看到自己。这个

美好的自我形象将永远陪伴他。

对于这些有关自尊心的棘手问题，我的导师精神病专家理查德·罗伯蒂勒给我的启发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在写《我母亲 / 我自己》这本书时，我常去他这间带点儿忧郁气氛的办公室，那里摆着非洲人的面具和独腿女人塑像。罗伯蒂勒认为，凝视的目光对自尊心（即良好的自我印象或感觉）的形成至关重要。那么，为什么良好的自我感觉在今天会变得如此难得？

我们时而得意忘形，穿着奇装异服趾高气扬地招摇过市，时而坠入绝望的深渊，愁眉苦脸地艰难跋涉，似乎在这两者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都是因为没有良好的自我印象，没有自尊心，没有出自内心的美。一切都是为了引人瞩目：只有别人看到我，我才存在。我们节食、买时髦衣服；我们拼命干活，以便能够花更多的钱来打扮自己。与此同时，我们对自己的容貌却越来越缺乏信心。这一切，都是因为做父母的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婴儿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的凝视越来越少。

分离：人生新的开端

如果我要给每个新生儿一样礼物的话，我将给他一张证书，这张证书能使他获得终身的而不是短暂的美貌。我将希望每个婴儿的父母都能接受玛格丽特·马勒关于分离和个体化的理论。我希望每个婴儿都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抚，或者说享受“共生”的快乐。不过，好爸爸好妈妈在适当的时候要舍得放开，鼓励孩子离开家庭闯荡世界。只要父母的爱在孩子的心里扎下了根，那么小家伙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独立的人。他能爱自己，也能爱别人，他是那样优雅自在、和蔼可亲，这使他不论在别人眼里还是在自己眼里都同样美好。世界上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

当我开始写关于母女关系的书时，我对玛格丽特·马勒的理论一无所知。我给出版商的大纲中还没有“共生”和“分离”这两个词。不过，我一读到马勒的理论就觉得它同我的思路太合拍了。在此之前，我一直相信我和母亲的关系非常好。不是吗？我是个独立自主的成功女人，我的生活同她的完全不同。然而，直到写完这本书时，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脚踏实地的安全感。虽然累得腰酸背疼，然而我很高兴再也不必生活在谎言之中。在我和母亲之间，有过真正的爱，也有过愤怒的时刻，愤怒是爱的另一个侧面。

马勒的理论对女儿和儿子同样适用。我们都是女人所生，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在婴儿时期都是由母亲抚养大的。母亲对我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包括我们以后怎样看自己。对了，马勒的理论也包括男人的作用。可喜的是，现在男人们开始走进育儿室了，他们的参与将使孩子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如果我现在仍用“她”来指亲手带孩子的人，那是因为亲手带孩子的人中女性仍占大多数，不过我希望你记住，这个“她”也包括做父亲的。

在依恋和分离之间不论走到哪个极端，都会使我们长大后讨厌自己的形象。这是因为我们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些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焦虑、刻板、过分挑剔、性冷淡，还有一副受害者的面孔。一个人要是在感情上永远不能把自己同母亲分离开来，她的一举一动就会显得刻板，她的前额上就会出现精神压力的皱纹，她的嘴唇就像铅笔一样僵硬。这就是我们的形象。当我们经过商店的橱窗时，橱窗的玻璃反射出来的就是这副令人讨厌的样子，我们挖空心思试图用化妆品或美容手术掩盖起来的也是这副样子。

如果我们不能成为独立的自我，我们就会像失去了一条腿那样，总是觉得缺少了什么，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镜子里的

影像。

我们都是独特的个体。在生命的最初时期，我们都需要享受足够的温暖和爱，同最亲近的人融为一体。在这天堂般的共生状态中，我们在母亲乳汁和目光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然而，不到一年，我们会离开这个天堂。为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发现一个独立的、有着独特形象自我？人只有在拥有独立的空间时才会感到安全。不然的话，我们一辈子都会依赖别人，害怕别人离开或抛弃我们。

分离是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它给人一种残忍的感觉，使人想起爱的终结，想起离婚之前那段严酷的日子。不过马勒所说的分离却有另一层含义，它是新生活的开始，它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能够爱别人的人。在此之前，我们对母亲的感情更多的是依赖而不是爱。梅拉尼·克莱因告诉我们，爱来自感激之情，这种感情只有在我们不再依赖全能的母亲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每个人都需要拥有自己的权能。如果母亲不让我们独立的话，我们会在人生的旅程上半途而废。在我看来，分离好比第二次新生。

出生后不到一年，我们就开始独自行动、离开母亲的怀抱往隔壁房间爬去——哈，这里有个新天地！突然，我们害怕起来——妈妈在哪儿？于是我们又回到妈妈怀里。等着我们的是妈妈的亲吻和拥抱。下一次，我们会爬得更远些。每次行动都是迈向独立的一小步。终于，我们走到院子里，跑到街上，越跑越远。我们每战胜一次恐惧都为自己赢得一块新地盘。上学、到新的地方去工作，我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每次新的冒险都给我们带来新的激动和成就感，新的自信和自我意识。这样，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拥有一个美好的自我形象。有了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如鱼得水。勇气和自信，这就是父母给孩子最慷慨的礼物。

如果我们一开始行动就感受到恐惧——从母亲那里感染到的恐惧——那我们在感情上就无法与她分离。不错，我们会离开她，但仍有一条无形的脐带将我们同她连在一起。我们焦虑不安，事事都渴望她的认可。这种恐惧说到底是一个害怕失去母爱的婴儿的恐惧。

感情上不能独立的女孩长大后永远离不开别人。从母亲、女友到男人，虽然依赖的对象不同，但他们都是母亲的替身。即使是遇到一个给她带来极大快乐的男人，她也会怀疑自己在他的眼里的形象。

即使成了家，有了孩子，我们仍旧需要母亲的赞同，哪怕是打个电话。只要她反对，我们就失去了勇气。即使她已不在人世，我们也会在她的阴影下生活。我们也许会做一些母亲不赞同的事情，或者试图改头换面、穿上时髦华丽的衣服，但是我们马上就会由于内疚而缩手缩脚。

也许热恋中的两性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分离”的含义。当陌生男女初次相遇时，两者之间的距离引发出激情的火花。当他们做爱时，如果女方同母亲的关系未能形成一种健康的分离状态，她就会一头栽进爱河，在男人的怀抱中完全丧失她那脆弱的自我。对她来说，做爱好比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方，投入男人的怀抱就像重新回到婴儿时期在妈妈身边享受过的亲密无间的共生状态。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男人的情况就不同了。迫于社会对男子的要求，母亲比较愿意让男孩学会独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男孩都能完成这一步，但他们至少表面上要显得独立。男人的问题在于如何暂时放下一些男子汉的架子，从性爱中获取新的活力。

如今，随着妇女越来越多地进入各行各业，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尴尬。经济上的独立并没有使女人摆脱感情上的

依赖。我们一边工作，一边仍旧竖起耳朵，眼巴巴地等着对方的电话。我们怀着一肚子的怨气：那些该死的男人，他们脑子里只有自己！于是我们就投入其他女人的怀抱。

与此同时，美容业却兴旺发达起来，因为女人们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有钱。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装扮自己。然而，为什么每天早晨，当我们打开挂满衣服的壁橱时，却找不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任何时髦服装也无法使我们对自己的形象感到满意。为了展示我们的性魅力，我们穿着高跟鞋，领口开得低低的。可是，透过烟雾，我们在酒吧间的镜子里看到的仍是一张充满焦虑的脸。

分离 美貌 竞争——这些恼人的题目之所以成为研究和争论的对象，难道不是因为今天的女人更需要了解自己吗？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里，女人只能呆在家里扮演母亲的角色，因此分离和建立独立的人格也就不显得那样重要。女儿理所当然要接母亲的班。为此，好妈妈们总是像老鹰一样监视女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检查女儿的日记。做女儿的要是有多多的自由和个性、在外表和行为上有任何独特的地方，那她就是个不幸的女孩。

在世人眼里，为孩子奉献一生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好妈妈就意味着牺牲，即使这种牺牲使她在生活中除了孩子之外没有任何能够使她快活的东西。可母亲和孩子相依为命的结果又会怎样呢？儿子将离开母亲成家立业，女儿虽永远是妈妈的女儿，可结婚后她将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依赖另一个人来保护她。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需要一个鲜明的、显示独立人格的自我形象。可是，翻开家里的旧影集，我们却很难找到一张女人单独拍的照片，她的形象总是同丈夫和孩子连在一起。这就是说，女人们祖祖辈辈都处在一种危险之中，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孤身一人时会变成什

么样子。毕竟，丈夫有可能离开妻子，孩子长大后也会离开母亲。

长期以来，女人们默默地忍受着由于缺乏独立自我而产生的焦虑、愤怒、忧郁以及对在经济上掌握实权的男人的羡慕。不是吗？我们靠男人养活，怎能对他们恩将仇报？对男人权力的愤愤不平最终将导致对母亲的愤怒，这是任何一个好女人都不愿承认的。在现代女权主义出现之前，女人们宁可塞住自己的嘴、忍受偏头痛或忧郁症的煎熬，或者干脆去死，也不愿承认她们对母爱的矛盾心情。

为了永远生活在理想的共生状态之中，女孩们在离开母亲之后就一心希望从男人那里得到同样的东西。为此，不管对方是否有此要求，我们迫不及待地向他们交出整个身心。女人总是对男人抱着极大的期望，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们。不是吗？从小时候起，母亲就教我们拒绝生活中的种种冒险——尤其是性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我们向这位白马王子献上宝贵的童贞，一心指望他能给我们带来第二次生命。为心目中的理想男人保持童贞并不是坏事。但是，一个指望男人“给”她性生活和性高潮的女人通常经历了漫长和痛苦的等待。

最后，女人们干脆放弃了性生活或者对性生活的尝试，因为对性表现出强烈的欲望不符合她们心目中“好女孩”的自我形象。当女孩长大成人时，在母亲和丈夫之间有一个短暂的空隙，那时，由男孩激发的性火花总会产生因越轨行为所产生的震撼。夜晚，当女孩在关了灯的汽车里、在浪漫的音乐声中同男孩互相拥抱时，她尝到了一点独立的滋味，那是一种既兴奋又害怕的体验。而结婚则是另一回事，那是一种回家的感觉。不知不觉之中，女儿在穿着打扮、言语行为，以及房间的布置上都越来越像母亲。不久，她就会有孩子，而她的女儿又将重新扮演同样的

角色。

我选择性这个题目，因为它是大多数女人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只要我们敢于对自己的性生活承担责任，性就能帮助我们摆脱对别人的依赖。“好女孩们”总是带着某种神态，似乎她们都属于那种讨厌性行为的女人。你可以选择不过性生活，但是讨厌性行为就是讨厌任何尽情享受性生活的女人。看来，只有当所有的女孩都克制自己的性行为时，女人们才能和平共处。

在成为作家之前，我总认为自己和母亲不一样，因为我是个性欲颇强的女人，她却不是。正是在这种沾沾自喜的心态推动之下，我着手撰写关于女人性生活的书。瞧——透明的衣服不受胸罩遮盖的乳头，70年代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镜子里我不是非常性感吗？我的调查结果显示，只要想得起来，大多数女人都能从早年的经历中找到性羞耻的感觉。对，就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吧。《我母亲/我自己》最初的书名是《第一次撒谎》。本来，这应该使我对写这个题目将会遇到的困难有所警惕。

3年之后，当我写完这本书时，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剥去了遮盖着母女关系的那层理想主义的面纱。我的母亲是个女人，她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在她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我们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天壤之别。她勇敢、有性欲、敢于竞争，对了，也有点儿喜欢自我表现。

某些崇尚母权的女权主义者攻击马勒鼓励母子分离。这些人在过去的10到15年期间都做了母亲。也许她们曾经为自由而游行、为争取妇女的权利而战斗，然而她们却不愿在自己和孩子之间实行独立的原则。

她们把所有的重炮都瞄准了男人这个错误的目标。“父权制之所以如此兴旺，就是因为它在女人之间造成分离，使她们互相争斗……”她们写道：“那些专家让母亲们相信，每个孩子都需要同母亲分离以便自立。这是谎言。他们把母亲对孩子的感情

说成是危害孩子健康成长的东西。更可恶的是，这套谎言将导致母亲在无意之中背叛女儿。”

太荒唐了。她们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男人头上，却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许多 20 年前上街游行的女权主义者们选择同男人一刀两断，因为一旦爱上某个男人，那种同对方融为一体的欲望就会死灰复燃，使她们无法担当女权主义斗士的角色。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男人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愿同女人融为一体。因此，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冷酷无情的男人都描绘成野兽和恶魔，把他们视为种种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他们给女人带来无尽的烦恼，包括对美貌没完没了的追求。

马勒的学说只是在最近 20 年间才流行起来。自从妇女在 70 年代中期大量进入工作场所，世界似乎被翻了个底朝天，许多曾经广为接受的信条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用上了交通图和图表。作为创造财富的女人，我们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身份。为了成为一个新女性，我们有必要了解自己、了解传统的女性。马勒为我们提供了解答题目的钥匙。

我们应该记得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做母亲是件不时髦的事情。我们要在工作上同男人和其他女人竞争，我们必须强悍泼辣、敢说敢干，这种情感与传统的母性是完全不相称的。马勒的理论正适合于这样的时代，因为她的关于感情分离的主张有助于确立自我和独立性，这种独立的身份正是渴望成功的职业妇女所需要的东西。

当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们仍处于单身状态时，马勒是她们的代言人。只是在这些人决定做母亲的时候，分离的理论才对她们失去作用。她们怀里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在感情上又回到母亲的身边。“我终于明白，当初她为什么不让我走！”请注意，马勒从来就没有叫我们抛弃自己的母亲。感情上

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同母亲一刀两断或同她作对。)怀中的小宝贝使她们体验到的同对方融为一体的极乐。这就是为母之道和为妇之道的精髓。竞争和性欲则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我一看到女儿……就觉得我会为她献出一切，”一位马勒的反对者写道，“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母亲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一个动机，那就是爱。”这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的爱是十全十美的。如果我们期待或试图给予这样的爱，那我们注定要失败。爱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大多数母亲尽了自己的努力，但是没人能做得十全十美，她们也不该这样要求自己。我们要求母亲仿效母爱的典范，可这种典范是不存在的。在那理想化的母亲形象之下隐藏着母亲的不足之处。我们把这些不足之处藏在心底里并且将它们内在化。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原谅母亲：瞧，妈妈，我现在和你一模一样，唠唠叨叨，管这管那，什么都不肯放手。

那些把女性的所有弱点和问题都归咎于男人的女权主义者会使这个世界变得十分可怕。她们总是把自己看作好人，把对方视为恶棍。即使当她们在工作场所同男人或别的女人竞争时，她们也拒不承认自己具有任何竞争意识，因为在她们看来，只有邪恶的男人才热衷于竞争，只有女人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女权主义者们一方面竭力从男人手里争到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竭力加固女儿与母亲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任何正视现实的言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

今天，女人们不像以前那样需要男人了。为此，她们写书反对那些主张母女分离的理论。“母女之间的关系是打破父权社会的关键所在，”希尔·海特写道，“母亲和女儿不是‘天然的敌人’（母亲和女儿为了争夺父亲的爱而成为天然的敌人，这是弗洛伊德那自我膨胀的头脑想像出来的东西）相反 她们是‘天然

的'盟友，因为她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维护这种关系的话，男人就无法大权独揽，父权社会就会终结。”

她们所要的，是一个由女人来掌权的母权社会。为此，她们痛斥那些邪恶的圈外人，因为这些人试图强迫女人们正视她们相互之间的愤怒。“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她对我的爱”这类说法使年轻的母亲们心安理得地在自己和女儿之间重复上一代的母女关系。因为她们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对还是错，只要是出于爱，那就是合理的。

这其实是背叛自己的女儿。做母亲的不让孩子独立，不让她拥有个人的空间，这样一来，孩子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永远不能学会在爱别人的同时不依赖别人。由于无法否认健康的分离的必要性，有些人试图两者兼顾。她们写书，主张“分离状态下的依恋”和“连接状态下的自主”，其结果无非是语义上的混乱，让人看了不知所云。

在我们这个破碎的、一切都变化无常、转眼即逝的世界里，同最亲近的人分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痛苦。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马勒的理论。我们只能为孩子提供短暂的保护，真正的安全感必须来自于内心。引导孩子完成这个学习过程的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个对孩子爱得最深的人。要是没有这种运气，孩子和大人都会受到损害。

请别把我看成是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旁观者。我第一次结婚时，一心想从男人那里得到童年时没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共生的极乐。那时要是有人对我说“分离”这两个字，我一定会大声嘲笑他的。不是吗？我是城里最独立、最能养活自己的女孩，我从来没让男人花一分钱为我付房租，最重要的是，在性生活上，我也是出了名的独立。

我的前夫也许不是我爱上的第一个男人，不过他确实是我希望能共同生活的第一个男人。有了他，我就有了一个家，一个

童年时从未体验过的家。他只爱我一个人，他就是我理想中的母亲。我本该早点儿离开他，可是，要舍弃自己勾画的人间乐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结婚之后，我的外表就起了变化。无意之中，我的服装和发型变得更加保守和讲究，更像个家庭主妇；我也不像过去那样冲劲十足，我的举止更像条可爱的母牛。对此，我丈夫也挺满意。别看男人们神气活现、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其实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暗地里都在寻找第二个妈妈。

对我丈夫那样的男人来说，我就是他想要的好妈妈。我给他买衣服、为他整理手提箱。我写书成功之后，总是把功劳归于他，把他说成是家里“真正的”作家。“你为什么不去争取更大的荣耀？”有位老友问我。可是，要是我跑到丈夫的前面，谁还会来照顾我？

于是，我把自己挣来的钱全都交给他，甚至拒绝在支票上印上我的名字。我想让他觉得我依赖他、是个弱者。虽然我最终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可在感情上，我仍旧把他当作母亲。当然，这只是在无意识之中。“他的眼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我的女友们羡慕地说。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妈妈。

当我们在一起时，他甚至不向别的女人看一眼：这就是促使我同他结婚的首要原因。不错，他有魅力、有幽默感、有学问，可是这些品质其他男人也有。我在开始同他约会之前就注意到，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东西。他对自己的情人是那样迷恋以至于从来不向别的女人认真看一眼。直到我主动去结识他。

“他永远不会使你满意。”我原先的男友警告我。

他哪里知道，我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性的满足，尽管当时我自己也不清楚到底为了什么。我想要的是这样一个男人：他把我视为掌上明珠，并且永远只爱我一个人。

“记得吗，我是怎样得到你的？”我丈夫常常这样问我。

其实，是我挑中了他，因为我知道，一旦他那凝视的目光落到我头上，他就永远不会离开我。我们的婚姻将双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像母与子那样亲密无间。那感觉就像一双互相抚摸着的手，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激情，却能互相安慰。

记得婚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一家餐厅里用餐。离我们不远处坐着两个男子，他们一面说笑，一面瞅着我。我对这种情况已习以为常。后来我听到其中的一个说，“她有多大？20还是40？”

直到成为作家之后，我才明白结婚后我的样子发生了多大变化。毫无疑问，我是在无意识中与母亲团圆。那个人见人爱、生气勃勃的女孩不见了，那张微笑着的脸现在绷得紧紧的。

有的女人即使不结婚也会变成这样。照镜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细小的皱纹、变薄了的嘴唇、松垂的皮肤和大腿上的肉纹，看到别人还没看到的衰老。虽然只有25岁，但我们永远摆脱不了母亲的影子。

摆脱理想化的母亲/女人

也许你会说，我们之所以变得像自己的母亲是因为我们爱她。然而，为什么我们会继承她身上那些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真正的爱不是出于欠缺和害怕，而是独立的个人所作出的有意识的选择。我们选择这个“他者”是为了扩大我们的空间而不是使它变得更安全。

老话说，男人在结婚前要好好看看未来的丈母娘，因为这就是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将来的模样。今天的女人不再守在家里，在穿着打扮和言语行为上也同过去大不一样。这些表面的变化使我们觉得自己不会变得像母亲那样。可是，请别低估幼年时

同母亲的关系。只有那些从小就在大人的关爱和鼓励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的女孩才能在成年后充满自信地面对镜子里的那个自我。如果她对自己所爱的人说“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她的意思是，生活中有了他就更加丰富多彩，而不是，没了他就活不下去。

三四百年前，母性只是少数人才能持有的奢侈品。家庭是个为生存而奋斗的工作团体，生养孩子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帮家里种地或织布。孩子们是没有童年的，或者说，童年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孩子这个词只是用来表示两代人的关系。巴巴拉·塔奇曼说，“同现代社会相比，中世纪缺少对孩子的关注。这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在中世纪的艺术作品中，孩子看上去就像小大人，表情和肌肉的形状同画中那些比他们高大的成年人一模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中世纪的孩子一旦能够照顾自己，就立刻进入了成人社会。

在那个时代，生命是脆弱的，婴幼儿的死亡是家常便饭，所以成年人无法对他们倾注太多的感情。通常的做法是尽可能多生孩子，只求能有几个活下来帮助维持这个家。从15世纪开始，情况起了巨大的变化。神父、律师和学者们推动了社会的道德化。他们教导人们：“父母要在上帝面前对孩子的灵魂和身体负责……对孩子的关注激发了新的感情和道德观，17世纪的肖像艺术持续地、极其出色地表达了这种现代的家庭观念。”就像我们所熟悉的17世纪后的绘画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的祖先开始扮演受人尊重的父母角色，他们的样子也变得高尚而且富有德性。

有趣的是正如尼尔·波斯特曼所说“是印刷技术和读书写字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思考和谈论那个独一无二的自我。正一强化了了的自我意识最终导致童年的出现。”这个变化不是一

夜之间就出现的。直到 18 世纪后期，母亲们还经常将孩子丢给孤儿院，或者交给奶妈。这种做法将孩子生存的可能性减少了一半。直到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才养得起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家庭。直到人们把工作场所从家里和田里转移到工厂和公共领域之后，家庭才被人视为一个单独存在的领域，女人的首要任务才变成呆在家生养孩子，而男人的奋斗目标才变成尽量多挣钱以便为这个家提供衣食和住房。而由此，养家的好丈夫不久就被定义为“男子汉”并广泛被人认同。意即：人们通过他的家庭状况来判断他是否是个成功的男人。

家里的浪漫是一种经济上的奢侈。男人越能挣钱，他的家庭就越能享受安定的生活和社会的尊重。19 世纪的男人要求他的妻子扮演“家庭修女”的角色。为了成就“大事业”，男人们需要越来越多地同污秽和腐败的东西打交道，因而他们指望有一个圣洁的妻子来使他们的灵魂得救。19 世纪肖像画里的那些女人都是面无表情，看上去没什么性欲，倒是有点儿沾沾自喜，好像已经得到了女人毕生所追求的一切。她们的表情挺像 50 年代那些老照片里的年轻父母们。那时的年轻人都想在毕业的那天就结婚成家。在短短的一年之中，中学时代的照片里那些火辣辣的少女形象就被年轻的主妇们所取代。我并不是看不起这样的选择。如果女人没有财产，单身一人就很难生活。在那时，一个女人如果到了 25 岁还没结婚，别人就会对她有看法。她在照镜子的时候也会仔细查看自己，希望自己的容貌对男人仍有吸引力。

那种将母亲和孩子理想化的观点使女人们获得了某种力量和认同感，这有助于她们联合起来对付掌握经济大权的男人。但是另一个后果也同样不容忽视：女性一旦被抬到圣母的宝座上就失去了性欲和性感。有了这样的妻子，男人们就可以放心地离开家在办公室里工作了。在性生活上，她也许是个枯燥

味的伴侣，但她能扮演免费保姆和管家的角色。再说，男人要享受性的极乐并不难，到处都有荡妇和妓女。20世纪50年代影片中的那些坏女人比如说格洛丽亚·格雷厄姆、玛莉莲·梦露、简·拉塞尔她们看上去就同琼·阿利森那样的贤妻良母不一样。血红的嘴唇、高耸的胸罩、紧贴着屁股的裙子，还有那对只要看一眼就能使男人神魂颠倒的眼睛，这一切都是坏女人的特征。不用说，同她们结伴的那些男人，比如罗伯特·米切姆，看上去也不像做父亲的。

父权社会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家庭爱情故事的结构。男女之间的分工使男人很少接触孩子，因为育儿室里是不需要男人的。如今，在妇女大量就业的新经济时代，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都能做。既然如此，男人的作用也应该有所扩大，因为这能使他们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许多女人已无法担当圣母的角色，虽然她们绝对不会放弃做妻子的责任。有些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允许她们这样做，有些则压根就没有这种愿望。这就意味着她们已放弃贤妻良母这个最受尊重的女性角色。

别以为只有女人才不让男人进育儿室。妇女进入充满激烈竞争的工商领域被视为历史的一大飞跃，但男人若进入女人的传统领域却享受不到什么荣光。对许多男人来说，这简直是耻辱。在他们眼里，那样的男人必定是一群女人气十足、没有勇气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的家伙，他们败坏了“男子汉”的形象。在一次对共和党成员们发表的演说中，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候选人宣称男人“生来”就倾向于成为一家之长言下之意女人“生来”就喜欢呆在家里围着锅台转。

还有位男士写了篇题为《武士元老》的文章发表在某个杂志上：“不论男人以什么样的风格行事——暗暗地、引人瞩目地、温文尔雅地、吵吵嚷嚷地、甚至是无法无天地重要的是他必须昂首阔步、勇往直前。但是我要对你们说，先生们，要是你们背着

个白白胖胖，只晓得吃了睡、睡了吃的小毛头，你们就没力气大步往前跑了。因为胸前绑着斯纳格利婴儿包的人是没法挺胸阔步的。”

20 世纪 50 年代是理想家庭的黄金时代。在 50 年代的图片里，母亲和女儿连穿着打扮都十分相似。这类图片暗示，母亲和女儿永远亲密无间，母亲尽心尽力将女儿养大，女儿在做了母亲之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女儿。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想法。它使女孩们感到，她们没有独特的人格，只不过是妈妈的翻版。从 70 年代起，妇女们冲劲十足地进入各种工作领域，她们的穿着打扮也同前辈大不一样。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 25 年。如今我们似乎又回到 50 年代。在女性杂志上登载的大量图片中，小女孩们又开始模仿她们的妈妈。也许，这是因为有些女人已经厌倦了辛辛苦苦的上班族生活，希望恢复过去那种天真可爱、小鸟依人的形象。

确实，许多女人发现，上班并不像她们所期待的那样有意思。有些经济条件好的女人就选择了辞职回家。不过这些人已经不是从前的家庭妇女了。她们拥有移动电话和竞争意识，这些都明显地改变了她们持家的方式。《华尔街日报》最近登载了一篇关于回家族妈妈的文章。她们在组织合伙用车、教师家长联谊会、曲奇饼大赛之类活动时所显示的那股竞争热情丝毫不亚于她们在公司营销会议上的表现。我们女人其实是竞争的老手，尽管我们口头上讨厌竞争。不管今天的育儿室是个什么样子，它绝对不是 50 年代的翻版。

在那些只有男人才能参加的俱乐部里，当有人问，“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回答是，“一切的一切。”那么，当女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指责男人，要他们对女人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负责时，男人为什么一声不吭？为什么如此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他们的战术：保持低姿态，拒绝同女人们正面交锋，就像达格伍德和德西·阿

纳兹对付布龙迪和露西尔·鲍尔那样。男人们以沉默应战，他们依赖的是传统的男性斯多葛主义。就这样，两性之战越打越长，而孩子们则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崇尚母权的女权主义者曾指责我太喜欢男人、对他们太客气，并进一步断言我对女人们所遭受的艰难毫无同情心。至于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我写的那些书可以作证。我也不会恋上所有的男人。不过，如果说，是爱情之光照亮了我的窗子，那盏灯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如果一个女孩从小就失去了父亲，那她就永远不会停止对男性的渴望。

有些男人则会长久地渴望发挥他们性格中具有女性特征的部分，那是他们多年前在社会分工的压力下被迫抛弃的东西。正如我曾努力压制自己的泼辣和直言不讳那样，男人们也以强横霸道或沉默来扼杀他们性格中“温和”的一面。做爸爸对男人们大有好处，因为这样他们就有机会重新找回同情心，找回失去的那部分自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天生喜欢孩子，女人也一样。我们总以为，所有的男人都能挣钱养家，所有的女人都具备做母亲的天性；女人只要一生孩子，母性就会自然地显露出来。如今，所有的工作场所都人满为患，然而，育儿室里却冷冷清清。现在是重新洗牌、重新分配工作的时候了。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他或她最适合做什么。

即使在工作上忙得不可开交，女人们也不会轻易放弃照看孩子的责任。虽然许多人竭力否认这一点，但她们或多或少都意识到，在任何社会里，养育人类的后代从来都是一项极其重大的使命 因此她们不愿看到男人在育儿室里干“女人的活”与她们分享这份权力。

于是，无意之中她们采用了一种最最古老、然而百分之百行之有效的策略来确保女人对这块地盘的垄断，那就是将女人理想化。她们将怀抱婴儿的母亲奉为崇拜的偶像，她们矢口否认

女人之间存在任何恶念或竞争，她们把世界上所有的邪恶都归咎于男人。

女人仍旧占据着育儿室这块领地，但是在其他地方，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商场上出现了一批重量级女强人。就拿今天早报上的一条新闻来说吧，那是关于一位女强人的简介。此人好出风头、不讨人喜欢，但却精明强干，在出版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今，越来越多的女强人正在进入政界。她们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她们呼风唤雨、甚至可以发动战争。总之，她们的行为同男人没什么两样。如果女人也能干那些通常只有最最冷酷和惟利是图的男人才能干的事，那么，做父亲的男人为什么不能像女人那样温柔体贴地照顾孩子？

我很喜欢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写的《谁偷走了女权主义？》，她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群丑图。那是一群热衷于自我扩张的恶棍，她们耍阴谋打入有利可图的领域，然后就像男性独裁者那样耀武扬威、大权独揽。事实确实如此。许多通常用来描写男性世界黑暗面的词汇，如“秘密行动”、“卑鄙手段”、“堵漏人员”、“假情报”等等，现在都能恰到好处地用于当代女权主义。令人欣慰的是，她们中的某些人今天能在女人的笔下原形毕露。萨默斯的书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她用严谨的调查研究暂时驱散了神圣的姐妹之情这层烟雾。作为报复，她的反对者们到处活动，企图迫使电视台取消让她在电视访谈节目中露面的安排，使她无法向公众推销这本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近来出现了一批“妈妈恐怖片”。很难想像，10年前这样的影片会得到观众的赏识。在《妈妈连环杀手》影片中，凯瑟琳·特纳的表演令人捧腹大笑。她扮演的妈妈专杀那些不愿回收垃圾的人。《纽约时报》引用了罗西娜的一句话：“我说女人应该更加强悍，应该多杀掉一些她们的老公。”只要想想特纳从这部影片中赚到的数百万美金，我们就不难看到，

百分之五十的美国人从这位气势汹汹、强悍泼辣的妈妈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妻子 / 母亲。就拿近来陷入白水事件丑闻的希拉里 · 克林顿来说，她完全可以成为这类电视片中的明星。

有趣的是，尽管女人们显示出如此强大的能量，我们却很少听到与此相关的评论。男人们很少评论女权主义内部形形色色相互对立的势力。也许他们是在隔山观虎斗，也许他们害怕那些母老虎，我就很怕她们。不过我也对男人们失去了耐心，因为他们的孩子正处在危险之中。我要向他们大声疾呼，“该死的，快行动起来！”

没有任何事情比父亲亲自抚养孩子更重要了。这件事必须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做。不幸的是，男人们至今仍徘徊在育儿室的门外。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除非得到妻子真心诚意的邀请，不然的话他们就不敢插手。

生活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变化。20年前，谁会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精疲力竭的爸爸”离家出走，这么多的女人在怀孕之前就打定主意把男人从孩子的生活中排斥出去？成年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失去了控制。我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在什么对孩子最有利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心理学家佩内洛普 · 利奇坦率地指出：“成年人必须为婴幼儿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和24小时无微不至的照顾。社会要求每个健康的成年人都能挣钱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必须离开家、在特定的地方工作一整天。一个人不能身兼两处，同时承担挣钱养家和照顾孩子这两副重担。”

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从小就失去了父亲。那是一种永久的匮乏、无法填补的真空。我的父亲是个谜。直到动笔写作的时候，我才有勇气来思考这个问题。孩子需要父母双方共
、无微不至的关爱。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孩子才能在人生的

道路上阔步向前。不切实际的幻想吗？曾几何时，妇女挣钱养家也仅仅是许多人的理想。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在进化。

育儿室里的男人

尽管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曾被女神们授予审美的大权，但是，对美貌的最终裁判权其实并不属于男人，因为他们对容貌的观察远不及女人那样挑剔。女人们的眼睛可厉害了，她们专门在你身上寻找那些你煞费苦心试图掩盖的缺点或瑕疵。在她们的眼里，你永远不可能完美。她们的眼睛永远不会对你说，“就这样亲爱的再好不过了！”

如果我们在生命的最初时刻就感受到父亲关注的目光，如果他常常抱我们、给我们洗澡，如果我们经常听到他的声音，如果我们同他亲密无间、相互理解，那么我们今天对男人就会多一层信任。

你是否认真想过，女人梳妆打扮究竟是为了什么？

育儿室里要是没有父亲，母亲/女人的眼睛就成了绝对的权威。如果她在我们身上没有找到她喜欢的东西，如果她对我们的头发或身材不满意，我们会感到自己不合她的要求，甚至觉得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那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因为在育儿室里，母亲就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在这种共生状态之中，我们不加选择地接受了母亲的所有看法。当我们开始同其他女孩交往时，我们也不加选择地将她们的看法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她们的眼睛像判官那样跟随着我们，而我们则完全处于她们的控制之下。当女友们将我们撇在一旁，一边窃窃私语、一边用挑剔的目光看着我们时，那眼光就像刀子，它能在顷刻之间摧毁我们的所有自信。我们害怕受到别人的排斥，就像小时候害怕失

去妈妈的喜爱。

西蒙·德波伏娃说过，“人们常说，女人梳妆打扮是为了引起其他女人的妒忌，而这种妒忌就是成功的标志。”由于育儿室里缺少男人的目光，我们习惯于依赖女人的判断来获得自信。当我们进入工作场所、需要同男士们建立更加复杂的关系时，这种心理习惯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同自尊心一样，决定一个人自我形象的不仅是外表，还包括行为、思想、自我感觉以及看待自己的方式。一个完全由女性控制的育儿室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女性垄断的育儿室同男人垄断的工作场所其实是同一时代的两个对立面。

事实上，“新父性”已经形成了一股颇为强大的力量。《时代》杂志还特地登载了一篇以此为标题的封面故事。可惜这并没有发展成女权运动那样跨文化、跨性别的革命。大多数提倡“新父性”的人目前仍处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他们中间有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专业幼儿教育者、作家、父亲……对了，感谢上帝，还有妇女。尽管他们据理力争，却未能赢得公众在舆论和感情上的支持。为什么我们鼓励妇女进入工作场所，却不愿看到男人进入育儿室？

目前已有大量的出版物谈论父亲在孩子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类书籍仍在不断增加。让我们从斯波克爷爷开始吧。他在1933年曾经说过：“……一想到要他们帮忙照顾婴儿……做爸爸的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60年后，他却建议：“从孩子出生的那天起，父亲就应该和母亲一起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同母子关系一样，这是建立父子关系的最自然的方式。”

我们从一些科研成果中得知，父亲同母亲一样，对即将出生的小宝宝充满了期待。孩子诞生的时候，90%的父亲都守在产房里。他们见到新生的孩子同样无比兴奋。当他们用奶瓶给孩子喂奶时，即使是从未接触过婴儿的男人也能干得像女人一样

好。在父亲的眼里，他的小宝贝完美无缺，赛过其他任何人的孩子。孩子对他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即使从来没人告诉他，婴儿对高声调的反应最敏锐，他也会自动地用假声同孩子说话。

心理学家迈克尔·拉姆指出，“同某些将母性视为本能的理论相反，母亲和父亲都是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学会’做父母的。”至于父亲 精神病专家马丁·格林伯格认为“同孩子在一起会使他们的感情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会极大地提高他们的自尊心。”当然，总有些做父亲的不能或者不愿同孩子建立密切的关系。有些做母亲不也是如此吗？只是我们不愿放弃那种视母性为女性本能的观念，因为我们相信母性是理想的母亲生来就有的东西。

大约 15 年前的春天，我第一次听说有些女人决定在不让任何男人参与的情况下单独生养孩子。那天我在厨房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纸。那天的报纸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一篇文章，并附有一些怀抱婴儿的女人的照片。我以为那是个爱情故事，于是就接着往下看。

我记不清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大吃一惊还是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女人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为什么《纽约时报》要如此随意地刊登这样的文章？那天上午，我给一位从事心理治疗的女友打了个电话。她的回答使我震惊：“没错，我有好几位女病人都打算这样做。”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她又说：“南希，女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孩子。”

“可是，难道孩子就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父亲？”我脱口喊道。这样的话我后来又说过许多次，直到我的几位最要好的女友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这样的选择越来越时兴了。

即使做父亲的对家庭忠心耿耿，我们仍旧顽固地阻止他们进入育儿室：男人带孩子远比妇女离家工作更为离经叛道。今天，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让一个女人在办公室里主持会议，但

是，如果有谁告诉我们，此时此刻她的丈夫正在家里抱孩子，那我们就无法接受了。一个在男厕所里给孩子换尿布或者离职一年在家带孩子的男人要比穿着女人衣服到处乱窜的易装癖者更加令人难堪。对此，男士们心里是完全清楚的。

心理学家杰罗尔德·李·夏皮罗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写了三本关于如何做父亲的书。夏皮罗指出，“我们的社会给男人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你要参与抚养孩子，但你不适合担任母亲的角色；第二，你可以进入产房和育儿室，但我们不需要你全力以赴。我们只需要你的支持。我们的文化传统不能容忍男人表现出恐惧、气愤或悲伤的情感。我们害怕他们变得温柔，因为我们指望他们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许多做母亲的大部分时间都得去上班，有些女人更喜欢出门工作而不是在家带孩子，有些女人生来就不会带孩子——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育儿室仍旧是女人的天下。不是吗？要是孩子同父亲的关系变得同母亲一样亲热，做妈妈的在家里还有什么地位？

在我们的无意识中，深藏着一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感情。这些感情根深蒂固，要改变它们往往需要几代的时间。我们首先要在口头上向它们挑战，要改变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如此反复较量，才能最终导致无意识中的变化。带孩子的男人使我们在理智和感觉上都感到很习惯。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支持这种尝试，直到怀抱婴儿的男人也能像办公室里的女人一样，能够心安理得地扮演这种角色。

记得大约 15 年前在一次对贝里·布雷泽尔顿的访谈中，我问道，“考虑到女人们不愿让男人在育儿室里同她们平起平坐，我们怎样才能使更多的男人走进育儿室呢？”

“你必须持续不断地大声疾呼。”他答道。

今天，27%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在 1970 年

只有 20% 美国性教育、性咨询及性治疗工作者联合会 (ASECT) 主席朱迪斯·赛弗说：“同双亲家庭的孩子相比 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单亲家庭的孩子在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后也会处于不利地位。那些选择单独抚养孩子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决定实在是非常自私的。”

根据一份 1994 年发表的报告，尽管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明 在出生后的头 3 年中，孩子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大脑结构和学习能力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美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婴幼儿生活在贫困之中……而最容易在行为和感情方面出问题的……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妨碍男人在家里同女人共同抚养孩子的最大阻力来自我们脑子里固有的男子汉形象。没有人会对一个女人说，“你必须证明你是个女人。”一个人只要生下来是女的，那就毫无疑问是个女人。男人可不同，他们要在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中证明他们是男子汉。这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能攻占那片海滩，如果他们没有勇气往前冲，如果他们不能使家里人过上好日子，他们就失去了做男子汉的资格。男人们很清楚，如果他们真的去享受公司为爸爸们提供的产假，整个社会会怎样看待他们。同事们也许会拍拍他的肩膀 说他是个好丈夫 但是 即使嘴上不说 大家心里也很明白，一个离开工作岗位的男人，即使是为了孩子，也会被人瞧不起。他的同事们得顶替他的工作，他的下级则会拼命争夺他空出来的位子。

应该承认，我们是多么不愿意抛弃那种以“征服者”气概为标志的男性形象。为此 我们竭力使男人远离“女人干的活”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剥夺了孩子的权利，也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

在竞争激烈的企业界，为了孩子而请假是得不到同情的，对男人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从老板、公司、企业文化、甚至他们的

妻子那里得到的反馈，”《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断言“说到底就是一句令人泄气的话：我们不信任、也不需要扮演爸爸角色的男人。”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儿童》杂志曾在 1992 年计划跟踪观察一批对做父亲的男人特别优待的公司。可是，合格的公司太少了，甚至很难找到对此感兴趣的公司，因此那份杂志第二年就取消了这项调查。耶鲁大学的精神病专家凯尔·普鲁厄特在对一些妇女组织和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组织发表演说时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人们指责他企图篡夺女人在育儿室里的位子，在他们看来这是“自然”赋予女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大多数女人都想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她们对女权主义政治不感兴趣，然而她们也不愿看到女人们代代相传的角色被男人替代。她们绝不想让孩子吃亏，然而她们也不愿放弃传统的权力。有些研究证明，尽管大多数男人希望更多地参与养育孩子的工作，可在接受调查的女人中，60%到 80%的人却不愿她们的丈夫在这方面比她们做得更多。

人就是这样矛盾。既然妇女们选择了离家工作，那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丈夫同她们一起来照顾孩子。许多女人虽然承认这一点，但心里还是不情愿。

我们不愿放弃、甚至不愿同男人们分担养育人类的后代这样一个权力重大的角色，虽然我们仍旧喜欢把母亲的身份说成是一种牺牲而不是权力。可是，男人也需要那样的权力，他们也愿意为此作出牺牲。

问题不在于男人是否有能力像女人一样照顾婴儿。事实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做到。关键在于，我们仍旧将父亲们想像为“男子汉大丈夫”。大概是因为我们在幼年时代同父亲缺乏感情上的接触，所以在我们的脑子里总是保留着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由于我们从小就依赖母亲和她的爱，即使心里有气，我们也不敢在她面前发作。可是父亲同母亲不一样。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那样高大强悍，坚如磐石。这样的男人什么都能忍受。对，只有把男人想像成硬汉，让他们来承受我们的怒气，我们才不至于气得发狂。

我们宁愿让男人们去打仗、战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也不愿让他们进入育儿室，虽然我们也多多少少意识到，社会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妇女离家工作、家里无人照顾孩子。在我们眼里，怀抱婴儿的男人要比那些在公司里拿高薪、挣大钱、强悍泼辣、对男人们发号施令的女强人更加令人不安。这是因为强悍泼辣的女老板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她们的专横使我们想起育儿室里大权独揽的母亲。为了避免女人之间的直接冲突，我们需要一个斯瓦辛格式的硬汉，把他当作攻击的目标、让他来承受女权主义的抱怨。

《纽约时报》登了一篇题为“怀孕少女不再遭人唾弃”的文章，上面还有一张少女给她的第二个孩子喂奶的照片。作者在文章里写道，“如今怀孕的少女甚至被有些同龄人视为榜样。”无疑，任何一个怀孕的未婚女孩都不该受到排斥，可是，为什么要吹捧和效仿她们？

我不禁诧异，为什么公众对此毫无反应？难道我们不知道，孩子既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这个少女在社会中的处境越来越坏，我们仍旧继续在报刊和电视上制造单身母亲的形象：她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父亲则变得无关紧要。

“总有一天那些单身母亲会意识到她们需要一个男人，”贝里·布雷泽尔顿在几年前对我说，“只要你能使她们看到男女共同抚养孩子的好处，她们就会为了孩子而回心转意。这就是我的目标。她们希望孩子完全属于自己，可是我很为那些孩子

担心。‘关于孩子的父亲我能对女儿说些什么呢？’有一次，一位3岁孩子的母亲问我。‘你说什么？’她的问题使我大为惊讶。‘我知道小姑娘心里需要一个理想的父亲。’她说。‘毫无疑问！’我答道。‘难道我就不能弥补这个缺憾？’她又问。我对她说，‘我想你应该帮她了解自己的父亲，至少让她知道自己为什么同别的孩子不一样。’她说，‘可是你知道我从来就不想要什么男人。在做人工授精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不想知道任何关于孩子父亲的事。’”

这种崇尚单身母亲、热衷于在没有任何男人参与的情况下生养后代的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与此同时，男人们在发怒。他们决心以男性美、男性时尚和男性模特儿的偶像魅力同女人争夺美的特权。这两种现象之间难道没有任何关联？

大多数男人只有在妻子同意的情况下才会进育儿室照顾孩子。真正的女权主义应该关心的是：如何让孩子得到父母双方的照顾，如何促使成年男女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斗，如何使他们放弃那种以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权利放在孩子的利益之上的做法。与其没完没了地罗列男人对女人犯下的罪行，我们还不如多问几个“为什么”：男人们为什么要发火？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这样粗暴地对待女人和孩子？要知道，他们不是外人，他们是我们的父亲、丈夫、情人和朋友，他们是孩子的爸爸。在数落男人的时候，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犯了多少罪、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也许斯多葛式的沉默是男性最后一件法宝。也许拒绝正面反击女人们向他们发起的攻击是男人的一种策略。我丈夫把这种策略叫作“果冻式防御”——当一个女人冲进他的办公室大发雷霆、又哭又闹的时候，他总是不动声色地坐着，等她闹完后自动离开。

虽然男人们在工作场所失去了不少地盘，但他们很少公开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愤怒，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男人们一贯是通过

竞争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的。要是男人们也以性骚扰、虐待孩子或者强奸等罪名来指控女人——有些确实有理由这样做——不难想像，此举会引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发出抗议的声音，而真正的男子汉们则按兵不动。

不过，我觉得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当然，男权运动的先驱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就拿抚养孩子来说，这对男人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妻子的也许会叫丈夫帮她抱一下孩子，可是，只要孩子一落到他的怀里，她就开始不停地抱怨，这也不满意、那也不称心。男人希望女人平等地对待他们，可是在育儿室里，她对他就像个霸道的母亲。于是，他只好离开。

如果男人能抱着自己的孩子、重新显出他温柔的一面，那该多好。正如女人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重新获得在青春期失去的技术和才能，男人同孩子在一起也能找回他失去的那部分自我。而且，男人的独立性和适应能力对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也大有好处。研究证明，对渴望探索周围世界的孩子，父亲的做法同母亲不一样。母亲整天担惊受怕、寸步不离地跟着孩子，而父亲则呆在一旁观察、鼓励孩子大胆行动。

俄勒冈卫生科技大学的家庭护理学教授雪莉·汉森指出，“父亲培养孩子的方式同母亲不一样，两者之间正好相互补充。母亲喜欢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父亲则喜欢让孩子作精神性运动。他们把孩子抛到空中，然后又放在地上；他们教孩子迈开双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他们扩大孩子的视野，促进孩子在体力、智力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发展。父亲和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会给孩子带来很多不同的东西。有了父亲的参与，母亲的潜能就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竞争很早就出现在孩子的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热衷于竞争，但他们确实懂得怎样赢和怎样输，而许多女人却没有学到。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学会无所畏惧地迎接新的挑战，

培养自信心，成为一个能够脱离父母而独立自主的人。

当我开始写关于性爱的主题时，我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母亲对我的无言教诲（虽然她从来不提这个词）性是肮脏的、邪恶的，女人的性器官是令人恶心的东西。她的母亲就是这样教她的。今天，母亲们仍在向她们的女儿灌输这样的陈词滥调，将女人的性器官视为“Cloaca”（拉丁语中的“阴沟”），这门课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它的影响一辈子都难以清除。每当我们张开双腿，不，只要一想到性爱，我们眼前就会出现那令人恶心的部位，只要一想到它，我们就感到浑身不自在。

可怜的父亲，要是那时你在我的身边就好了！你会给我带来不同的感觉。同女人相比，男人对性器官的看法要开放和健康得多。女人们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容貌和身体缺乏信心、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可爱？根子就在于我们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个永远也洗不干净的地方。

我反抗、竭力摆脱这种影响。如果在夜里，被人抛弃的恐惧出现在睡梦之中，在白天，我的脑子里就会想像出完全不同的爱情情节。在我的幻想中，男性对生殖器官的喜爱战胜了女性的厌恶。

如果在生命的最初年月里，我们就能享受到男人的目光和双手的抚爱，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和谐和美好，长大后，我们就不会如此厌恶自己的性器官。因此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的爱。我们都知道，婴儿喜欢用小手触摸生殖器，因为这使她觉得很舒服。看到这种情况，母亲就会瞪起眼睛、板起脸把孩子的手移开。我相信，在一般情况下，父亲对此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不过，我还没有找到任何科研成果来证实父亲对此事的态度会比母亲更加开放。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充足的理由提倡父亲和母亲一起照顾婴儿。如果我们改变对性器官的看

法，那我们就会更加爱自己、更加尊重和爱护我们的性器官。在这个把性看得如此重要的时代，我们怎能把我们从生活中排斥出去？

也许我们记不得婴儿时期的事情，但是在意识的某个角落里，我们仍保留着一些东西。从出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开始收集各种印象和感受。即使在大人开始对我们进行大小便训练之前，我们就能从他们的眼神、手和声音里感觉到他们对我们两腿之间的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我们喜爱自己的身体，我们就会好好地爱护它；如果我们从小就觉得位于两腿之间的那个地方是个禁区，那它在我们眼里就会变得令人作呕，好像是一条肮脏的阴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条肮脏的阴沟会被其他的东西所替代——头发、体重、或者手臂——但它永远不会从记忆里消失。不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化妆品或者做什么样的美容手术，我们总是提心吊胆，生怕遭到别人的厌弃。

成年人总以为自己在育儿室里可以为所欲为，以为婴儿什么也不懂、什么也记不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专家丹尼尔·西格尔告诉我们在3岁之前，婴儿的大脑对事物还不能形成“明晰”的记忆，这主要是因为大脑中储存记忆的海马还没有完全长好。明晰的记忆是指那些我们能够回想起来并且告诉别人的东西。“隐性”的记忆则不同，它从我们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形成，而且会跟随我们一辈子，因为它储存的范围遍及整个大脑。你想不起何时获得这种记忆，因为它是在无意中形成的。我们在婴儿时期和父母之间的感情互动就属于“隐性”记忆。

西格尔认为，“隐性记忆来自幼年时期我们同最亲近的人在一起的经历，它们会长久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也许意识不到，但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体验生活和看待

世界的方式。这些早年的记忆就像滤色镜，我们就是透过它们来认识整个世界，感受现实的人生。它们确实至关重要。”

这就是说，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学习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可惜做母亲的教不好这门课，尤其在如何看待那些女人们祖祖辈辈都觉得见不得人的部位上。不管“新女性”把自己装扮得如何性感，不管她是穿着皮制三点式泳装还是伞兵靴，婴儿时期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印象仍旧深深地留在她的记忆里。在母亲眼里，孩子的性器官是否也像她的头发、脸蛋和小手一样可爱？当她看着孩子的小身体时，她是露出满意的微笑还是皱着眉头将眼睛移开？她的嘴里有没有发出啧啧的声音？为什么有些男孩长大后过分崇拜自己的性器官？难道这不是对长辈的一种反叛？你越是不喜欢它，我就越要炫耀它，把它当作我的武器！”

有些父亲也许不喜欢给孩子换尿布、洗屁股，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不会显出厌恶的表情，嘴里也不会发出那种讨厌的啧啧声，从而给婴儿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们并不是生来就厌恶汗和粪便的气味或者生殖器官的样子；这些感觉都是后来才学到的。

男人可以给育儿室带来更加宽松的气氛。他们一般不像女人那样过分挑剔、容不得孩子身上有任何一点不整洁的地方。我的话也许不完全正确，不过我相信，如果男人能进育儿室，也许新一代女孩子长大后就不会过分担心自己的身体和气味、害怕丢脸、整天为自己的外貌而担惊受怕。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包括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都同女人对性器官的态度有关。当然，我们可以反抗，修改性器官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但这种努力要从我们出生后的第一年开始。

只要性器官在我们眼里仍旧是脏的，我们就无法看到自己身上美好的东西。不论是鼻子、乳房，还是大腿，在我们眼里，到处都是缺点。正因为对自己的外貌缺乏自信，女人们才会相互竞争、争风吃醋，尽管我们拒绝承认这一事实。

做父亲的如果不把女人的身体视为脏物，他就能帮助孩子脱离这一怪圈。

凯尔·普鲁厄特写道：“在带过3岁以下婴儿的男人中，对儿童进行性虐待的发生率要比没有这种经历的男人低得多。至于他带的孩子是否是自己生的，这并不重要。父亲亲自照顾婴儿能使父亲和孩子都变得更加富于人性，这是防止性虐待最有效的办法。”

如果我们一出世就能躺在父亲的怀抱里，享受他的目光和抚爱，熟悉他的气味、声音和身体，就像我们熟悉母亲的一切，我们就会感受到什么是“美”。有了这个开端，女孩长大后就会由衷地相信男人对她的欣赏和赞扬，而不是完全以其他女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至于男孩，他将在父亲的眼里看到自己美好的男性形象。这样，他就不需要为证明自己是男子汉而竭力逃离女人/母亲。成年后，他也不需要为了显示或维护男人的权力而去霸占或诋毁女人。因为从出生的那天起，他就从父母身上看到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

今天，男人们正步步为营，在美的王国里扩大他们的地盘。这是他们对女性大批涌入男性传统领域的回击。如果男人和女人在婴儿时期就能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一个美好的自我形象，那么，男女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充满了焦虑和对抗。

第二章 羡慕与妒忌

美的阴暗面

新生儿的母亲是幸福的，她沉浸在一片赞扬声中。她是奇迹的创造者。她抱着人见人爱的小天使，脸上容光焕发。

“多漂亮的小家伙！”大街上，陌生人发出由衷的赞叹。母亲微笑着，她知道自己的孩子多么可爱。直到有一天，她收起了笑容。“他太喜欢哭了。”她用这样的话来回答别人对孩子的夸奖。为什么？因为过多的赞扬，尤其是对容貌的赞扬，会很快演变成妒忌。

而妒忌就意味着危险。那么，怎样才能保护孩子不受伤害？犹太家庭的母亲会轻声念“Kenehore”。这话出自古老的祷文，而她却是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母亲，她不仅要管家，而且管理整个办公室。这样的祷文肯定不是在拉美兹妈妈培训班里学会的。也许这是她从自己的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潜意识的记忆。在感到危险的时候，她本能地用这样的祷文来保护自己的孩子。

“你的本能会使你意识到，过多的赞美会带来厄运。”我的朋友凯瑟琳说。她的小儿子漂亮极了，街上的行人都忍不住要回

头多看他几眼。她本人也是个习惯于被人称赞的美貌女子，看到别人欣赏自己的孩子自然十分高兴。与此同时，她却有一种“受威胁”的感觉。在决定做单身母亲之前，她曾是个雄心勃勃的职业女性。最近，她终于决定让情人在家过夜。那是孩子出生后在她床上过夜的第一个男人。可是第二天早上，那孩子就摔断了胳膊。打那时起，小家伙就取代了情人在她床上的位置。“我们不需要他。”儿子对妈妈说。

在意大利语中，Malocchio 就是“眼光恶毒的人”。这种人看到别人交好运就觉得无法忍受，他们想尽办法给别人带来不幸。在漫长的历史中，许多文化都发明了自己独特的仪式和药方来控制这种邪恶的本能。我们渴望看到别人赞美的目光，但是当我们享受这种荣耀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其中的危险。在欲望与毁灭之间只有一条很细的分界线。我们如饥似渴地追求美，然而对于别人的美，我们只能借用，却不能占有。于是，最可爱的东西就成了我们决意摧毁的对象。

没有什么比妒忌更能体现人的邪恶。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受到它的毒害。圣经里，夏娃“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眼目”。于是，她和亚当就吃了那树上的果子。顷刻之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意识到自己是赤身裸体。”

妒忌使我们变得卑劣，正因为如此，美才会对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女性的生活产生如此错综复杂的影响，因为美貌自古以来就是女性力量的源泉。我们周围的世界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在过去的 30 年里，社会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我们关于美貌的种种观念和规范，它们就像复活节岛上的巨石一样顽固不化。

谈论妒忌可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然而这正是本书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要使诸位看到美是如何引起羡慕和妒忌、而怨恨又是如何蚕食美给我们带来的喜悦，这对我来说可绝非易事，

因为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比美貌更能引起我的羡慕和妒忌。我羡慕和妒忌别人的美，却从未看到自己身上有任何美好的东西，因为我害怕自我欣赏会引起别人的恶感。

也许，我还不至于像麦尔维尔的小说《比利·巴德》中的恶棍克拉加特那样邪恶，但这个角色所言确实能引起我的共鸣，即：“谁会真心承认自己曾有过妒忌之心？人们普遍认为，妒忌包含了某种比最严重的犯罪还要可耻的东西。他们否认自己有过这样的感情，好心人也不愿相信任何聪明人会受这种感情的困扰。可是情感是不受理智控制的。”

有人说，妒忌同遗传基因有关。这就是说，有些人生来就比別人更容易产生妒忌的情绪，就像有些人生来就比別人更讨人喜欢那样。可是，别以为只有相貌平平的人才会有这种情绪。妒忌和美貌并不互相排斥，相反，它们常常结伴而行。为了避免妒忌的伤害，漂亮女人会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别瞎说了。难道你没看到？我的腿太粗，鼻子也太大。”而妒忌者则会竭力否认自己有任何恶念：“什么？我妒忌她？太荒唐了！”双方都在玩一场虚假的游戏。难怪在童话故事里会有那么多“可怜的美人儿”。

可悲的是，妒忌始于对美的羡慕和赞赏。我们最初的反应是一声惊叹。美使我们着迷，使我们兴奋，使我们眼花缭乱，直到残酷的现实将我们唤醒：“为什么是他（她）而不是我？”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美而变得更加可爱，我们也没有因此而充满感激之情。相反，我们因妒忌而咬牙切齿；我们巴不得那穿着高跟鞋的美人儿摔断腿。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妒忌。我们不能容忍别人拥有更多的东西，不愿看到别人比我们强，即使这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爱和快乐。同妒忌密切相关的是贪婪。贪婪毒化了爱情、家庭、社会，甚至水和空气。我们似乎不愿对自己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存感激

之情，因为，对于好妒忌的人来说，感激是无能的表现。美貌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偶像，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这个以机能障碍为特征的社会之中。正如小说家 A. S. 拜厄特所说“妒忌是从形形色色等级制社会和家庭中生出来的毒瘤。”

请别把妒忌和吃醋混为一谈。我们吃醋是因为遇上了情敌；我们害怕情敌夺走自己的心上人。这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反应。就拿我来说，我可不会爱上一个对我无动于衷的男人；你也一样。关键在于如何处置这种感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卑劣还是高尚。在三角恋爱关系中，我们甚至会妒忌自己的心上人，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使我们进天堂或下地狱。例如西拉诺·德·贝尔德拉克（法国戏剧《西拉诺·德·贝尔德拉克》中的主角）他深深地爱着一个女人，但是，为了让自己心爱的人得到幸福，他主动退出三角恋爱。失恋的痛苦促使他作出了高尚的选择。而妒忌则恰恰相反。《牛津英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这个词的：“由于看到别人比自己强而产生的怨恨和敌意。”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一个人要是出类拔萃，周围的人就会对他产生一种相互矛盾的心理。“他会被人打翻在地。”人类学家常这样说。这话具有普遍意义，它尤其适用于传统社会的女性关系。一个女人如果长得太好看，别的女人就会觉得她夺走了她们应该享有的一份：为什么好事都落到她一个人头上？对于美，我们又爱又恨。我们渴望在美的阳光下生活，我们渴望分享美的魔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它怀着恶意。人就是这样矛盾。

人类学家乔治·福斯特在分析墨西哥印第安人原始部落中的妒忌时提出了“有限利益之想像”这个概念，这话倒是适合于女人和美貌之间的关系。那些印第安人大概觉得这个世界只能提供有限的报偿，甲方得益就必然造成乙方损失。为了减轻乙方的怨恨，甲方最好设法贬低自己的好运。福斯特写道，“如果利益的总量是有限的、不可增长的，那么，任何个人或家庭只能

在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按照这条逻辑，人人羡慕的幸运儿就会成为全社会的敌人，因为他夺走了别人的好运。差不多所有的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都注意到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他们称之为：“得失所系的赌赛。”

如今，有些时装模特儿在电视广告上露一下脸就能赚到上百万美金，但她们仍旧不忘提醒别人，“知道吗？我讨厌自己的耳朵、头发和脚。我 12 岁的时候可难看了。”再举一个相反（但又十分相近）的例子。有一次，我走近几个坐在游泳池边的女人。她们正在恶言恶语地议论站在跳板上的一位十分艳丽的女郎。与此同时，她们却竭力否认自己有任何恶意，“我们对她没有任何偏见！她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都喜欢她！”她们说这话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事实确实如此：这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

要理解同美貌相关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态度和行为，没有任何感情能比羡慕和妒忌更能说明问题了。让我来引用一段梅拉尼·克莱因的解释，她在这个领域里算得上是元老：“妒忌是一种由于别人拥有和享有某种值得向往的东西而产生的怨气——它是一种冲动，意在剥夺或毁坏别人所拥有的好东西。要了解羡慕和妒忌的来龙去脉，我们还需回到主体早年与母亲的关系。”

她的意思是，你对美貌——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美貌——抱着什么样的心态，这同你幼年时期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当你看到别人拥有这样那样的好东西时，你会不会感到快乐？你能不能毫无顾忌地欣赏自己的成就？家庭关系一向都值得我们好好分析，因为，和童话一样，故事的结局是由它的开头所决定的。

比如，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但他不久就变得

六神不安，因为别的男人也迷上了她，并对他拥有这样漂亮的妻子而愤愤不平。他爱她、恨她，渴望摆脱在感情上对她的依赖。于是，为了平息心中的怒火，他投入其他女人的怀抱。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类似于婴儿咬母亲奶头的行为。让我们再从妻子的角度来说这个故事：她那有钱的丈夫对她有求必应；但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一切都拿走，因为所有的权力都在他手里。她爱他、恨他、妒忌他的权势；于是，她对他恩将仇报：不是拒绝和他做爱，就是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

弗洛伊德特别重视人的性欲中同体质有关的差异。在《妒忌与感激》这部开拓性著作中 克莱因则进一步提出：“我认为妒忌是一种带有口腔性虐狂和肛门性虐狂特征的恶意的冲动，它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就开始起作用 并且同体质有密切的关系……”

在过去的 10 年中——现在依然如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美。可是，我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快乐。没有任何东西能给我们带来满足，没有任何东西能长久地存在下去。我们像更换情人和配偶那样追随时装的花样翻新。不管我们花大钱买什么——汽车、房子、假日旅游——我们竭力追求的就是美。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无法忍受妒忌的煎熬，看到别人拥有美我们就妒忌得发狂。

克莱因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有妒忌别人美貌的倾向，而形形色色的广告、美容杂志和电视广告片则扮演着煽风点火的角色。只要观察一下你的朋友，你就会发现，当看到别人拥有美貌或豹牌轿车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妒火中烧。有些人会因为别人比自己风光而焦虑不安，有些人则泰然自若。

再来看看你家里的人——父母、兄弟姐妹——以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处世为人的风格：他们是真心诚意地称赞别人、为别人的成功而快乐，还是喜欢在财富、权力和外貌上同亲戚们比高低，看到邻居家有什么好东西就难受，却从来不知道欣赏自己已

经拥有的好东西？

在父母的影响下，孩子们努力追求成功。可是，当他们达到目的之后，却遭到父亲或母亲的妒忌。这使孩子们大惑不解：在做出那么多的牺牲、辛辛苦苦培养出如此出色的子女之后，做父母的怎能妒忌孩子的幸福？请别在妒忌中寻找符合逻辑的解释。有些父母没完没了地折磨他们的孩子、将他们同别的孩子比、让他们看到自己不如别人。“在一个充满妒忌的家庭里，孩子们从小耳闻目睹大人的言行，”心理分析家莱斯利·法伯说，“如果他们把这一切都接受下来，他们也会变成嫉妒忌的人。”

就拿我们这个家族来说吧，我们都是些嫉妒忌的人。谁比谁更漂亮，大人们心里都有本账，孩子们也跟着学。因为从小就妒忌别人的美貌，所以我也害怕别人妒忌我。当别人称赞我的杰弗里·比恩套装时，我就会立即告诉他们，这衣服是10年前买的。

如今，铺天盖地的广告正竭力加重和利用我们嫉妒忌的毛病。为了鼓动我们不停地购买最新设计的电视机、汽车、电脑和衣服，广告商们将我们已经拥有的任何东西都贬得一文不值。我们不再鼓励大家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抱感激之心，因为这悖于市场经济，而贪婪则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保障。在这个充满了妒忌的时代，人们不再崇尚善良、正直和慷慨等美德。不难想像，孩子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煽动妒忌之火的不仅是电视和广告，还有报纸、畅销书、商标和品牌。只要翻开当天的小报，就会看到一大堆俊男倩女的照片，瞧人家活得多潇洒，穿的、用的、住的，没有一样不使我们相形见绌、无地自容。一看到他们，我们的好心情就荡然无存。

我们对美的最初反应是羡慕和赞赏，这是一种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感情。遗憾的是，在一个妒忌成风的社会里，羡慕和赞

赏很快就变了味。当我们看到照片里的人住豪宅、开豪华汽车、在有电影明星参加的社交聚会上出头露面时，我们对他们顿时充满了恶感。

“我要吃她的心！”当狠毒的女王在镜子里看到比她更美的白雪公主时，她恨不得将对方一口吃掉。这就是妒忌！

美貌最容易招来恶感，因为对美貌的妒忌从幼年时期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外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否认这一点是荒唐的。漂亮的婴儿总是得到更多的爱抚，不过，他可能不久就会遇到麻烦。谁能保证他今后不会遭受兄弟姐妹、父母和朋友的妒忌？可是，我们对可能遭遇的不幸毫无兴趣。我们惟一盼望的就是自己能有那样漂亮的脸蛋和身材。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里，妒忌被描绘成一个食蛇肉的怪物，她平时躲在山洞里，浑身裹着浓浓的黑雾：“妒忌脸色惨白，浑身瘦得皮包骨头；她有一双可怕的斜眼和满嘴的烂牙；她的胸部发出青绿色，毒液顺着她的舌头不停地往外滴。只有在看到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她的嘴边才露出一丝笑容。她从未舒舒服服地睡过一觉，每时每刻都处在担心和焦虑之中。看到有人交好运她就气得发狂。她折磨别人，也折磨自己。”我们之所以拒绝正视美在我们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愿承认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丑恶的妒忌。

在《家庭和民族的罪恶》这篇论述妒忌的文章里，A. S. 拜厄特写道，“寓言和童话是道德规范和心理学的结晶，它们尤其适合于同妒忌有关的题材，因为妒忌的表现就是心智的瘫痪和自耗——喜欢妒忌的人确实会变成和妒忌一样的怪物。”

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社会，但它们各自都发展了独特的对付妒忌的办法。中国的高官们在接待来访者的时候，总是站在自家豪宅的门口，向客人深深地鞠个躬，高声唱道：“欢迎

光临寒舍！”

我们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享受特权并不感到奇怪。虽然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会恨他们，但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勉强接受这种不平等。在打躬作揖、求神拜佛之后，权贵们就可以放手变本加厉地争权夺利了。

美貌不需要这类符咒的保护，因此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它的权力。于是我们只好求助于“美貌只不过是一张皮”之类谨小慎微的告诫。不过，对那些利用美貌来获取权利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在别人恭维他们的时候作出谦虚的姿态，或者干脆自我否定一番：“您说什么 我漂亮 这怎么可能？”最糟糕的就是毫无节制地吹嘘自己的美貌。

记得 80 年代末，在制作一部有关美貌的纪录片时，我看到过一幅潘婷发胶的广告。那上面有一位极其艳丽的模特儿。大字标题是“但愿我的美貌不会给您带来任何不快。”下方还用小字印了一段话，意思是：在使用潘婷发胶之前，我也像你一样相貌平平。好聪明的作者！这样的广告太适合于我们这个被妒忌和美貌搅得神魂颠倒的时代了。不过这条广告不久就消失了。有人私下告诉我，这是因为女权组织的抗议，她们反对在广告中把女人们描绘成互相妒忌的一群。

在不同的社会中，男女之间都按照一定的方式分配资源和角色。美貌成为物质财富的附庸。在我们的社会里，经济大权自古以来都掌握在男人手里，而女人则拥有照顾孩子的权力。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女人还垄断了美貌，但这是一种有限的垄断，因为，为了确保自身的发展，父权社会必须对女人的这项特权加以控制。这项工作就交给了女人。于是，女人们为了争夺美貌而互相残杀，男人们则高枕无忧。

母亲可以从女儿的脸上看到她的未来。如果孩子有张漂亮的脸蛋，那她将来一定福星高照、嫁个白马王子。社会就是这样

安排的：把最美的姑娘配给最有权势的男人。这道公式看上去很简单，其实不然。这就是说，一个出生卑贱的男孩可以走南闯北做出一番事业，而女孩则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容貌是爹妈给的。

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些规则来保护漂亮女人不受其他女人的伤害，同时也让相貌平平的女人们有条生路。重要的是，在一个由男人掌握经济大权的世界里，女人们互相之间必须有所节制。

女人们承认美貌的重要，但她们不愿让人看到自己为了美貌而互相竞争。即使真有这样的事，她们也不会承认：“竞争？不可能。我们可要好了！”

今天，这种否认竞争的态度已成了我们维护自身利益的绊脚石。由于我们不愿承认在女人中间存在着竞争，我们就无法学会开展良性竞争的规则。

朱尔斯·费弗画过一幅令人伤心的漫画，主题是“别让三个小姑娘在一起玩”，因为其中总有一个遭到其他两人的排斥。那个不幸的小姑娘哭着对妈妈说：“妈妈，妈妈，昨天她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其实，大姑娘们也一样。在工作场所、社交场合、甚至尤其是亲密朋友之间，小姑娘/大姑娘们总喜欢联合起来惩罚她们当中的一员。除非我们学会正大光明地竞争，女人们就永远不会停止互相为敌。

在过去，漂亮女人从小就得学会保护自己。她们避免在智力、体育、领导和管理等方面出类拔萃，因为在别人眼里，她们已经够幸运了。如果一个美貌女子想保护自己不受妒忌的伤害，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做个“没头脑的美人”。即使母亲没有这样教她，同胞姊妹和其他女孩也会让她明白这个道理。这些教训会长久地留在记忆里，不过这只是一种“内隐的”早期记忆，一种焦虑的感觉，它能有效地阻止这个女孩在其他方面发展自己的能力。

到了青少年时代，女孩们已经接受了 12 年这样的训练。不错，最漂亮女孩多半会嫁给最出色的男孩。可是，总有一天，青春和美貌会离她而去，有钱有势的男人也会把眼睛转向更年轻的女人。到那时，昨天的美人儿就没了本钱。这倒是应了那句老话：美貌只不过是一张皮。

今天，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做母亲的已经无法预见她怀里的小天使长大后将怎样生活：是利用美貌去猎取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还是建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没有男人的王国？不过，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美貌仍旧是众人追逐的对象。今天，不仅女人追求美，越来越多的男人也把它当作追求的目标。美貌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在扮演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妒忌也变得日益猖獗。在这个男女分享权力、财富和美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把妒忌作为研究的对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患于未然，避免在妒忌的驱使下做出害人害己的事情。

“人们可以在不丧失自尊心的情况下承认自己有过内疚、羞耻、骄傲、贪婪和愤怒等不良心态，”人类学家乔治·福斯特说，“可是要他们承认自己妒忌过别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至少在美国社会中是如此……承认自己有妒忌心，就是承认自己比别人差，因为只有意识到自己比别人差的人才会有妒忌心，而我们最不愿承认的就是比别人差。”

妇女走上工作岗位打破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在经济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社会即将到来时候——我们不妨称它为“前母权社会”——人们正迅速地抛弃几百年来父权社会中形成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曾被用来防止两性之间由妒忌引起的恶战。

今天，外貌已不再是女人谋取幸福的唯一手段。我们有经济实力。我们花很多的钱——不是老爸或老公的钱，而是自己的钱——买衣服、买化妆品、上美容院。我们不再小心谨慎、夹

着尾巴做人。

我们还注意到，办公室里的男士们总是大大咧咧地接受别人的称赞。如今男人们也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表。不过，当别人称赞他们崭新的阿尔马尼西装时，他们绝对不会说，“嗨 这是旧的。”相反，他们爽快地接受并充分利用别人的恭维。这并不是说男人不受妒忌的困扰，只是他们并不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于外貌。当他们看到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及别人时，他们的反应更具竞争性。这是因为男人从小就接受不同的训练：他们敢于主动出击 敢于表现自己。

在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界定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我们的外貌也将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女人对自己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个崭新的影像。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竞争是父权社会留下的罪恶遗产，男人们都是些野蛮的畜生；她们想把“无竞争”这条女性世界的法规带到工作场所。事实上，女人之间的竞争可厉害了，只是她们表里不一；她们表面上笑容可掬，暗地里却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在电影《不择手段》里 尼科尔·基德曼的出色表演把这些行为特点都赤裸裸地暴露在观众眼前。她扮演的角色凶狠毒辣，却有一张甜美的笑脸。

女权运动将美貌带进了工作场所，对此男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只要男人们仍旧掌握经济大权，女人的美貌对他们就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美貌历来是征服者手中的战利品。男人不管怎样老态龙钟、丑陋不堪，只要有钱有势，他就能占有年轻貌美的女人。从来没有人对这样的交易提出异议。看到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和老态龙钟的男人结成一队，我们只是耸耸肩而已——没有人会对此大惊小怪。美貌和财富之间的交易毕竟是自古以来就确立的传统，它不会那么快就离开历史舞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女性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并在工

作岗位上像男人那样勇往直前，我们却仍旧不愿坦诚地讨论女人对美貌的利用。我们否认美貌的巨大吸引力，因为我们害怕遭到其他女人的报复。

例如，当一个女人穿着一身昂贵的夏奈尔套装或高跟鞋和超短裙走进办公室时，她首先吸引的是谁的眼睛？女人的眼睛。办公室里的其他女人马上就会暗中估计她的衣服值多少钱、她的腿是否好看。她们比较、评估、判断。她们能透过衣服，看到她身上的每一块肉体，与此同时，她们的脑子里则忙着想像自己穿上这套衣服会是什么样子。穿名牌服装并没有什么不好。难道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花自己挣来的钱？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要是我们不能忍受或应付别人的窃窃私语、挑剔的目光以及她们眼里流露出来的忿恨，穿名牌服装就是花钱买气受。

美貌和妒忌是我们生活中永恒的主题。我们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追求美貌，希望因此而得到别人的好感，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于是我们陷入愤怒、悲伤和孤独。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更加慷慨和友善？在过去，老祖母看到漂亮的小孙女就满心欢喜。如今，那些可爱的老奶奶到哪里去了？她们在健身房里流大汗呢！她们渴望甩掉身上松懈的皮肉，想重新获得青春和美貌。

女权主义已经分裂成许许多多的派别。这并不奇怪，因为每个女权主义者对生活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不幸的是，尽管我们各持己见，我们却不能容忍不同观点的存在。每个派别都把持不同意见者视为叛徒，每个派别都把自己看作女权主义的惟一代表。我们不愿承认分歧，因而无法展开健康的辩论。要知道，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才能在各种不同的派别之间达成共识。

但是，只有健康的、具有独立意识的人才能在辩论中坦诚相待。这需要长期的实践。男人们不怕辩论，因为他们从小就接

受这样的训练。女权主义之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分歧，是因为女人们从小就习惯于同母亲保持一致。在感情上，我们习惯于依赖别人，一旦遭遇别人的挑战，我们就暴跳如雷。所以，女权主义者只能在她们的天地里称王称霸。

本书将容貌和自我形象作为探讨的重点，因为从这些地方最能看出我们到底有多少独立性。如今，时尚像走马灯一样瞬息万变、驱使我们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象。这使我想起电影《红舞鞋》里那位走火入魔的女主角，她一穿上那双红鞋子就命里注定要不停地跳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我看来，这象征着自我否定。

要了解或改变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重新审视童年时代我们同父亲和兄弟姐妹、尤其是母亲之间的关系，看看这些关系是怎样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家庭关系千变万化、充满了矛盾和竞争。幼年时期的家庭生活是我们自我形象形成的基础。如果今天我们仍对小时候遭到的不公平耿耿于怀，请别迁怒于母亲！别把她当作替罪羊。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母亲头上，我们就会看不到自己的责任，因而也就永远不会长大。我们必须审视自己，诚实地回顾过去，回顾我们同母亲的关系，记住那些美好的东西并为它们怀着感激之情。感激之心至关重要。要记住，母亲不是十全十美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我要吃她的心！”

如今，一切都使我感到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新的生育高峰正在到来；在电视屏幕上、公共汽车的车身上以及公路边的广告牌上，到处都是怀孕女人的形象。翻翻今天早报，广告上尽是

些裸体男人和女人的照片，其实那些商品根本不需要脱光衣服来推销。这些人怀里常常抱着裸体的婴儿。裸体的超级模特儿们微笑着，她们似乎对观众的喜爱深信不疑。其实在我们的感受中，更多的是妒忌而不是喜爱。我们妒忌美貌给她们带来的巨大能量。

我们的文化煽动妒忌、鼓励妒忌。妒忌是推销商品的有力武器。广告商们知道，要使人们不断地购买新产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尽快地厌倦自己刚刚拥有的东西。“你真的这么喜欢半年前买的那辆车？”有一段广告问道。“傻瓜！看看你家邻居刚买的那辆车吧，看看真正的名人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别让你的邻居占上风！买一辆比他们更漂亮的车，叫他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妒忌无处不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问：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了得到同伴的金链条或运动鞋，或者仅仅为了减轻心里的自卑感，一个小孩子会拿枪射杀自己的同伴。

我们妒忌最亲近的人，妒忌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也能给我们带来悲哀。他们能够使我们上天堂，也可以让我们下地狱。为了惩罚他们，我们一头栽进其他人的怀抱。不是吗？通奸成了电视脱口秀的热门话题，离婚率直线上升。生活中没有忠诚，也没有感激。正如梅拉尼·克莱因所说，如果失去了感激之情，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爱。

竞争本身并不邪恶。不过，缺乏规则的竞争则不然。它就像上了子弹的枪，迟早会造成伤害。“在我们这个患了偏执狂的社会里，竞争无处不在。不过，竞争意识本身并不是坏事，”精神病专家威拉德·盖林说，“孩子通常都想独占母亲的爱，因此，竞争意识的产生是正常的，而与人分享的意识则需要通过学习才能培养。”那么，谁来将孩子的竞争意识引向健康的轨道？在过去的20年中，女权主义者不断地告诫妇女们：所有的竞争都是邪恶的。照此办理，母亲怎能帮助孩子正确地理解自己的感情？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下童话故事的作用，因为故事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越是可怕的故事就越能反映严酷的现实。

孩子通常在睡觉前听大人讲故事，然后，他就会做梦，甚至是噩梦。事实上，促使孩子做梦的不是《汉塞尔与格雷特尔》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而是孩子白天对家里人或朋友所产生的敌对情绪。如果父母用亲切的声音讲述这类故事，并在故事结束时给孩子一个亲热的吻，那么孩子对自己就不会太苛刻，因为他看到，故事里的人也有过类似的感情，他的父母也不会因为他有过这样那样的恶念而抛弃他。对孩子来说，家就是世界的缩影。难怪童话中的人物大多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美好的家庭就像一个充满了忠诚和信赖的世界。但是，如果孩子觉得在家里受到威胁，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我们应该怎样利用童话故事呢？为了给潜意识披上一层美丽的面纱，我们可以专挑令人愉快的故事讲给孩子听。这样，他们也许就不会意识到，人的感情中还有那么多可怕的东西。可是，如果不了解人性的阴暗面，孩子们怎能学会选择光明、避免黑暗、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为？童话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常常面临这样的选择。孩子们也一样。

近几年来，有些女权主义者反对让孩子接触古典童话，理由是那些故事宣扬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在她们看来，“故事书”中的女主角大多是写消极顺从的人，她们只是王子们手中的战利品。正如虚无主义者安德烈亚·德沃金所说，童话故事鼓励女孩们“成为天真的受害者、无暇的睡美人、形形色色好色之徒猎取的对象”。

德沃金在她自己的小说里反其道而行之，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主角：这个女人有计划有步骤地阉割所有的男人。说白了，这些小说表达了德沃金式女权主义对男性的愤怒。德沃金也许不打算为孩子们写故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她和她

追随者们对男人和反对者的狂怒同儿童潜意识中的虚无主义倾向联系起来。德沃金在她的书里承认自己早年生活非常不幸，原因是，她曾经多次遭到男人的强奸。记得弗洛伊德曾经对一个病人说过这样的话 意思是 你的不幸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在这些不幸的事件中，你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女作家们正在创作新的童话故事，这些故事读起来十分带劲。女主角们再也不是可怜巴巴的弱女子，而是为争取自由而勇往直前的女英雄。《佩德罗奈拉》讲的是一位公主的冒险故事。她在结婚前历经艰险，最后终于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勇气获得了成功。《森林王子》则颠倒了《拉庞泽尔》的故事情节 把公主变成了王子的救命恩人。

不过，有些作者过分热衷于颠覆传统，这使她们的故事常常陷入刻板的模式。当我们用童话故事为女性世界唱赞歌时，不要忘记这些故事对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新的女权主义童话故事把男人都描写成一成不变的窝囊废，用软弱无能的男人来突出无所不能的女人，这样的故事对我们的后代将是有害无益。要知道，孩子们喜欢童话故事，与其说是为了得到对未来的美好承诺，倒不如说是想通过故事来同自己的潜意识对话。

布鲁诺·贝特兰就反对那种认为古典童话导致男女形象公式化的观点 他写道“孩子们知道 不管故事里的英雄是男的还是女的，故事本身都同他们的自身问题有关；而那些缺乏想像力的父母却看不到这一点。”

有些人主张应该把那些老故事扔进垃圾桶，因为它们不符合激进女权主义的需要。这样做是很愚蠢的。这些故事早在几百年前就已代代相传，尽管那时还没有人用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古典童话的重大主题之一就是美貌以及美貌对人生的巨大影响。如今，在现代女权运动风行了 25 年之后 美貌是否真的不那么重要了？恰恰相反，对外貌的追求重新成为时尚，美貌仍

旧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平心而论，我们很难将这种情况归咎于男人们设计的阴谋。把女人拉回到梳妆台前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自己。女人们希望美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美的魅力是永恒的，它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应该理解它、正视它，从而有效地利用它。

当女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狂热追求美貌的时候，我们能用理想来代替现实、将美貌排斥在现代童话的主题之外？不管我们对孩子说什么，我们都应该说真话，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真实感受，因为孩子们一眼就能看出父母说话是否诚实。父母应该向孩子解释美貌对一个人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帮助孩子正确地看待美貌。在人的一生中，金钱的魅力只是在早些时候才会起作用，因为人对金钱的向往并不出自于本能。美貌则不同，我们很早就感受到它的魔力。我们是否有能力感受和欣赏美——不管是自身的美还是别人的美——同幼年时期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密切相关。这份财产不会因为年老色衰而消失。俗话说：观者眼里出美景，道理就在这里。

这就是说，多读点古典童话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忘记了小时候从童话里学到的智慧。与此同时，社会环境却迫使我们用假面具来掩盖内心种种见不得人的感情。然而这并不能减轻我们的烦恼。不是吗？如果丈夫在晚宴上公开赞同某个漂亮女士的看法，或者对她露出特别亲热的笑容，我们的好心情就会立刻烟消云散，并会气得彻夜难眠，以至第二天无法照常工作。

我们为什么要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丝微笑或几句话——而妒火中烧、自寻烦恼？其实童话故事早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只要想想那个邪恶的女王在看到比她更美的白雪公主时所感到的羞辱和妒忌。童年时，我们就熟悉这样的感情。可是如今，我们已习惯于否认美的魅力，我们也不愿承认自己有任何

妒忌心。于是，当我们害怕别人夺走我们的心上人时，我们只能在睡梦中咬牙切齿、把恐惧埋藏在心里。

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在工作中的表现。我们要么干得很糟，要么用极其狠毒的手段来对付竞争对手。与此同时，我们为自己的心狠手辣而忐忑不安。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拿起格林童话集。毕竟，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不愿看到他们受别人的伤害。

幼年的竞争：“漂亮的就是好的”

小时候，我对漂亮衣服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也不喜欢玩弄梳子和刷子或让人抱着照镜子。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才突然改变。不过，我很早就开始寻找美貌之外的其他的手段来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我会用一些引人瞩目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以此来赢得大人赞赏和喜爱。

我小小年纪就开始琢磨：如何在一个有着众多漂亮女人的家庭里生存下来。我天生就有一种本事，能够不依赖外貌而使自己变得与众不同。我从来不指望自己能像姐姐那样，凭着一张漂亮脸蛋，轻而易举地得到别人的喜爱。

不过，我也常常因为自己不及姐姐那样可爱而愤愤不平。这是一个藏在心里的秘密，我今天把它兜出来，是因为它非常适用于研究同外貌有关的行为科学。大人们偏爱漂亮的孩子，孩子们也一样。在幼儿园里，孩子们会告诉你班里哪个同学长得好看；他们喜欢同漂亮的孩子做朋友，并且相信漂亮的孩子待人更加友善。在他们眼里，漂亮的孩子更加聪明、友好、可爱、自信和独立，相反，不漂亮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则更加好斗、更加不合群。

研究外貌的博士生们称这种现象为“成见效应”，或者说以貌取人。在我们眼里，美貌就意味着善良、单纯以及无限美好的未来。只要想想童话故事中的那些女主角，她们是那样天真无邪：牧鹅女从不动手打人，灰姑娘也没有使她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得到应有的惩罚。我的姐姐也一样。我经常引诱她和我一起打牌和跳房子，为的是能够打败她。可她总是那样心平气和、对输赢一点儿也不在乎，气得我真想揍她一顿。她好像早就知道这些游戏全都无关紧要，不管是输是赢，总会有人来关心她。这真叫人受不了。所以，每当她想跟我亲热时，我就把她一把推开。

我是否把自己想得也太坏了？别忘了，梅拉尼·克莱因曾经说过，对付妒忌有两种方式：理想化和自我贬低。就拿我来说，我确实妒忌姐姐同母亲的亲密关系，并且觉得，她们之所以如此接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姐姐继承了母亲的美貌。毫无疑问，为了摆脱妒忌的折磨，我一方面把姐姐理想化，把她想像得像天仙和圣贤一样完美无缺，另一方面则贬低自己。直到今天，我仍旧没有摆脱这种心理。

在家庭或其他以感情为基础的关系中，三人组合在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兄弟姐妹中总会有一个人特别出色，而其他人则会对他产生强烈的爱或恨，”专攻同胞关系的心理学家斯蒂芬·班克指出，“一视同仁的情况是很少的。”这条理论也适用于朋友之间的关系。至于情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三角关系必然是不平衡的，“其中的两人会变得特别接近，最终把第三者排挤出去。”

关于成见效应的理论完全适用于我对姐姐和自己的看法。既然姐姐比我好看，那她就一定比我好。这就是说，她是好人，我是坏人。我这里没有4岁前拍的照片，不过我还记得自己4岁时的模样：平直的头发扎成两根小辫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金属

框架的眼镜；右眼当时还没动手术，看起来有点像查尔斯·劳顿扮演的卡西莫多。在我的身旁站着姐姐，金丝般的卷发衬托着她那漂亮的脸蛋——她长得多像母亲啊！难道这就是我讨厌她的原因？我也许常常听到别人将我和姐姐作比较。也许正是这样的评头品足促使我同她们——母亲和姐姐——分道扬镳，走上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

道理似乎很简单，既然别人都说我不像这个家庭的一员，那我就索性特立独行，这样别人就没法将我和母亲、姐姐作比较。我拒绝吃鱼、椰子饼、苹果馅饼等她们喜爱的食物。她们喜欢在花生酱三明治上涂赫尔曼蛋黄酱，而我却偏要涂神奇沙拉酱。她们循规蹈矩，而我却偏爱干坏事。我偷店里的糖果和母亲钱包里的零钱。要是有人忘了关门，我就会偷偷溜出去。毫无疑问，我想让别人看到这个捣蛋鬼其实并不坏，她是给逼出来的。我要让他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我”。那时我只有4岁。幸运的是，街上的人对我可好了。他们把我带到自己家里，请我喝鸡汤、吃花生酱三明治，直到家里打电话来找我。

我讨厌穿那件黄色的连衫裙，因为它的式样同姐姐的粉红裙子一模一样。我讨厌照镜子，却渴望别人关注的目光。为了吸引别人对我的注意，我会头朝地、脚朝天，竖个蜻蜓给他们看。虽然姐姐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的事，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试图报复，把自己做的坏事都推到她头上。

在《一个婴儿的日记》中，丹·斯特恩谈到，4岁的孩子仍保留着婴儿时期的感情。不是吗？早年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其中最难忘的就是同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微笑、抚摸、拥抱、亲吻——这一切都保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虽然某些细节常被改写，但永远不会消失。难怪每当家人团聚时，我们总是异常激动。斯特恩揭示了这些长年来隐藏在无意识中的情感，使我们看到，为什么家

人和情人总是在我们心里唤起如此强烈的感情。

别以为我在为自己的童年而难过，恰恰相反，我并不想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没有过去，就不会有今天；没有童年时为了引起别人对我的关注而磨炼出来的那股闯劲，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我不是慈祥的老祖母，不过，我小的时候也不像自己想像得那样坏。童年时期的经历证明了一个孩子求生存的意识，它告诉我们：不应该随意贬低自己；要看到，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美好的东西。

毫无疑问，小时候针对母亲和姐姐的那些“报复”行为是愚蠢的。为了同“她们”背道而驰，我放弃了许多东西。比如说，我拒绝学钢琴。为什么？因为“她们”两人都会弹琴。可是后来，看到好友彼得·艾伦穿着夏威夷衫、赤着脚在钢琴旁作曲，我就对他羡慕不已。彼得是作曲家兼歌手，他写的那些情歌真是太棒了。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童话故事。现实世界太可怕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了质。到处都是怨恨、愤怒和妒忌，而传统的行为准则、道德标准和礼貌规矩则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人们不再把美同行为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如今，美就是时髦、就是性感；美就是袒胸露臂、穿着细高跟的女人和松开裤子、阴茎勃起的男人。想给孩子读《无所不能的小火车头》吗？还是拿本格林童话吧！格林童话能让孩子们了解真实的世界，而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孩子的感情仍旧比较真实，他们打心眼里明白，灰姑娘的两个姐姐为什么如此仇恨美丽的灰姑娘，因为他们自己也有过类似的感情。不是吗？当披着金色卷发的小妹妹得到盘子里的最后一块小饼时，其他的孩子是多么恨她啊！可是做母亲的却假装什么也没看到。她不愿承认，一块小饼会燃起如此强烈的感情；她不愿让孩子们看到，兄弟姐妹之间除了爱还会有别的感

情。久而久之，孩子们就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看自己或别人：不是天使 就是恶魔。

童话故事里的事件和人物可以使孩子们避免过分苛刻地看待自己或别人，因为童话故事再现了他们在真实生活中体验到的感情。这样，孩子们就不必把这些感情深藏在心里并为此而感到内疚。想想灰姑娘的两个姐姐吧！她们多么丑恶！同她们相比，孩子心里那点小小的怨恨实在算不了什么。

“孩子们看问题比较简单，他们还不能理解，在两极之间存在着许多过渡阶段，”贝特兰写道“，在他们眼里 中间状态是不存在的。一个人不是英雄，就是懦夫；不是幸运儿，就是可怜虫；不是美人儿 就是丑八怪 不是天才 就是蠢驴 不是一片爱心，就是满腔仇恨。”

“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也是如此：他们若不是善良和仁爱的典范，就是凶恶和残忍的化身，就连动物也不例外。通过这些简单和一目了然的人物形象，童话故事帮助孩子们整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错综复杂的感情，将这些感情分门别类。”

可见，童话故事的主题与现实密切相关。如果美貌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是无关紧要的东西，那它就不可能在童话故事里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漂亮的婴儿总是比别的孩子得到更多的关爱。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盯着他、没完没了地赞美他。别的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怎么会相信，大人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

对孩子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赢得大人们的关注。这是他们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真理。即使在他们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他们也不会忘记这些经历。早在文人们用文字将童话故事记录下来之前，一代又一代的父母们就把自己童年时期的感受用故事的形式说给孩子们听。他们完全可以编造一些更加令人愉快的故事，让孩子们多想想理想中的美好生活。然而他们并没有

这样做。做父母的都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正是出于这种本能，他们才在故事里融入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不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自立、单身，还是同另一个女人一起过，我们永远无法忽视美貌对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没有一个孩子会忘记，那些热情洋溢的眼睛如何越过她转向另一个更漂亮的孩子。女权主义者应该放弃那些华而不实的新童话，多花些精力鼓励父亲们走进育儿室。有了父亲的参与，育儿室里就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双手臂、多了一份关爱。父亲的目光、声音、气味和触摸不仅使孩子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爱的温暖，而且带来不同的审美观。这一切都会使孩子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只要涉及到美貌这一主题，古典童话中总会出现一些同室操戈的可怕情节。其实这些故事都是有目的的：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并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某些感情的控制。例如，在听灰姑娘的故事时，你会觉得她的两个姐姐坏得出奇；你恨她们，知道自己不想变得像她们那样狠毒，这使你认识到，你其实并不像自己所想像的那样坏。当孩子把善和美联系在一起时，他们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容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长得不美，那他们就很难把自己想像成好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阴暗的心理会形成一种隐藏的自我。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让别人喜欢我们，我们这些相貌平平的女人就拼命用各种华丽的服装和首饰来装扮自己。如果没有接到电话或邀请信，我们就会怀疑，对方一定是透过华丽的外表看到了我们内心的黑暗。

孩子们喜欢一遍又一遍地听童话故事，因为这些故事使它们看到他们不是“惟一的”怀有各种恶念的人。相反成年人却忘记了这一切；她们害怕童话故事里那些令人恐惧的情节。“天哪，你怎么能给孩子说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不能？我们需要的是诚实，而不是谎言。

童话故事的作用在于转化。它使孩子看到，有善就必有恶，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在善与恶的冲突中，善总有一天会占上风。

“归根结底，爱能够转变一切，甚至能使丑陋的东西变得美好，”贝特兰写道，“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我们才能将潜意识中那些最原始、最粗野和最普通的东西——萝卜、老鼠、癞蛤蟆——变成最高雅的精神产品。”

如今，最热门的电视节目就是许诺“美改造一切”。这些节目不仅让观众们相信，美容术可以使他们改头换面，而且向他们许诺，容貌的改变可以使他们变得更好、活得更幸福。外貌决定一切！不错，我们都想变成美人。不过，我们也像临睡前的孩子一样，需要摆脱那些使我们变得卑鄙和心胸狭窄的情绪和思想。可惜我们很早就不再阅读童话故事了。其实，我们不妨让孩子们读给我们听，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童话故事并没有过时，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不愿相信，幼年时期的感受仍在影响我们今天的态度和行为。然而，不论走到哪里，别人的眼睛都在审视我们，并在我们心里唤起早年生活的回忆。当我们觉得丈夫或情人用某种特别的眼光看着另一个女人时，我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那种感觉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妈妈生下小弟弟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了。

在理智上，我们信任自己的丈夫或情人。然而，我们为什么常常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火冒三丈？这一切都和幼年时的经历密切相关。如果那时我们因为自己相貌平平而感到自卑和缺乏安全感，这种感觉就会永远伴随着我们。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会像弱小的孩子一样提心吊胆、惶恐不安。

就是丈夫或情人的称赞也会在我们心里产生疑虑。虽然我们把一半的收入都花在梳妆打扮上，可是我们仍旧对自己缺乏信心，总觉得镜子里的那个人像个虚假的幻影，随时都可能从我

们眼前消失。要知道，真正的自信是在幼年时期形成的。只有那些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就享受过真爱的孩子，才会具备这样的自信。

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为自己打造一个称心如意的形象。为此，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形象设计师身上。可是别忘了，问题的根子不在眼前而在我们的童年时代。“你爱我吗？”每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时，我们总要没完没了地用这个问题来缠绕对方。“当然啰，那还用说！”可是，不管对方如何热烈地表示他的爱，我们总是不放心。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在他的爱情表演中找到一个小小的漏洞，于是我们放声大哭：“不，不，你根本不爱我！”我们绝望、愤怒、振振有词，直到对方低声下气地承认：“对，对，我确实不爱你。”

现在，我正赤着脚在花园里徘徊。今天是圣诞节，我该怎样打扮自己呢？要是戴上白色的木槿花，那一定很漂亮。

木槿花只开一天。它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非常美丽。早晨，它们迎着朝阳开放，中午是开得最艳丽的时候，到了晚上，它们就凋落了。当然，如果把花冷藏起来，就可以延长它们的寿命。我一有空就到花园里，把那些花盆移到有太阳的地方。我在中午花开最盛的时候把它们摘下来放在冰箱里，等待晚上南瓜车的到来。那时，我就会戴上美丽的木槿花。我只戴那种特大的白色双层木槿花。当它们盛开的时候，花瓣显出美妙的粉红色和德文奶油的色调。

这是我最喜欢的样子。木槿花为我增添了几分姿色，而且，女人头戴鲜花就意味着悠闲自在，意味着女性与自然的结合。这真是奇迹般的转变。要知道，在白天，我可是个完全不同的人，风风火火，野心勃勃，没有情趣，也没有耐心，有时还会发脾气，总之，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可爱。确实，生活中多一点美就会使大多数人变得好一点，而且会大大改变我们在镜子里的影像。

别人对我们刮目相看，我们自己也会充满感激之情。当然，这样的好心情通常是短暂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样的转变无关紧要，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对我这个马不停蹄、依靠男性基因取胜的女人来说，强化女性气质是大有好处的。头戴三朵盛开的鲜花也许有点儿惹眼，不过，这跟穿透明衣服不一样。鲜花能够消除别人的敌意。谁会谴责一个借助自然之美来打扮自己的女人？

让我为自然界的慷慨大方而祈祷。我的木槿花开得多好，露湿的花瓣显得格外娇艳。我需要九朵花，因为今天我要参加三项圣诞活动，每次都要戴三朵花。第一项活动是同我们亲爱的邻居加朋友迪克和鲍勃共进早餐，然后是吉米的便餐，最后是戴维安排在克雷斯楼屋顶上的晚餐。我回到厨房，开始预备早餐：打鸡蛋，煎火腿片，烤热山核桃咖啡蛋糕和奶油蛋卷。今天只好让爬楼大王健身器靠边站了。

为了迪克，我们总是特别精心地准备圣诞节的早餐，因为我们想弥补他 4 岁时遭受的损失。那年圣诞节的早晨，小迪克穿上镶红边的蓝上装、长筒袜和灰色法兰绒裤子，高高兴兴地站在楼梯上等着过节。可是，他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他那美丽的母亲和她的情人（那个为他们家开车的司机）手挽着手走出了大门。从那天起，她再也没有回来。

迪克是独生子。他的父亲一心想要个“漂亮的儿子和继承人”，为此他取了个年轻美貌的妻子来为他传宗接代。“他喜欢把我抱起来抛到空中，亲我的小肚子，逗得我哈哈大笑。”说到这里，迪克长叹一声。母亲离开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抱过他。

像童话里一样，是热心肠的老祖母把小孙子带大的。迪克每隔一定的时间同母亲（他的冰女王）见一次面。后来奶奶死了，迪克失去了他惟一热爱的人。迪克的叔叔每个星期天都要

带着老婆孩子来吃晚饭，他们的眼睛盯着迪克父亲的财产。最后，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迪克被剥夺了继承权。

20年前，母亲把迪克请到纽约韦斯特伯里大酒店的波洛厅去吃了顿午饭，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同他见过面。那时她正准备同第四个丈夫结婚。她相信儿子一定能够理解，“没有人会相信我有一个像你这样大的儿子。”迪克是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可是，在一个惯于利用美貌来为自己开路的女人眼里，他却成了威胁。要知道，迪克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只有十七岁。她恨这个儿子，因为他太漂亮了，他会把所有的眼睛都吸引过去。当迪克长成一个令人惊叹的美少年时，连母亲的情人都忍不住把眼睛转向他。于是，母亲减少了儿子每月一次的拜访。“要是我想见你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她冷冷地说。

最后 在波洛厅里 母亲临别时对他说：“别再给我打电话，别再来找我了。”

今天，在那缠绕着布干维尔花藤的树下堆满了各式各样系着缎带的盒子；空气中回荡着托尼·贝内特迷人的歌声。我们为友谊和佳节干杯。当我们打开礼品盒的时候，电话铃也响个不停，那是各地的亲属向我们送来节日的祝贺。可是，没有一个亲人给迪克打电话。

有个亲戚从查尔斯顿打来电话，感谢我们给孩子的圣诞礼物。那是一套童话故事的录像。“《白雪公主》的录像我们从店里租过好多次了，”她说，“这下孩子们总算有了自己的《白雪公主》。猜猜看，谁最喜欢你的礼物 两岁的小不点儿！”

两岁的孩子竟会对美貌、爱情和妒忌如此着迷。这些感情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需要了解真相。

“要做好人，不要单靠外表。”母亲总是重复这条古老的训诫 希望她的孩子能安分守己。在格林童话《心爱的罗兰》中 邪恶的巫婆一心要杀死她那美丽的继女。“你逃不出我的掌心！”

她狂叫。这些都是前人留下的警告。

当然，两岁的孩子也看到：美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美貌能给人带来许多特权。不过，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妒忌的伤害，漂亮的女孩子们还得学会遵守一整套的规矩。

当一个女孩长到 4 岁时“美貌不过是一张皮”之类的训诫已经深深地印在她的脑子里。她看到，如果一个漂亮女孩不懂得约束自己，别人对她的羡慕就会很快转变成妒忌。所以，要小心，别太张扬。

当一个女孩长到 10 岁或 11 岁时，她已经把这套防身术学到了家。根据一项对小学五年级女生的调查，75% 的女孩，包括那些最漂亮的，都把自己评为班里最没有吸引力的人。真是不可思议，10 岁的孩子居然不约而同地回避现实！怪不得女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容貌缺乏信心。她们不停地添置漂亮衣服，却总是嫌自己不够好看。

也许你会说，谦虚一点总是好的。但是，如果一个家庭能给孩子更多的正面鼓励，那不是更好吗？做父母的应该更多地称赞孩子的独立性、好奇心、领悟力、勇气以及他们的容貌，让他们看到自己和别人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并学会有效地利用自己和别人的优点。

孩子喜欢听童话故事，因为他们可以从童话故事里找到自己的真实感受，而美貌正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最强烈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深受欢迎的童话故事都涉及到兄弟姐妹之间为了美貌而产生的冲突。

让我来讲个真实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个人送给我一枚金戒指，戒指上刻着一幅画，这画取自一个童话故事：玻璃山上的公主。有一天，国王宣布：“谁能爬上这座玻璃山，谁就能得到我的女儿并成为一国之主。”有兄弟三人前来求婚。老大神气活现地骑着马往山上冲，结果以惨败告终。老二也遭到同样的下场。

最后轮到那个被人瞧不起的老三。他没有骑马，却徒步登上了滑溜溜的玻璃山，赢得了美丽的公主。一点不差，戒指上确实刻着公主和三兄弟。

送我戒指的那个人在家里也是老三。两个哥哥都比他大好多，所以他一直是母亲最宠爱的孩子。可是后来，母亲又生了个盼望已久的女孩。于是，小妹妹就取代他成了父母的心肝宝贝。不难想像，他当时多么恨这个妹妹。后来，他作了很大的努力才把自己从妒忌中解放出来。怪不得他把女性美看得如此重要。我从来不相信自己是个美人，不过我还是接受了这枚戒指，并把它戴在手上。我这个情人是个看上去颇为冷峻的知识分子，他居然设计了这样一件奇特的礼物。不幸的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件礼物的含义。

最后，让我用一首英国儿歌来结束这一节：

在爸爸的花园里，
我捡到一分钱。
把它交给妈妈，
买了一个弟弟。

小弟弟，真讨厌，
做成肉饼烤了吃。
小肉饼，真难吃，
一把甩到墙门外。

送你上西天！
送你上西天！
今生今世别再来！

幼儿训练：保持清洁(和美貌)

我们都知道，女人最讨厌性器官。她们厌恶女人的性器官，也厌恶男人的性器官；她们厌恶性器官的样子、气味和触摸的感觉。令人费解的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偏偏让女人来负责孩子的大小便训练。要知道，我们对性器官的看法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这种感觉很难改变，它会跟随我们一辈子，对我们的性生活产生长远的影响。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爱，但我们首先要教孩子爱自己、爱自己身上的一切，包括两腿之间的那个部位。女人们在这方面到底做了些什么？

只要观察一下女人在给孩子换尿布时眼睛和面部的表情、嘴里发出的声音、手的动作，还有她们对粪便和气味的反应。很难想像，一个对下身清洁过分挑剔、过分敏感的人会宽容地对待孩子控制大小便的能力。很难想像，一个厌恶自己下身的女人会喜欢孩子的性器官。就算她过去曾经让丈夫吻自己身上的那个部位，现在可不行！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都避免公开谈论同性有关的各种问题；如今，少女怀孕和致人死命的艾滋病却成了全社会的难题。我们从各种渠道得知，我们对性器官的态度决定我们的性行为；而且，我们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态度传给孩子，从而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长远的影响。

“母亲”已经不再是育儿室的主宰，她已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即使女人们全都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里去做家庭主妇（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她们也不会成为传统的贤妻良母。那些在职场上冲锋陷阵的女强人早已把贤妻良母这一往日的偶像踩在脚底。

于是，女人必须两头兼顾，她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这就迫使女人让男人来分担育儿室的工作。首先，要教会婴儿尊重自己的性器官。这份工作应该由父亲来干。先从孩子的大小便训练开始。如果能让孩子轻松自在地完成这项训练，他就不会对自己的下身感到恐惧和厌恶，也不会害怕别人会因此而讨厌他。

我的观点一定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不过，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我们对性器官的看法决定了我们对身体所有其他部位的看法；这种感觉甚至在接受大小便训练之前就开始形成。

让我们先来看看女人。为什么女人照镜子的时候总是对自己不满意？这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身上有些地方不干净、见不得人。要知道，“清洁”对女人来说是头等大事。即使我们在意识中从未把性器官同自己的外表联系在一起，但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却隐藏着对性器官根深蒂固的厌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除掉这种恶感。不论是名贵的香水、华丽的服饰，还是男人的甜言蜜语，都不能使我们摆脱婴儿时期在母亲的影响下形成的感觉。

其实，女人并不是生来就讨厌或喜欢自己的性器官，所有这些感觉都是在摇篮里形成的。出生后的第一个年头是最容易受影响的时期，那时我们吃喝拉撒都要依赖母亲，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现在我们来看看男人的情况。女人经常指责男人过分迷恋他们的阴茎。确实，我们恨透了这两者之间的私情。男人居然能甩开女人同“它”共度良宵，不错，我们女人离了“它”也能活，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愿意忍受屈辱、眼巴巴地看着男人们自得其乐。虽然我们多多少少意识到，性行为是健康和自然的，虽然我们也体验过性行为带来的快乐，但我们却不能像男人那样

自得其乐。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却充满了羡慕和妒忌。想想吧，他们居然能心安理得地干这种勾当，甚至在明知犯罪的同时享受性的极乐！

为什么男女之间对性器官的看法如此大相径庭？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女孩意识到自己以后也要做母亲，因此下意识地全盘接受母亲对性器官的看法。男孩则因性别不同而作出相反的选择。他们意识到母亲对他们性器官的厌恶，但他们拒绝接受母亲的管教，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许多男人一辈子都在反抗童年时期母亲对他们性器官的侮辱。他们手淫、同“坏女人”寻欢作乐。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虐待女人，他们只是用各种方式，甚至是对自己有害的方式，来发泄他们早年的怨气。

只要看看那些好心肠的母亲用什么样的语言来称呼小男孩的阴茎——“小鸡鸡”，多么可恨的绰号！我们需要认真看待这个问题，要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性器官的形象会成为自我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母亲教她的小儿子大小便时，她的感觉如何？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如此接近男人的阴茎并把它握在手里。然而她心里并不踏实。不错，她手里抱着的只是个两岁的小家伙，他的阴茎只有一点点大。可他是个男人，他（还有这小小的阴茎）很快就会长大、远走高飞。于是她下意识地把它称作“小鸡鸡”，好像这样一来，即使是雄鹰也会变得像鸡一样老老实实。

当然，小男孩长大后是不会老老实实的。当男孩们在一起时，他们就会炫耀自己的阴茎，把它视为男性的骄傲。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母亲的管教，把自己从性压抑中解放出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那些小时候不敢涉足的禁区如今都成了令人神往的宝地。举个例子：没有一个小女孩敢在上课时放屁。可是小男孩却不怕。对他们来说，在教室里放屁就是在公共场合打破女人的清规戒律，是一件颇为得意的壮举。所以，当教室

里有人放屁时，小女孩们往往厌恶地捂住鼻子，而小男孩们则兴高采烈。

到了青春期，女孩和男孩之间的距离就更大了。女孩变得更像母亲，男孩们则结成一伙，在各个方面都同女孩划清界限。由此拉开两性之战的序幕。

男人之所以对自己的性力如此着迷，同女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女人眼里，爱情和性行为是两码事，她们渴望爱情，却厌恶性器官。于是，由这样的母亲带大的男孩就只能到“坏女人”那里去寻求性的满足，因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会真心喜爱他们的性器官。不过，在体验到最初的兴奋和感激之后，男人们难免会感到有些尴尬。天哪，她是谁？我怎么会同她在一起？怪不得老话说：有的女孩可以同你结婚，有的女孩可以同你上床。

在男人眼里所谓“好女人”就是母亲那样的女人，所以不应指望她们喜爱他的性器官。要是有一个女人同时具备“好女人”和“坏女人”的能力，那她准能把男人牢牢地掐在手里。看到妻子在生育之后性欲降低，男人反而会有种解脱的感觉，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有理由去找另外一种女人。他宁愿在家庭之外、在没有母亲孩子的地方寻求性欲的满足。如今，有些女人也选择将性生活和婚姻分离开来。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分裂的自我。我们把性欲和美德看成互不相容的东西，因而永远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让我们来听听一个男人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他提到母亲如何教他“像大人一样往抽水马桶里撒尿”。他认为，正是这段经历导致他成年后“陷入欲望与良心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这些话摘自菲利普·罗思的《波特诺的抱怨》。这部小说是大约30年前出版的。罗思是个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小说出版后一炮打响，即使是最胆小刻板的读者也能从这部小说里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

我面对马桶站着，伸出小小的鸡巴。妈妈坐在位于马桶旁边的浴缸边缘上，她一只手控制着浴缸的龙头，从那里放出一小股细细的流水让我模仿；另一只手轻轻地搔着我那小鸡巴的下部。我嘴里念念有词：“摸摸我的小鸡巴！”她大概相信这样一来，就能把小便从那小东西里引出来。告诉你，她可真有两下子！“做个好妹妹，做个妈妈的小乖乖。”妈妈对我唱道。很可能，她就是这样决定了我的未来！真是不可思议！她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个男人的性格，她就是这样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可怜的阴道，饱受诬陷的玫瑰

记得第一次去配子宫帽的情景。（说实话，我早就应该配这东西了。）我坐在医生的诊所里。桌上放着一个难看的淡红色女性生殖器模型，医生在用这个模型向我讲解避孕的道理。我很怕怀孕，但我实在不想看那个模型，也不想听医生的解释。当医生手里的铅笔从子宫颈移向尿道、膀胱……我立刻下意识地吧眼睛移开——别说啦！那是肛门！我从来没见过尿道和肛门。当男人的嘴接触我的下身时，那感觉比什么都好，可是我从来不想亲眼看看那个地方。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在做爱时体验到某种神秘感。我的情人也喜欢这种无知。要是有一个男人能使天真的女孩在性的极乐中神魂颠倒，那他一定是个阳刚气十足的男子汉。

拉丁语把女人的下身称为“cloaca”，即阴沟。这就是说，我们喜欢不加分析地把女人的下身想像成一个孔；似乎身体中所有的废物都是从这个孔里排泄出来。妇科医生告诉我，就是今天，还有许多妇女不知道尿道和阴道的确切位置，也分不清两

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振动按摩器的发明倒使不少人弄清楚了阴蒂的位置。许多女人喜欢用装在浴缸龙头上的自慰装置。这并不奇怪。这套设备挺管用，而且使用者的手不必接触下身。这就是说，它能让使用者在体验性高潮的同时保持心灵的纯洁！

我的导师理查德·罗伯蒂勒说，“我不认为女人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生来就羡慕男人的阴茎。大多数同行都持同样的看法。我也不相信女人生来就觉得自己的性器官有缺陷。”不过，罗伯蒂勒也和他的同行们一样，认为小女孩确实不喜欢自己的性器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往往有多种：过分严格的大小便训练、有自卑感或性受虐狂倾向的母亲，还有家庭内部的重男轻女。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会使小女孩子们觉得“自己身上有些令人讨厌的东西，那就是她们的性器官。”罗伯蒂勒指出“女人们还将这种对性器官的反感扩展到大腿、乳房以及肌肉松懈的手臂。你见过一个对自己的身体心满意足的女人吗？”

我不知如何反驳他，只好无可奈何地摇头。这是罗伯蒂勒和我近几年来经常谈到的问题，也是我写作、阅读、思考和体验的一大主题。我越来越觉得罗伯蒂勒的话有道理。当我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们只是羡慕男孩控制身体器官的能力，对阴茎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如果我们发现，母亲对哥哥或弟弟的爱带有某种性爱成分，我们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到，男孩身上有一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不论男孩在家里或社会上得到什么样的优待，我们都会把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同下身的那个部位联系起来。我小时候没有兄弟，也没有父亲，但我很早就有这样的感觉。记得我曾试图站着小便，结果当然很惨。该死！我多么厌恶自己的身体啊！

大多数男人不像女人那样一辈子都讨厌自己的身体。他们也许会担心自己的阴茎不够大，可是他们决不会把阴茎和肛门想像成阴沟。男孩们有时会有意侮辱女孩，把阴道称作“gash”

或 slit”(裂缝)。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女孩最敏感的地方。男孩也许会羡慕女人的乳房或生孩子的功能，但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女孩对自己性器官的反感。所以，为了报复那些对他们管头管脚的女人，男孩们就用这个方式来诋毁女孩，拿她们出气。

当男孩意识到性爱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女人手里时，他的粗话和脏话就更多了。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想表示对女性身体的爱慕。如果女孩断然拒绝这种表示，并鄙视他、把他视为野蛮人，那么他就会像野蛮人一样发起反击。比如，两个男人站在街上说话。这时，一个非常艳丽的女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两人立刻被她吸引住。那女人注意到他们凝视的眼光，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于是，敬畏立刻变成了愤怒：“嗨，哈里，”一个男人对另一个说，“瞧那两个奶子！”畜生！”女人骂道，弓着背快步走开。

男女之间什么时候开始互相作对？为什么？当然，男人不该辱骂女人。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男人知道如何利用女人的弱点。女人最怕别人发现自己身上的缺陷，这种羞辱她们早就在别的女人那里领教过了。那么，男人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女人这一致命弱点的？就是当女人在他们眼里显得无比强大的时候。

心理学家安·卡尼-库克说：“病人一谈到身体形象就会想到鼻子、身高、体重。我试图让他们明白，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身体形象，不是你对自己身体的印象和看法，而是你的感觉。首先，你的身体如何行使各种功能，你在幼年时期如何学会控制这些功能。”

最初的自我意识来自我们幼年时期对身体的感觉、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卡尼-库克指出：“身体好比是你的家，如果这个家出了什么问题，你对它就会产生反感。当你学会爬的时候，当你成功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

为你鼓掌。大小便训练也一样，做得好，就会得到更多的爱；做得不好，就会尝到失败的苦头。良好的身体形象有赖于控制身体的能力，控制身体的能力越强，我们对自己就越有信心。”

我们也许从未想到，控制力和身体形象之间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可是，只要想想，如果我们不能管住自己的身体，在公共场合大小便失控，我们就会在大庭广众之中丢尽面子。实际上，我们都想“控制观者”，也就是说，我们只想在对自己的形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才让别人注意我们。这好比真人造型，表演者向公众展示的，是一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形象。控制，绝对的控制，只有这样，我们在别人面前才感到踏实。

男人最怕的就是女人的控制欲。那么，女人是在什么时候感到有必要将一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个过程从幼年时期就开始了：在育儿室里，在隔壁房间里，在卫生间里。当大人把我们安置在马桶上，教我们如何控制括约肌和膀胱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只有学会控制这些器官，才能赢得爱和称赞。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控制大便和小便。

性教育专家朱迪斯·塞弗谈到小女孩在卫生间里的经历：“她们坐在马桶上。大人不许她们看或摸自己的下身，但是要求她们学会控制那里的功能。与此同时，大人们不断地吓唬她们，向她们灌输对污染的恐惧，使她们相信下身的一切都是肮脏和见不得人的。小便之后，她们必须用大量的卫生纸把自己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手也洗得干干净净。男孩则不同，他们只需用手把住阴茎、对准目标。要是所有的尿液都准确无误地进了马桶，小家伙就会获得嘉奖。”

男孩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手控制他们的阴茎，这无疑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优势。即使他们控制大小便的能力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他们也能从妈妈那里得到更多的称赞和宠爱。在女孩眼里，男孩手里的这个小玩意儿真是够神的，它就像水龙头

上的开关一样灵便。也许这就是女孩羡慕阴茎的原因：要是她也有这玩意儿，妈妈对她就不会那样苛刻了。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阶层的妇女和她们 1 到 4 岁的孩子。他们发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孩子知道性器官的确切名称。其他的孩子只会说“水桶、小甲虫、土豆、小妞……(女孩生殖器)”或“小飞机、小鸟、笨蛋、小虫威利……(男孩生殖器)”。有的甚至不知说什么才好。别以为年龄和教育会改变这种情况。根据在两所不同的医科大学中的调查，“有些儿科实习医生在给孩子们作定期检查时会漏掉性器官，有的医生在检查性器官时一声不吭，有的则会在检查之前对孩子说，‘现在我要看看下面那个地方。’在给女孩作检查时，漏掉性器官的情况比男孩要多一倍。”

记得小时候，有时母亲在她那间漂亮的浴室里给我洗澡。那时，我一定想着将来有一天，我也能拥有那么多玲珑可爱、散发着奇妙香气的小瓶子。那些香水香膏把妈妈打扮得多么漂亮、多么清洁！女人要获得成功，就少不了这些精美包装的化妆品和饰物。保持绝对的清洁，这就是我们从小受到的训练。而男孩们却自由多了。他们可以大大咧咧地站在一起，一边撒尿，一边闲聊，小便之后也无须擦干，就是滴在地上也无所谓。（天哪，想像一下，要是我们也在地上留一滩尿会怎样！）

在女孩眼里，男孩比女孩干净，因为他们能控制自己的小便；但他们同时又很脏。为了显示男子汉的独立性，他们有意把一切都弄得很脏，并且以此为荣。看到男孩在刚擦过的瓷砖地上留下的泥泞脚印，小女孩就会和妈妈一起发出厌恶的“啧啧”声。在家里，小女孩总是和妈妈站在一起。她们都喜欢干净的地板，她们都喜欢那些放在洗脸池上方化妆品小橱里的瓶瓶罐罐。

至于那些化妆品到底派什么用处，小女孩也许并不了解。

但是她知道这些东西可以遮丑、可以使女人更加漂亮。有时，她会出于好奇，把卫生巾塞在两腿之间，把自己想像成一位高雅的太太。她哪里知道那东西的真正用途！总有一天，女孩身上所有的东西，从时装、口红到漂亮的内衣，都会变成遮羞的工具。女人就是用这些东西来伪装自己、遮蔽下身的耻辱。

“这些年里，有许多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病人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问我，‘你做这种检查难道不觉得恶心？’”妇科医生克里斯蒂亚娜·诺斯拉普说。她认为，“女人之所以不断地冲洗下身，通常是因为她们觉得这个部位令人恶心，必须不断地清洗。这是她们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

令人沮丧的是，即使在成年之后，我们同男人的亲密关系也离不开母亲的影响。当我们渴望性爱、梦想性的极乐时，我们仍念念不忘要做“妈妈的好女儿”。于是我们把怨气全都发泄到男人头上。我们恨那些梦里的“坏男人”，是他们闯进那个令人恶心的禁区，“强迫”我们感受性的极乐，“强迫”我们背离母亲的教导。

好多年以前，电视广告里有个洁先生，他经常在女主人不提防的时候闯进厨房教训她们，说她们用错了洗涤剂，说她们的地板脏得要命，说她们不是好女人。那年头，衡量好女人的惟一标准就是她管家的本领。要想得到洁先生的奖赏吗？那你就必须购买他们的产品，因为只有那些产品才能保证你们家里里外外一尘不染。女人的职责就是保持清洁。

今天，电视广告瞄准的对象是“新女性”。这些女人每天发疯似的奔波于家和办公室之间，为了两者兼顾而忙得不可开交。这类广告比洁先生更加直言不讳：女士们，这样不行！就算你能像男人一样干活赚钱，可是别忘了你是女人：别忘了冲洗！别忘了喷香水！马森吉尔冲洗液成了今天的“洁先生”。

但愿大人在给小女孩洗澡或训练她们大小便的时候，不再

把她们的下身看成令人作呕的阴沟！在这方面，男人比女人好得多。大多数男人对清洁的看法不像女人那样绝对，他们也不会在看到孩子触摸性器官时大惊失色。要是让父亲来带孩子，手淫的历史就会完全不同。要知道，手淫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当你长大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是否手淫，那你就学会对自己的性行为负责。

在一次有关艾滋病的讨论会上，当有人问前卫生部长乔依斯林·埃尔德斯，“是否应该提倡手淫、对手淫进行更坦率的讨论？”她答道：“我想那是人类性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我们应该提供这方面的教育。可惜我们连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教给孩子。长期以来，我们都试图用无知来对付这个问题，我想，现在是尝试教育的时候了。”

可惜，埃尔德斯这番精彩而大胆的言论反而给她带来了麻烦。克林顿总统迫使她辞去了卫生部长的职位。说实话，我从未对克林顿如此失望过，要知道，我还投过他一票呢。对性的无知已经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可是这个国家却仍旧不愿让年轻人了解，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权利和责任。我只想对埃尔德斯发言中的“教”这个词提出异议：我们用不着教人如何手淫，重要的是，要消除对手淫的偏见和恐惧。

我们不愿正视青春期前的性行为。把儿童和性联系在一起会使大多数人觉得非常不安——别忘了当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遭遇！我们也不愿回想自己早年的性骚动。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常喜欢骑在沙发的扶手上前后摇摆。有一天，我们突然觉得两腿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快感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就在这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伙海盗，他们将我们扣为人质，并且警告我们：这样很危险。那时我们只有4岁，但我们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有点不对头。不过，真正阻止我们的，是突然出现在门口的母亲。她的声音和脸上的表情都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是绝

对禁止的行为。可是，我们到底错在哪里？是身体的动作，脑子里的幻觉，还是那浑身发热的感觉？是因为我们碰到了那个禁区，还是因为我们的动作使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就这样，母亲的道德观融入了我们对性的感受。母亲总是对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为了赢得母亲的爱，我们必须改邪归正。就是在 10 年、20 年之后，每当有人唤起我们对性爱的渴望，焦虑和恐惧便接踵而来，我们会下意识地收紧腹部的肌肉，将火热的情欲拒之门外。我们也许不记得小时候骑沙发的事件，可是，每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触摸下身，我们就会像母亲一样大声呵斥。

如果带孩子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那会怎样？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有把握地对付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性欲。这个问题也和童年时期母亲对他们的影响有关。不过，父亲的参与可以让孩子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样一来，孩子就不会把母亲的话当作惟一的真理、原封不动地将母亲的一切都继承下来。

你一定注意到，性爱对一个人的外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女人们平时总是担惊受怕，她们的脸上常常显出紧张和焦虑的皱纹，而性爱的激情却能使这张脸容光焕发、充满活力。当你和情人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满面春风地走进餐馆时，你会觉得一切是那样令人愉快，所有的人都会在你的影响下变得格外和蔼可亲。如果所有的女人都能学会如何充分享受性爱，我们的生活将增添多少热情和欢乐！

女人们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花在梳妆打扮上，却不愿想想如何改善自己的性生活。性压抑使我们变得脾气暴躁、情绪恶劣。我们压制自己，也压制别人。看到别的女人享受性爱的极乐，我们就气得咬牙切齿，因为她们那心满意足的笑脸使我们想起自己失去的欢乐。

就是女人们近几年在经济上的成功也不能减轻性压抑造成

的怨恨。相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女人们的怨气似乎越来越大了。她们拥有一切，却越来越讨厌自己的身体。可怜的男人，他们成了女人的出气筒。其实，这一切同男人有什么关系？男人并没有向我们灌输对性器官的厌恶。然而，要我们追究性压抑的根源可不那么容易。谁愿意谴责自己的母亲？那简直是大逆不道！于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继续走母亲的老路，模仿她的言语行为，像她那样管教自己的孩子。就这样，我们原谅了她，因为我们已经变得同她一模一样。

可是，回避是不明智的。请问，如果做母亲的放弃了自己的性生活，当她看到女儿开始对性感兴趣时，她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吗？我们常常妒忌那些在性爱上比我们更加不受拘束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女儿。我们恨她们，因为她们使我们想起自己曾经放弃的东西。有些人看到女儿手淫就破口大骂，“嫁不出去的小娼妇！”从这些话里我听到了母亲的妒忌。

女人对性行为的管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这是因为她们不仅控制自己的孩子，而且把她们的权力扩张到其他地方。性压抑造成人生的缺憾和人格的缺损，以及强烈的妒忌心。这样的人不能容忍别人有一点越轨行为。那些保守的右翼群体，那些反对性自由的男男女女们，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就是因为他们心里燃烧着永恒的妒忌之火。

如果母亲讨厌自己的性器官，那她就不可能教儿子或女儿去爱他们的阴茎或阴道。这就是说，要改变对子女的教育，母亲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脱胎换骨，要么请丈夫和她共同承担养育孩子的职责。既然女人能走上工作岗位，为什么男人就不能进入育儿室？如果女人能在办公室里唱主角，男人同样能带好孩子。

我们必须坦率地谈论这个问题。年轻人在考虑结婚的时候，也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女方不喜欢带孩子，那也没什么不好，她可以找一个喜欢带孩子的丈夫。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

理由选择配偶：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容貌身段，还有共同的爱好，比如钓鱼或看老电影。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考虑带孩子的问题？20年前，有人提出“母性的本能”是不存在的。这个观点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实，这话没错。父母和孩子都需要学习怎样去爱对方。

只要看看这几年销售的母亲节贺卡，就不难发现，完美的母性又成了崇尚的对象。与此同时，广告商们则为吸引“典型的”母亲而伤透了脑筋。“广告商最怕的，就是得罪他们最重要的顾客。”《广告周刊》的评论员巴巴拉·利珀特说：“如果广告里的母亲是家庭主妇，上班族母亲就不愿看；如果广告里的母亲是工作狂，家庭主妇就不愿看。”

但愿有那么一天，男女双方都能把各自的才能和人生经验带给孩子。20年前，妇女打破了男人对职场的垄断。那时，女人在法律和道义上都占了上风，就连男人们也看到这一点。许多男人和妇女并肩战斗，支持她们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今天，男人能否进入育儿室，同样是一个有关伦理道德的大问题。男人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女人能不能放弃她们对育儿室的绝对垄断。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该要求男人更多地担当起抚养孩子的责任。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索尔·贝娄的小说《赫佐格》里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描述。小说的主角摩西·赫佐格打定主意报复前妻马德琳和她的新丈夫格斯巴克。他带上手枪，来到马德琳家。透过浴室的窗子，他看到一只男人的手正在关浴缸边上的水龙头。那是他的死对头格斯巴克的手！他正在给继女洗澡。他用半开玩笑的口气温和地命令她站好，“于是她略微弯下身子让他洗……他不慌不忙地将她彻底擦干，还用一大号粉扑给她搽上粉。小家伙快活得蹦蹦跳跳。‘别疯了，’格斯巴克说，‘穿上你的睡衣’”看着这一切，赫佐格的满腔怒火

顿时烟消云散，他不声不响地走开了。

这一段深深地打动了。一个男人在看到情敌为自己的小女儿洗澡后，打消了报复的念头。多么动人的一幕！我们听了那么多关于男人猥亵儿童的报道和统计数字，难免对所有的男人都产生怀疑。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这方面，男人并不比女人更出格，只是后果不同而已。如果一个女人吻男婴的阴茎，我们最多耸耸肩膀；如果一个男人做同样的事，他就得蹲监狱。

根据 1977 年的一次统计，51% 接受调查的丈夫表示，如果缩短工作时间，他们就会更多地同家人在一起。《洛杉矶时报》在 1990 年作过一次调查，39% 接受调查的父亲希望辞去他们的工作，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同孩子在一起。在另一次调查中，74% 的男人表示，比起快速提升，他们更希望做个好爸爸。有些研究显示，带过孩子的男人自我感觉更好、更加自尊、待人也更加和善。我们是否可以设想，由父亲和母亲共同带大的男孩长大后也会更加和善？

如果男女之间不能就权力的分享达成新的共识，他们之间的怨气就会与日俱增。女性即将在经济上和男性平起平坐，然而她们却仍旧独霸着生育和培养人类后代这张王牌。这预示着母权社会的来临。

一百年前，为了应付过高的婴儿死亡率，一个家庭要生十几个孩子。在今天这个医学技术发达的时代，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孩子的存活率，而是他们能否在家里得到足够的爱。在传统的大家庭里，孩子不仅能得到父母的爱，还能得到祖父祖母、叔叔阿姨以及其他亲戚的关心和爱护。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正如佩内洛普·利奇所说，在我们物质生活日益富裕的家庭里，成年人对孩子的关心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商品”。要知道，这恰恰是孩子最需要的东西。“大人可以对孩子发火，可以责备或惩罚他们，但决不能不关心他们。冷漠会对孩子的感情造成

巨大的伤害。”

我们为孩子提供的东西越来越多，给他们的关爱却越来越少。在理智上，我们知道，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是他们自我意识以及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他们照镜子的时候，他们应该看到一个真实的自我，一个值得喜爱和骄傲的自我，这样，他们长大后就不会对自己缺乏信心。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关爱，他们的自我形象就会在羞辱、妒忌、恐惧和偏见的压力下遭到扭曲。

第三章 创造自我的年代

体验自由,表现自由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讲述一个人的生平故事时，我们常常会漏掉他的少年时代，似乎这是个无关紧要的时期。可是对我来说，少年时代却是一生中最快活的时期。那时的我，敢想敢干，对自己信心十足。

同其他年龄的人相比，八九岁的孩子是最自由的。不幸的是，弗洛伊德把这个阶段称作“性潜伏期”，这种说法造成了一个错觉，好像这是个非常乏味的时期，而我们则像梦游者一般，稀里糊涂地度过了这个阶段。其实，在我们的一生中，没有任何时期比少年时代更加乐观和富于创造力。至于对性的感受，我们也不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处在“潜伏”状态。在度过恋母（或恋父）的阶段之后，我们已经学会把性的感受藏在自己心里。

不错，我们还是孩子，但我们已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勇敢、好奇、天真无邪。即使在家里受到一些委曲，我们也能在家门外寻找补偿。我们无忧无虑，对青春期的残酷竞争一无所知。谁会在八九岁的时候想到这些？

我们惊喜地发现，出了家门，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家里是否得

宠。对我们来说，家已经不是惟一的世界，外面的人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在此之前，别人只把我们看作父母的孩子。“你长得真像爸爸，他们会说；“你的眼睛同妈妈的一模一样。”这些都是好话，只是他们看到的不是真正的“我们”。

现在，我们不再是爸爸妈妈的影子。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在朋友家里，我们都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面前。一个新的世界在我们眼前展开，这里的人不知道我们在家里的小名，也不会期待我们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我们请汽车加油站的工人给我们的自行车打气，向商店里的女售货员买糖。他们待我们可不像家里人那样管头管脚，这使我们有机会大胆地表现自己。有时，我们会得到由衷的赞赏。

我们是充满幻想的一群，喜欢把自己想像成童话故事里神通广大的英雄。至少，我们现在不再弱小可欺，我们可以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

在文学作品、电影以及实际生活中，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做父母的听到别人夸他们的孩子：“你儿子可真了不起，瞧他多会讲故事。多可爱的孩子，多逗！”他们多半又惊又喜，不过有时也不一定。有些父母不喜欢从陌生人嘴里得知这样的信息，因为这使他们意识到，孩子向他们隐瞒了一些东西，他们没有首先向父母、而是向外人显示了自己的才能或爱好。父母的失望和怀疑并没有使孩子感到内疚。他们发现了新的自我，这是他们的秘密。

少年时代，我们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这样做并不奇怪，这是为了保护父母和我们自己。成年人也有他们的秘密。不是吗？他们常常互相耳语，“你怎么能把这事告诉孩子？”在影片《战友》里，男孩子们发誓绝不把他们的冒险经历告诉任何其他人。这个誓言不仅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而且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父母。经过了那场冒险，他们都觉得更加自信和成熟，好像变了一

个人。

在那个年龄，外貌并不特别重要，因为其他的才能也能使我们得到赏识。我们比智力、比速度、比谁的新点子多。我们有勇气战胜那些小美人；至少，我们可以同她们平起平坐。于是，我们起劲地训练自己，努力打造一个新的自我。我们开始把自己想像成运动员、演员或领袖。幼年时的自卑相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张充满个性和活力的脸。我们不需要照镜子，因为我们正全力拥抱心目中的自我。

在家里，父母和兄弟姐妹注意到，我们走路和说话的时候有些装腔作势，好像在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指责我们“故意炫耀”，劝我们不要去“刻意模仿”什么人。对这些批评我们不屑一顾，继续勇敢地拥抱新的自我。做父母的总是很难改变他们对孩子的看法。比方说，约翰小时候是家里最漂亮的孩子。二三十年后，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可是我们的父母仍旧说：“约翰长得最好看。”如果做父母的很早就某个孩子身上寄托了自己所有的期望，要他们改变是很难的，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偏见。

让我们再来看看家人团聚时的情景。不管我们成年后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父母和兄弟姐妹仍旧喜欢用那些讨厌的绰号来称呼我们——“小胖墩”、“小四眼”、“小矮子”……碰到这种情况，千万别发火。

要是不当作家，我就永远不会想到重新发掘少年时代的我——那个勇往直前的小姑娘。小时候，我在家里是个无名小卒，可是，当我学会骑车、能够独自出门时，我发现外面的人对我的看法同家里人不一样。通过他们的眼睛，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我。只要凭着这个真实的我，就能赢得别人的爱。

我好像站在高墙的顶上遥望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是那样美好。顷刻之间，所有的苦恼都烟消云散。我有了新的安全感。

就像童话故事和小说里那些闯荡世界的小英雄一样充满自信。我哪里知道，这个世界里还有性别歧视和种种清规戒律，它将剥夺我们身上最有活力的东西——勇气、创造性、竞争性。我哪里知道，对异性的渴望将使 12 岁的我在一夜之间成为爱的俘虏。打那以后，我将再也无法找回少年时代那个充满阳光的自我形象。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国作家圣-埃克萨佩里的小说《小王子》才会在 70 年代吸引几百万读者，包括我自己。埃克萨佩里在书中写道，“对我来说，童年时代的回忆在我的一生中是最真实的。”

少年时代是短暂的，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像一张小小的快照。这张照片虽小，却能显示出我们身上最重要的特征，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自行车是少年时代的象征。那时，我心目中的偶像是牛仔女郎。当然，我没有马，不过我有自行车。有了车，我就能离开熟悉的房子、马路和街坊，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记得第一次独自骑车出游，我的感觉就像个探险家，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得意。这种感觉一直保留到我有了第一辆汽车。不用说，汽车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活动空间；更多的陌生人将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的样子：身穿牛仔裤和一件说不出什么颜色和款式的毛衣（那年龄，谁在乎这些？）骑着绿色的施温（Schwinn）牌自行车，双脱手，唱着歌。我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飞过路边的行人，飞过一条条熟悉的街道，突然向右拐，飞上一条从未走过的小路。不好，迷路了！没关系，找找看！瞧，前面就是回家的路！就这样，每次小小的冒险都成了自身能力的见证。骑车时，我的四肢及全身的肌肉都配合得好极了，我成了自己身体的主人。我心里得意极了，觉得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我身上。至于别人是否真的这样看我，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

我感觉如何。

只要很少几样东西就能给一个孩子带来快乐，这些我都有。一辆自行车再加上一个好朋友，就能痛痛快快地玩个够。哎，但愿我能重新找到当时那种心满意足的感觉！

在那短短的几年中，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探索和实践，模仿心中的偶像，显示自己的才能和技巧，而别人也会突然对我们刮目相看。比如，当我们显示出对画的鉴赏能力时，老师就会说，‘唷，你可真有眼力！’别人的夸奖使我们勇气倍增，我们无所顾忌，胆子越来越大。自发性是我们生活中至高无上的统帅。同那令人窒息的青春期相比，这是多么自由自在的年代啊！

人生最快活的事是什么？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要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好像即将登台的演员，也许心里有点紧张，但演出本身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创造发明更伟大了，而9岁的孩子是最有创造力的。只要想想《红与黑》、《汤姆历险记》、《我的童年》和《战友》。我们喜爱这些电影和小说中的小主人公，因为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特别喜欢罗伯特·德尼洛的《布朗克斯故事》。故事里的小男孩对外面的世界是那样着迷，为了不漏掉街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特地把自己的床推到窗子下面。我也喜欢在睡觉时把枕头搁在窗台上，让想像的翅膀带着我在广阔的天空下飞翔。要是电影和小说中有更多勇敢的小女孩，那就好了。

在家里，我常因自己不及姐姐和母亲漂亮而难过；出了家门，我发现自己有能力从别人那里得到足够的爱。同时，我也乐意和别人分享自己拥有的一切。那时的我，确实非常慷慨大方。可是，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到哪儿去了？我相信，如果在青春期到来的时候，我能好好发挥少年时代的创造力，而不是把精力都浪费在梳妆打扮上，那么今天我肯定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喜欢浪漫的音乐。母亲的百老汇音乐剧唱片里有许多这

样的歌。当我骑车穿过那些熟悉的小街时，常常放声唱着这些民歌。那悲伤的旋律在我心里唤起莫名其妙的共鸣。不过，浪漫毕竟不同于性爱，浪漫的爱实质上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是纯粹的渴望。

尽管如此，我当年对浪漫音乐的迷恋还是比不上我的邻居彼得·艾伦。彼得曾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获得巨大成功，他跳起舞来腿踢得像罗基特舞蹈队的姑娘们一样高。我们做了12年的邻居，在此期间，彼得经常在我们共用的露台上唱他创作的情歌。谁也写不出彼得那样优美的情歌。夏天，我喜欢坐在露台上听彼得唱歌，我常想，这辈子能和一位音乐家做邻居真是莫大的福气。去年夏天，在他去世之前，我们把他的钢琴推到露台上。远处是曼哈顿迷人的夜景，一轮明月悬挂在卡莱尔大酒店的上空。那天晚上，彼得唱了多少情歌啊！

彼得对我就像哥哥一样。我小时候特别希望能有个哥哥，这样，我就可以跟在他后面，像男孩一样四处闯荡。我跟母亲和姐姐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也许我确实把自己看成一个男孩。

我喜欢甩开性别差异，随心所欲地创造自我。当然，母亲希望我们变成端庄的淑女，她的影响依旧存在，但是少年时期的自信、独立和勇敢在我们身上占了上风。那时，我们还没到性成熟的年龄，因此，大人们对我们比较放心、也比较宽容。但是好景不长。对大多数成年女人来说，一生中再也不会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即使有，她们也不敢去冒任何风险。就这样，我们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胚胎，到死也看不到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潜能。

我们常看到一些像男孩一样横冲直撞的小女孩。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常看到具有女性气质的男孩？原因之一，是社会对男性的要求很严，对什么是男子汉有严格的规定。为了成为一个男人，男孩必须学会抵抗母亲的影响、远离任何具有女性特点的东西。在家里，男孩最先接触的是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说，在

童年时期，他对女人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对男人的了解。后来，他跑出家门，开始同其他男孩交朋友。每个男孩都从影视节目里寻找自己的男性偶像：施瓦辛格、兰博或者其他值得他们崇拜的英雄。不过，这些虚构的男性英雄仍旧不足以抵挡女性/母亲在家里的无上权威。因此，为了摆脱女人的威力，他必须贬低女人。

父亲的作用越小，母亲的权力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男孩就愈加渴望摆脱母亲的控制，并竭力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为了证明自己不需要女人，男孩们结成一伙，练习新的行动、感觉和说话方式，清除自己身上一切具有女性气质的东西。夏天，他们一起奔到湖边，脱光衣服跳进水里。这是他们在庆祝自己获得新生就像埃金斯在《泳潭》这幅画里所描绘的那样。

我多么希望能和那些男孩们一起跳进水里！我讨厌自己家里的女人 她们胆怯、好哭、相互牵扯、形影不离。我虽然没有父亲，没有兄弟，甚至从未同小男孩交过朋友，但我行动起来却像男孩，尽管我从未有意识地模仿过他们。每当我想起这些，就觉得颇为得意。这确实是我的黄金时代。

记得我曾和两个小朋友以及他们的家人在靠近北卡罗莱那的奥克拉科克岛上一起过暑假。我的小船刚靠岸，朋友们就飞奔过来：“南希 南希 我们已经告诉那帮家伙 等你来了，一定会好好教训他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她们居然把我看成是复仇的英雄，指望我去对付一帮粗野的男孩！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难道我真有这么可怕？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有好几次把自己锁在浴室里，试着往一个玻璃杯里撒尿。难道我想做男孩？也许。至于我是否真的与那些野男孩对峙过，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往玻璃杯里撒尿的感觉却留在记忆里。

每当我提起自己小时候的长相，母亲总是反驳道，“瞎说！你那时可漂亮了 梳着两条小辫子 还喜欢穿着牛仔裤爬墙。”不

对，我爬墙是为了向别人证明：别看我长得不美，我在其他地方可是个赢家。谁的记忆更可靠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当年和家里人在一起时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我喜欢回想自己10岁时的样子：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我和姐姐同睡一间房间，椅子上放着前一天晚上叠好的衣服。我拿着衣服跑进卫生间。卫生间的门后面挂着母亲的丝袜和衬裙。洗脸池的上方有一面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两条小辫子、高高的额头、雀斑、戴着矫正架的牙。我随便套上几件衣服，毫不在乎颜色和料子是否协调。接着就开始刷牙。可是，一看到母亲和姐姐的牙刷，我就停了下来，故意把嘴里的牙刷抽出来放回架子上。对我来说，不刷牙不梳头就是证明我是个独立的人，和她们（母亲和姐姐）不一样。至于这样做是否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这并不重要。

在楼下厨房里，我取出葡萄干、花生酱和面包，然后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边吃，一边翻看一本笔记本。那上面有我写的歌词，用的都是流行的曲调。我是一个名叫“俊妞摇摆歌手”的五年级四人演唱组成员，这些歌就是为演唱组写的。我们当天要在学校的行政大楼表演。我一面吃，一面哼哼唱唱、手舞足蹈，有时站起来做几个从音乐剧影片里学来的精彩动作。

我喜欢自己的少年时代，因为那时的我是那样清纯、那样自然。我带着书，骑着车飞快地上了街。一路上，我向卖花的女人们招手，她们正在邮局前的台阶上摆开装满鲜花的篮子；我向运送冰块的马车夫们招手，以前我常跟着他们的车到处跑（直到有人向我母亲报告）。前面就是朋友乔安娜家，在那里，我又能吃上一顿早餐。这回，我将同一个完整的家庭坐在一起，就是说，在餐桌的一边会坐着一个父亲。他们待我就像一家人，在他们家里，我变得高高兴兴、活泼可爱。

乔安娜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也是演唱组的成员。我们决定

先让她们家的人看看我们的节目。我把手搭在乔安娜的肩膀上——她比我矮一个头，可那有什么关系！——我们俩一边唱一边跳。我们唱《你真了不起》，就像影片《夏季剧团》里的吉恩·凯利和朱迪·加兰那样。乔安娜甜美的高音和我的低音融为一体，歌声和浪漫的歌词融为一体。我们还是孩子，但我们的演唱充满了对爱的渴望。

那时我有很多的自由。家里只要求我按时回家吃饭、晚上9点上床。可是，即使这点要求我也不常遵守。我认识城里很多人家，他们欢迎我，并且经常留我吃饭。在我熟悉的许多家庭中，我是惟一没有父亲的孩子。他们有没有把我看成一个失落的灵魂？对这点我一无所知。至少他们从未在我的面前表露出怜悯。相反，他们给了我赞扬、接受和爱。我没能报答他们，心里总觉得十分内疚。也许，这是因为我欠他们太多，以至于不知如何报答。看来，只有在许多年之后，我才能体会到，我从老邻居、老学校，以及那田园般美丽的小城里所得到的一切是多么宝贵。

我们从家庭的小圈子走进了学校这个大家庭。如果说，在家里我们像沉默的羔羊，在学校里我们却声音洪亮，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老师和同学的赞赏使我们信心倍增，他们的尊重成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就这样，我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人：在学校里，我是优等生。毕业时，我还得到一只刻着我名字的银杯，那杯子是用来奖励我的领导才能的，现在我用它来装铅笔。在家里，我却成了无关紧要的人。要是我不在家，很少有人会询问我的去处。他们的冷漠当然会使我难过，不过也为我提供了更多自我创造的自由。

我的学校，在那里，我度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光！它是我的人间乐园，它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我在那里排练话剧、玩垒球、创作歌曲、做小头头。有时，我很早就跑到学校，校园里只有值

班的人。如果小组里的其他成员还没来，我就独自练习投篮。我对竞争性的游戏特别感兴趣。在南方，人们不喜欢好胜的女孩子，而我却偏偏喜欢当得胜将军。

幸运的是，我上的是女子学校。这使我受益匪浅，因为我不必挖空心思去吸引男孩们的注意。我可以一心一意地练球、学习和组织各种活动。要知道，一旦男孩进入我的生活，我就会为了爱情而放弃一切。

这就是少年时代的我 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可爱的时候 宽容、善良、公正、热情、能说会道、有进取心、有竞争意识、有领导才能。可惜几年后 为了将自己改变成一个淑女 我放弃了这一切。

银幕上的自我

看电影大概是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事情。如果说，自行车给了我们行动的自由，电影则唤醒了我们的想像力，为我们打开梦幻世界的大门。童话故事反映的是儿童经历的感情冲突，电影则体现了少年男女的感情世界。电影无限地延伸了我们的生活半径，摄影机把我们熟悉的环境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不错 电影里的故事都是编造的 但是在有些孩子眼里 银幕上的世界比现实生活或书里的故事更加真实。不错，我们不是美人儿，我们也不会再在楼梯上跳舞，可是，影片里的女主角原先不也是如此吗？直到有人因为一首歌、一套衣服或者一个热吻而对她们刮目相看，这才彻底改变了她们的命运。

对有些孩子来说，看电影只不过是一种娱乐。他们喜欢呆在家里，他们只想成为像父母一样的人，他们想要的都是已知的、熟悉的东西。但是，对另一些孩子来说，电影才是生活的开始。回想一下你在电影院里度过的童年，回想一下同你一起长

大的人，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对电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完全沉湎于银幕上的世界，有的人则在电影结束后很快回到现实生活中。

对于 10 岁的我，电影是生活的开始。我想这和幼年时期的经历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是父母理想中的孩子，如果他们能在我们身上看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是他们的掌上明珠，我们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在家里享受明星地位。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从电影里寻找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我指的不是电视，而是在大银幕上放映的电影。

和我一样，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道道地地的电影迷。我们从不漏掉城里放映的任何一部影片，我们都喜欢把自己想像成电影里的某个人物。

我那时就像影片《星光伴我心》里的小男孩看电影上了瘾。为了看电影，我常翻妈妈的上衣口袋和手提包。只要能找到一角零钱，我就到离家几个街区的一家药店里去找我的朋友。在去影院的路上，我们总要在面包房停留一下，每人购买满满一袋果冻炸面圈和巧克力泡夫带到电影院去吃。在黑暗的放映厅里，我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银幕上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嘴里塞满了炸面圈，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我们和影片里的人同生死、共命运，心心相印、息息相关。这种感受在电视前是绝对得不到的，只有电影院那巨大的银幕才能完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完全沉浸在影片的激情之中。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成年人能够在我们这些少年的心里唤起对英雄的崇拜，影片里的巨人却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他们只能在银幕上存在一小时，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却是活生生的英雄。在黑暗的放映厅里，我们和一大群陌生人坐在一起，公开地体验人生最隐秘的感觉。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喘气、叹息，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

中，平时的礼仪和拘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大概这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观众在竞技场里的集体感受。

说也奇怪，我在教堂里也有过类似的体验：这是一种在公开场合同别人共享的、超越现实的感情，一种集体的自我感受。坐在我周围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一个小基督徒。不过，在教堂里感受到的自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真正的我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找到。电影是人类感情的大杂烩，在电影院里，我可以全方位地体验自我，体验内心深处各种感情。高中毕业后，我没有像其他女孩那样急于嫁人，因为我想更充分地体验人生的七情六欲，就像在电影院里所经历的那样。

电影还能给人带来安慰。我们有时会把自己想得很坏，可是影片里的恶棍通常比我们坏得多。就拿理查德·威德马克来说吧。同他扮演的恶魔相比，我们那些小小的恶念算得了什么？伊丽莎白·泰勒的美貌是我做梦也不敢想像的，但我对她那光彩夺目的形象只有崇拜和喜爱，决不会有丝毫的妒忌心。有趣的是，电影里的美人大多是受苦受难的角色。这就是说，美貌不是万能的；除了美貌，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能给人带来成功和幸福。

最激动人心的是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的音乐片：《雨中曲》、《演艺船》、《月光下的海湾》、《好消息》、《滑稽面孔》。我坐在黑暗的影院里，和着音乐的节拍摇头晃脑、嘴唇微微抖动，就像中了催眠术一样。我和多丽丝·戴一起，苦苦地恋着隔壁人家的男孩。看完了《复活节的游行》我会像弗雷德·阿斯泰尔和朱迪·加兰那样，在邮局的楼梯上狂跳。楼下卖花的女人们看着我发笑，而我却毫不在乎。最最令人难忘的是影片里美妙的音乐。看过电影，我就去买唱片。我会唱所有的歌、背得出所有的台词。

在那令人乏味的 80 年代，这些老片子再度走红。新的作曲家写不出浪漫的歌词和曲子，于是我们又重新请出弗兰克·西纳特拉和托尼·本尼特。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新一代年轻观众的心。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电影给了我新的生命，它那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向我展现了人生的宽广道路。电影开阔了我的眼界，它使我看到，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障碍其实是可以跨越的，就看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尝试。只要想起黑美人、莱斯利·卡伦和贝特·戴维斯，我对生活就有了新的热情和希望。

友谊和排斥

10 岁是充满幻想的年龄。在这个年龄，我们需要勇气，以便在生活中尝试各种新的角色，因此我们需要真诚的友谊和来自同龄人的鼓励。有了这一切，我们长大后就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女杰。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变成心胸狭窄、毫无个性的女人。这种人没有主见，只会随波逐流。她们不断地追随时尚，改变自己的体型、面孔和头发，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是女孩们能互相支持、鼓励各自的独立性和独创精神，那该多好！不错，女孩之间常会形成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常常演变为背叛——对朋友和对自我的背叛。女孩之间的亲密关系受到母女关系的影响极大，两者都属于一种难解难分的共生状态。我们无法表达对母亲的愤怒，因为我们不愿失去母亲的爱。朋友却不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她头上。只要有新伙伴，我们就可以轻易甩掉或排挤掉最要好的朋友。

女孩们很早就开始玩这样的游戏，它成了女性的一大特征。其实，这种行为方式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后来学会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行为模式就变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女友之间突然莫名其妙地翻脸；5分钟以前，她们还是难解难分的朋友，顷刻之间就变成了仇敌。只要有3个女孩，其中的两人就会抱成一团、排斥另一个女孩。

我们对待朋友的方式类似于我们同母亲的关系。我们不仅需要亲密无间的友谊，而且渴望权力。在我们和母亲在一起时，母亲拥有无上的权力。如今，轮到我们来向其他女孩行使这种权力了。

在女孩中间，友谊和背叛相辅相成。为了同某个人保持亲密关系，我们必须排挤另一个人。我们常常被人抛弃，但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别人。

这里有一封登在《美国女孩》杂志‘求助’专栏里的短信。寻求帮助的人可真不少，每期至少有一封类似的求助信得到回复：

亲爱的《美国女孩》：

我有两个好朋友。我和她们中的一个单独在一起时，玩得很开心。可是只要她们两人碰到一起，她们就不理我、把我甩在一边。我们为什么要相互倾轧？难道不这样做就不能成为朋友？

我们是9岁到11岁的女孩，正处在快速成长的时期。我们热情洋溢，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母亲对我们也不像小时候那样管头管脚。我们应该相互激励、相互支持、满怀热情地欢迎所有勇敢和有求知欲的女孩。那么，是什么使我们漂亮的大眼睛变得如此目光短浅、充满疑虑？

是恐惧和担心。我们担心失去别人的爱，害怕遭到别人的排斥。即使最亲密的友情也不能逃脱排斥异己这一达摩克利斯剑的威胁。

“妈妈 她们为什么避开我 我做了什么？”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事情很简单：那两个小女孩想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们必须排斥这个女孩，把她作为牺牲品。友情就像炉子里的火，必须加燃料才能烧得旺，而燃料就是对第三者的排斥。也许她们明天又会喜欢她，可是现在绝对不行！她们惩罚她、伤害她、向她发泄所有的怨气。这一招挺管用。同谋关系把她们紧紧地缠在一起，使她们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女孩们追求的不仅是单纯的爱，而是更复杂的东西。对她们来说，爱这个概念总是和怨恨、报复以及支配别人的权力纠缠在一起；她们永远不能脱离处在共生状态下的婴儿对母亲的充满依赖性的爱。她们只懂得一种爱的形式，那就是如胶似漆的二合一关系，完全的支配和占有。

当她们一岁或两岁的时候，如果母亲打破这种二合一关系、将关爱的目光转向父亲或小弟弟，那她们只有一种选择：为了不失去母亲的爱，她们必须把愤怒和怨恨藏在心里，因为母亲不喜欢小女孩显示自己的愤怒或挑战母亲的权威。对男孩就没有这样严格。于是，小女孩只好用其他的方式来安慰自己：同玩偶一起重新上演那痛苦的一幕。这时，她将扮演母亲的角色，行使母亲的绝对权力，用母亲对待她的方式来对待她的娃娃。

心理分析词典将这种现象称作“对侵犯者的认同”。上面提到的两个女孩对待第三个女孩的做法就是一个例子。她们是在重新上演幼年时期的经历。在这场新的为了爱而展开的争夺战中，她们认同母亲的角色、向她们的朋友行使母亲的权力。

当然，女孩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成年人中间。我们女人最爱干的事就是嚼舌头、玩弄小阴谋、

争风吃醋、互相排挤。看到某个女人倒霉，我们就兴奋得发抖，迫不及待地 will 脑袋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久而久之，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成了用眼睛发信号的专家，只需一个眼色，就能使满屋子的人心领神会。这就叫“眼神”。这是一种自鸣得意、遮遮掩掩、卑鄙刻薄的眼神。我们在餐馆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当一个女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其他几个同桌的女人就会立即开始谈论发生在她身上的倒霉事。她们的脑袋紧紧地挨在一起，她们眯缝着的眼睛像猫眼一样炯炯有神，她们恶毒、冷酷，放暗箭早就成了她们的看家本领。年复一年，女人们就是这样相互排挤、相互伤害，陶醉在幸灾乐祸的极度兴奋之中。

这种现象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却很重要。它不仅显示出我们相互关系中的毛病，而且暴露出我们自我形象中的缺陷。我们知道自己不可靠，既容易背叛别人，又容易遭到别人的背叛。要知道，久而久之，这样的心态对女人的容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焦虑和紧张在我们脸上刻下越来越多的皱纹。

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说：“孩子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里就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们会掩饰或伪造自己的感情。在这方面，父母就是孩子的榜样，他们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直截了当地教训孩子：‘听着，别在我面前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

埃克曼还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掌握了一整套“表演规则”，它能自动地控制我们的面部表情。即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很难摆脱这套表演规则对我们的控制。

从童年时代开始，我们的表情就逐渐丧失了自发性，我们的脸也逐渐变成埃克曼所说的“面具”。为了掩盖真实感情而强迫脸部肌肉的收缩，其结果必然是加重肌肉的损耗。如今，假面具越来越重要。怪不得这些年来，美容手术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

可少的东西。

在我们这个女权主义盛行的时代，女人对外貌的审判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女人们最担心的不是男人对她的评价，而是其他女人挑剔的眼光。在青春期，男孩也许会戏剧性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唤醒我们对性的渴望；但是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由女孩组成的小圈子里度过的。只有“坏女孩”才离开原先的小团体去效忠男人。

贝特·戴维斯在不止一部影片里把女人对女人的统治作为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权力就是用“眼神”建立起来的，即使是最亲密的友情也无法摆脱这种权力斗争。我们无时无刻不受这种眼神或目光的监视，它对我们的行为方式、进取心、性生活和外貌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当然，有些勇敢的女性对此毫不在乎。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就有许多这样的女主角，例如罗莎琳德·拉塞尔和凯瑟琳·赫伯恩扮演的角色。这些女人不会因其他女人的在场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其实，喜欢聚集在这些勇敢女性周围的都是男人而不是女人。这倒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工作午餐之后，女人们干些什么？打电话，交换小道消息，议论某个女同事的升迁、她的新情人、她那过分性感的服装、她的“狂妄自大”……我们越说越起劲。天哪，她竟敢如此放肆、如此目中无人；她竟敢挑起竞争、向我们发起挑战。给她点颜色看看，让她知道我们的厉害！

希拉里·克林顿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就是因为许多女人认为，她在丈夫就任总统之后变得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如果没有女人们的全力合作，男人们是不会向希拉里发起这种攻势的。她的锋芒毕露激起了女人们的妒火，她们决定让她吃点苦头。她们嘲笑她的穿着打扮，那些曾经赞赏她的人如今也落井下石，毫不掩饰她们幸灾乐祸的心情。

在欺负同龄人的方式上，女孩和男孩各不相同。“儿童热线”是一项专为英国孩子建立的电话咨询服务，这个项目的一位资深咨询经理说，“男孩喜欢用显示男子汉气概的进攻性方式；女孩则倾向于将对方从朋友圈里排挤出去。”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她的小说《猫眼》中将女孩之间的这种关系描写得惟妙惟肖。小说的女主人公伊莱恩是个9岁的女孩。她试图和同伴们保持一致、赢得她们的好感：“我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包括脸上的表情、走路的样子、身上穿的衣服，所有这些都需要改进。我不正常，我和其他女孩不一样，这是科迪莉亚对我说的，她会帮助我。格蕾丝和卡罗尔也会帮助我。我必须加倍努力，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你可以恨你的敌人，对他们发怒。可是科迪莉亚是我的朋友。她喜欢我，她想帮助我，她们都想帮助我。她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

男人有时确实像个无赖。他们忘恩负义，一走了之，连个电话都不打。不过，女人没有男人也能活得挺好，越来越多的女人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男人不像女人那样为了得到别人的爱而心力交瘁？这是因为大多数男人拥有一个比较坚强的自我。由于性别不同，他们很早就比较成功地把自己同母亲分离开来，而母亲也在社会的压力下让儿子早日获得独立。

我们再来看一段阿特伍德对女孩心理的精彩描述：“我意识到，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别人总能在你身上发现这样那样的毛病，”伊莱恩说，“不管你怎样努力，不管你把自己擦洗得多么干净，总会有人对你不满意，她们不是嫌你的脸不够干净，就是嫌你的举止不够得体。不过，妇女杂志上也有许多不完美的女人，她们额上的皱纹显示出过多的担忧。我把她们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剪贴簿里，这活给我带来不少乐趣。”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仍在呕心沥血，试图打造一张完美的脸、一身完美的衣服以及完美无缺的言语行为。这些可怕的焦

虑同男人到底有多大关系？男人们对这些东西似乎毫无兴趣。再说，即使他们离开我们，也不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在其他男人那里找到爱情。问题在于，我们从小就把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看成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不能忍受分离和竞争。

人的身体可以承受多少强压下的愤怒？让我们来看看《致命的诱惑》。这是一部非常走红的电影，影片中有个热衷于诱惑男人的极其妖艳的女郎。但是，我认为真正吸引观众的，是这部影片塑造的现代女性形象：一个身穿阿马尼套装的女强人，表面上十分能干，实际上却忍受着满腔怒火的煎熬。她有些神经错乱，但并不比现实世界里的许多女人更加疯狂，因为这些女人虽像她一样穿着名牌服装热衷于诱惑男人，但她们还指手画脚，气势汹汹，恨不得杀了什么人。一旦这满腔怒火爆发出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男人。不过，要是以为女人只是在青春期首次接触男孩时才开始感到这种愤怒，那就错了。女人今天的愤怒有着更深的的原因。我们可以对男人大发雷霆，但却不敢对女人这样做。

我喜欢男孩，这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很像男孩。少年时代的男孩都喜欢张开想像的翅膀海阔天空地自由飞翔。他们随心所欲地把自己想像成各种各样的人物——运动员、发明家、宇航员。他们还没有注意到父亲的公文包有多重，也没有想到将来会成为养家活口的人。他们爱母亲，仍旧需要她，不过，为了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们必须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至于女孩，在清一色由男孩组成的社团中，女孩是绝对不受欢迎的。男生俱乐部的门外通常有醒目的标记：“女生免进。”

好莱坞很早就发现：男孩和女孩都爱看关于男孩的电影，可是男孩对关于女孩影片却不感兴趣。在电影《小公主》的规划阶段，有人曾建议把女主角改为男主角，但是遭到影片制作者的

拒绝。电影出来后，赢得评论界的一片赞扬，不过那位专家的看法也没错：票房记录令人失望。影片《风中奇缘》的制作成本大概同《狮子王》差不多，但票房记录却差远了。好莱坞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是因为《风中奇缘》的主角是女孩，“男孩不愿看女孩的电影。”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个 10 岁的男孩，你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什么？就是搞清楚什么是男孩、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男孩。对于这个问题，你最先想到的答案是：在各个方面同母亲 / 女孩背道而驰。

男孩们结成一伙，由群体来规定什么是“真正的男孩”。在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是友谊、信任和同志般的情谊。有的男孩也可能对他的朋友不忠，但男孩之间不像女孩那样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同这个人难舍难分，一会儿将那个人排挤出去。如果关系破裂，遭到同伴的冷落，男孩仍旧有办法大声发泄自己的愤怒。母亲给他更多的自由，他可以提高嗓门同别人吵架——“这孩子脾气可真大，同他爸爸一模一样！”男孩们生性好斗，他们打架、争吵、相互挑战。不过，不论是打架还是玩竞争性的游戏，他们都有一套规则。犯规是不行的。

男孩们都知道，不遵守规则就会受到群体的惩罚。玩游戏总有输赢，今天赢了，明天就可能输。一个人既要学会赢，也要学会输。比赛结束后，双方一定要握手。男孩们很早就把生活看成永无止境的比赛，对他们来说，活着就是要不断地争取胜利。

男孩会做出一些残忍的事情，但他们也鼓励和崇尚勇敢。在每一群孩子中都有一个孩子王，他通常是群体中最勇敢、最强壮的男孩，其他的人都跟着他。在比赛场上，他总是扮演大英雄的角色。其他的孩子也许会羡慕或妒忌他，向他发起挑战。但是 要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必须学会输，学会和对方握手，准备明天再战。

男孩之间也会有一对一的亲密关系，但他们首先是一个团体的成员。有时候，他们会成立一个正式的俱乐部，将总部设立在树上的小屋里、老爸的车库里或者某个地下室里。这些俱乐部里绝对没有女孩。我们常可以看到成群的男孩们在体育场外玩耍，他们之间的友情就是在比赛和竞争中产生的。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形成一个正式的团体，在大街的一角就会出现一个只有男人才能参加的俱乐部。

女孩之间的亲密关系建立在保持表面一致和避免公开竞争的基础之上，男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则不同。儿童精神病专家会告诉我们，要是小男孩在外面受了委屈，他是绝对不会哭着对妈妈说，“昨天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他要离开我去跟那个人好？我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不理我？”

女人对女人的控制远远超过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女人是女人的监管和看守，她们之间的相互控制在青春期达到高峰，并将一直持续下去。她们之间的相互排挤妨碍她们建立专业性的组织。她们对公开竞争的厌恶妨碍她们开展健康的竞争。

至于那些努力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自我的女孩，她们会不可避免地觉得自己违背了母亲。即使母亲什么也没说，她们也会感到内疚。如果在童年时代我们同父亲的关系也像母亲那样亲密，那么我们就不会因违背母亲而感到如此强烈的内疚和不安。贝特兰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

和父亲接近时，她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在双方关系中是举足轻重的一方。一个人需要根据他同别人的关系来界定自我……同母亲的关系使她产生了初步的自我意识。不过，除非有其他的依靠对象，否则对母亲的高度依赖会使她无法把自己同母亲分开。同父亲的关系是实现独立人格不可缺少的一步，它使孩子意识到：“除了母亲，我还可

以依靠另外一个人。”此后，她会进一步意识到：我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世上还有什么人比父亲更适合于做女儿的第一个亲密伙伴？父亲可以教孩子正大光明地竞争，帮她跳出二合一关系的束缚。父亲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多萝西·迪内斯坦认为，“有了同父亲的亲密关系，女孩就能更好地处理自己同母亲之间的感情纠葛。”有了对父亲的爱，小女孩就能比较坦然地看待自己同母亲的关系，即使有怨气，也不会因此而心怀恐惧以及油然起生怕失去这惟一依靠的担忧。

除非女孩们在童年时期就意识到独立自主的好处，把自己看作妈妈的女儿而不是妈妈的克隆，不然的话，她们成年后就会成为毫无主见的人，一辈子都把其他女人的赞同或反对视为行为的准则。我们应该敢说、敢怒、敢为人先，我们应该胜不骄败不馁、热心参与健康的竞争。只有这样，三个女孩才能在一起无所顾忌地玩耍、工作和生活。

寻找理想的自我

少年时代的我有两个崇拜和热爱的对象，一个是成年人，另一个只比我大两岁。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丰富多彩的人生。我形影不离地跟着她们，模仿她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我的心目中，她们一个是缪斯，另一个是爱神。她们对我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在我 9 岁那年，帕特姨妈搬来和我们同住。她是母亲的妹妹，可是在我眼里，她却像个天外来客。她的容貌和举止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她同我见过的任何成年女人都不一样，她

是个天生的女主人公。我忍不住盯着她看——高高的个子，像我一样——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理想中的形象。当然，我肯定不及她那样美丽动人：一头漂亮的红色卷发，波浪般的裙子，宽宽的腰带，还有那双芭蕾舞鞋。不过，我更喜欢她的与众不同。我打心眼里感到，这是我们共同的特点。我一直觉得自己和其他女孩不一样。在我认识的女孩中，只有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只有我没有父亲，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我的姨妈既是演员，又是画家和作家。我喜欢她仰面大笑的样子和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麝香味，那香水的气味好像来自她戴的那条用古希腊钱币做成的手链。我常跟着她到河边去，她在一幢废弃仓库的二楼设了一间画室。那里有她的画架，旧沙发上随便放着一些枕头和披巾，酒瓶上搁着蜡烛。她和那些当演员的朋友们常在烛光下大声朗读《火刑架下的女郎》、《乌龟的声音》和《铃、书和蜡烛》里的台词。他们让我参加这些聚会，有时也让我念上几段。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善良和慷慨的人。

有几个晚上，我和姨妈一起到多克街剧院去看他们排练。那是本地最老的剧院。姨妈在莎士比亚、怀尔德和奥尼尔的戏里担当女主角，当导演的就是她未来的丈夫。夏天，我们常去圣菲利普教堂后面的墓地。在那里，姨妈教我画水彩画。我多么依恋她啊！在她搬来的第一个夏天，我常在夜里躺在床上等她，忍受着窗外木兰花那浓郁的令人窒息的香气，直到外面传来她的脚步声和大铁门的嘎吱声。谢天谢地，她回来了！

我爱帕特姨妈，和她在一起，我可以无拘无束地爱。我崇拜她，但这并没有使她感到不自在。她一定觉察到我对她的依恋，所以她尽量让我参加她和其他成年人的聚会。我喜欢和她一起坐在黑黑的电影院里，我的手臂紧靠着她的手臂。那感觉可真好，不过这同几年后和男孩们在一起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帕特姨妈对我的赏识使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像她那样漂亮和能干。她对我抱着很大的希望，为我开书单、给我上表演课、教我展示自己高挑的身材和仪态。在我的卧室里有张牌桌，下午，她常在那里打字、写剧本。金色的烟嘴里飘出一丝淡淡的烟。我坐在旁边，腿上搁着一本书，可眼睛却老是盯着姨妈。她多美！她是第一个赏识我的人，和她在一起，我感受到爱的温暖。

与此同时，我还爱上了波佩，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她家买下的房子就在我家花园外面。那时，我们住的地段有很多围着砖墙的花园，我喜欢在砖墙顶上玩，从一个花园走到另一个花园。有的墙上镶着碎玻璃，可是我不怕。有时我会跳进人家的花园，跟他们的狗玩，或者坐在树丛里。邻居们对我可好了，他们从来不对我生气。也许这是因为我态度友好，会讲故事，对人总是笑嘻嘻的。

舅舅说 查尔斯顿仍旧是“美国最神秘的地方”这里的人绝对不是那种灵魂空虚，只晓得追求名贵服装、名牌商品、珠宝首饰或豪华汽车的人。他们善良、自尊、有礼貌、有个性 他们给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快乐。杜波斯·海沃德曾住在我家北面，和我家花园只隔几道墙。据说，他的《波杰和贝斯》里有一个场景就取自我们这个街区。我家南面住着我们这个地段最后一家黑人，他们的孩子喜欢坐在门外的栏杆上玩。看到我站在院子的围墙上向他们招手，他们吓得直摇头。那堵墙已经摇摇欲坠，我脚下那些松动的砖头不断地往下掉，惊得隔壁院子里的狗一下子穿过树丛，对着我狂叫。我那时胆子可真大。

有一天，我从卧室的窗子爬到围墙上，往外一看，嗨 我们这儿新搬来一家人家。波佩见到我就不客气地问：“你到底是谁？”我从来没听到一个“有教养的女孩”这样跟陌生人说话。然而这话对我却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我跳到她家院子里。波佩立刻

把我给迷住了，她的胆子比我还大。她的家庭来自社会下层，我在他们身上感觉到一种从未感受到的强烈的性感。那时我脑子里还没有“性”这个概念，但不久我就从波佩和她的3个姐姐那里学到了这个词。她们个个浓妆艳抹。单凭口红的颜色，人们就可以把她们看成是“坏女孩”。

我很少碰到比我更加胆大妄为的女孩。波佩还让我看到了蓝领社会的生活习惯。相比之下，我所熟悉的私立女校实在是太规矩、太死板了。直到认识了波佩一家之后，我才意识到生活中还有热烈而放荡的一面。他们家里乱糟糟的，壁炉上没有木兰花的枝叶，晚餐桌上也没有蜡烛。一家人都在厨房里用餐，说起话来大声吼叫。帕特姨妈从来不跟我说任何和性有关的事，而波佩家的人则三句不离性。我立刻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我穿着女童子军短裤，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波佩家，看她的3个姐姐梳妆打扮。楼下坐着几个军校生，他们正急切地等着和这些胸部丰满、浓妆艳抹的金发女郎出去约会。4个女孩都睡在一间大房间里，床和床之间放着大镜子的梳妆台。她们在镜子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慌不忙、一丝不苟地拔汗毛，搓油抹粉，涂睫毛膏，抹胭脂，画眉毛，极其熟练地调配各种颜色，用手指把每根汗毛都弄得服服帖帖。然后是涂指甲油：在赤裸的膝盖上张开五指，像中世纪的神父们精心绘制彩图祈祷书那样，仔仔细细地把每个指甲都涂成血红色。楼下，军校生们仍在眼巴巴地等候。我真想向这些故意磨磨蹭蹭的姑娘们大喊一声：“快点儿，不然他们就要走了！”可是她们比我更了解男人。

我的母亲和姨妈只用很少的化妆品，可是在波佩家，女人们的抽屉里却堆满了装着油膏、乳液和面霜的瓶瓶罐罐。她们的梳妆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刷子、卷发器、梳子，只要拿起台上的任何一样东西，就会扬起一团烟雾般的粉尘，于是一切都带上

超现实的色彩，弄得我眼花缭乱。

我知道她们在为很重要的事情做准备，这种事以后也会同我有关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观察她们的一举一动，就像观察帕特姨妈那样。在我面前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边是帕特姨妈的世界，那是高雅艺术的殿堂，在那里，我可以获得灵感和荣誉；一边是性的放纵，这里的人以食禁果为荣，但她们同样引人注目，同样可以成为别人追求的对象。对于我这个在家里得不到宠爱的女孩，这里的一切确实非常诱人。

一天，我在她们家过夜。夜里，波佩爬到我睡的床上，一把抓住我的手放在她的乳房上，然后又教我触摸身体的其他部位。最后，她一头钻到我的两腿之间。说实话，除了用毛巾擦洗，我的手从来没碰过那个地方。她的嘴唇和舌头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令人震撼的快感。那时我只有 10 岁，但我知道这是犯禁的行为，必须绝对保密。不过，我确实喜欢犯禁的性行为。

帕特姨妈不赞成我和波佩的关系。有一天，她发现我躲在杜鹃花树丛的后面，正偷偷地涂着一种艳丽的粉红色口红。要知道，我那时穿着牛仔裤和旧的法兰绒衬衫，梳着小辫子，嘴里还戴着矫正牙齿的钢丝架子。我的样子一定很怪。帕特姨妈问我，“你为什么要跟那个女孩搞在一起？”如果当时我了解自己的欲望，我就会说：“因为她在我身上唤起了一种本能的欲望，那是我的本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我什么也没说；我感到无地自容，红着脸拔脚就逃。

波佩的青春期的来得很突然，我们的友谊也到此为止。她的周围总是聚着一群男孩，他们被她身上的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和气味搅得神魂颠倒。我伤心极了，只好去找老朋友，回到我所熟悉的女孩圈子里，不过，我的内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母亲从不干涉我和姨妈的亲密关系，从这点看，她确实非常宽宏大量。有些女人不喜欢和孩子在一起，却不能容忍她们的

女儿依恋其他女人。我的母亲给了我充分的自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同姨妈和她那些来自北方的朋友在一起。她们都是像帕特姨妈那样独特的女子，有的在纽约当杂志编辑，有的写书。当然还有男士们，他们是建筑师、诗人和剧作家，高高的个子，个个都很英俊潇洒。他们都在向姨妈求婚。有个人乘灰狗车来了两次，每次都空手而归。好多年后，我在纽约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仍旧是百老汇最出名的导演之一。在青春期到来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姨妈的影响之下。

我和帕特姨妈的亲密关系使我获得了一种新的审视自我的眼光；她给了我强大的自信心。当然，幼年时期由于相貌平平而产生的恐惧和自卑感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今天，我仍旧无法摆脱这种矛盾的心态。

反面角色的作用

少年时期，有些人成为我们崇拜的偶像，另一些人则会变成我们心目中的反面角色。我们厌恶这些人的行为、看法和生活方式，并且发誓一定要和他们背道而驰。也许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绪，但是它来自心灵深处。例如，我们也许讨厌过分挑剔的父亲、怨声载道的母亲、或虐待我们的兄弟姐妹。由于我们仍旧依赖这个家，所以不敢大声说出来，可在心里却默默发誓：我决不会像他们那样！事实证明，我们确实可以成为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人。

如果我们有一个野蛮的哥哥、脾气暴躁的祖父或喜欢自吹自擂的叔叔，如果我们对他们特别反感，那么，我们今天在照镜子的时候，就绝不会在自己脸上或身上看到任何像他们的地方。有个美容外科医生告诉我，那些到他那儿去做美容手术的人，当

他们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告诉医生哪些地方需要修改时，他们常常漏掉某些缺陷，如鼻子上的凸块、下塌的眼皮。这些多半是亲属中那些反面角色所具有的特征。这就是说，当我们发誓成为一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人时，我们的眼睛就会拒绝识别自己身上那些和他们相似的东西。

多丽丝·莱辛在自传的第一卷中对父母的描写深深地吸引了我：“他们总是在一起紧紧地粘在一起永远在贫困的泥潭里挣扎，永远在过去的阴影里挣扎。他们看上去那样可怜、可悲，那样无能为力，这一切都使我——一个倔强而毫不妥协的孩子——感到无法忍受。我站在那里，对自己说：我绝对不会变成这样、绝对不会。我永远都不会变得像他们一样……记住这个时刻，永远记住这个时刻。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变得像他们一样。”小莱辛告诫自己。

我记不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发誓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公，母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外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像许多喜爱孙子孙女的老人一样，他对自己的子女则像个严厉的吹毛求疵的工头。他很有钱，但他以卡尔文式的死板来对待他的子女。他要求母亲为他工作，以部分“偿还”他用来资助母亲和外孙女的那笔存款。他的要求在今天也许不算苛刻，但是，在那个年代，南方有钱人家的女人是不工作的。母亲厌恶她的工作，她愁眉苦脸、无可奈何，一点不像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女性。我受不了她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尤其在吃饭的时候，我最怕看到的就是她那漂亮脸蛋上的苦相。在那些自发性的聚会上，当她和朋友们在一起时，她有说有笑，显得很快乐。可是每当她把脸转向我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她就会长叹一声。

我发誓，绝不像她那样唉声叹气。我后来确实从来没有为了钱的事而愁眉苦脸。我像许多孩子一样，觉得母亲的叹息同我有关。她唉声叹气，就是因为除了依靠自己的父亲，她没有别

的办法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不，我绝不能走她的路。为了学习赚钱的本事，我参加捐赠品义卖，在街上卖柠檬汽水，在后院的露台上演戏。我们用床单充当帷幕，还派一个孩子在“门口”收硬币。家里人都觉得好笑。在他们看来，对钱的事，有身份的女人连想都不该想。

那时我只有 7 岁。我有一个形状像地球仪的玻璃储蓄罐，里面装满了一分、五分和一角的硬币。我满心欢喜地看着玻璃罐里的硬币一点点往上涨。瞧，那条线昨天到了葡萄牙，今天又上升到法国！外公从国外寄来的信上总是贴着五彩缤纷的外国邮票，我多么想去看看那些国家啊！我幻想着用这些钱去探险、去周游世界。我绝对不能过母亲那样的生活。

当然，那是少年时代的我，那时，我对许多事情还不了解。成年以后，我才对母亲的经历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小时候，别人都告诉我父亲已经死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死，他离开了我们。而母亲则必须忍受这一切，屈辱地接受外公的“施舍”。难怪她看到我时，总是无奈地转过身去，脸上除了烦恼就是悲伤。每当我在学校里拿到全优的成绩单、得了奖金和奖品、赢了球赛、当选为队长或主持人时，我多么想让她看到这一切啊！可是我在她脸上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一点高兴的样子。于是我决定自己管自己，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再也不去找她。

直到今天，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感情上，我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从来不让别人为我付房租、为我买衣服，或者在餐馆里为我付账单。这可不是什么行动纲领，而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有人正而八经地为我买首饰。那是 60 年代，我在罗马认识了一个意大利电影制片人。一天，他送给我一个镶着细小的钻石和红宝石的发夹。我把手缩回来，不客气地问：“你真想把它送给我？”他被我弄糊涂了。我对他说我不打算延长我和他之间的恋情，我马上要回纽约，我在那里有个男

友。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大笑起来：“南希，这只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礼物。”今天，每当看到那个发夹，我就想起当时那副吃惊的样子。我最怕的就是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尽管我们大力宣扬成功女性，但在女性世界里，人们仍旧对那些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女人怀着根深蒂固的反感。我们的社会崇尚有钱有势的男人，却竭力贬低那些为自己博得了财富、名声、魅力和权力的女人。就是好莱坞也摆脱不了这种习惯。

在我的心目中，姨妈是个正面角色，她代表着独立自主和快乐的、充满创造和想像的生活；母亲则是个反面角色。这样做也许很不公平，但多年来，我确实是根据这个模式来看待她们的。不过，后来我对母亲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许多东西都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或学来的：她的笑声、热情和好胜心。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不懂得感恩，因为怨恨在我心里占了上风。那次在基韦斯特岛，当我看到母亲在游泳池旁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喝马提尼酒，并且略带挑逗地接近我最要好的男朋友时，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

当然，我的生活方式同她不一样。看到我身穿华丽的时装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母亲叫道，“喔，哟哟！你真是个见了世面的女人。”我知道母亲为什么羡慕我，她完全有能力像我一样过她想过的生活，只是她没有找到一个反面角色来促使自己选择一条不同的路。

生活就是这样矛盾。我们往往对自己最爱的人产生最强烈的怨恨。

学做男子汉

少年时代的男孩和女孩一旦出了家门，就会选择两条截然

不同的道路。双方都想寻找和自己类似的人做朋友或者结成一伙，用这种关系来取代他们和家里人的关系。

女孩们最喜欢在朋友家过夜。她们喜欢躺在同一张床上，紧紧地靠在一起说悄悄话。男孩们是绝对不会选择这种花花绿绿的卧室来做他们的活动场所，他们宁可在帐篷里或者搭在树上的小屋里睡觉，在垒球场上比高低。不管在身体上还是在交友的方式上，男孩和女孩都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为了摆脱母亲/女人的视线，男孩必须同其他男孩建立联系。他们爱母亲，但是必须摆脱母亲对他们的绝对控制。我是谁？这是每个男孩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不相信母亲能够为他提供答案，因为她是女的，她的思想和需求必然同他的不一样。因此，他开始避开她，寻找他信得过的、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孩。

如今，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父亲同儿子建立了亲密关系，但是他们在人数上的增长仍旧跟不上独自抚养儿子的女人。难怪有那么多的男孩或男人在态度、表情和行为上显示出敌视女性的倾向。最近一期《老爷》杂志上有一篇介绍罗伯特·西尔斯的研究成果的文章。西尔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对一组男人进行跟踪调查，他发现：“那些在 23 岁时最善于通过协商来解决争端的男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他们 5 岁的时候……他们和父母有着同样密切的关系。对同样一组男人，我们在他们 31 岁和 41 岁时分别作了同情心和社会关系/亲密关系的评估，我们发现，影响他们性格和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父亲在他们成长中所起的作用。”可见，父母双方的共同参与是何等重要。

男孩们一出门就结成一帮，这就是男性俱乐部、酒馆、牌局，以及形形色色男性组织的雏形。

在操场上、地下俱乐部里，以及其他肮脏、潮湿、恶臭难闻的地方，男孩们打造出一种新的语言。经过这番艰苦和危险的磨练，他们对这种语言的掌握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许多人

一辈子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臭狗屎！他妈的！呸！谁在放屁？”他们不但这样喊，而且这样做。他们在一起手淫、放屁、拉屎，做各种各样女人讨厌的事。如果男孩们采用这种夸张的语言和行为，那是因为他们竭力想和女人划清界限。一个小男孩在短短几年中就能在言语行动上都显得像个男子汉。

我很喜欢约翰·欧文的《新泽西大酒店》。在这部小说里，约翰和他的妹妹范妮在足球队回体育馆的必经之路上拉屎，然后守在路边，等着看那些运动员出洋相。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哥哥，那该多好！小时候，男孩的阴茎是我羡慕的对象。那是男性的象征、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东西，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男孩的最大愿望就是摆脱女人在生活上对他们的控制。比起阴茎，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他们和女人的区别？所以，当男孩们聚在一起时，他们就会干出许多看起来十分荒唐的事情：围着篝火集体撒尿，在更衣室里脱光衣服打打闹闹，玩手淫游戏看谁能射得更远。打破母亲的清规戒律不仅是一件极其快活的事情，而且为他们提供了自吹自擂的动力。这是胜利的反抗。男孩们用这种方式声明，他们有权控制自己身上的一切。男孩们知道，他们有阴茎，女人没有，他们每手淫一次，就是向男性身份的确立前进一步。

男孩有很多机会互相欣赏和崇拜他们年轻健美的身体。不过，这种对男性美的英雄崇拜只能持续一个短暂的时期。对同性恋的恐惧不久就会干扰他们之间的相互赞赏：“上帝啊！难道我是个同性恋？”在《假如》这部1969年上映的影片里，有一个场面生动地表现出男孩之间的英雄崇拜：大男孩在单杠上轻松地摆动，他那经过良好训练的身体是那样强健、那样优美协调。小男孩在一旁看得入了迷，他爱他，崇拜他，渴望在将来变得和他一样。

为了脱离母亲的影响，男孩往往舍弃容貌去追求别的能吸引别人的手段。他们对长长的睫毛和金色的卷发不屑一顾，他们更看重那些显示勇气和魄力的危险活动。虽然这种行为会引起母亲的厌恶和恐慌，男孩们却能靠它赢得同伴的尊敬，确立自己的男子汉形象。美貌在他们眼里成了廉价的女性资产。如果母亲还像以前那样摸着他的头、凝神注视着他的脸，他就会推开母亲，叫道：“别这样，妈妈！”他在男孩群体中的经历使他确信，只有力量、能力和顽皮捣蛋的胆量才能证明他的男子汉身份。在男孩的群体中，美貌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男孩们故意不修边幅，甚至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我们常在电视广告里看到母亲们赞扬她们用的洗衣粉，因为这些产品帮她们把那些小顽童的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她们显然为自己的“小男人”而感到骄傲。“瞧，多干净的制服，再多的烂泥咱也能对付！”男孩再脏，母亲也能忍受，然而女孩是绝对不行的。对那些有胆量、有能力的男孩来说，体育运动最能体现男子汉的气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男孩都是运动健将。比如，近几年来，一些背着“呆子背包”的书呆子居然成了影视作品里的另类英雄。

不过，外貌已经开始成为男性气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拥有美的魅力，今天的成年男子正越来越多地进入时装和化妆品的消费领域。电视已把男性美变成了商品，一种能够带来巨大利润的商品。不少有儿子的朋友们告诉我，如今，八九岁的小男孩已经十分注意打扮自己：他们往头上喷发胶和摩丝，他们的耐克鞋、衬衫和牛仔裤都必须是特定的款式。不过，要是哪个女孩打电话给他，或者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跟着他，他会感到迷惑不解。在这个年龄，男孩们打扮不是为了吸引女孩，而是为了成为男孩群体的一员。

如今，垮掉的一代又成为时尚的典范。这使我想起乔依斯·约翰逊在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她讲述了

她和垮掉的一代的两个头面人物——杰克·凯鲁亚克和艾伦·金斯堡——在一起度过的日子。在她看来，这个流派给人的印象就像一帮聚集在圣火边的男孩。女孩可以参加，但不能进入运动的核心。女人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他们的一员。约翰逊还描述了她的朋友埃莉丝如何“羡慕地看着男人们玩危险的游戏，以及他们在最后的灾难到来之前尽情享乐”。

如胶似漆的女孩们

和男孩们相反，女孩在相互之间建立了一种类似于女儿和母亲的那种如胶似漆的共生关系。女孩们喜欢在朋友家过夜。她们睡在一起说贴心话，把自己的小秘密告诉对方，并希望以此来获得对方的信任，和对方结成亲密无间的一对。当然，我们渴望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是二合一是我们所知道的惟一的亲密关系模式，我们从来不敢独自行走。不管我们怎样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和母亲不一样的人，我们仍旧无法摆脱她对我们的巨大影响。

当我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们喜欢和同伴躺在同一张床上。我们搂在一起，说悄悄话、互相呵痒、咯咯傻笑。在我们眼里，亲密的朋友就像我们在镜子里的影像，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即使肤色和发色不一样也无关紧要。我们是心灵的伴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信赖。她就是我，我就是她，我们手拉手，谁也离不了谁。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背叛了我，投入到另一个女孩的怀抱中。于是，我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自我。

大多数人不愿意把 9 岁的女孩和性行为或性欲联系在一起。我们顽固地拒绝承认儿童有性的感受。我们相信，只要避开这个问题，就用不着为它操心。我们否认科学不断向我们揭

示的真理，继续教年轻人从小压制他们的活力。这是非常可悲的事，要知道，只要正确对待，这种活力就能用来激发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发展。

性欲所产生的能量可以用在学习、体育运动和社会活动上，可以用来发展任何一种才能和技巧。过早的性交有可能毁掉孩子的一生，但是适当的教育却可以帮助孩子学会正确地利用性欲所产生的能量。不幸的是，我们回避性教育、用隐瞒来欺骗他们，即使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我们却抱怨，孩子从来不让我们知道他们对性的感受。

女孩比男孩更多地继承了母亲对性行为的反对态度。当我们和其他小女孩和小男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试图探索这块禁区时，眼前就会出现母亲严厉的面孔。有趣的是，这种恐惧使我们的冒险行为更加刺激。“我们坐在沙池边上，”有位女士回忆道，“都是八九岁的孩子，有女孩也有男孩。我们一边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一边拉下裤子、把屁股露出来给对方看。”越是禁忌的行为越能使人兴奋和激动，这是性幻想产生的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幻想会变得更加复杂。

今天，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女人们最普遍的性幻想就是同另一个女人做爱。少年时期和女友之间的性探索仍旧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那是我们的秘密，我们相信自己是世上惟一做过那种事情的人，别的女人都像母亲那样规规矩矩。我们是同谋，共同违抗母亲的法规。但是我们也不愿意伤害母亲，因此，我们要对她绝对保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成年女人在结婚后就对性生活失去了兴趣，只有“违禁的做爱”才能给她们带来真正的快感和激情。

成年女性性幻想的另一个来源是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在窃窃私语中和对方分享自己的隐私。对女人来说，语言是通向性爱的桥梁。男人不懂得，女人在做爱之前需要一段亲密的开场

白。甜言蜜语可以消除她们心里的疑虑和顾忌，让激情之火自由燃烧。小孩子们常常在床上分享她们的秘密；大一点的女孩喜欢在烛光下一边共进晚餐，一边说悄悄话；再大点儿，就会需要浪漫的音乐和更加煽情的谈话。小时候，我们相信，只要做个好孩子就能永远得到大人的爱。为了脱离和母亲的共生关系，获得性的自由，我们需要一个比母亲更有说服力的情人。

9 岁的时候，我们对性器官的反感已经形成。除了用毛巾去擦，我们的手是绝对不敢去摸的。我们从未看到自己的性器官，但是我们相信，它一定很难看。不过在少年时期，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发现，母亲说的不一定都对。如果另一个女孩想触摸我们的“那个地方”并且要我们也去摸她的“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就不再肮脏，也不再神秘。这样一来，性器官就有可能成为我们自我形象的一部分。男人很难理解女人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他们不懂得，女人那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能改变对方对性器官的反感，而男人却无法模仿这种声音。

有些女人“忘记”了她们在青春期之前同其他女孩的性冒险，直到多年之后，在做爱或自慰的时候，当年那种兴奋的感觉有时会突然从潜意识的深处释放出来。这时，在她的幻觉中，会出现一个成熟的裸体女人的形象，那是母亲和少年同伴的混合体。

许多女孩做梦也不会想到去察看或触摸另一个女孩的身体。即使和其他女孩一起在草丛里小便，她们也提心吊胆，相信有人在监视她们。母亲永远和女儿在一起，母亲的眼睛永远看着她。就是在多年之后，当她和男人在一起时，母亲一个电话就会使她一下子紧张起来。她感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已经“看”到她身边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她在镜子前，穿上新买的性感服装，左看右看，然后又急忙脱掉。她对自己的形象没有信心，因为她无法摆脱母亲那挑剔的眼光。从两岁、9 岁到 40 岁，

她永远处在母亲的控制之下。

20年前，女人对女人的性幻想只涉及少数人，如今却成了最热门的话题。在时装广告、电影和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女人和女人相互拥抱的身影。其实，女人之间的相互吸引不仅出现在幻想中，而且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别看许多女人都在干男人的活，但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做女人，更加渴望自己像个女人。我们相互之间细细观察，迫切地希望能从别的女人身上得到肯定的答案。

不知女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在对待同性之间的性爱关系方面，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加自在。我很少看到一个女人在想到另一个女人的迷人之处时，像男人那样严厉地谴责自己、怀疑自己是同性恋。不论是自发性的幻想，还是真实的经历，女人之间的性爱关系都会进一步充实她们的自我形象。

不幸的是，有些女孩完全继承了母亲对性爱的刻板态度，她们永远无法跨过母亲设立的警戒线。当然，她们会进入青春期，会结婚，会生孩子，但她们永远不会把自己看成有性欲的人。当她们照镜子的时候，她们永远不会想像自己美丽的乳房和腿对男人会有多大的吸引力。对性的渴求和感觉在她们的生活中很早就消失了。

如今，在那些女性占统治地位的家庭里，男人已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甚至是不受欢迎的人。有些女人喜欢把孩子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样也许能满足她们的权力欲。但是，她们有没有想到，没有父亲的家庭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男孩会更加严重地依靠男性群体；女孩则会更加完全地依赖某个男人，指望他像母亲一样全心全意地爱她。可是，这种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

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女人不愿生活在母权社会里。比起父权社会里的男人，女人的刻板规矩、控制欲和占有欲可以说是

过之而无不及。从小就处在女性控制下的孩子们没有成年人的选择自由，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敌视男人的气氛中，每天都从电视和印刷品中看到大量恶声恶气、凶狠残忍的男人。

没有父亲的男孩会用过激的方式来反抗母亲的绝对权力、证实自己的男性身份。这些孩子长大后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别的女人。男孩们并不是生来就敌视女人，男人也不是生来就喜欢欺负女人。如果他们从小就能感受到父亲的爱，如果他们成年后能够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他们就会重新发现自己的爱心和同情心。

有趣的是，正当传统家庭从我们的社会里消失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早期的亲密关系在人的一生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当然，大家庭并不能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过，每当我们坐在电影院里看伍迪·艾伦的《广播日》和尼尔·赛蒙的《迷失在扬克斯》时，我们就忍不住想念那些曾经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古怪而可爱的叔伯姨妈们。

我常想起那些可敬可爱的人，也许是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已在最近几年离开了人世。他们的童年并不完美，但他们都有幸得到像帕特姨妈那样的关注。这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进取心。许多人长大后成了演员、舞蹈家、作曲家、作家和导演。他们出类拔萃，成了众人追求的目标，难怪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年纪轻轻就死于艾滋病。他们靠魅力生存，他们从爱的大喜大悲中汲取灵感，他们的整个生命都沉浸在激情和痛苦之中。

记得罗伯蒂勒曾说：“有的人拥有天生的美貌，他们一生下来就像圣婴一样得到众人的喜爱；有的人则从小遭受冷落，必须用其他手段来赢得别人的关注。在这两种人中，你选择哪一种？”我的选择是第二种人，虽然这是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天生的美貌总有一天会消失；但是才华将伴随我们一辈子。

少年时代是无比珍贵的。我们有很强的可塑性、很多的自

由。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还没有落在我们肩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自我。即使我们在青春期放弃了这些大胆的尝试，少年时代的影响是不会消失的。

我敢向你保证，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发现你在 9 岁或 10 岁时打造的自我形象，因为它早已成为你独特人格的一部分。就拿我来说，10 年前，我才觉得自己真的成熟了，我蜕掉了那张不属于我的假皮，重新找回了少年时代的自我。

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自己的少年时代，就像海盗们在地图上为他们的秘密宝库做标记那样，这样，我们就在今后的岁月里找回那可爱的形象。

第四章 青春之舞：少女

美貌和青春之恋

谁会忘记自己的青春？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脑子里一个叫作下丘脑的杏仁状部位向身体发出了信号：性成熟的时候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们从童年的好梦中唤醒，把我们的眼睛从童年的伙伴引向异性。刹那间，异性的眼光、异性的评判成了我们命运的主宰。青春之舞就要开始了！

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在舞台的一边是一群男孩，另一边是一群女孩，在他们中间隔着一块幕布。他们全神贯注、无忧无虑地在各自的圈子里舞蹈，谁也没有注意到舞台的另一边在干什么。

突然间，一阵狂风将幕布吹开，舞台两边的舞蹈立即停了下来。男孩和女孩面对面地站着，他们目不转睛地互相凝视，好像刚刚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他们看到了什么？也许他们并不清楚，但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原先的群舞了。现在他们要跳的是双人舞，这种舞蹈谁也没有学过，但是谁也无法避免。那么，他们该怎样开始？

一个性格外向的女孩欢欢喜喜地向男孩们奔去，但其他女

孩马上把她拉了回来。这时，几个面目姣好、亭亭玉立的女孩出现了，她们的动作是那样优美。在舞台的另一边，领头的几个男孩们果断地离开自己的群体向女孩们走去：最强壮、最英俊的男孩将同最漂亮的女孩一起，领衔跳青春之舞。记得在音乐剧《七个新娘和七个新郎》、《西部故事》和《俄克拉何马》里少男少女的舞蹈就是这样开始的。

就是在今天，想起当年的情景仍使我感到痛苦。那时我对青春期的到来充满了幻想，满心希望能够获得小时候没能得到的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浪漫的音乐和舞蹈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

多年来，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在帆船俱乐部度过的那个晚上，那是我参加的第一次正式舞会。那年我 13 岁，谁能想像一个活泼大胆的 13 岁女孩在一夜之间从阳光灿烂的梦幻世界落进绝望的深渊？那天晚上，我像木头一样背靠墙呆呆地站着，痛苦地看着那些熟悉的女孩和英俊的男孩成双成对地从我面前掠过。几天前，她们还听我指挥呢，现在却全体投入了男孩的怀抱，就是那个从来也没有投中过一次篮的女孩也不例外。整个晚上，我的脸上挂着可怕的僵尸般的苦笑。她们都劝我躲到女厕所里去，可是我拒绝离开。

也许就是在那个晚上或以后的几天里，我放弃了领头羊的角色，抛弃了勇敢、聪慧、机智和速度。对一个渴望投入男孩怀抱的女孩来说，这些东西已经毫无用处。

我还保留着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我好像刚刚步入青春期，看上去像个又瘦又长、前额蓄着刘海的小听差。我坐在一把白色的柳条椅子上，拉长了脸，弓着背，双手紧紧地抓着膝盖，眼睛呆呆地看着脚前的那块地，一副战败者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想不起这张照片是谁拍的，不过我记得当时穿着姐姐的裙子和毛衣，那些衣服穿在漂亮女孩身上挺不错，可是穿在我这个假小

子身上却难看极了。

在家里，大人们悄悄地谈论我的变化。“这是暂时的，”他们相互安慰；“过了这个时期就好了。”心理学家们仍旧喜欢说这样的话，似乎青春期所有的痛苦和感情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不见得。多少年轻人为了使自己符合那些刻板的标准，削足适履、放弃了太多宝贵的东西。我敢肯定，如果我在青春期能够保持少年时代特立独行的勇气，那么，我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走那么多的弯路，放弃那么多的机会。不幸的是我给自己套上缰绳，强迫自己向其他女孩看齐。这使我变得忸忸怩怩、胆小谨慎、缺乏自信、犹豫不决。对了，还有怨恨。一个人要强迫自己改变真实的自我，就必须咬着牙忍受一肚子的怨气。

青春期的社会压力把我，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女人，变成了非常克制的人。我们压制自己的愿望和幻想，强迫自己去适应某种既定的模式。这种自我压抑只有在所有的女孩都这样做的前提下才能忍受。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种自愿的屈从归咎于父权社会的压迫？说实话，男人并没有强迫我停止发展自己的才能，是我自己希望通过这样做来赢得他们喜爱。我错误地把娇柔美丽和被动顺从等女性世界推崇的东西视为男人的最爱。不错，男人喜欢美貌的女人，但他们还看重其他的东西，比如热情、善良、激情、幽默感和进取心。是我们女人自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美貌之上，竭力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来改造自己。我们之所以在照镜子的时候总是对自己不满意，就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独特的优点和才华。今天，女人们对美貌的追求比过去更加走火入魔。在这场永无止境的竞争中，评判的标准仍旧是其他女人的眼光。

就这样，在青春期到来的时候，我陷入了迷茫。小时候，我

很少照镜子，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从许多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他们称赞我、喜欢我，待我像自家人一样亲切，我随时都能感到他们的温暖。

现在，我突然失去了这种自信。我关上浴室的门，呆呆地看着大镜子里的高个子——头发、脸、身体——越看越觉得不对头，越看越觉得自己不是别人的对手。在学校里，我的学习和体育运动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管是打篮球还是玩垒球，我都是领头人。我知道哪个女孩行、哪个女孩不行。可是现在，我却失去了所有的优势。于是，我决心脱胎换骨，彻底改变自己。我竭尽全力模仿那些最漂亮的女孩，从言谈举止、姿势仪态到服饰打扮，甚至她们说话时那种细声细气的声调。

在家里，我也注意到美貌给人带来的好运。可爱的母亲马上就要结婚了，姐姐也出落得更加漂亮。她们经常在餐桌上争论用什么样的化妆品和服装。以前，我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可是现在，我多么希望她们能停止争吵，向我传授一点梳妆打扮的诀窍！

为了让我去上舞蹈课，我的朋友莫利的妈妈给我做了一套漂亮的裙子和衬衫。她只需对我看上一眼，就能设计出这样好的衣服。我发现，这条长裙给了我一大方便，它遮住了我的腿，这样我就能暗暗地弯着腿走路，使自己显得矮一点。现在，我终于能在跳舞的时候把头靠在男孩的肩上了。但是我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让弯着的膝盖撞到对方的腿。

想起这些往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今天那些患了厌食症的女孩。她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乱了套，于是，她们把节食当成控制命运的手段。在我们的少女时代，骨瘦如柴的体型并不时髦。在南方，人们喜欢娇小玲珑的身材。我们都是时尚的奴隶。即使那时流行裹小脚，我大概也会跟着干的。女孩们争先恐后，展开了否定自我的竞争。一切同智力发展有关的东西，如学习上的

好成绩 都变得无关紧要 因为男孩们不需要‘活动辞典’(酷爱读书的女孩)

我必须学会少说话、少思考、放慢速度、放低姿态。很多年以后，我才重新找回自信心，恢复畅所欲言的习惯。从青春期、大学时代一直到三十多岁，我都害怕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一想到将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我就会变得非常紧张，脑子里就像装满了一团乱麻。

长期地弯着腿走路损害了我的脊椎骨。20年后，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医院里重新矫正脊椎骨。不过，我在青春期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是勇气和自信心、良好的自我感觉和乐观的冒险精神。少年时代，正是这些品质使我赢得了那么多的爱。成年后，我虽然获得了友谊、爱情以及事业的成功，但始终不能完全恢复那失去的自信和美好的自我形象以及天真善良和慷慨大方的本性。

其实，只是在最近的几百年里，人类社会才有能力让自己的孩子享受青春期，给他们提供充分发展自己的机会。在此之前，孩子们从小就要在地里和工厂里干活，14岁就开始生儿育女。可惜做父母的常常意识不到，这段时间对孩子来说是多么宝贵。不错，青春期的孩子不再像婴儿那样依赖父母，他们希望父母像成人一样对待他们，尊重他们的隐私权，但是他们也同样少不了爱和关注。

看看今天的早报吧。上面登满了有关青少年犯罪和怀孕的文章，与此同时，广告栏里到处都是穿着时髦服装的少男少女的照片。我们就是这样误导我们的孩子，浪费他们宝贵的青春。

当年 为了适应那些刻板的模式 我们抛弃了自己宝贵的个性。令人伤心的是，今天的孩子也逃不出同样的命运，就是那些天生丽质的女孩也不例外。她们相信美貌能够征服一切，美貌

能够帮助她们达到一切目的。对她们说红颜易逝之类的话是没有用的。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告诉她们美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向她们指出美的力量；同时要告诉她们，还有许多和美貌同样重要的东西——智慧、风趣和同情——这些东西的寿命比美貌长得多。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一方面用说教和老生常谈来否定美貌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开动所有的媒体大肆兜售虚假的美，利用年轻人的爱美之心拼命地赚他们的钱。如今，9岁的孩子就要上美容院，接受修指甲、做头发、化妆等全套服务。顶级模特代理公司还专门为少男少女们制作了“如何当模特”的录像带。

如果让我来为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制定课程的话，我就会增加一门教他们如何同异性交往的课。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不会像我们那样，对青春期的变化毫无准备。

小时候，我有强烈的表现欲，不过我渴望得到的是所有人的赞赏。直到青春期的到来唤醒了对异性的渴求，我才把男孩看作真正的观众。我渴望他们的凝视，就像婴儿渴望母亲的凝视。在我那13岁的头脑中，对性爱的渴求和婴儿时期遗留下来的对母爱的渴求溶合成一股强烈的欲望。

青春期激发的性欲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它可以用来促进智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发展。不幸的是，我那时一心只想投入某个男孩的怀抱。虽然谁也没有为我出过点子，但是我凭直觉就看得出，如果不想在舞会中坐冷板凳，我就必须把自己从假小子变成一个甜美的小妞。

我一心想赢得一个男孩的爱，这个男孩必须是个领头的，换句话说，他将是我的另一个自我，他将代替那个被我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自我。我看上了马尔科姆，那个穿防风上衣的强壮男孩。他总是把T恤衫的袖子卷得高高的，

露出肌肉发达的手臂。强健的肩膀，坚定的目光，他在我眼里就像磐石一样坚不可摧。他是我的白马王子，为了得到他，我可以杀掉一条巨龙！请别见笑，在那个年龄，我们都喜欢胡思乱想。

可是马尔科姆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的眼睛飞快地掠过我，落到另外一个女孩身上。我从小就认识那个女孩，她既不会玩垒球，也不会爬墙，在班里从来也没有当过什么头。不过她很漂亮，大大的眼睛、小小的下巴、高高的颧骨、适合于生孩子的臀部，当然，还有乳房。研究美貌的专家们会告诉你，这是构成女性美的完美组合。

我一定下意识地妒忌过她。在那几年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马尔科姆，心里一直想着他。他是那样迷人，又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不是吗？浪漫爱情的精髓就是这样的单相思。不过，即使我妒忌过马尔科姆选中的那个女孩，我也绝对不会承认，因为她是我的朋友。我渴望得到男孩的爱，但也不愿失去和女孩们的友谊。为了扑灭妒忌的火焰，我采用了将情敌理想化的办法。在我的眼里，她变得完美无缺、像天仙般的美丽。我和她相比，简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根本就不配做她的对手。我讨好她、紧紧地拥抱她，心甘情愿地离开马尔科姆去和他的部下约会。

在女孩的群体中，我已经不再是领头人，相反，我成了最没头脑的随从。我亦步亦趋地模仿别人，竭尽全力使自己的言语行为完全符合传统的“好女孩”准则。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准则虽然没有公开宣布过，但它们确实有很大的约束力。

要说对男孩的迷恋，在我们这群的女孩中，谁也比不上我，但我同时又是最虔诚地遵守“好女孩”行为规范的人。有时，我很想给要好的女孩们打电话，问她们有没有尝过禁果的味道。我多么想知道，她们是否也像我一样，至今仍不敢进入那日夜向

往的神秘禁区？

说实话，我虽然没敢食禁果，却也尝到了不少热恋的滋味。最难忘的是那些在汽车里度过的夜晚。收音机里播放着浪漫的音乐，朦胧之中，我好像溶化成一股暖流，和身边的男孩融为一体。许多研究证明，幻觉在女人的性心理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即使在缺乏任何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幻觉也能使女人进入性高潮。虽然我拒绝让男孩碰我的乳房或下身，每次在汽车里约会之后，我的白色棉内裤总是湿透。

看来，要获得性欲的满足，头脑的作用比性器官还重要。那时，我们都知道怀孕就意味着被社会抛弃，但是谁也搞不清怀孕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好在我从姨妈、老师以及书本和电影那里获得了不少智慧，这些智慧帮助我避开了怀孕的危险。

我渴望异性的爱，但我更憧憬大千世界里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不能重复母亲的悲剧，让怀孕来捆住我的手脚。

不管怎样，我的青少年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痛苦。我的故乡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那里的人心地善良、仁慈宽容。他们从来没有强迫我去做一个模范女孩，是我自己一心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在动身去北方上大学的时候，我相信自己是城里最快活的女孩。不是吗？在毕业班里，我被同学们选为最受欢迎的女孩。多年后，当我和丈夫一起，重新漫步在那些可爱的小街上时，街上的熟人都对我丈夫说，“这里的人都喜欢南希·弗莱迪。”

不错，我总是面带笑容。我竭力压制自己的本性，把怨气藏在心里。我的胸前戴着一枚金色的圆形徽章，这是“好女孩”的标志。我和男孩子的关系只限于亲吻拥抱，只要能感受他们的爱，我就心满意足了。难怪，到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才和男人有真正的性关系。刹那间，我对男人变得百依百顺，连避孕都没有想到。

青春期：“告别童年”

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心理学家 G. 斯坦利·霍尔就把青春期说成是“第二次出生”或者说，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时期。霍尔认为，这是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这是决定一代人的命运以及他们对文明能作出多大贡献的时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青春期的经历会对我们成年后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有些人来说，青春期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过了这个时期，他们就走上下坡路了；而另一些人则需经历令人痛苦的调整。有的人在经受了考验之后，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选择；有的人则一蹶不振，再也未能找回失去的自我。

心理分析家彼德·布洛斯解释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他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对他的现在和将来、对他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布洛斯引用英海尔德和皮亚热的论述来说明：青少年和儿童的最大区别在于，“青少年想得更远……他能够把今天的努力同将来的目标联系起来。”

我们总喜欢把青春期贬低为一个适应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充满了荒唐可笑、令人头疼的事情。成年人为了孩子的种种极端行为大伤脑筋，急切地盼望这个阶段能快点儿过去。我们好像忘记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忘记了自己当时的苦闷，也许这就是我们对孩子缺乏耐心和理解的原因。另外，我们也可能妒忌他们。不是吗？如果不是我们辛勤工作，创造了这些年的繁荣，他们都得早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是我们为他们买来了青春，使他们能更好地在感情、理智和生理上度过这“第二次出生”。我们为他们买来了时间，却不告诉他们如

何有效地利用这段时间。看来，我们确实妒忌他们。

长期以来，青春期一直没有得到现代行为科学的重视，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把青少年看成一群即将被塑造成成年人的孩子，他认为教育、读写能力、自制力和羞耻感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条件。18世纪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把青春期视为最接近“自然状态”的时期。在今天这个高科技时代，我倾向于彼德·布洛斯的说法：“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缺乏统一的程序或方法来界定青春期的作用，也没有任何仪式来认可青春期社会地位的变化……青春期缺乏制度化的特定形式，这和幼年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说，社会放弃了对年轻人应负的责任，让他们自生自灭。”

说到“第二次出生”，人类是惟一需要青春期这样一个漫长的成长阶段的灵长目动物。低等的灵长目动物到了能够生育的年龄就自然而然地开始繁殖后代，直到死亡。“在野兽的家庭里，幼兽在身体上成熟后就必须离开父母的巢穴，”社会学家弗吉尼亚·拉特写道，“这是为了避免发生对异性的争夺。对动物来说，离开原先的家并不意味着遭到遗弃，因为它们的身体和头脑是同步发展、同时成熟的。”

想想吧，要是我们一到发育年龄也被这样无情地赶出家门！其实，三百年前的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后来，工业革命的兴起、社会财富的积累、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印刷机的发明，导致了学校的增加和在校时间的延长。从那时起，年轻人必须先在学校里学习，然后才能成为成年人。“办学校就是为了培养出有文化的成年人，”尼尔·波斯特曼写道，“学校不应把孩子们看成小成年人，而应把他们视为尚未定型的人，”或青少年。也许你还记得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十六七世纪的绘画。在那些画里，孩子看上去确实像“小成年人”。今天，不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艺术作品里，青少年的形象都和以前大不一样。

既然作出了那么大的努力使孩子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时期，我们为什么如此顽固地拒绝深入探讨和理解他们的心理、道德和性行为？我们已经出版了许多研究婴儿期的书，探讨婴儿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还有不少教人如何做父母的书；可是，要找一本关于青春期的好书却很难，尽管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书来帮助成年人和青少年理解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复杂变化，帮助父母们有效地协助他们的孩子。

八 成长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指出，“几年前 研究人类成长的学者们都知道，青少年研究领域就像一片废墟。虽然发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论文，但大多数研究都没有什么创见。”直到 1985 年青少年研究会成立以后，情况才有了改变。

在青少年问题上，我们找得到一个像儿科医生斯波克和布雷泽尔顿那样充满同情心的专家吗？电视台放过一部探讨 13 岁或 15 岁青少年成长问题的纪录片吗？畅销书排行榜上出现过一本指导父母教育青少年的书吗？我们每年向少男少女们推销大量的商品，从他们头上大量地赚钱——1994 年就卖了 1 000 亿美元——但是我们却不愿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来关心和研究他们的成长。如今我们不仅有大批小儿科专家，而且有日益增多的老年学专家 可是我们到哪里去找“青少年学专家”？

青春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时期，它包括三个发展阶段：前青春期、早青春期、青春期，也可以称之为：发育期、青春期、青年期。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激素——雄激素、雌激素、睾丸激素——像罗马大军一样，在年青的身体里迅速挺进、势不可挡。体液将化学能量送往身体的各个部位，“刺激身体的加速成长。”这使我想起查利·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里的一个场面 机器轮子一刻不停地转动着，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将部件送往四方。

在男孩的身体内，这个进程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减速。

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器官、每一块肌肉都在生长。直到某个早晨，当他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被单上的精液——“我的上帝！”有位朋友告诉我，那时他的胃口好极了，夜里也会从床上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拿冰箱里的牛奶和面包吃。这时，男孩的声音开始变粗；乘校车的时候，阴茎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勃起。

女孩也一样。她像往常一样读书、幻想、听浪漫音乐，与此同时，体内的激素却在持续不断地刺激阴蒂、外阴、乳房和毛发的生长。直到某一天，她突然在上课的时候发现裤子上有血——“我的上帝！昨天她还是个孩子，今天突然变成了女人，一个能够生孩子的女人！她举起手臂，发现腋窝里有毛；擦洗下身的时候，发现那里也长出了毛。她侧身站在镜子前，查看自己的乳房有没有像别的女孩那样鼓起来。她渴望亲密接触；在梦想和幻想中，她回想起婴儿时期享受过的爱抚。

在青春期，一方面是早期经历的重演，另一方面则是对清规戒律的反抗。年轻人用独特的服装、发型、语言、音乐和舞蹈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将自己同成年人分离开来。

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再也无法像 18 世纪那些乐观的思想家那样，把青少年看成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了。相反，在我们眼里，他们成了大把花钱的购物狂和毫无责任心的享乐主义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成年人造成的。如果说，他们过分地注重自我，那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行动鼓励他们大量购物、鼓励他们用品来标榜自己的独特身份。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复我们这一代的行为。包装就是一切：我们离不开精美的服装，我们需要用最时髦、最知名的品牌来包装空虚的自我，不然的话，别人就看不到我们，就不会承认我们的存在。

为了吸引那些走火入魔的恋童癖者的眼球，最新的卡尔文·克莱因服装广告亮出了穿内衣的儿童。这些广告在报纸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顷刻之间，克莱因服装的销售额直线上升。市场就是这样运作的。对此，年轻人看在眼里。他们嘲笑我们对这一事件的道德问题争论不休，他们宁可把惟利是图的卡尔文·克莱因当作偶像。

我们无法要求孩子们超越对自己的爱去追求对全人类的爱，因为我们自己就从来没有走近这种无私的爱。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病态的自恋；我们用服装来显示我们的身份，用装饰物和财产来体现我们的自尊和道德规范。在每天的晚间新闻里，孩子们看到的是两面三刀、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卢梭把青春期说成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阶段，年轻人向文化的传统规范提出质疑和挑战，他们大胆地探讨、分析、提出自己的创见。关注自我并不是坏事，年轻人应该，而且能够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未来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对学生来说，还有什么课程比“了解自己”更重要呢？

G.斯坦利·霍尔说，他不相信任何人能够在成年后的日子里弥补他在“第二次出生”时失去的东西。我想他是正确的。就拿我来说，如果我在青春期能保持童年时代的进取心，而不是为一时的满足而放弃智力上的发展，我现在的思想也许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事实上，我在成年后再也没能恢复童年时代的发展势头。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青少年同我年轻的时候很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却是一样的。我们心里都充满了骚乱和动荡，我们都迫切地希望得到别人关注和赏识。今天的青少年使我们想起自己的过去，想起那些失去的机会和被压制的性欲。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懂得，性欲所产生的动力能够推动智力和社会能力的发展。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性的体验，而且是更为广泛的生活体验。

那时，我们将大量的精力用来压制自己的性冲动。其实，这

样做只能造成整个机器的停顿。事实证明，除非把年轻人关在监牢里，强行监管和禁止他们的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真正对青少年造成损害的是成年人，他们拒绝为青少年提供性教育以及必要的预防和保护措施。今天，青少年中患抑郁症、自杀和吸毒的比例越来越高 将近 30% 的人在 15 岁之前有过性关系。虽然在 50 年代中期，青少年中生孩子的比例比现在高，但那时的青少年一旦怀孕，多半都会结婚。“在那时，一个连中学都没毕业的人也能养活一个家庭；”青少年辩护律师玛格丽特·普鲁伊特·克拉克说：“今天人们最担心的是青少年怀孕后只能靠社会救济过活。”

有些人认为，向青少年传播性知识就是为他们的性行为开绿灯。这些人低估了孩子们的能力。弗吉尼亚·拉特指出，我们不相信年轻人能够学会保护自己的身体，这反映出我们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对青春期的害怕和反感——我们把青春期视为一种疾病。”

我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青少年应避免过早地发生性关系。青少年虽然对性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渴望，但他们也怀着美好的希望和远大的理想，他们懂得，为了不断送自己的将来，有必要推迟性行为或采取避孕措施。不过，如果做父母的不信任自己的孩子、也不给他必要的帮助，那么，即使一个有理想的孩子也会变得不负责任。

如果一个女孩觉得母亲在感情上背叛了她，没有教她如何应对青春期的各种问题，或者不承认她对性的正常需求，这样的女孩就很可能怀孕。精神病专家路易斯·卡普兰指出：“在无意识中，绝大多数怀孕的未婚少女都有一种和母亲重新合为一体的愿望；与此同时，她们也因母亲的冷漠而怀着反抗和报复的心理。”

今天的青少年并不把我们看作值得模仿和超越的榜样。

期以来，我们努力工作，希望下一代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美国梦。今天，这个梦成了一场灾难。在美国，每天有超过 160 万 5 岁到 14 岁的孩子离家出走。许多少女过早怀孕，并不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而是因为对爱的渴望。她们从小就缺少爱，所以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才迫不及待地抓住一切机会投入另一个年轻人的怀抱。

神殿，还是阴沟？

在青春期女孩的眼里，美貌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好像完全失去了控制。胸部开始发育，身上的衣服很快就变得又短又小。突然间，下身流出血来，弄得我们狼狈不堪。

月经唤醒了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反感，那是我们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得来的感觉。我们早就知道，母亲不喜欢她的身体，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女人们每个月都要有 5 到 7 天的麻烦日子，就是在余下的那些天里，我们也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过不了几天，我们又要变得不干不净了。

不论女孩们在来月经之前如何看待自己，她们的自我形象都将发生变化；不管她们长得多美，周期性的流血都会使她们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厌恶的感觉。月经以及所有与此相关的习俗和仪式都会对女孩的自我形象产生深远的影响，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乐观地、心满意足地看待自己了。经血又脏又难闻，谁也无法将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月经成了美貌最可怕的敌人。

难道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不见得。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只能在妇女卫生用品广告里得知一点有关女性卫生的信息。那些广告有整版大，画面上印着

身穿精致华丽的夜礼服的漂亮女郎，在广告的一角，有一行不显眼的小字“因为有了‘摩德丝’。”为什么我搞不懂‘摩德丝’到底是派什么用处的，月经对我来说仍旧是个谜。不过，那句彬彬有礼的广告词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当我开始有月经时，不用别人说我就知道，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体面的女人，就必须像“摩德丝”广告上的女士们那样，把身上那见不得人的秘密藏起来。在离家不远的药房里，我绕着柜台转来转去，直到能找到一个女营业员，我才敢开口向她买一盒“坦佩斯”月经棉塞。在男人面前，我就没法开这个口。

今天，女孩们每天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大量的妇女卫生用品广告。我们再也看不到“因为有了‘摩德丝’”这种遮遮掩掩的广告词。代之而起的，是在海滩上尽情欢乐的少女、在开满了矢车菊的田野里散步的妈妈和女儿，她们都由衷地感谢那些五花八门的女性卫生用品，是这些产品帮她们安全体面地度过了每一个月。在从事广告业的女性里不乏大学毕业的高才生，然而她们撰写的妇女卫生用品广告文案也免不了暗示女性生殖器的丑陋。难道我们就不能打破传统，实现真正的革命性的转变？

女孩们很小就学会控制自己的膀胱和括约肌，就是在睡着了的时候也不例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已不那么在乎哥哥弟弟撒尿时的潇洒了。可是，无论多么能干，她们都无法控制每月一次的流血。她们永远无法知道月经来潮的确切时间，永远不能保证不在公共场合弄脏衣服。更令人难堪的是，她们两腿之间那个最见不得人的地方恰恰是产生性爱的激情和快乐的源泉。这真是极大的不幸。

“女性必须学会对自己的身体负责，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为她们提供足够的知识。”朱迪思·塞弗坦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朱迪思一直在研究青春期，并同时给青少年上性教育课。“学校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但仍旧不告诉女孩子：她们身上有

一个叫阴蒂的东西。我与奥托和韦思这两个医药公司磨了 18 年，它们才制作了那种类似供医生摆在治疗室里的塑料人体模型。奥托制作了一种淡红和蓝色的小型模型，用来演示子宫帽在体内的位置。此前，我从来没在医药公司为性教育制作的女性人体模型上看到阴蒂。我的班上都是六年级到九年级的女孩子，如果她们知道自己有阴蒂，却无法在人体模型上看到它，她们还会信任我吗？”

由于营养状况的改善，青少年的发育期正变得越来越早，这就是说，女孩们很早就有了生育的能力，她们的身体也长得越来越大。例如 在最近的 50 年中，为了适应这种情况，10 号衣服的臀部尺寸从 34.5 英寸扩大到 37 英寸。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性成熟的年龄每过 25 年就提前 1 年。今天的青少年性成熟的平均年龄比 1850 年提早了 6 年——女孩在 11 岁或 12 岁 男孩在 12 岁或 13 岁。

“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女孩性成熟的平均年龄是 12 岁零 8 个月或 12 岁零 9 个月；”塞弗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很可能是 13 岁以后。如今，生活在市中心的女孩在 10 岁或 11 岁就来月经。这是因为她们身上的脂肪比前辈多；她们吃的东西不见得比前辈更健康，但食物中有许多能够制造脂肪细胞的成分 而雌激素就储存在这种细胞里。”

与此同时，我们的绝经期却越来越晚。这样一来，我们一生中就有三四十年要忍受月经带来的麻烦。好在每个女孩都要来月经，这倒是一大安慰。说实话，要是到了年龄还不来月经，我们反而会担惊受怕。朱迪·布鲁姆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青少年的形象，而其最受欢迎的女主角之一就在祈祷时说出了每个小女孩的心里话：“上帝啊 您在哪儿 这是我 玛格丽特。我的朋友格蕾琴有月经了。我多么妒忌她啊，上帝！我恨自己，可是我没法不妒忌她。但愿您能给我一点帮助。南希说，她肯定

不久就会有。要是剩下我一人，我该怎么办呢？求求您，上帝！我只想做个正常人。”

月经带来的羞耻感将我们连结成一个整体。看到同伴在公共场所弄脏衣服，我们也和她一起感到无地自容，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定哪一天，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惟一的办法是加倍的控制，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每时每刻都不能放松警惕。

月经一来，我们就进入高度警戒，严厉地执行各种规则。我们要控制的不仅是那滩血，而且包括所有的行为和动作。当然，这个过程很早就开始了。我们很早就被训练得过分挑剔、过分讲究清洁、过分严厉地控制自己。这种倾向从幼儿时期的大小便训练开始，后来又在母亲和老师的敦促下不断地强化。她们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大声说话，不要放声大笑，不要撒开腿乱跑。当然，还有女孩群体对每个女孩服装和行为的控制。

令人费解的是，我们能够成功地打破男性对职场的垄断，却不能心安理得地看待月经这个最最自然的生理现象。塞弗指出：“女孩们仍旧讨厌月经，把它称为‘上帝的诅咒’。当然，如果家里的成年女人都讨厌月经，每次来月经时都会肚子痛，都要吃药，还要捧着电热垫躺在床上，那么，自然而然，你就会变得像她们一样。”

小时候，我常看见妈妈拿着一小杯杜松子酒送给楼上的姐姐，从关着的门里传出一阵又一阵的呻吟。这样的呻吟每个月可以听到两次：妈妈一次，姐姐一次。不过，我也好不了多少。有一天，当在上历史课的时候，我的月经来了。突然间，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我只好站起来请假，然后跌跌撞撞地穿过马路，跑到朋友家。可是门锁着，家里没人。于是我只好打碎厨房窗子上的一块玻璃，开了门进去拿杜松子酒。

在1984年出版的《女性气质》一书中，苏珊·布朗米勒写

道，“原始的月经期禁忌不一定是男人的发明。很多规矩，例如，处在行经期的女人必须住在专设的小屋里、避开男人和房事、避免下地干活或做饭，都是为了应付腹绞痛和过多的流血……直说吧，月经确实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东西……一摊湿淋淋、黏糊糊的血块……为了对付这些脏东西，女人们伤透了脑筋。她们要层层防护、处处设防，要经常察看是否有渗漏，随时携带足够的棉塞，还要不断地换卫生巾。要是经血漏出来或者一下子冲出来，那可就糟了。”

我们当然不能把野草说成鲜花。不过，为什么布朗米勒和比她更早的女权主义斗士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谈到月经这个同女性生殖力密切相关的生理功能就像女孩子一样充满了恐惧和厌恶？我们对气味的判断，不管是香气还是臭气，都是后天学来的。我们对血也有不同的感受。看到负伤战士绷带上的鲜血，我们非但不厌恶，而且会对他肃然起敬。那么，为什么女人就不能把月经看作女性生育力的标志并以此为荣？

德波伏瓦写道：“男人的性器官像手指一样简简单单、干净利落；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同伴面前炫耀他们的阳具。女人却不同，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性器官究竟是什么样子。它藏在暗处，又黏又湿，受到各种体液的污染，每个月还要流血，那里发生的一切既神秘又危险。”

女人身上的血渍是她的耻辱，是缺乏自控能力的证据。如果一个女人在公共场合弄脏衣服，她就会觉得无地自容，只好躲起来痛哭一场。在场的其他女人除了安慰她们不幸的同伴，就是感谢上帝让自己免遭这样的厄运。做女人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能力对月经这一周期性的生理现象实行绝对的控制。

有些犹太朋友告诉我，他们用一种成人仪式来庆祝女孩的月经初潮，这种仪式相当于犹太男孩的成人仪式。这倒是一个好办法，虽然只是一个开端。我们应该把陈腐的传统颠倒过来。

如今，女人们在各种公共场合出头露面，她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别人对自己的印象。为了减肥，女孩们患上了厌食症，过度节食又导致停经。也许这就是绝对控制的最高境界。

我们教育孩子，要相信自己能够成就一切。与此同时，我们却用种种禁忌捆住她们的手脚。就拿我来说吧，看了那么多的书，脑子里仍旧无法摆脱这些禁忌的影响。我相信，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像月经所引起的精神状态那样，严重地妨碍女性在智力上的发展。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理现象看成一大缺陷，那么，要求男女平等又有多大意义？

在某个青少年杂志上有这样一条卫生巾广告：“专为预防意外事故而设计。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突然肚子疼得像刀绞。不得了，你的肚子装满了水，就像一条小白鲸……”另一条广告在最后一句担保“自始至终万无一失。”在这些广告的影响下，我们每个月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消耗在厌恶和担惊受怕之中。

在 80 年代中期，女性卫生用品的整版广告开始大量涌现。1986 年，商家花在杂志上的广告费是 23 974 600 美元 这个数字在 1994 年上升到 40 931 300 美元。更令人惊叹的是电视广告，它们随时随地都会从屏幕上冒出来，不断地制造恐惧心理，提醒我们注意那每月一次的危险。

经期健康基金会主任塔玛拉·斯莱顿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用某种形式来确定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怎样庆祝自己成为一个女人。”斯莱顿在 15 岁时不慎怀孕，这段经历促使她投身对青少年的教育。她从政府那里申请到资助，用来开办普及怀孕和月经知识的课程。

“当我开始给青春期的女孩们上课时，”斯莱顿说，“我发现她们对月经的惟一反应就是反感。许多女孩恨透了流血，她们甚至下意识地希望怀孕能使她们避免流血。如今，怀孕被看成是好事情，即使是婚外孕也没关系；但月经却仍旧是令人厌恶的

东西。青春期内分泌的变化导致了行为上的变化，但我们无法公开地确认这些变化。身体的变化使女孩们面临新的挑战，而她们常常在需要独立思考的关键时刻过早地怀孕。就这样，怀孕代替了庆祝性成熟的仪式。”

研究外貌的心理学家安·卡尼库克认为：“母亲即使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也不应在孩子面前表露出来。孩子们很小就在各方面认同父母，包括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做父母的应该正确看待自己的形象，不要将消极的看法传给孩子。如果做母亲的对自己的性别、性器官、或乳房的形状感到惭愧，即使一言不发，她也会把这些感情传给自己的女儿。”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敦促母亲坦率地将自己的经历告诉女儿，帮助女儿摆脱对月经的恐惧和厌恶，鼓励她们更加积极地看待自己。如果母亲自己不能这样做，那么她就应该找个合适的人来帮助她的孩子。

塔玛拉·斯莱顿认为，“我们向下一代传授的是一种无言的羞耻感。青春期的女孩们从前辈那里得到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负面形象，这个形象扼杀了她们的想像力，使她们无法将月经周期看作是生命力的源泉。”这种无言的羞耻感还改变了我们的声音，使十二三岁的女孩变得胆小和缺乏自信。原先敢想敢说的女孩变得羞羞答答，害怕在课堂上发言。还没开口，她们就先担心自己的外表，不是弄裙子，就是抖头发，有时还要悄悄地察看身后的衣服是否干净，生怕露出一痕迹。

对女孩来月经这件大事，家庭和社会都保持沉默，这种态度无疑导致原先活泼自信的女孩在各方面的退步。如今，对美貌和外表的过分强调又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趋势。女人们忙于加入职场角逐，但她们对月经这个生理现象的忧虑丝毫没有减少。

很久以前，来月经的女人被视为有福的人。根据韦氏词典，blessing(祝福)这个词就是从古英语中的 *bletsian* (即“流血”)—

词演变而来。《女性神话及秘史百科全书》的作者巴巴拉·沃克写道，从亚里斯多德的时代开始，人们一直认为胎儿是由子宫里的经血凝固而成的。直到 18 世纪，欧洲的医学院才停止教授这条理论。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神话故事里，人类是由一个女神用粘土和着她的经血造成的；在《旧约圣经》里也可以找到这类故事的影响，如“Adam”（亚当）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语的“adamah”（意即“带血的粘土”），可是后来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人们开始改变看法，把经血视为不洁的东西。

我们能否在古代的经血崇拜和今天的月经歇斯底里之间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平衡点？朱迪思·塞弗指出：“女孩们对自己的身体缺乏信心。她们说：‘我对自己惟一的感觉就是厌恶，我讨厌那难闻的气味、污秽、腹绞痛以及其他的折磨。’”现在，PMS（经前综合征）已经被正式确认为一种精神错乱。这种观点同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有什么两样？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的歇斯底里是月经引起的。不论我们用什么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功能衰退也好，周期性变化也好，这些理论都是教条式地看待女性。

成长心理学家苏珊·哈特已经对自尊心这个课题研究了 20 年。她认为，不论是 5 岁的孩子还是 55 岁的成年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外貌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会对一个人的自尊心产生巨大影响。当一个女孩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美貌和爱情成了她朝思暮想的东西。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自己的容貌，因为美貌会给她带来爱情和浪漫、亲吻和拥抱，让她重温婴儿时期在母亲怀里感受到的亲密无间、融为一体的感觉。她梦寐以求的，就是和男孩在汽车里约会，躺在他的怀里，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甜美歌声：“让我们紧紧地拥抱，永不分离。”

然而，一旦他的手移到她的两腿之间，那种如醉如痴的感觉便顿时烟消云散。自从有了月经，这个地方对她来说就变得愈

加不可触摸。他怎么能把手放在这里？这是她最不干净、最见不得人的地方。顷刻之间，一股难言的羞愧将浪漫的喜悦一扫而空。

这就是女性自卑心理的根源：女性之间代代相传的对性器官和月经的厌恶。

大多数女人都以为，她们每次来月经都会不可截止地大量流血，其实多数人每次出血量只有六匙子。难怪我们把自己想像得如此污秽不堪，这种恶劣的感觉甚至影响了我们对身体其他部位的看法。少女们整天为自己的身体忧心忡忡，不是担心手臂或肚子上的肉太多，就是嫌自己的大腿太粗。她们无法使自己不流血，但是至少可以设法控制体重、改变体形。不过，只有那些肯在体操房里拼命苦练的人才有可能拥有理想的曲线。

不知今天的年轻人如何看待鲁本斯的那些传世之作。鲁本斯画的女人个个体态丰满、浑身是肉，她们有的在花园里，有的和天鹅在一起，有的躺在男人怀里，有的骑在公牛背上。她们要干什么？做爱？瞧她们那身肥肉，简直是不可思议！今天，标准的美人儿必须瘦得像柳条、像豆芽，瘦得皮包骨头、两眼突出，像个营养不良的流浪汉。我们忍饥挨饿不是为了男人，而是为了得到其他女人的赏识和羡慕，因为只有女人才喜欢把圆润可爱的曲线变成硬邦邦的直角。

不知怎的，在我的脑子里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个场面：那是我11岁时住的房子，屋子里正在举行鸡尾酒会。母亲正在壁炉前和一位男士有说有笑。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突然间，我看到母亲脚下的地板上出现了一滩血。我吓坏了，我的漂亮母亲也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倒是那位男士快步走进厨房，拿了块毛巾擦干了地上的血。他脸上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我和母亲却……我怎么也想不起后来发生了什么。如果真有这事，我应

该不会忘记。这一定是我的想像，一个即将变成女人的 11 岁女孩的噩梦。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 记忆就像一本日记，它记录着从来不曾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有些男人能比女人更好地应付流血造成的尴尬。我常怀着感激之情想起那些曾经大大咧咧地在拥挤的药房里为我购买坦佩斯棉塞的情人。他们喜欢我的身体，即使在我来月经的时候，他们也照样跟我做爱。我相信，要是流血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那他们一定会把它作为特殊日子来纪念。

大约 50 年前 德波伏瓦写道：“当你感觉到两腿之间那块血淋淋的布时，或者说，当你意识到作为肉身的原始痛苦时，你就很难扮演偶像、仙女或传说中的公主那样的角色。” 布朗米勒在《女性气质》中引用了这段话。我认为，她应该修正德波伏瓦的这段话，用新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把月经和人类强大的生存和繁殖能力联系起来。

卡罗尔·吉利根的书《相遇在十字路口》记录的是女孩们在进入青春期的前后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可是这本书对月经却只字不提。为什么？根据苏珊·C. 罗伯茨发表在《新时代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披露，原因是吉利根和她的同事林恩·迈克尔·布朗做调查的那所私立女子学校“不赞同”她们在学生面前直接提月经之类的事。可是，我们怎么能在描述女孩从性潜伏期到青春期的成长过程时把月经排除在外？难道月经不是女孩从童年时代跨入青春期的标志？

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沮丧的原因。罗伯茨说，吉利根害怕其他女权主义者攻击她通过自己的研究“暗示女人‘在本质上’同男人不一样”。她担心“如果她们强调月经初潮的重要性，别人就会指责她们加入反对女权主义的行列、用时髦的理论来包装性别歧视者‘解剖学决定论’的陈词滥调。”

就这样，为了避免遭到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排斥，这位在女性

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杰出学者把月经排除在女性青春期的研究之外。

自慰的好处

想像一下，如果我们从小就对自己的性器官保持一种自然和友好的态度，如果我们不再将自身的一部分视为有害和肮脏的东西，如果我们抛弃那些使我们终生受辱的禁忌，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罗伯塔·西蒙斯和弗洛伦斯·罗森堡的研究显示，在青春期之前，男孩和女孩对自己的评价是差不多的；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对自己的形象变得高度敏感，而处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的女孩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男孩。如果你问一个小女孩，“你漂亮吗？”她也许会说“很漂亮”，但是要在青春期的女孩中得到这样的回答就不那么容易。

考虑到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年轻人注意自己的外貌是很自然的。心理学家戴维·埃尔金德指出，“这个年龄的女孩和男孩容易把别人的想法和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混淆起来，他们以为别人也像他们自己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注意他们的行为和外貌。”难怪在青春期的友情中，外貌成了首要因素。

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把善良和慷慨等内在的品质看得比外表更重要。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年轻时也和他们一样注意外表。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帮助他们通过外貌评估这一关。首先，我们要鼓励他们认同自己的身体，尤其是那些最隐蔽的部位。在青春期做这事虽然晚了一点，但总比不做要好。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多多了解和亲近自己的性器官（自慰是不需要教的），直到他们真正喜爱自己的身体。如果一个女孩感受到这个部位给

她带来的快感，那她就会自然而然地尊重和爱护它。我们应该和孩子们讨论如何对自己的性生活承担责任，努力争取他们的同意。

近几年出版了许多关于自尊心的书籍和文章，说到底，自尊心就是对自己的良好评价。我们常把自尊心同傲慢、虚荣心或自负混为一谈。其实，那些自吹自擂的人所缺乏的正是自尊心；他们需要用牛皮大话来掩盖他们的自卑心理。问题很简单，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性器官看成肮脏丑陋的东西，那么，我们怎能作出良好的自我评价？不论年龄大小，不论追求者有多少，如果一个女人不能摆脱对自身器官的厌恶，那她就永远不会建立起真正的自尊。

对一个不敢触摸自己阴蒂的女人来说，在做爱前给自己放置子宫帽是一件非常令人难堪的事情。只要一想到自己的手放在“那个地方”脑子里那梦幻般的美丽和浪漫就烟消云散。

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受到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的恐吓，自慰（或手淫）就会成为一种很自然的行为。不满周岁的婴儿喜欢把小手放在两腿之间，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很舒服。如果大人不去把他的手挪开、对他吹胡子瞪眼睛，他就会继续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自己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还会学会一些如何维护隐私的简单规则。

我们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有关少女不慎怀孕的统计数字。在 15 到 19 岁的美国少女中，每年有 12% 的人怀孕。面对这种情况，难道做父母的没有责任帮助他们的孩子？我们也许出于个人或宗教的原因讨厌自慰（或手淫），但是，如果自慰能够帮助女孩们避免怀孕，我们有什么理由竭力阻止？要知道，过早怀孕会毁掉年轻人的前程。

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劝告少女们推迟怀孕。除了过早怀孕所带来的种种风险，我们还应告诉她们，只有在青春期这一人生

发展的黄金阶段保持身心的独立，她们才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成长、更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智力和想像力。有些奇迹只有在青春期才会出现，那是我们才华横溢的年代。在结婚生孩子之后，这种奇迹就不会发生了。到了那时，我们就必须把自己看成家庭的一员，和丈夫分享一部分自我，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再有独立思考、独立感受和独立探索的机会。

我并不是反对在十几岁的时候谈恋爱。但是性交会激发强烈的感情和冲动，就是二三十岁的人也难以保持理智，更何况十几岁的青少年。女孩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她们比较缺乏独立性。当热恋中的女孩向男孩献出自己的身体时，她们情不自禁地渴望和对方融为一体，她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愿望：我是你的！

不论我们在学习、社会活动和体育运动等方面表现多么出色，一旦同男孩发生性关系，我们就会昏头昏脑地坠入爱河，在一阵晕眩之中丧失自我。“亲爱的，我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就没法活！”于是我们紧紧地抓住对方，就像吃奶的婴儿紧贴在母亲身上。可是，年轻的朋友们，追求一时的痛快就会使我们失去成长的大好时机。

当年，我是多么渴望男孩的拥抱和亲吻、多么渴望那种如胶似漆的爱！如果当时真的和男孩们做爱，我很可能会沦为他们的俘虏。那时，我对避孕一无所知，如果怀孕，那就永远别想实现我在少年时代的梦想了。

大多数女孩对性交的理解仍旧局限于阴茎和阴道。如果一个女孩不懂得如何用自慰的方式来获得性的感受，那她就会把男人看成惟一的依赖。她分不清爱情和性欲之间的区别，她只相信男孩的魔力，以为只有他的手和嘴才能使她得到满足。

于是，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就成了她命运的主宰。她会整天坐在电话机旁，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声音。许多女孩和成年女人

就是这样屈服于男人的魔力，在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和他们做爱。

我们指责男性生殖器崇拜，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是谁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殖器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不错，男孩确实比女孩更加喜欢自己的性器官，他非常看重自己的阴茎。可是，归根结底，是我们女人给了他们最高的荣耀。当男孩看到，他的阴茎居然能使一个原先不情愿的女孩在感情上变成他的奴隶，他自然又惊又喜：“哇！太棒了！”

青春期的女孩渴望爱情，却害怕男孩用手和嘴去接触“那个地方”——难道他不知道那里是什么？难道他没有见过那些女性卫生用品的电视广告？与此同时，她却情不自禁地渴望口交的极乐。她想起在书里读到的情景，又想起电影和电视里那些漂亮的女主角们如醉如痴的脸。欲望和羞耻感将她的脑子搅得一团糟。

最后，是他的嘴唇帮她脱离了困境。刹那间，阴沟变得不那么可怕，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那只青蛙，公主的一个吻就使它变成了一个王子。瞧，他多么狂热地爱她！为了和她做爱，为了给她带来性的极乐，他什么都能干。在她眼里，一切快感都来自他的嘴，而不是她的阴蒂。“我只要弯下身，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我曾听到男人们这样吹嘘。

可悲的是，有些女人可以让男人的嘴去碰“那个地方”，而她们自己的手却不敢去摸。就拿我来说，是一位军校生用甜言蜜语和波德莱尔的诗歌使我放弃了反抗。我忘不了他的嘴给我带来的快乐，那感觉就像海滩上的沙子。直到今天，那位军校生和那次偷食禁果的情景还常常出现在我的幻想中。

10年之后，我才发现，我自己的手也能带来同样的快乐。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发现这个简单的道理？一定是因为我不喜欢自得其乐。我们不愿意用自慰的方式来寻求性的极

乐，因为我们在感情上无法独立，我们宁愿把支配权交给男人。

自尊也好，自爱也好，我们对性器官的看法决定了我们的整个自我形象。如果我们厌恶自己的性器官，这种感觉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它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悄悄地进入我们的视觉想像，于是镜子里的一切——手臂、大腿、鼻子、脚——都变得像性器官一样令人厌恶。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在鼓动丈夫杀人之后，就老是觉得自己的手上沾满了鲜血，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即使在街上看到几个干活的工人，我们的神经也会绷得紧紧的。只要他们对我们看上几眼，吹几声口哨，或者相互之间评论几句，我们就会觉得他们一定在诋毁和嘲笑我们。不论我们在出门前照镜子时如何洋洋自得，只要一碰上他们那 X 光射线一样犀利的眼光，我们就变得心慌意乱：不好！一定是裙子包得太紧，衬裙露出来了，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些该死的男人！

忍气吞声的女孩

为了参加帆船俱乐部的舞会，我第一次高高兴兴地穿上了姐姐的夜礼服。其实，只要对着镜子好好看看就不难发现，那件衣服穿在我身上根本就不合适。不过那时，我还没意识到，美貌对青春期的女孩来说多么重要。

那天晚上在帆船俱乐部举行的舞会，标志着我的童年时代的结束。眼看着那些曾经听我指挥的女孩们一个接着一个投入男孩的怀抱，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缺少什么。在她们身上有一种比美貌更加微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波浪般的卷发、丰满的胸部和漂亮的脸蛋，更重要的是她们看上去那样随和、顺从，一

副小鸟依人的样子，而我却是风风火火、过分自信。看来，我需要一副假面具；或者说，我必须改头换面。

我决定改变自己，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男孩的喜爱。然而，强迫自己放弃原先引以为荣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无言的愤怒。

那天晚上，我大哭了一场，直到某个同学的父亲开车把我送回家。其他女孩却和男孩们一起驱车前往另一场聚会。我哭得很伤心，然而却无法表达心里的愤怒，因为我从未见过任何女孩或女人成功地将愤怒转化为进取的动力。像大多数女人一样，我只能强咽下怒火，把所有的怨气都憋在肚子里。我低着头、弓着背，活像一条走投无路的母牛。

在帆船俱乐部舞会遭受的耻辱改变了我对自己的看法。我意识到自己缺乏一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美貌。在此之前，我可以贬低美貌的价值，现在，我再也无法否认，美貌决定一切。

我开始全力以赴，追求美貌。我要模仿那些漂亮女孩，像她们那样微笑，像她们那样走路，努力按照大家公认的标准来改变自己。但是在内心深处，怒火并没有熄灭。所有像我这样在外貌上不合标准的女孩都会有同样的感觉。

当然，除了美貌，还有许多值得追求的东西。自古以来，男人一直在各个方面发展和运用自己的才能。今天，青年女性也有同样多的选择机会。可是，我们对美貌的痴迷却有增无减。这说明了什么？我们还得从生命的最初阶段开始。在 3 岁之前，负责储存记忆的那部分大脑还没有完全长好，所以我们记不清那时发生的事情。不过，请别小看那些留在婴儿脑子里的模糊印象，它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马克·吐温把这些模糊的回忆称作“半真半假的故事”，就是说，它们是事实和想像的混合物。不过，它们也包含着一些最重要的回忆。我自己在写这本书时就发现了不少。根据我从亲戚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我确信

这些回忆大多是事实。就这样，我发现了，是什么原因使我长期以来一直怒气冲冲。对我来说，这个发现在是一大解脱。

在青春期，我原先的那些长处——聪明、机敏和大胆——在爱的争夺战中都成了没用的、必须抛弃的东西。这些都是男性的特征，表现在一个女孩身上就成了短处。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婴儿对爱的渴望。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欲望，男孩们一定被我吓了一跳。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怀里抱着的，不是一个年轻女子，而是一个婴儿。我闭着眼、紧紧地靠在对方身上。朦胧之中，我觉得自己变得很小很小，好像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最大的遗憾是，为了追求美貌，我失去了原先引以为荣的口才。看来，那时我一心追求的，就是那种小鸟依人的形象。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敢想敢说、喜欢在大小集会和表演中打头阵了。我的舌头开始变短，语言表达能力开始退化。

口才和容貌密切相关。能说会道的女人都有一张生动的脸，她们的整个身体都有丰富的表现力。被动的女人总是等待别人对她们说话，给她们点菜、为她们做决定，她们的脸像面具，像拉上窗帘的窗子。

我们通过语言来表达愤怒和幽默、灵感和启示。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大脑以极快的速度将思想变成语言。有什么能比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激动人心？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交流中不断成长、不断更新自己。许多女孩一到青春期就失去了表达能力，这种情况只是在近几年才有所改变。她们忍气吞声，把真实思想藏在心里。然而，愤怒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忍耐和压抑只会伤害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语言就是力量。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别人就无法了解我们，我们也无法了解别人。

坦率地说出心里的愤怒是培养独立人格的不可缺少的一步。对最亲近的人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见得会使我们失去对方的爱。小时候，为了得到母爱，我们总是避免在母亲面前流

露心里的愤怒。我们把母亲看得十全十美；我们相信，母亲总是对的，如果我们有怨气，那一定是我们的错。就这样，愤怒和内疚成了我们的心病。

在我们心目中，母亲成了爱的典范。当我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母爱又成了爱情的典范。我们渴望十全十美的爱情，我们希望男孩们像母亲那样全心全意地爱我们。如果他们做不到，我们就悲痛欲绝，恨不得把他们杀了。当然，我们不敢这样做。于是，我们又一次把愤怒埋在心底里，又一次使自己成为受害者。

年轻人渴望得到父母的关注和社会的承认。那些最成功的青春片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是因为它们抓住了年轻人面临的困惑如《辉煌的小草》和《无因反叛》还有《叛逆者之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影片，花钱不多，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鸣。这些影片里的年轻人为了适应社会，压制自己的真实感情、强迫自己用假面具来掩盖真实的自我，直到最后，他们终于忍无可忍，起来反抗。

年轻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成年人能够认可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却不让他们公开谈论性这个重大问题？女孩们无法向父母说真话，她们只能把自己的感受偷偷地写在日记里。而忧心忡忡的父母则想方设法偷看女儿的日记，并美其名曰：“这都是为了她好。”

一位少女在给《十七岁》杂志的信里抱怨“我的妈妈老是设法进我的房间里。只要我不在家，她就会进去。我经常发现房间里的东西被人翻过。她搜查我的房间，拿走或扔掉我的东西。我想和她谈，因为我觉得她这样做是不尊重我的隐私。可是，她总是说，‘你为什么这样担心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隐瞒？’或者说，‘这是你的房间。可是别忘了 这是我的房子。’”

在家里，我们应该允许孩子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怨气。

争论不会毁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反，适当的争论能够消解积聚在内心的愤怒和怨气。青春期的孩子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权利，需要自己的空间，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然的话，愤怒和怨气就会以一种原始的状态淤积在心底，最后转化为各种各样的病症。

母亲和女儿的竞争

20年前，如果有人说什么女人在和她的女儿竞争，做母亲的一定会气得发抖或惊得目瞪口呆。她也许会承认，含苞待放的女儿勾起她对自己少女时代的回忆；她也许会觉得，同女儿相比，自己显得老了。但是，大多数母亲都会矢口否认：“什么？我和女儿竞争？你一定是疯了！”

今天，不同年龄的女人都在追求青春和美貌，母亲和女儿的对峙也不像20年前那样不可思议。即使不和女儿竞争，母亲也会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女儿。她看到，女儿已经长成了标准的美人，穿着母亲最喜欢的时装杂志上的服装。不过，大多数母亲仍旧不会承认在女人之间，尤其是母女之间存在着竞争。

有些人的母亲有很强的竞争心，有些人则像我一样，始终得不到母亲应有的关注。不论母亲如何看待自己青春期的女儿，她的态度都会影响女儿的一生。

如果我告诉你，我一直置身于母亲和姐姐的竞争之外，那我肯定是在撒谎。童年时期，我确实不怎么在乎母亲对我的忽视，相反，我挺喜欢那种自由自在、不受大人监督的生活。可是到了青春期，母亲对我的忽视却使我觉得低人一等，因为这证明，我缺乏美貌，没有资格同她们竞争。这对我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直到现在，我在进出各种社交场所的时候还免不了对自己的外表

忐忑不安。如果说，母亲的关注是我在婴儿时期最大的渴望，那么这种渴望在青春期就变得更加强烈。

想不到，在我认识的女孩中，我是第一个来月经的人。衬裤上的血迹把我吓了一跳。母亲好像比我还要尴尬，她得亲自为我系上卫生带。以前，我常在浴室的抽屉里看到这东西。不过，那时它和其他女人用的东西一样，是母亲和姐姐的，同我没有有什么关系。我一直觉得自己和她们不一样，可是现在，我突然变成了她们中间的一员。

我再也不能在母亲和姐姐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充当旁观者了。过去，我常在吃饭的时候听她们两人争吵。在我们家，餐桌就像战场，母亲和姐姐总是在吃饭的时候争论各种各样的事情：姐姐穿的衣服、她在半夜三更和男孩们的约会。有时她们还会气得哭鼻子。母亲好像不知如何对付大女儿那诱人的美貌。在我的记忆里，这些年也是母亲最美丽的时候。从外表上看，我和她们一点都不像：直头发、扁平的胸部，还有装在牙齿上的钢丝架子。无疑，这就是我的发育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原因。

我很爱母亲，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她。不过，我很早就决定做一个坚强的、不轻易诉苦的人。母亲一直对别人说，“我从来不用为南希操心。她能自己照顾自己。”确实如此。后来，我看到别的女孩都戴上了胸罩，为了能和她们一样，我也想戴，虽然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我没有开口向母亲要，因为我曾听到她对姨妈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的胸部又扁又平。她的话没错，但我却觉得受到了极大的羞辱。于是，我就自己动手，在贝尔克百货店里偷了几个胸罩。我也没有向她要其他女孩穿的那种漂亮的浅色衣服，而是硬着头皮继续穿姐姐穿过的旧衣服。尽管如此，我心里一直希望，有一天，母亲会回过头来，注意到我的存在。

10年以后，我终于变成了一个漂亮女人，可是母亲却一点

儿也没有注意到。当她的朋友贝蒂在 21 俱乐部的洗手间里对她说我已经变得比姐姐更好看了，她还以为贝蒂在说胡话。母亲的看法好像永远不会改变；不管我取得什么成就，她好像永远都看不到。不过，这也从反面刺激了我，促使我去追求美貌、男人以及事业的成功。

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说 在通常情况下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父母正好在回顾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这对男孩的父亲或女孩的母亲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过，母亲和女儿碰到的困难通常要比父亲和儿子多。弗吉尼亚·拉特的结论是，“父母在孩子身上看到他们失去的自我。年轻人旺盛的性欲不仅使做父母的感到相形见绌，还令他们怀念自己青春期的经历，这使他们对自己在中年时期的魅力和性生活产生怀疑……青春期孩子的父母常常对自己的生活或婚姻感到沮丧。他们妒忌，害怕失去自己的孩子，害怕遭到厌弃。孩子身上发生的变化——发育、外貌的改变、恶劣的情绪、躲避父母、越来越多地和朋友们在一起——这些都使做父母的觉得难以应付。”

不难看出，青春期的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同婴儿时期有些共同的特点。父母和家庭已经不能满足他们感情和身体的需求，但是他们仍旧需要父母。一旦在外面碰到不愉快的事，女孩就会跑回家，寻求母亲的关怀和安慰。她渴望自己的空间，同时又离不开母亲的怀抱。她的表现就像一个婴儿，刚刚开始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需要一些合理的规则，这些规则可以保护她，并且帮助她在打造独立自我的同时继续享有父母的爱和关怀。

许多人到了青春期就停滞不前，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负责的成年人。原因之一是，他们对未来、对自己都缺乏信心。这就是说，他们无法摆脱过去。我们终生都在争取独立，但是任何时期都比不上青春期。如果我们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梦想，那

们就能朝着这个目标创造自我。

极端女权主义者试图恢复古老的理想化的母女关系。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倒退行为。用人口学家的话来说，现在的青年属于“第二次婴儿潮”；现在的母亲大多是职业妇女。然而，同70年代的母亲们相比，她们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如何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女儿。

如今，追求亲密无间的母女关系成了许多母亲最强烈的愿望。在她们眼里，女儿是她们最亲密的、也许是惟一的亲人。今天的母亲身兼养家和管家双重职责，因此她们常常觉得自己拥有双份权力。即使她们没有这样想过，但单枪匹马赚钱和抚养孩子则会使她们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自己有权拥有和控制这个家。那些掌管经济大权的男人们不也曾经把女人看作他们的私有财产吗？

母亲应该鼓励女儿独立，并且使她相信，她永远不会失去母亲的爱和支持。如果母亲做不到这一点，女儿就很难找到一个独立的自我。她们会像50年代的“好女孩”一样，“和母亲共享自己的秘密……把母亲当作仿效的对象，模仿她的发式、服装、言行举止。”精神病专家路易丝·卡普兰写道：“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亲密。”那位骄傲的母亲吹嘘……就是在她女儿结婚以后，她最好的朋友还是妈妈。妈妈是她的贴心人，妈妈帮她对付老公。任何男人都无法拆散母亲和女儿的亲密关系。”

我们的文化历来赞赏这样的母女关系，我们喜欢把女儿看成是母亲的克隆，而不是希望她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爱母亲但又不依赖母亲的年轻女子。

在许多成年女人眼里，竞争就等于背叛，因此她们竭力否认在她们和年轻美貌的女儿之间存在任何竞争。然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成年女人和少女一样，穿着半裸的超短裙在大街上行走。在《十七岁》杂志的一项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对你们

这一代有什么看法？”60%的青少年回答是：“有竞争性。”这些女孩知道什么是“竞争性”，但她们不知道如何竞争，因此常常陷入困境。

今天，容貌、美貌、外表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青春期的女孩不仅要和其他女孩竞争，而且要和自己的母亲争芳斗艳。与此同时，她们还要担心竞争会使她们失去母亲和朋友的愛。我们从小就陷入这种非此即彼的困境。如果母亲不能帮助我们学会健康的竞争，如果我们不懂得如何在竞争的同时保持友谊，那么，当我们被迫同别人竞争的时候，我们就无法摆脱恐惧和愤怒。

我相信，母女关系可以成为女性力量最宝贵的源泉，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去掉遮盖在母女关系上的那层虚假的面纱。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去拜访一个情人的家庭。那是一个周末，我们一起去乡村俱乐部吃饭。我那位情人的母亲60岁出头，但仍旧风韵不减，从头到脚打扮得十分得体。她的女儿也很漂亮，可惜她穿了一件样子很糟的衣服，还配上一些难看的饰物。母女之间显然关系密切，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两人之间的差距。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拍了照。一周之后，当我们聚在一起看照片时，女儿突然流着眼泪躲进自己的房间。她的哥哥告诉我，“我妹妹所有的衣服都是妈妈买的。一贯如此，就是在她上大学的时候，妈妈也叫她这样穿。现在她在照片上看见你和妈妈这样漂亮，而她却穿着那件难看的衣服……唉，有什么办法？这种事是不能说的。”

虽然母女之间关系密切，但是一个家庭似乎容不得两个美人。照片把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暴露无遗。今天，那个当年哭鼻子的女儿已经结婚成家，并且有了自己的女儿。有趣的是，她从阁楼上找出自己小时候穿的那些衣服，让她的女儿穿上。这些女人每天都要通电话。她们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许真

的这样亲密，可是，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她们咽下了多少怨气啊！

一个在母亲的绝对控制下长大的女孩即使结了婚，也摆脱不了对竞争和失败的恐惧。她的对手也许是网球场上的某个女人，或者是她丈夫盯着看的那个女人。她害怕失去丈夫的爱，就像小时候害怕失去母亲的爱。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对自己负责？性生活问题、性器官疾病、吸毒——如果母亲不能帮她应付这些问题，那就让男人来对付吧。

美和性是青春期的两大主题。如果不能坦率地谈论这两大主题，那么女孩就不能学会对自己负责。男孩们很快就发现，对女孩，只要赌咒发誓永远爱她、不断地夸她长得漂亮、做出一副非她不可的样子，就能使她的防御土崩瓦解。是啊，哪个女人不想听这样的好话？哪个女人不想看到男人被她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就这样，她轻而易举地成了男孩的俘虏。

有一项 1992 年的研究显示 比起其他女孩来 持有“传统价值观”的女孩更早开始两性关系，采取避孕措施的可能性也 smaller。所谓“传统价值观”包括以下信条：“大多数女人没有男人的帮助就无法照顾自己”；“大多数女人对工作和职业不是太感兴趣”；“丈夫应该比妻子更聪明”。

今天，如果做母亲的控制饮食，上健身房苦练，她就能穿女儿的衣服。母亲们常去的美容院里和她们的汽车收音机里放的是最最流行的 MTV 音乐。如果母亲是个离了婚的女人或单身母亲，她就会放俱乐部或者她最喜爱的酒吧里的舞曲。她常在那些酒吧里和男友跳舞，那些男友很可能比她年轻。商店里最新款式的服装也许更适合于她的女儿，不过，难道做母亲的就应该穿得像个老太婆？不可能！

当然，母亲仍旧爱自己的女儿，仍旧把自己看作是女儿的监护人和家里的主管。但是，只要一谈到竞争，她就会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矢口否认：“什么？我和女儿竞争？这怎么可能？我们是

最要好的朋友！”

如今，科学加上财力就能延长一个人的青春。可是，那些一心留住青春的母亲们仍旧不愿公开承认这是一种竞争行为。她们不愿承认，竞争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职场上到处都有竞争，家里也一样。与此同时，她们却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少女，这样一来，她们就不会在年轻美貌的女儿面前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我们声称，年轻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她们自己的前程。她们也这样认为。但是来自潜意识的压力使她们在行动上像前辈一样被动。今天的少女也许会邀请男孩去看电影、去吃饭，但是在两性关系上，她们仍旧不愿为自己作主。

在我的朋友中也有一些是十几岁少女的母亲，她们看上去和二三十年前的母亲们完全不同。这只要看看我母亲在我十多岁时拍的照片，那时她很漂亮，但显然比我们大一辈。今天，媒体大肆宣扬的母亲-女儿“姐妹”组合意味着什么？是今天的少女们显得比以前老，还是今天的母亲们使自己变得更年轻了？显然是后者。今天，我们越来越难分清谁是母亲，谁是女儿，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现象，尤其在我们这个外表和包装决定一切的时代。

今天的少女们如何才能将自己和母亲区别开来？新的一代将用什么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独特身份？青少年一贯喜欢标新立异 他们的服装、音乐、舞蹈和语言常常使老一辈震惊、迷惑和愤怒。这些表象后面有着深刻的原因。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渴望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关注，渴望别人看到我们身上独特的东西。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期。我们刚刚告别童年、刚刚脱离母亲的羽翼，我们迫切地希望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为此，我们离经叛道，不惜以极端的方式来向老一辈宣告，“我们同你们不一样。”如果他们拒绝让我们登台亮相，我们的外表和行为就会变得更加出格。

青少年穿奇装异服、把自己弄得怪模怪样，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吓唬成年人。他们警告成年人：离远点，这是我们的地盘！今天，成年人起劲地模仿下一代的打扮，他们忘记了自己是谁。我们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打扮，但他们不应该越过两代人之间的界限。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使自己显得年轻和健康，甚至求助于整容术，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和距离。

不论在外表和行为上，母亲都应该显得像个负责任的长辈。尊重孩子的隐私权是母亲的责任。少女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和别的女人比，但是谁都不愿意和自己的母亲比高低。如果母亲总是在暗地里和女儿较量并竭力使自己占上风，那么，女儿就会对竞争产生恐惧心理。

男人曾经利用漂亮女人来炫耀自己的实力，今天，许多做父母的也在做同样的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长辈们厚颜无耻地抢先占有孩子们的最新款式、流行音乐和时尚。那些经营服装、杂志、影视和音乐产品的成年人则大肆盗窃青少年的创造发明。

大街上、商店里、广告牌上到处都是批量生产的最新时尚。高档时装的设计师们则剽窃少男少女的最新款式，经过一番改造，将它们卖给孩子们的父母。如此肆无忌惮的模仿迫使孩子们不断地发明更加新奇的东西。那些生产青少年豪华时装的厂商都发了财，他们从青少年和成年人那里赚取了几十亿美元。在这个只重包装不重实质的年代，男女老少都在拼命寻求引人注目的外表、光彩夺目的包装。

服装历来是身份的标志。不过，服装对今天的青少年尤其重要，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习如何引人注目。年轻人成了美貌的奴隶，而众多的厂商却因此发了财。不论是牛仔裤、运动鞋，还是首饰，时髦的包装每时每刻都在花样翻新。人们不断地花钱购买转瞬即逝的时尚，用眼花缭乱的的外表来掩盖内心的空虚。

青春期的性骚动成了追求美貌的原动力。女孩们为了成为

最瘦的美女而忍饥挨饿。她们一见面就仔细地审视对方，怀着羡慕和妒忌比较她们越来越细的脚踝和腰身，“哎哟，瞧你多漂亮！多瘦！”

十多岁的超级模特开始走红，成为成年女人模仿和崇拜的对象。这使普通女孩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超级模特成了当代的文化偶像，成了青少年的代表。

《纽约时报》刊登过一篇热情赞扬唐娜·卡兰 DKNY 秋季时装的文章。“设计师认为，今天的时装是为适合多元文化而设计的，女儿的服装母亲也能穿。任何地方都少不了时髦服装：健身房、夜总会、社交聚会就是工作场所也不例外。”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传来了库尔特·科贝恩自杀的消息。科贝恩是4年前突然走红的邋遢摇滚乐队纳瓦那(Nirvana)的领衔歌手。他来自一个破裂的劳工家庭，他的歌曲都是关于愤怒、死亡和孤独，处处表现出精神的创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讣告里提到，科贝恩被公认为近来风靡一时的“邋遢风格”的创始人。“邋遢”时尚的追随者们模仿科贝恩衣衫褴褛、邋里邋遢的样子。

记得十多岁的时候在沙利文岛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和朋友们常常聚在一个叫亭子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跳“跳跃舞”。我穿着一条从海军剩余物资商店里买来的白色水兵裤。那条裤子被我改得非常小，像紧身裤一样紧紧包在我身上。当母亲和她的朋友开车经过时，她大吃一惊。第二天早餐时，她免不了唉声叹气：“南希，你怎么能穿这样紧的裤子跳这样的舞听这种乱糟糟的音乐！”而我却暗自得意，因为我终于抓住了母亲的目光。她一面说，一面两眼朝天祈求上帝。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我和她，都笑了起来。

我常带一盒马洛马斯巧克力饼干和一瓶可乐在海滩上呆一整天，虔诚地把全身的肌肤晒成古铜色。打那以后，我到过许多

海滩，学会了如何使自己拥有像迪斯尼影片《风中奇缘》中的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那样绝妙的肤色。我常常在海滩上走来走去，摆出一种非常诱人的姿态。看到别人掉转头来看我，我那份得意劲就别提了。母亲的话没错，过多的日光浴损害了我的皮肤。尽管如此，在那些年里，我有过许多非常快乐的时光，我体会到了美貌的力量，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征服者。

母亲不赞成我的爱好——服装、音乐、舞蹈，还有那些和军校生在网式大吊床里度过的夜晚。在她和我之间形成了一段距离，这反而为我提供了独立成长的有利条件。母亲接受了这个事实，她爱我，同时也让我拥有自己的空间，这使我逐渐学会对自己负责。我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和她不同的人，就必须学会照顾自己。

我要强调的是，在争取独立的创造性努力中，我们能够掌握一套自我保护的规则。

在母亲和女儿之间不可能有健康的竞争。母女之间的竞争只能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女儿屈从于母亲。她将永远逃避为自己作主，永远害怕向其他女人挑战。

争论和分歧并不可怕。只要有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竞争意识就不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造成损害。相反，掩盖和否认竞争必然使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应该相信，爱和竞争并不是互相对立的东西，公平友好的竞争只会促进同志般的情谊。

最要好的知心朋友应该是同龄人，而不是母亲。这是因为，母亲在家里的绝对权力使她的意见不可避免地带上权威的色彩。即使母亲对女儿的秘密不作任何评论，做女儿的也知道母亲的内心感受。如果母亲和女儿争芳斗艳，就会使女儿陷入非常尴尬的处境。女孩最怕的就是失去母亲，因为她从小就相信，只有母亲才是真正爱她的人。

女孩群体与无竞争条款

在那个难忘的夜晚，男孩们突然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是那样富有魅力，就像太阳、月亮和星星一样光彩夺目。多年来，他们一直都活跃在我身边，和我一样在球场上投篮，可是我和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的亲密朋友都是女孩，我们形影不离，常常睡在一张床上，就像一根藤上的瓜。现在，男孩们突然成了决定我们命运的主宰，他们对我们的评价改变了我们相互之间的看法。

当然，女孩们很早就意识到漂亮脸蛋的重要性，但是亲密无间的友情冲淡了相互之间的竞争。现在，男孩对女孩的挑选打破了原先的平等，在女孩中形成了明显的等级。

我们不知不觉地用男孩的喜好来衡量自己，看谁有丰满的胸部、金色的卷发和漂亮的腿——美貌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比起幼年时代，青春期的性欲之火把我们对美的渴望烧得更旺。

不仅男孩们喜欢漂亮姑娘，女孩们也像蜜蜂一样围着最美的花朵转。就拿我来说吧，我那时最要好的朋友都是最漂亮的女孩。也许我想从她们身上借光，也许我希望，在那些被她们拒绝的追求者中，有人会看中我。

“从三年级起，女孩们对自己外貌的评价就不行了，而男孩们却仍旧对自己的样子觉得相当满意，”心理学家苏珊·哈特说，“一个人对自己外貌的看法对他的自尊心有极大的影响，它的影响超过了智力、运动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不管是男人、女人、残疾人还是才华出众的幸运儿，无一例外。在所有这些人群中，一个人对自己外貌的评价成了衡量他的自尊心最可靠的尺度。我们不禁要问，自尊心到底有多少深刻的内容？为

什么外在的肉体的我同内在的心理的我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外貌之所以能对我们的整个自我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责任并不完全在我们自身。在幼儿园里和小学里，老师和朋友常把外貌和才能混为一谈。有一项 1987 年的研究发现：“那些给少男少女们上课的教师常常以貌取人，他们认为长得漂亮的学生比相貌平平的学生在学习、社交和运动上有更多的才能。”

于是，青春期的女孩们重新洗牌。性潜伏期的明星们自动退位，把头把交椅让给了青春期的美女们。不幸的是，在性爱和浪漫的青春之舞中，除了美貌，女孩拥有的其他才能都变得无关紧要，有时甚至成了缺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男孩的眼睛虽然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其他女孩的赞同却仍旧左右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她们的眼光像母亲一样犀利，她们的监视像母亲一样严格。如果其他女孩觉得我们太招摇，或者认为我们和男孩的关系太出格，我们就会变得非常沮丧。只有当我们得到宽恕、重新被“大家庭”接纳，我们才不会感到失落。在依附女性群体的同时寻求男性的爱，这种试图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的做法完全不同于性潜伏期的冒险和创造精神。

当青春期到来的时候，我们被迫同自己最要好的女孩竞争。我们渴望成为男孩的首选，但又不敢采取主动，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遭到女孩群体的唾弃。于是，我们只能在等待中忍受煎熬。女性友谊的核心是“无竞争条款”。每当我们试图超越我们的同伴时，红灯就会亮起来。这类似于母女之间对“无竞争”的默认，而做女儿的总是屈服于这条规则。因为害怕失去对方，女性之间很难展开真正的竞争。

出头的椽子先烂。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人总是容易受到排斥和孤立。运动心理学家谢里尔·麦克劳克林说：“为了被群体接纳，女孩们，尤其是初三和高中阶段的女生，特别喜欢随大

流 她们处处互相模仿 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 俚语。如果有谁炫耀自己的才能，并试图以这种方式来使自己与众不同，她将遭到严厉的惩罚。在高中网球队里，优秀队员时常有意输给她们的朋友，因为她们不想损害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女孩和成年女性常常在竞争面前畏缩不前 她们说，‘如果我赢了 另一个人就会输，那多难堪啊’！

当然，这并不是说女性之间没有竞争。我们是偷偷地在暗地里较量。“去年 我失去了童贞，”一个女孩写信给《十七岁》杂志，“打那以后，我最要好的朋友就一直想超过我。如果我和一个男孩睡觉，她就和两个男孩睡；不管我和几个男孩睡，她总是比我多一个。而且她总是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这样做是不是太愚蠢了？”

不甘落后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我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会竞争的方法和规则。哪里有美貌，哪里就有竞争。青春期是我们一生中最漂亮的时期，竞争当然不可避免。

有个小伙子告诉我一件几年前发生在他们学校的事。他的好朋友的女友怀孕了。她是班里最聪明的，又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之一。她还属于一个由拉拉队长组成、内部关系非常密切的小集团，它的绰号是“维斯太贞女”（古罗马祭祀女灶神维斯太的女祭司）。当她们发现小集团的成员破坏了集团最重要的规则时，她们就驱逐了她。那个男孩决定和怀孕的女友结婚。在此之前，他走进食堂，当着所有维斯太贞女的面，对她们说，“你们有什么权力处罚我的女友？让我来告诉你们这些假圣女，你们中间还有谁跟我睡过 你 还有你！”他指着两个女孩。这个小团体一下子就垮了。

从青春期开始，女人性幻想中的一大主题就是引诱男人。成年女人会在梦中想像，要是能够重新回到青春期，她会怎样打破那些清规戒律，放手去引诱男孩。在所有的规矩中，最死板的

大概要算女孩应该如何展现她的身体。

我们一生都在为美貌而奋斗。为了得到美貌，我们不断地花钱，不断地节食，不惜损害自己的身体去换取美，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给我们增添多少自信。面对这种普遍的焦虑，甚至天生的美女也不敢表现得太过得意。西比尔·谢泼德试图使我们相信，她之所以这样漂亮，只不过是运气好、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美的基因。看着她在欧莱亚的电视广告里甩动着一头美丽的金发，我们羡慕极了。不过，她破裂的婚姻又给我们带来一点儿小小的快乐。

另一位影坛美女则在一家女性杂志上更加直截了当地恳求：“请不要因为我长得好看而恨我。”

威廉·福克纳的小说《村子》里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尤拉·瓦尔纳还不到 13 岁……她全身焕发出原始的青春魅力，使人想起古代的酒神狂欢——丰盛的葡萄，阳光下的蜂蜜，熟透了的葡萄在羊蹄的践踏下流出鲜红的液汁。她好像不属于周围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玻璃房里。日复一日，她在郁郁寡欢的沉默中倾听自己体内各种器官的生长，好像继承了所有哺乳动物生长发育的古老智慧……

在她 14 岁那年的春天和漫长的夏天，不论走到哪里，她的周围总有一群 15 岁、16 岁和 17 岁的孩子。有的和她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有的不是。她那丰满湿润的嘴唇好像熟透的桃子，而他们就像一群贪食桃子的黄蜂。他们大约有十几个人，整天形影不离、闹哄哄地围着她转，而她却始终安详宁静。在这群人中有三四个女孩，都不及她漂亮。很难断定她是否有意拿这几个女孩做陪衬。她们虽然年龄比她大，但个子都比她小。她的秀发、她的皮肤、她那迷人

的脸蛋和高大的身体使这些女孩黯然失色。

同那些含苞欲放的美貌少女们相反，相貌平平的女孩们将一辈子难以摆脱自卑心理。即使在 10 年之后，有些人变得漂亮起来，她们也很难相信别人对她们的赞赏。

共享妒忌可以起到增强小团体的作用。我们女人喜欢和有相同经历的女人窃窃私语，用这样的方式来分享和发泄我们的愤怒。当两个女孩头碰头、眯起眼睛，一股电流就会滋滋作响，在两极之间快速流动。男孩们虽然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对象，但是一旦遭受失恋的打击，我们还是从小团体中寻求安慰。

在青春期，我们竭力在寻求异性爱的同时维持着我和女性小团体的关系。可用不了多久，年轻女孩那充满期待的脸就会显出种种焦虑和恐惧。我们不仅害怕被男孩抛弃，还要在暗地里提防小团体中其他女孩的竞争。原先天真自然的表情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矜持和压制。为了控制愤怒和恐惧之类的表情，我们需要绷紧脸部的肌肉。久而久之，我们的脸上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线条和皱纹。

“我认为外表确实能显示一个人的性格，”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整容外科主任林顿·惠特克说：“这是因为脸部的模仿肌肉同人体的其他肌肉不同：它们直接和骨头及皮肤相连，因此它们显示出每个人表达感情的独特方式。某些线条的产生是肌肉在很长的时间里反复作用的结果，就像刻玻璃那样。很可能需要重复几百万次才能在脸上留下永久的线条。在那些到我这儿来做美容手术的人中，大概有 20% 到 30% 的人要求我帮他们除去一些特定的皱纹，这些皱纹通常代表了悲伤、愤怒、焦虑、疲惫等表情。在有些人脸上，这些皱纹无疑是在青少年时代开始形成的。”

至于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身份，青春期的经历同样会造

成长远的影响。由于独立意识和竞争意识的缺乏，我们只能在如胶似漆的关系中寻求快乐。我们害怕同自己喜爱的男孩和女孩争论或公开竞争，因为我们不愿失去那种如胶似漆的关系。

男孩常常会突然看中某个女孩，他也许喜欢她身上的某些特点，但他并不想破坏她所属的小团体。他可能会转向其他的女孩，或者失去自己喜欢的女孩。这个过程会持续好几年。他不知道，把一个女孩从她的小圈子里拉出来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权力和风险。

至于那些美貌的少女，她们虽然意识到自己在男孩心目中的地位，但她们也担心自己的成功会引起其他女孩的妒忌。为了减轻其他女孩的怨恨，她们会避免在其他活动中占上风。她们需要男孩的爱，但也不愿脱离女孩 / 母亲这条生命线。

我们都知道，最美的女人总是和最强的男人结合在一起。我们接受这一不可抗拒的事实，直到他们坚固的防护层上出现一条裂缝，暴露出他们的弱点。于是我们暗地里戳上一刀，以发泄我们的怨恨。美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也会导致仇恨和冷酷。

在走红的青春片里经常有传布流言蜚语的情节，道听途说的东西在学校里越传越离奇，最后变成了耸人听闻的谣言。不过，影片结束时总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美貌战胜一切，观众们也皆大欢喜。生活就是这样矛盾。

在传统的女性世界里，为美貌而展开的暗中较量就像火山下沸腾的岩浆。为了防止这座火山的爆发，女人们将无竞争原则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直到美貌不再是女人惟一的权力基础，反竞争的法则才开始瓦解。这种变化在女运动员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就拿康涅狄格州女子篮球队来说，她们在整个赛季不仅获得全胜，而且最后赢得了 NCAA 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观看她们的表演确实令人兴奋不已。在运动场上，我们看到的是在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指导下的健康的竞争，只有这种竞争才赏心悦目。这些年轻姑娘像男运动员一样奋力拼搏，她们为胜利而欢呼，和对手们友好地握手，并准备下次再战。我认为这才是最好的女权主义。如果这些年轻姑娘能把这种竞争意识带到工作场所或家里，那该多好！

“女运动员最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训练的时候竭尽全力打败自己的队友，但是在训练场外仍旧和对方友好相处，”康涅狄格州女子篮球队的教练基诺·奥里埃马说：“一开始就对她们说，‘注意，在这里必须收起女孩子喜欢搞的那一套。不许背后议论、散布东家长西家短的流言。’她们很清楚我希望的是什么。比如说，两个男生同时看中球队里的一个位子，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在训练场上拼得你死我活，但是训练结束后他们又一起到外面去吃东西，第二天在篮球场上他们又会变成对手。这就是竞争。

“女孩很难学会这些。她们分不清场内场外。‘我再也不跟她说话了。’‘她是我的敌人 因为她想打败我。’很难让她们明白，在竞争性的场合，每个人都应该竭尽全力。参加比赛的目的就是要学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不是分什么敌人和朋友。在比赛中拼命争夺并不妨碍对手之间的友谊。

“我的队里有一个叫珍妮弗·里佐蒂的女孩。在我教过的所有男女队员中，她是最有竞争性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孩。‘我要全力以赴 直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队员。’她说。她很自信、公正、敢于竞争，在队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很可能是今年全国最好的后卫。她的身高是 5.5 英尺。

“我觉得女子比男子工作更努力，工作时间也 longer。但她们必须学会像个团队那样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她们应该相信，在激烈的竞争之后，她们仍旧可以在一起快乐地喝酒。

这些都会使她们终身受益。有人说，‘女人不懂如何竞争，因为她们太情绪化。’胡扯！女人比人们对她们的估计要强得多。

“那些能够对自己承担责任的年轻姑娘是最富有竞争意识的。‘哟，你有6名队员上了优秀生名单。’许多人很惊奇。那有什么奇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全国冠军。如果你在竞争性体育比赛中表现出色，那就是说你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和责任心。女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能让她们的发挥竞争性，并在竞争的同时保持友谊。”

那么，年轻姑娘们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呢？是健康的竞争，还是反竞争的母权制女权主义？格洛莉娅·斯坦内姆说过，竞争对女权运动是非常有害的。卡罗尔·吉利根也断言，女性天生就不喜欢竞争，这正是女性的优越性所在。

事实上，美貌之所以控制了我们的各个领域、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就是在女性中间缺乏保证公平竞争的规则。我们不愿承认美貌的作用以及女人们围绕美貌所展开的剧烈竞争。相反，我们试图消除差异，以为这样就能避免竞争，使那些拥有美貌的幸运儿免遭别人的忌恨，而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也能得到一些安慰。女性小团体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成员在各个方面相互模仿。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产生具有独创精神的人。

我们从未公开讨论过在青春期应该遵守哪些规则，但我们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好像有一位神仙在我们熟睡时对着我们的耳朵传授了这些规则。我们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更加注意身边的其他女孩，看她们穿什么、做什么。谁也不愿被小团体排斥在外，恐惧将我们紧紧地绑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竞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我们只是表面上否认和反对竞争，暗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相互较量。

寻找父亲的眼睛

父亲，这个词对我来说是多么陌生啊。在我们家，谈论父亲就是背叛、就是犯了最大的忌讳。我是个好女孩，这就是说，我必须遵守这条家规，绝对不去刨根问底的打听：“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到哪里去了？他长得怎样？”等等。他成了我们家的一大秘密，母亲从来不提他的名字。不过，我还是要说出他的名字：沃尔特。

现在是谈论他的时候了，特别是在这一章里。我从小就没有父亲，这对我的青春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所有没有父亲的女孩一定都有同感。在那倒霉的帆船俱乐部舞会之前，我的生活中除了外公没有任何其他男人。不过，这对我并没有多大的妨碍。事实上，我还试着在家里扮演一个男人的角色。在我的眼里，母亲和姐姐都是畏缩不前、多愁善感的人，为了成为和她们完全不同的人，我竭力表现得像个坚韧勇敢的男子汉。可是，那次舞会之后，我却迫不及待地盼望成为一个像母亲和姐姐一样有女人味的女人。

我已是青春少女，却得不到父亲的祝福，于是我急切地希望从其他男性那里寻求在家里无法得到的东西。几年前，当我采访精神病专家伦那德·迈克尔斯的时候，他对我说：“一个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对男人有特别强烈的渴望。”

在本质上，我是父亲的女孩、喜爱男人的女人，我有男人的气质，因为我总是坚决地试图证实自己。虽然我渴望从男人的眼睛里找到我曾试图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我也希望成为男友的精神伴侣、梦中的情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迁就他。我相信，如果我能赢得一个男人的信任，他就会看到，我会全心全意地爱

他，我会爱他的一切，包括他所有的弱点。这样，他就会成为我的人，永远也不会离开我。如此完美的结合就是走遍天涯也找不到。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终于在母亲放内衣的抽屉里看到了父亲的照片。记得那天家里非常安静，阳光照在深色桃花心木的五斗橱上。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翻母亲的抽屉了。她不在家的时候，我经常在她屋子里翻箱倒柜。翻开一叠漂亮的衬裙，我突然发现下面有张照片——我的父亲正看着我呢！他是个英俊的男人，深色头发，系着领带。他是那样神秘，他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大空白。我多么希望能看到他的眼睛，感受他的爱和支持。

“你爸爸是女士们眼里的明星，”多年之后 我的一个姨妈告诉我，“他很会吸引女人。”如果父亲在的话 我一定会成为他的掌上明珠，就像姐姐是母亲的掌上明珠那样。

如果我从小就享受到父亲的爱，也许我在幼年时就不会在母亲和姐姐面前觉得低人一等，在青春期也不会在其他女孩面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作为一个女人，我渴望从异性那里证实自己的女性魅力。不幸的是，我虽然在心里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十足的女人，可我对自己的外表仍旧缺乏信心。13岁时的经历太痛苦了。几年后，我才开始变得漂亮起来。可是，原先那个糟糕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有时，我试图用浓妆艳抹来改变自己，可是镜子里的我总是带着13岁的痕迹。我如此迫切地需要男人的赏识，多半和早年在母亲和姐姐面前产生的自卑感有关。

父亲在青春期女孩的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男人更了解男人，做父亲的可以帮助女儿了解她朝思暮想的男孩。比起母亲来，父亲能够更好地向女儿解释女性美对男孩产生的影响、男孩们面临的种种挑战、他们的梦想和弱点。父亲会告诉女儿，男孩们之所以摆出一副硬汉的样子，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对付

女性的强大吸引力。

大多数人都是由那些对男人一无所知的女人带大的。如果做父亲的在孩子的幼年和青春期都能和他们保持亲密的关系，这个世界就会大不一样。把青春期的女孩完全交给母亲，就会使她们在成年后和母亲一样对男人一无所知。

青春期的女孩需要父亲赞赏的眼光。她喜欢和父亲呆在一起，她希望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都能得到父亲的肯定。

“别缠着你爸爸，你现在不是小孩子啦。”母亲会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母亲干涉父亲和女儿的亲密关系，如果父亲从此退居一旁，女孩就会觉得，如果她和男人太接近，那就会损害她和女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而父亲感受到的则是妻子对孩子和他本人的占有欲。

许多女人都记得，在她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原先和她们非常亲热的父亲如何“抛弃”了她们：“小时候，爸爸最喜欢我。我们一起去钓鱼，有时我还跟他一起出差。可是，当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抛弃了我。”

她不能不感到愤怒、失望和困惑，她不能不怀疑，这一定和她身体的变化有关。于是，她轻易地将她对父亲的失望转移到其他男人身上：“男人就是这样无情无义！”

当我们进入青春期、当我们的性意识被唤醒时，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却得不到父亲的肯定和支持。这一缺憾的负面影响一辈子都难以消除。青春期的女孩喜欢和父亲亲热，这并不是为了从母亲那里把父亲偷走，而是想在父亲这个惟一信得过的男人身上试试卖弄风情的本事。如果他理解自己的女儿，他就会亲切地对她说：“瞧，我们的女儿已经长成个多么漂亮的姑娘！”父亲的真心赞赏将使他获得女儿的信任，这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如果我有这样一个父亲，我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我曾在各种各样的男人身上寻找父亲的替身，然而，不管他们怎样夸赞

我的容貌、怎样表示他们对我的爱，我都无法完全信任他们。

在我认识的女孩中，我想不起有什么人和她的父亲有密切关系。在这些女孩中，也许我是惟一没有父亲的人。但是在青春期，好像所有的女孩都没了父亲。从来没有一个女孩提起父亲给过她什么指导。在我那些朋友们的家里，父亲就像个幽灵、一个模糊的身影，一声不吭地坐在扶手椅里看报纸。

有一项研究调查了三组不同类型的青春期女孩：第一组来自父母离异的家庭，她们自父母离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第二组女孩的父亲已经死了，家里只有母亲；第三组女孩父母双全。在这三组女孩中，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行为上的反常现象，但她们对男人的反应却有明显的差异。

在研究中，每个女孩都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一个男人的面谈。办公室里放着三张椅子供女孩挑选。第一组里的女孩们通常挑选那张靠男人最近的椅子，然后伸开双腿坐在椅子上；面谈时她们显得富有挑逗性，话很多，而且面朝男人俯身向前、直视他的眼睛。第二组女孩们通常挑选离男人最远的那张椅子，然后直挺挺地坐着，两腿并拢，板着脸，和面谈者之间也没有多少目光接触；她们显得害羞和胆怯。第三组女孩的表现介于两个极端之间，她们在男人面前显得比较自如。当这三组女孩接受男人的面谈时，她们的表现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研究人员还调查了这些女孩同其他男性的关系。他们发现，来自父母离异家庭的女孩们把她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年轻男子常去的地方，她们喜欢用自己的身体去吸引男人的注意；她们更早和男人约会和做爱，而且约会和做爱的次数也超过另外两组女孩。那些父亲已经去世的女孩则相反，她们倾向于避开男人，在性行为上也显得受抑制。心理学家 E. 梅维斯·赫瑟林顿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写道，“这两组女孩都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在她们身边没有一位关心她们的父亲，她们没有机会和父亲

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互动关系，这样的环境使得她们和男人交往时不是疑虑重重，就是缺乏节制。”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父亲不是家庭的一员，他的缺席会严重地、长远地影响女儿对男人的态度。“那些在父母双全的家庭里长大的女人，她们找丈夫比较现实和成功，她们对自己婚后的性生活的满意度（包括性高潮的次数）也比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的女人要高。”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时，父亲应该看到，他的女儿已经是个年轻的成年女子。他不应该撒手不管；恰恰相反，他应该关心女儿，鼓励她继续发展自己的各种才能。他应该和女儿谈性的问题，帮助她了解男孩，向她解释他们的长处和弱点。

有了父亲做她的裁判，女孩就不需要依赖一个和她一样缺乏经验的男孩来判断她的容貌了。不过，如果父亲没有履行这一职责，同龄人的评价就会变得举足轻重。男孩的赞扬可以使一个女孩高兴得神魂颠倒，为了报答他的甜言蜜语，她会轻易地委身于他。

有些孩子也许对来自父母的称赞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真的不在乎。“对大多数青少年来说，父母的影响仍旧是最重要的，”青少年研究会主席珍妮·布鲁克斯-冈纳说，“同龄人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大，但是研究显示，在对待学习、成绩、中学毕业后的目标甚至吸烟和喝酒等一系列问题上，父母的影响仍旧比同龄人更重要。”

父亲应该劝告女儿不要放弃自己的才能；他应该使女儿懂得，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在追求美貌的女人；男人也看重女人的其他特点和才能。对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这也许只是一种安慰，但是她会记住这些话，因为说话的是个男人，而且是她信赖的父亲。

当有人问朱迪·塞弗，青春期女孩最需要什么，塞弗答道，

“她需要一个不受诱惑的成年男子在她身边，这样她就能在安全的情况下试验她的社交和吸引男人的技巧。她不能在女友们中做这种试验。我们的文化非但没有为女人提供这种机会，而且还告诫男人，在两性关系上，所有的女人都是潜在的搭档。在我们的文化中，女人和少女被如此严重地色情化，以至于大多数做父亲的不敢承认自己的女儿已经到了性成熟的阶段。父亲的退缩必然引起女儿的困惑，她不能理解亲爱的父亲为什么不再和她像以前那样亲近。难道发育成长是件坏事？如果做父亲不能认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变化，那她就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男孩身上。”

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父亲不能像母亲对待儿子的男性特征那样对待女儿的女性特征？难道男人的自控能力一定比女人差？我们一看到成年男人关心漂亮女孩，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一定是不怀好意。真不明白我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关于乱伦的假定已经流传了好几代人，因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我们不否认，有的人会对家里人产生某种带有性爱色彩的幻想，但是幻想不一定导致行动。我们不应该把男人都看成性欲失控的色狼，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做父亲的疏远自己的女儿。我们应该使男人们明白，幻想就是脑子里出现的想法和图像，幻想不等于现实。

社会分工曾经把男人变成纯粹的挣钱养家者，把女人变成家里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很少有机会和孩子接近。与此同时，“男人都是色狼”的说法使男人显得越发强大而女人的性欲则受到压抑。不过，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在争得女性的平等权利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男人？

我们总以为母亲绝对不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任何性冲动，其实不然。随着女性经济权力的不断增长，我们对女性性欲的

了解也越来越全面。

长期以来，人们不愿谈论母亲的乱伦行为，因为社会需要理想化的母亲。30年前，行为学界甚至不承认女人也会有性幻想。如果女人连性幻想都没有，当然就谈不上乱伦的想法或行为。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新闻和日间访谈节目里绘声绘色地报道和谈论父亲的乱伦行为，但是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母亲也会有乱伦的想法或行为，我们就会断言他在说疯话。

什么是乱伦？从定义上看，乱伦不仅仅指性交行为。有的母亲在给婴儿洗过澡后会亲一下他的小鸡鸡，但她肯定不会把这种行为看作乱伦。旁观者也不会对此大惊小怪，因为这是母亲的权利。丈夫到外地出差时，有的女人会由于孤独而爬到儿子床上去睡。当然，她只不过是搂着儿子睡觉而已，但这对儿子却会产生“某种”影响，包括阴茎的勃起并在他心里留下永久的记忆。母亲对孩子的占有欲会促使她在孩子长大后仍旧试图保持和孩子的身体接触。

我们很少听说母亲的乱伦行为，因为男孩或男人避免谈论这个问题。在儿子眼里，母亲是爱他的，如果他对躺在身边的母亲产生任何性的反应，那一定是他自己出了问题。阴茎的勃起会使他产生一种可怕的犯罪感，他会把这种反应归咎于自己的邪恶本性。

即使在成年后，儿子也不会重提这种事，因为这样做违反男人尊重母亲和宽宏大量的行为准则。大多数男人确实“忘记”了这种经历。在我调查过的男人中，有几百个在来信和面谈中提到这种经历，但他们并没有以审判者的语气说话。他们宁愿把母亲的行为看作是母爱的表现。

“我们习惯于把母亲看成慈爱和自我牺牲的表率，”心理学家珍妮·默伦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是慈母。有的母亲怒气冲冲，有的虐待孩子，有的埋怨，‘我不喜欢这个孩子。我

心里矛盾极了。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生这个孩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允许我们谈论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 在美国的 900万 15 岁到 19 岁的女孩中 每年有超过 100 万女孩怀孕。我们还知道，那些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女孩更容易过早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显然，那些家里没有父亲的青春期女孩更容易将男人理想化，更容易陷入怀孕的危险。

在过去，男孩们虽然常常试图使女孩屈从于他的欲望，但是如果遇到女孩的抵抗，他们就不再胡搅蛮缠。这是因为 30 年前，大多数家庭都有父亲，做父亲的多多少少可以成为男孩仿效的典范。如今，男孩们崇拜的却是电视里的男子汉形象。今天的男孩同样需要父亲。

心理学家亨利·比勒花了 30 年时间研究父亲和父性。他说，“青春期的女孩不能没有父亲。只有得到男人的关注和认可，女孩才会对自己的整个身体形象感到满意。女儿的需要很简单：她希望自己身体和感情的变化能够得到父亲肯定和赞赏；她希望看到，在父亲眼里，她已经成功地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青年女子。”

可惜 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传统”我们的前辈没有留下什么故事或智慧能够帮助今天的父亲们认识到他们对青春期女儿的责任。今天的父亲只能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既然做妻子的能够打破传统进入男人的领域，做父亲的也能在家里担当新的角色。男人不介入女人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需要更多专门为父亲写的书。对父亲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对待女人之间的竞争。就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博士也没能处理好和自己女儿的关系。弗洛伊德最出名的女儿是安娜，不过她认为父亲在她小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关心过她，原因是她长得不好看。而她美丽的姐姐苏菲却得到父亲的宠爱。安娜·弗洛伊德从未和任何男人有过性关系。也许正是因

为童年时代未能凭借“女性”美赢得父亲的爱，安娜才在长大后选择继承父亲的专业。

今天的少女们不久就会在工作场所面对来自男人以及女人的竞争，她们需要学习竞争的游戏规则。行为科学证明，参加体育运动的女孩在工商活动中成功的机会比较多，因为她们在运动中培养了团队精神、合作精神以及冒险精神，而这些都有助于在工作场所建立协作关系。这些都是父亲熟悉的东西。比起父亲，还有什么人更适合于带领女儿进入一个新世纪？

第五章 青春之舞：少男

男孩的模样：我们亲爱的冤家

在沙利文岛度假的那个夏天，我们这群少男少女在宽阔的海滩上玩一种名叫“红色海盗”的游戏。参加者分成两队，各队的男女成员们手挽手组成一条人链，力图突破对方的防线。成功者可以在对方阵营中挑选一个成员，让他加入自己的团队。这个游戏我们已经玩了好几年了，但是那天晚上感觉格外兴奋。

在冲破对方的人链后，我获得了挑选对方成员的权利。我看着眼前的男孩们，情不自禁地说：“你们都这样帅，我真不知道应该选谁。”我的记忆也许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也不会太走样。这话刚说出口，我就羞得满脸通红。不过，这确实是心里话。我一向喜欢男人和男性美，我从他们的脸型和体型上获得极大的视觉快感。如果男人也能像我一样来看他们自己，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在青春期前的五六年中，男孩逐渐摆脱了对母亲的依恋、越来越多地认同自己的同伴。和其他男孩之间的友情有力地强化了他的男性身份。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女性美突然进入他的视野，并在他身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昨天，他还是个天不怕地不

怕的少年，今天却变成一个腼腆笨拙的追求者。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女孩就像幼年时的母亲那样，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既兴奋、又害怕的感觉。

在某种意义上，男孩就像“睡美人”。他们的眼睛盯着漂亮女孩，却不知道欣赏自己。在有些人眼里，青年男子的身体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只要想想那些古希腊美男子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青春期的男孩就像米开朗琪罗塑造的人类始祖亚当：他的身体像亚当一样完美；他像亚当那样优雅地伸出手，等待女孩的到来。

在男孩的记忆中，母亲拥有所有的权力和美貌。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他在母亲的视野里长大，从她的目光里吸取他所需要的一切。后来，他渐渐摆脱了她的控制。现在，当他面对美丽的少女睁开刚刚睡醒的眼睛时，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体验到的女性魔力。他无法把眼睛从女孩们身上移开，但这并不等于说，他自己不需要别人的赞赏。我们习惯于谈论男人的窥视癖和女人的裸露癖，其实不然。男孩也需要别人的关注，不然他就会变得粗暴。难怪有时男人眼里会露出愤怒的目光。

凝视的目光是心灵的养料，我们一辈子都少不了它。但是男孩们很早就学会避开母亲的凝视。在他们眼里，男子汉不需要女性的赏识。面对女孩的目光，男孩宁可相信女孩看到的只是他的汽车、他在运动场上的出色表现和他的身份。

不错，今天的年轻女子有自己的收入，但她们并没有放弃传统的女性特权，女孩们仍旧拥有表现伤心和痛苦的独家权利。但是，如果一个男孩遭到女孩的拒绝，他就必须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决不能在同伴面前显露出任何脆弱。

虽然只有 13 岁，他已经学会摆出一副男子汉的架子。可是，女孩们到底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他对此一无所知。

他哪里会想到，青春期的少女希望他能全心全意地爱她，把

她作为女神来崇拜。他哪里会想到，她期待他能代替母亲成为依靠的对象，像母亲那样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心肝宝贝。

在他的眼里她才拥有如此神秘的力量 只要她说声“不”，他就连碰都不敢碰她。他是他的同龄人，一个占了上风的同龄人，因为他要靠她来证明自己的性力，靠她来把梦中的幻想变成现实。

在她看来，如果她对他让步，那就是向他表明：我是你的。也就是说，他不仅要唤起她的性欲，而且必须对她负责。对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不错，他会感激她、甚至爱她，不过，难道这一切不是两相情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会在她心里引起什么样的变化。

他改变了她。现在，她要求他的眼睛只看她一个人，并且像母亲的眼睛一样注意她身上发生的一切。如果他做不到，她就会哭哭啼啼的指责：你从来就没爱过我！于是她恍然大悟：男人都是没心没肺的家伙，只有女人才懂得真正的爱！

伊莎贝尔·艾伦德在她的小说《幽灵之家》里是这样描写少女阿尔巴的爱情：

有生以来，阿尔巴第一次希望自己是美人。她们家有那么多光彩夺目的女人，然而，除了美人罗莎，她们谁也没有把自己的美貌传给她。就是罗莎也只给了她头发的色调。那海藻色的头发在她看来更像一个愚蠢的理发师犯下的错误。米格尔理解她的忧虑。他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密室的一边，那面墙上装着一面巨大的威尼斯镜子。他掸掉那破镜子上的灰尘，点亮了所有的蜡烛，然后把这些蜡烛放在她的周围。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面破碎的镜子。在烛光的照耀下，她的皮肤看上去像蜡像一样。米格尔开始抚摸她。在那万花桶般的破镜子里，她看到一张完全不同

的脸，她终于相信，她是宇宙间最美的女人，因为她学会了透过米格尔的眼睛来看自己。

想像一下，如果一位非常英俊的男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同时又听到人们对他的称赞，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在传统社会里，男人很少利用自己的外貌。不错，他们也照镜子，意识到自己对女人的吸引力。但是，正如青春期的女孩必须放慢进取的脚步，男孩也竭力避免过分关注和利用自己的外貌。

可惜我年轻时没能让周围的男孩们意识到，男性美有多大的震撼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没有勇气对自己承认，他们的美是如何使我陶醉，并在我身上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反应。我从未听到过任何女人谈论男性美对她的吸引力，所有的人都对此保持沉默。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敢公开表露我对男性美的迷恋。

长期以来，用女性美来换取男性的保护成为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交易，它使我们对男性美视而不见，也使男人的表现欲受到压制。难怪男人们不高兴。他们被剥夺了吸引别人眼球的权利以及享受赞美、恭维和爱慕的权利。

我是在观看军校生操练的时候开始意识到男性身体的美。每到星期五的下午，查尔斯顿的姑娘们就把车停在军校的操场边上，然后端坐在汽车防护板上，观看军校生们和着约翰·菲利普·苏泽的进行曲操练。不过，我们女孩子更习惯于做花瓶，把自己置于镜头的焦点。我们穿着漂亮的羊毛衫、脖子上戴着珠子，等待那些军校生前来挑选我们。那情景现在想起来实在滑稽可笑。

还有什么能比观看一队正在操练的军校生更加激动人心？他们穿着合身的制服，紧身上装的背后镶着诱人的深色条纹，肩部和臀部显出优美的 S 形曲线。奇怪的是，虽然我们像中了催

眠术一样被眼前的景象所陶醉，女孩中没有一个人公开表示内心的感受。在南方，男性和女性、窥视者和表现者在角色的分工上泾渭分明。

昨天晚上 我们看了一部 1949 年的老电影《女继承人》。在这部影片中 奥利维亚·德哈维兰扮演相貌平平的女儿。她因为长得不漂亮而受到冷酷的父亲的羞辱。当她那漂亮的未婚夫得知，如果他们结婚，女孩的父亲就会取消她的继承权，这位一心想借婚姻关系获得大笔遗产的投机家就抛弃了她。今天早上，我丈夫睡眼惺忪地说，“那电影弄得我一整夜都没睡好。他们对她太残忍了。那个做爸爸的怎么这样冷酷？还有那个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其实，她是影片中惟一可爱的人。就是因为她相貌平平……”

“你很同情她。”我说。

“我想是的，”他说，“她原先的生活简简单单、无忧无虑，只是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她的容貌变得重要起来。”尽管事业有成，我丈夫仍念念不忘青春期遭受的挫折和感情动荡。我也一样。

男孩和女孩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当他们在青春期相遇的时候，相互之间非常缺乏了解。男孩起初常显得傻乎乎的不知所措；而女孩却把他想像成坚决果断、主动出击的勇士。男孩当然十分乐意扮演这样的角色。在他最笨拙可笑的时候居然有人把他想像得如此伟大，这怎能不使他感到沾沾自喜。于是他卖力地向她求爱。在经历了一番热恋之后，他才意识到她对他抱着多大的期望。于是他后悔莫及；而她则认为他背叛了她的一片痴情。

少女们总以为她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在我们眼里，男人都是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可是别忘了，男孩子们并没有强迫我们作出牺牲，是我们自己甘心情愿。我们喝下库尔-爱得迷幻药，然后指责男孩们见死不救。其实，男人本

来就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们从未想过，为了赢得女孩的爱，青春期的男孩放弃了什么。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其他男孩那里得知，男人具有像母亲一样强大的力量。并不是所有的男孩都能成为好朋友，但是，只要和朋友在一起，他们就会觉得十分自在。“纯男性”的组织开始并不是针对女人的，而是出自男孩们自己的需要。现在，他们突然意识到女孩的存在。尽管这个新发现使他们万分激动，但他们很快就知道，为了赢得美人的芳心，男人需要拿什么来作交换。

如今，青春期的男孩面临许多可怕的挑战。他们必须同一群老于世故、极其苛求的年轻女子打交道。她们都是在母权型的女权主义熏陶下长大的，这种型号的女权主义把男人视为头号人民公敌。即使母亲反对女权主义，女儿也无法脱离这种思潮的影响，因为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整个文化。这一切都使男孩们陷入困境，他们不知如何面对后女权主义时代的“新女孩”。可是，父亲们仍旧拒绝帮助他们的儿子。为什么？

行为学家告诉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在父母心里唤起他们对过去的回忆，做父母的在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如果父亲年轻时吃过很多苦头，他就会觉得儿子摔几个跟头也没什么了不起。也许他觉得这是男子汉必须经受的磨练；也许在潜意识中，他羡慕并妒忌儿子的青春。

父权社会的传统使父亲们相信，男人应该大权在握、坚强有力，不能有任何“软弱的”表现。因此，在他们眼里，青春期就像一所新兵训练营，男孩们在这里吃点苦头是为将来的生存斗争作准备。可是，今天的少女们不同于上一辈的少女。除了男人的爱，她们还追求经济上的权力。男孩的未来比过去更加难以预料；真正的男子汉”的定义也和以前大不一样。

由于得不到父母、教师和青春期通俗文学的帮助，男孩们无

法了解“新女孩”的复杂和自相矛盾，他们的处境比父辈更加困难。当父亲年轻的时候，女人们至少在经济上依赖男人，所以她们不能对男人过分苛刻。如今，女人们已经摆脱了这种依赖，但是在感情上，她们仍旧像以前一样贫乏，像以前一样苛刻。

今天的小伙子拿什么来应对女孩日益增长的权力？他一方面追求财富这个传统的男性权力的载体；另一方面，他开始照镜子、修饰自己的外貌。他在衣服和化妆品上花的钱比以往任何一代都多。今天的女性不仅拥有美貌的特权，还从男人手里夺得了他们的一半权力。这就迫使男孩们认真考虑如何利用外貌来为他们自己服务。这样的男孩确实是聪明人。

如果说，今天的男孩们更加注意打扮自己，这是因为社会已不再对爱美的男人抱有偏见。就拿我的朋友乔妮的儿子来说吧，这位 11 岁的少年每天早上都要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梳妆打扮，极其虔诚地往头发上喷摩丝。男人的服装开始像女人的时装一样花样翻新，衣橱里的衣服也日益增多。

随着青春期的逐渐延长，年轻人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为将来作准备。他们本应在老一辈的帮助下更健康地成长，超越眼前这个缺乏爱的世界，创造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可惜老一辈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

我们把下一代变成花钱的好手，然后又反过来从他们头上赚钱。我们不仅鼓励他们花钱，而且剽窃他们的独特风格。今天的年轻人需要更大的激情和能量来改变他们从我们手里继承的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到处可以感觉到男人的愤怒：在美国，每年要发生一百多万起家庭暴力事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女人对男人的态度。如今，女人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仍旧像以前一样，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男人头上，这在青春期尤其明显。

“做个男子汉!”

在性成熟期到来之前的几年中，男孩摆脱了对母亲和女性身体的依赖。在其他男孩的陪伴下，他逐渐“忘记了”幼年时代的依恋和畏惧。他用自己的想像和行动建立了一个男孩的世界，这个世界增强了他的独立意识，帮他摆脱了女人的控制。大男孩成了他心目中的伟人，英雄崇拜代替了母亲崇拜。

可是，当青春期到来的时候，昨天不屑一顾的女孩们突然成了他心目中的女神，在他心里重新燃起对女性身体的渴望。伴随着青春期的性冲动，他重新回忆起女性的乳房、皮肤和气味。

“我觉得许多男人的欲望都和幼年时期留在他们意识深处的记忆有关，”保罗·泰鲁写道，“他们的力比多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套代码。对大多数男人来说，最难承认或接受的就是他们性欲中那些来自幼儿时期的成分，而妓女和角色扮演者最了解的正是这些东西……它们产生于婴儿时期或青春期的记忆。”大多数男人都不愿在女人面前暴露这一事实，“因为这将使他们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泰鲁本人就在记忆中保留着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有一天，当他走进一位朋友家的花园凉亭，那男孩年轻漂亮的母亲正坐在那里，她穿着宽松的短裤，赤着脚，上身只有白色的胸罩：

那圆锥形的胸罩，潮湿的天气，赤裸的脚，她的眼睛和微笑，她的肌肤和姿态，还有我自己饿狼一般粗重的喘息声……那是我不该去的地方。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震动——这里不是我的家，她是我朋友的母亲，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半裸的女人……我多么想得到她啊！虽然我那时没想到

做爱这个词，但是眼前的一切却点燃了我的欲火……我敢肯定，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无法在任何地方定居下来……在将近 35 年的时间里，我从未停止过旅行。漫游癖这个词的涵义实在太深刻了……成熟的欲望是不存在的。男人的欲望扎根于早期的潜意识。

泰鲁当时只有 10 岁。但愿所有的女人都能读读泰鲁的这篇文章、从中体会一个 10 岁男孩的感受，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男孩的成长过程。

由于男人和女人最初都是吃母亲奶长大，女孩的婴儿期潜意识中就不存在关于男性身体的记忆。所以，当青春期的女孩看到和她同龄的男孩时，她多半不会感到像男孩那样强烈的性冲动。即使她无意中看到一个半裸的男人，他的阴茎恐怕也不会使她患上泰鲁那样的漫游癖。

相反，她惟一的参照就是眼前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如果从小就没有感受过男人的爱，她就不会从性爱的角度来看眼前的男孩。她对自己身体的无知使她更不愿去看男人的身体，因而窥视癖自然同她无缘。青春期的女孩不像男孩那样，在看到异性的身体时就感到强烈的性刺激。正如泰鲁所说，她的力比多并不总是“像上了膛的枪一样一触即发”。这不仅是由于女孩性器官不像男孩那样显露，还有更深的原因。男孩一生下来就爱上了女人的身体，尤其是乳房。就是女孩也喜欢看女人的乳房。

（我很喜欢泰鲁那段关于漫游癖的话。旅行为他提供了“逃避家庭束缚”、体验色情冒险的机会。对此我深有同感。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发生的性行为更带冒险性，也更刺激。如想亲身体验这种感受，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想像，就必须离家去漫游。）

那么，青春期的男孩拿什么来赢得他如此渴望的美人呢？他从未想到，他完全可以拿自己的容貌和身体来和女孩比美；他

也无法透过女孩的眼睛看到自己的迷人之处。至于女孩，她只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对男孩的感受却一无所知。她知道他在看她，但是他们之间既没有同情，也没有同感。

更令人丧气的是，她讨厌他的阴茎。她有权决定是否让他吻她的嘴唇、摸她的乳房，而他却要整夜整夜地忍受欲望的煎熬。不幸的是，她一点儿也看不到他的美；当然，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魅力所在。不过他肯定希望能够得到女孩的欣赏。女人不是最善于用眼睛来表达她们的爱吗？

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听任男孩像破了产的穷小子一样对着光彩夺目的女性美发呆。也许这是为了让他们多受点磨练，以便有朝一日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得到天下最美的女人。可是别忘了，这种痛苦的经历会使男人对女人的美貌以及美貌给女人带来的权力产生强烈的妒忌。

我们应该大力赞扬男性美；我们应该教会那些迟钝的眼睛去发现和欣赏男性身体迷人的曲线。在操场上、在体操馆、在酒吧间，我们到处可以看见他们健美的身影。男孩们已经开始显示他们的潜力。在1995年，70%的12到19岁的男孩表示，他们关心或追求最新的时尚。也许千篇一律的美女形象已经使我们感到厌倦，现在轮到男人们，特别是青春期的男孩，来显示男性美的力量。

今天的青春期男孩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们从母亲身上看到，今天的女人没有男人也能活，因此他们倾向于把女人想像得十分强大。在他们眼里，那些傲慢的女孩们似乎对他们不屑一顾，或者根本就不需要他们，而他们却必须竭力掩饰自己内心里的欲望和冲动。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男孩把车停在海滩上的一家快

餐店旁。当时，我闭着眼睛，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抓着膝盖。我多么想和他亲热啊，可是，我不能首先采取行动。糟糕的是，他也像我一样紧张和害怕。我想，他和我一样不是天生被动的人，但是对神秘的女性美的畏惧使他在女孩面前不知所措。

如果成年人能够帮助他们的儿子认识到，男人也拥有美貌，男人也能利用美貌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力量，那么，男孩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自信。他们在女孩面前就不会表现得束手无策；当他们遭到漂亮女孩拒绝时，也不会像挨了鞭子一样感到羞辱。相反，如果缺乏这样的自信，他就不能平静地看待女孩的拒绝，他就会憋着一肚子的气找机会报复。可惜，成年人没有担当起这样的责任。我们既没有帮助我们的儿子发现他们自身的美，也没有帮助我们的女儿学会欣赏男性身躯优美的曲线。

女性美可以在男人心里激起体验生活的强烈愿望。泰鲁相信，正是少年时期感受到的女性美在他心里萌发了周游世界、体验世界的愿望，这一持久不衰的愿望改变了他的一生。既然女性美可以对男人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那么，男性美呢？如果男孩们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拥有的美，如果他们能从女孩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美好的形象，他们心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可以向年轻人讲授金钱的运作，为什么不能向他们解释美在我们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在父权社会里，美貌如何成为买卖的对象；在现代女权主义时代，美貌又是如何体现它的价值。女性在工作场所打破了男性的垄断，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男性在美貌这一领域里打破女性的垄断。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应看到这一变化。

今天，男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冷静、镇定自若，可我们往往只看到他们每年高达几十亿美元的消费额。在商家眼里，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市场。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个穿着售

价 135 美元的耐克运动鞋的大男孩在 4 年里足足长高了 12 英寸，最快时一年要长 3.5 英寸到 4 英寸？女孩在 12 岁左右开始发育，而男孩则要等到 14 岁，这使男孩在发育前的一段时间里处于不利地位。不要忘记，今天的男孩像女孩一样，迫切地希望得到看到别人赞赏的目光，而我们的文化却处处把男人视为攻击的目标。女权主义者们对男人的愤恨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特征。

在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里，男孩不仅失去了父亲，而且失去了效仿的榜样。面对咄咄逼人的女强人们，他们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同龄的伙伴。为了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在外貌、语言和行为等各个方面刻意摆出反叛的姿态。令人惊奇的是，面对强大的女权，他们居然敢放肆地诋毁我们的美人。“她的身体太美了所以我才想到强奸——谁叫她把窗帘拉开她这是活该。”吉托男孩唱道。男人在街上用粗话嘲笑女人是为了发泄他们的妒忌。年轻的说唱歌手用粗野的歌词来诋毁女人的身体是为了发泄他们的愤慨。他们代表了今天的许多男人，这些人觉得自己在女人面前已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人。

让我们再来看看九英寸指甲演唱组的一段令人心寒的歌词：“我是一个大男人（对！）我有一杆大枪……我要把它对着你的额头，我要把它塞在你的嘴里。说不定我会在你头上打个洞，供我取乐。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叫你无地自容，把你变得一钱不值。我像钢铁一样无坚不摧，我是彻头彻尾的男子汉。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要让你尝尝这杆枪的厉害。放，放，放，放，放！……”

青春的骚动和男孩的困惑

青春期男孩必须学会掩盖自己的不安全感。女孩们虽然貌

似强大，但她们真正想要的还是男人的关怀和宠爱。对青春期的男孩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他第一次在女孩面前感到局促不安，他不了解她们，但他又不愿让她们看到自己的无知，于是，当他被漂亮女孩搅得心慌意乱时，他就摆出一副冷峻的硬汉面孔和姿态。几年下来，这张石墙般的假面孔就会成为他的真面孔；再过几年，这张毫无表情的脸就会变得和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成功人士的铁板面孔一模一样。

女人们最受不了的就是男人那张不动声色的脸，她们没法从那张脸上看出男人的真实感受和想法。而女人的脸则表露出她们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随着年龄的增长，男人们的心也被圈在石墙里面，一切敏感的反应都被迅速压制。在今天的电影里，青春期的男主角们都是硬汉式人物，而不是感情的俘虏。眼泪和他们无缘，他们的面部表情更像久经沙场的老将，而不是多愁善感的奶油小生。

青春期男孩为什么会有集体窥视癖？原因很简单：他们害怕单独干。多年来，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篮球架，谁也没想到去注意女孩子；突然间，一股强烈的欲望促使他们把注意力从打篮球转向窥视女孩子。这是一场谁也不熟悉的新冒险，即使在睡梦中，远航非洲的壮举也被女人的身体所取代。当女孩走过时，他像个傻瓜似的张着嘴呆看。不幸的是，女孩们从小就没学会欣赏男性美。她们自然不懂得如何回报男孩的注视。

碰了钉子之后，男孩们便开始用一种女孩们讨厌的方式来看她们。他们盯着女孩看，用粗鲁的眼光上下打量她们。不过，他们很少单独这样做。成年男人也许会单独盯着一个女人看，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但青少年却需要同伙的支持，于是，老的兄弟情谊就有了新的含义。

由于从小就不太注意自己的外貌，男孩也很少看到女孩身上那些使她们尴尬的缺点，如太粗的大腿、稀稀拉拉的头发、鼻

子上的小痘，等等。但是女孩对自己外貌的过分敏感和缺乏自信却成了男孩的一个有力的武器。

多年来，男孩已经习惯于远离母亲的爱抚，他既不想被人搂在怀里，也不想去抚摸别人。难怪在追求女孩的时候，他往往显得笨拙。但是一旦发现了女孩的弱点，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如果他多次遭遇女孩轻蔑的目光，他在打量女孩的时候，眼睛里就会流露出敌意。

男孩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应付女孩。他们追逐女孩，常常站在街角观看来往的女孩，而且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最让女孩们受不了的是，他们的行动神出鬼没、无法预料。记得那时，我和其他女孩子常聚在一个女孩家里，等待男孩们来找我们。虽然他们早晚总会找来，但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会来。男孩和女孩不一样。女孩们从小就缺乏独立意识，男孩们则不然。男人需要女人，但他们不像女人那样把能否赢得别人的感情看成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下午，我和其他女孩常站在操场边上看男孩们打球，眼巴巴地等着他们，有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他们却一门心思只顾赛球，不打完就不散伙。难道我们真的那么喜欢看球？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不能采取主动，只能等待。我们等啊、等啊，等他们给我们打电话，等他们来吻我们，等待那梦寐以求的爱。多么痛苦的等待！

等待使女孩和女人变得倦怠、懒惰、孩子气和缺乏责任感。好多年后我才发现，男人会多么热烈地爱上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女人。不过，我得首先学会识别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不喜欢和小鸟依人式的女人做爱，他们喜欢敢于对自己的性行为承担责任的女人。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和这种男人在一起，我就能重新找回那些被我轻易抛弃的才能：口才、智力和冲劲。

当然，男孩也有自己的烦恼。有时，他会从睡梦中惊醒——天哪，他梦见同性者之间的性爱场面！他哪里知道，做这样的梦并没有什么奇怪。他把这看成一个危险的信号：“难道我是个同性恋？”怎么说呢？他也许是，也许不是。在女人的幻想和梦境中，也常常出现女人之间的性爱场面，但这并没有使我们对自己是否是异性恋者产生怀疑。看来，双重标准有时也会使男人处于不利地位。

还有一件使男孩困惑的事：女孩对他的性器官的反感。她从来没有如此贴近地观看男人的阴茎。在她的眼里，凡是两腿之间的东西都是见不得人的。当他试图把她的手往那个方向移动，当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阴茎上，或者要求她把嘴放在“那里”时，她厌恶地拒绝了。他感到失望和困惑，她对他的厌恶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他搞不懂她为什么要拒绝，要是换了他，他一定会欣喜若狂。

“不行！”她断然拒绝。她从来没有碰过自己的性器官，即使有过手淫的行为，那也是带着犯罪的感觉偷偷干的。今天，这位刚刚用他的热吻将她唤醒的白马王子，居然把她的手放到那个地方，居然在她眼前露出那个难看的“东西”……她真想大哭一场。或许她真的痛哭流涕。于是男孩恍然大悟：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一时间，他成了厚颜无耻的恶棍，而她却像个纯洁端庄的淑女。

也好，坏蛋总比窝囊废强。“坏”也好，粗野也好，至少是个男子汉。好吧，既然他不打算就此罢休，那就索性做个无耻的恶棍。让她去做她的公主好了。他会亲她、抱她、稳扎稳打、得寸进尺，直到摧毁她的所有防线。

男孩没有那种把爱和性混为一谈的习惯。他爱母亲，可是这种爱不能满足性的需求；他通过自慰来满足性欲，不过这同爱毫无关系，要知道，母亲是坚决反对手淫的。他把爱和性看成两

码事。他是对的，爱和性确实是两码事。可是女孩不那么看。她相信只有男孩才能点燃她的激情。只有他的爱情才能唤起她的性欲。一切都有赖于他。

男孩必须继续做她的白马王子，同时设法将她引入禁忌之门。他不得不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不久他就发现她的“不”其实常有相反的意思。当她低声说“不，不，别这样！”时，她的身体却更紧地贴着他。这是鼓励“野小子”继续进攻的一个信号。与此同时，他必须在她耳边低语：“啊，上帝，我多么爱你啊，你多漂亮，多甜蜜，求求你，让我摸摸，求求你，我太爱你了……”原来如此，她渴望性的感受，但一切必须在爱情的掩饰下进行。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挡那股强大的、不以他们双方意志为转移的力量。

经过了那一夜，她就会每天夜里躺在床上，听着浪漫的爱情音乐，一遍又一遍地重温躺在他怀里的滋味，回想他身上那股神秘的力量……

就这样，她在甜蜜的梦幻中成了爱（也就是性）的俘虏。她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他的电话。如果他从此不再来电话，如果他另有新欢，如果她发现自己怀孕，她就会向他哭诉：“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爱我吗？你不是说我很漂亮吗？如果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绝对不会和你干那种事的。”可是，他也许根本就没有说过他爱她，即使说过，他也搞不懂她说的“爱”是什么意思。在他眼里，既然双方都有激情，那就是两相情愿的事，这就是说，她和他一样，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渐渐地，男孩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女孩们和母亲一样，不喜欢他的阴茎，在她们眼里，它和性一样，是个危险而丑恶的东西。当他长大成人、结婚成家的时候，他很难将男性勃起的性器官和纯洁可爱的贤妻良母连接在一起，这是两个多么不同的形象啊。为了在性生活中获得真正的满足，他只好去找妓女。

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不愿在两性交往中采取主动，但是这样的女孩会遭到其他女孩的排斥。在两性关系中，女孩必须扮演身不由己的角色，就像神话中那个被宙斯变成的大公牛强奸的少女欧罗巴。女人总是把自己看成两性关系的受害者，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互相安慰：“男人就是这样！”

其实，男孩对待女孩的方式和女孩对他们的看法大有关系，成年男子对女人的性暴力行为也和女人对他们的看法有关。女人并不比男人更好、更纯洁。在两性关系上，男女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

男孩也许还不善于在性行为中承担责任，但是他很可能通过自慰意识到精液的神秘力量。他知道，他的精液里有传播后代的精子，没有男人，女人就无法怀孕。射精是男性力量的体现。女人对精液的狂热是男人最喜爱的幻想，也是男性电影中最常见的高潮。

根据亨特 1974 年发表的研究结果，63%的男孩在 13 岁的时候已经有过手淫行为，而女孩只有 33%。此后各种关于青少年性行为的研究又提供了许多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女孩的百分比有所增加，但男孩的百分比仍旧远远超过女孩。

研究人员在一份 1993 年的论文中指出，“显然……自慰对女人的作用不及男人那样强烈。对这一区别的通常解释是，女人所受的教育使她们更愿意把性行为同爱情、人际关系以及亲密的感情联系在一起，更容易把那种纯粹是为了满足性欲的性行为视为禁忌……近期所作的一些努力，包括鼓励女性对自己的性生活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及建议女性更多地采用自慰的方式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

童话故事也涉及自慰的主题。根据贝特尔海姆的解读，《杰克和豆茎》这个故事是为了缓解男孩手淫之后因害怕遭惩罚而产生的恐惧感。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杰克和他的魔杖》暗示，有

了魔杖，杰克不仅战胜了所有其他向公主求婚的人，而且能够生平第一次勇敢地面对他的父亲。最后，在魔杖击败所有的野兽之后，杰克终于赢得了公主。这就是魔杖的威力！

贝特尔海姆认为，总的说来，这个故事的各种不同版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减轻男孩因勃起或手淫而产生的焦虑，同时教育他“在发育成熟之后，男孩必须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努力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说，他不能整天躺在那里靠自慰过日子。

贝特尔海姆反复强调，这些故事的对象不仅是男孩，也包括女孩。但是我对此颇感怀疑。试想，女孩在读到这些关于豆莖和魔杖的故事时怎么会想到自慰？想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到哪儿去寻找类似的针对女孩的故事呢？

我是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里长大的，我的早期记忆中没有任何关于阴茎的印象。我喜欢在跳舞的时候感觉到它的压迫，不过我仍旧不清楚自己身上的哪个部位对它特别敏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无法把自己所爱的英俊男孩和他的阴茎联系在一起，好像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直到把它握在手里或含在嘴里，我才有了不同的感觉。我被男人的感激之情所感动。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满足感，一种意识到自己有能力给对方带来巨大快乐的满足感。

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反复研究梅普尔索普令人惊叹的摄影作品，照片中的男性性器官显示，男人的身体是一件多么完美的艺术品！自然界创造出在身体结构上如此相配的男人和女人，不幸的是，这样美好的身体却常给我们带来心理上的烦恼。不过，最令人费解的是，男人总的来说喜欢自己性器官的构造，而女人却厌恶她们的性器官；男人喜欢女人的身体，但女人对男人身体的反应却复杂多变。

现代女权主义从来没有把性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女

孩子们仍旧认为性的主动权掌握在男人手里，自慰（手淫）是可耻的行为；她们看不到，自慰不仅可以满足性的需求，而且可以使人学会把性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

金西研究院的名誉院长琼·赖尼希说，当男人们被问道他们希望从性伴侣那里得到什么？他们最常见的回答是“爱”。许多女孩认为：“男孩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这是一种偏见。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我们看不到男孩们还向往其他的东西——亲近、安慰、友谊、爱情。如果我们把他们看成一群野蛮人，他们就可能表现得像个野蛮人：既然已被判为不可救药，那就索性坏到家。

女孩总是根据自己的偏见来看男孩。她讨厌自己的性器官，然而这正是男孩想碰的地方。如果她允许他这样做，那是她为爱情而作出的牺牲：因为爱他，所以她迁就他，把自己献给了他。在男孩眼里，这是性行为，是两相情愿的好事情，而女孩却把这看成一件脏事。既然她为他作出了牺牲，那他就必须对她负责，对后果承担所有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女孩不愿对自己负责，不愿用避孕手段来保护自己。

说起爱情，男孩也可能真的爱一个女孩，但他很难理解女孩是如何将爱和性混为一体。至于女人的爱，他惟一知道的就是母亲的爱，而母亲的控制恰恰是他竭力要摆脱的东西。正如女孩不理解男孩对性的看法，男孩也不熟悉女孩对爱的解释。

在和女孩的交往中，男孩不久就发现，尽管对方喜欢他的脸、肩膀和胸部，但是对阴茎这个男性最重要的标志，她却试图避开。她的厌恶激起他的愤怒，并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1994年，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高中生中，女孩对性活动的兴趣不及男孩那样强烈。”“在性行为比较活跃的男孩中，81%的人表示‘性是一种非常快活的经历’但是在女孩中，只有59%的人感到快活。”我想，如果调查的对象是

三十几岁的男人和女人，这样的调查结果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我们把这种情况归咎于男人对女人的需求麻木不仁；其实，女人依赖男人来激发她们的性欲才是真正的原因。

“如果男孩真的接受女性对性器官的态度，把阴茎看成又脏又难看的東西，那么，他就不会尊重一个真正喜欢和他做爱的女孩，也不会把她视作未来的贤妻良母，”赖尼希说，“尽管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感觉，但它有可能使男人把女人分为圣母和妓女这两个极端。”

青春期男孩的困惑曾经是很多小说和戏剧的主题。例如，经典影片《马蒂》的主人公马蒂就是这样一个男孩。他觉得自己不论在体格还是在感情上，都不符合社会对一个年轻男子的要求。幸运的是，马蒂终于找到了一个和他相配的女孩。我们都熟悉马蒂式的人物，他永远不会过时，而威廉·霍尔登在比尔·英奇的《野餐》中扮演的野性十足的男主角却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不过，当《野餐》在50年代后期首次上映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那个极具诱惑力的年轻人视为恶棍、野蛮人或强奸犯。

故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位陌生青年从火车上跳下，闯入小镇上一家人人的生活。没有一个女人能够逃脱他的诱惑，从当教师的老处女到十来岁的少女。为了这个不速之客，美丽的大女儿抛弃了自己多年的老相好——一位正经体面、温文尔雅的年轻人。

陌生人像一团烈火，点燃了她的激情。这一事件安排在她捧得镇上选美大赛的桂冠之后，这使我们觉得，在他的诱惑下，她从一个美丽的淑女变成了一个放荡的女郎。但是我们并不想谴责她，英奇成功地使她赢得了观众的同情。一句话，我们全都被男主角迷住了。

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英奇的意图很清楚：性本身并不邪恶，是社会成见给它罩上邪恶的阴影。不错，影片的男主角

差点儿把一个家庭和整个镇子都毁了，但他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是周围的人把他看作祸害。对这点，影片中的妹妹看得比谁都清楚。在最近一次访谈中，保罗·纽曼提到，当年他没能在《野餐》里演主角，因为导演觉得他看上去“不够危险”。

今天，没人能写《野餐》这样的剧本了。布拉德·皮特之类的年轻人也许十分性感，但缺乏那种危险的诱惑力。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再有烈火般的激情，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性力旺盛的森林之神。

不再妒忌阴茎

如今，人们很少谈论女人对男人性器官的妒忌。弗洛伊德关于阴茎妒忌的理论就像 40 年代的影片一样，成了过时的东西。它使人想起那些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赚钱养活老婆孩子的男人。那些年里，只要一说到“妒忌”这个词，人们就立刻会想到“阴茎”。

我个人从来就不喜欢这种说法。我太喜欢男人了，所以不可能妒忌他们。我一听到弗洛伊德的名字就反感。我鄙视那些搞心理分析的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些可怜虫和骗子。没想到，在我成了作家后，居然碰到一位比弗洛伊德还要可怕的人——梅拉尼·克莱因。他告诉我，还有一样东西，其威力比阴茎大得多，那就是乳房。

早在现代女权主义诞生之前，除了铁杆弗洛伊德主义者，已经没有人相信女人希望把阴道换成阴茎。精神病专家克拉拉·汤普森的著名论文《女人的阴茎妒忌》（发表于 1943 年）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阴茎妒忌主要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它是用来表示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体验到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她写道，

“女人因性别而产生的自卑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男人的妒忌，这种倾向的存在可以用文化上的原因来加以解释……阴茎妒忌是一种心态，它类似于任何弱势群体对当权者的态度。”

如今，阴茎似乎落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当然，我所指的“危险”不一定像洛雷纳·博比特对其丈夫的摧残那样严重，虽然这一事件（发生于1993年）确实很说明问题。令人费解的是，博比特太太居然被无罪释放。不错，博比特欺人太甚，应该受到惩罚，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在男人睡着的时候割掉他的阴茎！

真正将阴茎打入冷宫的不是别的，而是迅速蔓延的“乳房妒忌”。面对乳房日益膨胀的势力，阴茎作为象征物已经失去了昨日的威风。在过去，男人从不怀疑阴茎在父权文化里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喜欢盯着女人的乳房看，但不会感到妒忌。他们的世界是万宝路男性王国。

今天，乳房崇拜已成为时尚，而男人却只能靠边站。乳房在女人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是和男人却毫无关系。女人们痴迷地盯着其他女人的乳房。在性幻想中，她们看到的是其他女人的乳房，她们能够详细地描述它们的大小、形状和味道，她们渴望占有它们。

裸露的乳房、乳房填充、乳房重建、神奇胸罩、公园里敞开胸部喂奶的女人……乳房的形象无处不在。

在去年的“异想天开”狂欢中，有个在我家当过管家的男人在街上大声叫：“嗨，南希，看我的乳房！”他把自己打扮成风骚的荡妇，还装上一对和杰恩·曼斯菲尔德一样大的假乳房。除了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大学生和其他男人也不甘落后，有的在长满了毛的胸前戴上胸罩，有的给自己装个大肚子，还有一个人躺在桌上，生下一只活鸡。

越来越多的女人挺着大肚子走进办公室，要求产假及其他

特殊福利，同时寸步不让地和男人竞争工作机会。面对这一切，男人们感觉如何？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失去的特权？在一部关于三个女王的电影中，硬派男子汉电影明星们穿上女人衣服，外加硕大的假乳房。在横穿全国的旅行中，他们赢得了男扮女装选美大赛的桂冠。在影片里，他们看上去确实比真的女人还漂亮。看来，可怜的阴茎已被彻底地打入冷宫。

只有记住这一切，我们才有可能理解青春期男孩对女人的愤怒。如果男孩觉得女性的权势使他受到压抑，他对女人的态度就会变得非常矛盾。他渴望女人的身体，但又对女性身体的巨大威力感到愤怒和妒忌。

青春期女孩对自己身体的巨大潜力也一样无知。在父权社会时代，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承认女人的力量，阴茎是惟一的权力象征。如今，在我们这个无法命名的时代，人们仍旧不愿意承认女人的身体，包括乳房、性器官、皮肤和气味，在生活中的巨大影响。然而，对这种影响最敏感的正是青春期的男孩。

看看那些在斯特林费洛酒吧里袒露着上身跳舞的妙龄女郎吧。她们抚摸着硕大的乳房，嘴里发出轻微的喘息，沉浸在对自身肉体的迷恋之中。面对着男人们贪婪的目光，她们好像在说，“瞧，你有吗？”

有几位过去常去滑稽歌舞厅看脱衣舞的男人对我说，那些地方虽然没有今天的夜总会那样时髦，但是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却比现在要热得多。男人们感激那些让他们一饱眼福的女郎们，而赤身裸体的女郎们也因此而心满意足。

今天，戴着神奇胸罩的女孩们大摇大摆、孤芳自赏地走在大街上，她们像斯特林费洛酒吧里的女郎们一样，明目张胆地向男人们宣布：靠边站吧，我们不需要你们！

男孩们忍受着渴望和愤怒的煎熬。他们的音乐变得日益狂暴和震耳欲聋，他们用粗鲁的语言攻击女孩和她们的身体。没

有人愿意抽出点时间帮他们解决问题，相反，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们把他们描绘成谋杀和强奸女人的惯犯。与此同时，男孩们却盯着屏幕上新出现的一群穿着皮制超短裙的女主角，比起男性杀手，她们的凶悍有过之而无不及。男孩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属于他们的东西。我们找出各式各样的原因来解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犯罪、吸毒、监禁和自杀，可就是不提女人的性感魅力所起的作用。

我认为乳房确实至关重要。梅拉尼·克莱因说，妒忌的破坏力早在婴儿吃奶的时候就开始显露出来：婴儿依恋母亲的乳房，同时也妒忌它。如果我们不设法消减妒忌和怨恨，爱和感激之情就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在过去的 20 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我们以为问题都出在工作、金钱和政治方面，却没有看到心理方面的需求。其实，我们最渴望的是重回母亲的怀抱，像婴儿一样靠在母亲的乳房上。这就是为什么阴茎会失去往日的辉煌，而乳房却成了崇拜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女人要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乳房弄大，同时像男人一样用贪恋的眼光盯着其他女人的乳房。我们都感到失落和空虚，青春期的男孩更是如此，因为在他们出生之前，男人就已经失去了许多他们引以为荣的东西。

男孩的愤怒

随着发育年龄的逐渐提前以及平均结婚年龄的推迟——目前女性已接近 25 岁，男性接近 27 岁——青春期变得越来越长。这就是说，年轻人在担负起成家立业的重担之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知识和培养社会活动的的能力。在人的一生中，这应该

是成长和大胆实验的最佳时期。问题在于，如今成年人的文化和审美观都带上了青春期的特征。成年人已不再为青少年提供成熟的榜样，青少年在成年人身上也看不到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他们对成年人侵犯他们的领地感到愤怒。既然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的界限已被弄得模糊不清，青少年自然有理由要求获得成年人的特权。他们过早地开始性行为，酗酒，吸毒，携带武器。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成年人造成的。

我们谴责青少年不自量力、乳臭未干就想获得成年人的特权。可是，我们是否应该看看自己如何越过界限，从成年人倒退到青少年的领地。我们已经变得比他们更加不负责任。我们害怕变老 不愿变老 甚至不愿变成中年人。

难怪青少年会感到如此失落，因为他们从我们身上继承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看到的，只是表现狂和窥视狂，每个人都在追求别人的眼球，然而内心却是一片空虚。我们知道，青少年最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同时也最敏感。青春期是长身体的时期，“身体的各个部分在发育的时候并不是同步生长的，”劳伦斯·斯坦伯格说，“这……常使孩子们在外貌上显得笨拙和不协调。他们会因为身上某些部分长得过快而觉得尴尬。”

在青春期，内省、自我意识、理性化的倾向会日益增强。外貌对青少年一向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不过，今天的青少年可以在媒体上看到更多理想化的少男形象——电视系列剧里的青少年男主角、MTV 的歌星和舞星以及杂志封面上的少男照片。

男人曾把女人的抱怨和指责称作“唠叨”。那时他们大权在握，所以并不把女人的抱怨放在眼里。幽默漫画常把爱唠叨的老婆和母亲作为嘲笑的对象，男人们看了只是一笑了之。当然，女人们非常生气，但她们那时没有发言权。“行了，妈妈。”男孩常常不耐烦地回答母亲的唠叨。他学爸爸的样，表面上接受母亲的管教，但是，只要母亲一转身，他就像爸爸一样继续我行

我素。

在“坏”男人统治的社会和“好”女人控制的 家庭之间产生了一系列道德规范。这不是一个健康的道德体制，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它确实挺有效。

如今，女人已变得和男人一样“坏”。和男人不同的是，我们仍旧保留着把一切坏事都推到男人头上的权力。即使我们自己也有错，我们仍旧把错误的根源归咎于男人。这使许多男人，尤其是青春期的男孩，感到无所适从。面对女人们排炮般的攻击，他们只能拼命挣扎、保护自己。

男性，特别是青少年的犯罪率逐年上升，但是很少有人问个为什么。要是有人提出这同女权主义的负面效应有一定关系，那就会被人视为大逆不道。

所有的革命，包括妇女运动，都会造成一些混乱局面，但是那些习惯于把自己看作受害者的女权主义者却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她们继续没完没了地指责男人。也许成年男人可以从这种折磨中恢复过来，但青少年却很容易受到伤害。在 1960 年到 1992 年期间，15 岁到 19 岁的白人男性的自杀率上升了 212%，而女性只上升了 131%。

成年人为孩子们做出了什么样的榜样？我们整天忙忙碌碌，赚钱、结婚、离婚、购买越来越多的“东西”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婚姻破裂，夫妻分离，从社会、社区、到家庭，我们已经无章可循。青春是美丽的，但是，少男少女的形象却被广告商们肆意扭曲，大量地搬上广告牌和杂志封面；他们用青春偶像来煽动成年人的妒忌心，以便引诱他们购买更多的商品。

女权主义拒绝承认女性美的巨大力量以及它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与此同时，美貌却垄断了少男少女的生活。这使他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不错，追求美是人的本性，但是如今外表却成了压倒一切的东西。

“做个男子汉”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掩饰恐惧焦虑等真实情感，男孩们竭力在外表和穿着打扮上摆出一副孤傲冷漠的样子，而其他则迅速模仿他们发明的时尚。30年前，披头士的穿着打扮风行一时，年轻人不顾老一辈的反对纷纷流起了长发。报纸上出现了大量描写两代人为了儿子的长头发在理发店里争吵的漫画。今天，男孩们正竭力塑造一种新的形象，以便应对来自女性的巨大压力。为了掩盖内心的焦虑，他们不断创造出独特的服装、姿态、行为方式、走路的样子以及面部表情。他们会给自己戴上一副假面具。

生理学家保罗·埃克曼强调，即使戴着这样的假面具，真实的感情也会在瞬间流露出来。为了及时压制感情的流露，必须立即调动脸部肌肉作相反运动，例如，为了掩盖内心的喜悦，就必须紧闭正在咧开的嘴巴。

昨天晚上我在意大利《男人时尚》杂志上看到大约八幅青春期男孩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有整版大，上面的男孩大多半裸，只穿内衣。摄影师抓住了有些人脸上刻意做出的“酷”相，但有些却流露出一丝羞怯，显然，他们知道，薄薄的内裤遮不住他们的性器官。摄影师是斯蒂芬·迈泽尔，他也为卡尔文·克莱恩的促销广告拍摄穿着CK名牌内衣的半裸体青少年。

克莱恩和迈泽尔玩的是什么花招？这些照片对那些年轻的模特儿和窥视者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对此似乎难以作出明确的解释。

年轻人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对付如今大学校园里风行的女性同性恋。校园内外的“新潮女性同性恋”主要是“母权制女权主义”的产物，而不是男性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派生物。今天的年轻女士们不必依靠丈夫来养活她们，经济上的自由给她们带来了选择性伙伴的自由。“新经济”使女性同性恋成为时尚。

如今，女权主义教师们占领了全国各个大学的讲坛，她们常

常在男女学生面前把世界分为“他们”和“我们”两个对立的阵营。所谓“他们”是指“坏男人”，所谓“我们”则是道德高尚的女人；他们“是强奸者、性骚扰者”；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已故男性白人知识分子的作品在许多课上遭到排斥。有一个女权主义教师甚至要求把教室墙上挂的安格尔的裸体画拿掉。

“新潮”女性同性恋者们向社会宣布，她们根本就不需要男人。这无疑会使小伙子们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其实，许多校园女性同性恋者毕业后就结束同性恋，开始和异性建立关系。但是对男人来说，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转变角色却不那么容易。男人要么是同性恋者，要么是非同性恋者，而女人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两者之间跳来跳去。

男性同性恋是一种性关系，男人一旦认定自己是同性恋，就很难回心转意。女性同性恋追求的主要目标却是一种姐妹般的亲密关系。

校园女性同性恋关系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女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却持久不衰。男人们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干涉女人之间的事情似乎有损于男子汉形象。最近《华尔街邮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校园女性同性恋的文章，但是在我认识的男人中，没有一个人提起这件事。这篇文章援引一位校园女同性恋者的话：“我是这样看的：如今干什么都不容易，找工作不容易，要变得像父母那样成功更不容易。我们需要爱，如果我们因同性恋异性恋之类的标签而放弃享受爱的机会，那不是太愚蠢了吗？”

同一天，另一家报纸登了一篇关于一位男同性恋者被赶出军队的文章。这篇文章告诉年轻人，如果他们像上面提到的那些女同性恋者们那样行动的话，他们的职业前程就会受到损害。而女人则不必担这份心思。即使她们过去曾是同性恋者，男人们仍旧把她们看成女人。

亨利·比勒在《父亲的作用》这本书中指出，“你儿子和女孩

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他的男性气质，而这种气质的形成受到你和妻子以及其他女人的关系的影响……你的儿子还会观察你是怎样对待女人的性吸引力……如果父子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如果父亲对儿子不闻不问或者离家出走，那么儿子和女孩交往的时候就会缺乏信心，他和女孩或女人的关系就可能发生问题。”考虑到将近五分之二的美国家孩子不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我们有理由把父亲的缺席同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持枪的男孩到怀抱孩子的女孩——挂上钩。”

“我们常常纳闷，是什么造成青春期男孩的偷窃、抢劫和暴力行为，”专为青少年治病的心理学家珍妮·默伦说，“根子就在我们的文化。这种文化使孩子们觉得他们应该拥有各种东西。当男孩打开电视，他看到的是 120 美元一双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广告。他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穿 20 美元一双的鞋又觉得不入流。‘我一定要搞到 120 元的阿迪达斯，’他想，‘我有权拥有那双鞋和那件羽绒服。我只要用一枝枪对着那人的脸，他就会乖乖地把那双鞋让给我。’”卢梭描写过青春期的“道德冲突”。可是，如果没有成熟、理性和值得尊重的成年人来给年轻人做榜样，青少年如何才能理解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理想？

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从 1985 年到 1991 年，15 到 19 岁的男性青少年中被谋杀的人数增加了 154%。我们把这类社会问题都归咎于 70 年代毒品泛滥造成的后果。其实，问题的根子在我们心里。我们患了内心空虚症。不管这毛病是怎样发生的，是二次大战后的消费主义，50 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还是 80 年代对财富的疯狂追求，我们失去的是自我中最好的东西。为了掩盖内心的空虚，我们只能求助于花哨豪华的包装。

在水门事件发生的年代里，随着内疚和羞耻心的消失，诚实和善良也开始离开我们。在 80 年代早期我在早餐时从《迈阿

密信使报》上读到了许多暴露政府高级官员和工商界头面人物的欺骗和腐败行为的报道，可是没有一篇文章报道过他们辞职的消息。到了 80 年代末，我们对这些名人的厚颜无耻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已经习惯于他们光彩夺目的包装，至于里面包着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已不感兴趣。

今天，经常占据头版头条的，是一些默默无闻的男人或男孩，因为他们成了在杀害别人或自己时毫无顾忌的冷面杀手。如果国家和社会的领导阶层也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我们的文化还有多少值得信赖的东西？我们拿什么来证实自己的价值、判断自己和别人的行为？难怪有那么多人醉心于外表的包装，为了引人注目而不择手段。

“我是你童年时失去的父亲”

这是奥德修斯在离家 20 年后对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说的话。这句话多么简单，就像刻在墓碑上的铭文，漫长的 20 年就这样被一笔带过。我是在一张 1984 年的旧剪报上找到这句引语的。剪报上有诗人斯坦利·库尼茨的一段评论。他认为，比起俄狄浦斯神话来，“奥德修斯和他儿子重逢的故事对于 20 世纪的美国来说，意义更加重要……‘他们（父亲们）即使人在，他们的心却在黑暗中游荡……父亲们不仅在军队、工厂和商场，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迷失了方向。’”早在 50 年前库尼茨就在一首诗里写道：“‘父亲，’我呼唤，‘回来吧。你知道回家的路。’”

今天，男孩们到哪里去寻找值得他们尊敬和模仿的男子汉？谁能为他们指出一条既能成为真正的男人、又能赢得女孩芳心的道路？一年前，一连串名为“夺回夜晚”的示威活动在大学校园里风靡一时。在埃伦·戈德曼的专栏文章中，有一篇标题为：

“女人要安全 那就想办法赶走男人吧。”

难怪男孩们要模仿“九英寸指甲”演唱组里的特伦特·雷兹诺的样子。他的唱片在 1994 年高居排行榜第二位。男孩们不一定全盘照搬雷兹诺的黑头发、黑衣服和苍白的肤色，但是他的歌词以及歌曲中所表达的态度却代表了一代年轻人。他在歌中表现发狂、自杀、毫无目的的生活、痛苦的现实、疯狂的人群 不论在形象还是在内容上，他都反映了年轻一代的感情。

我们的时代是拒绝成熟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出一代新的弗兰肯斯坦，他的步伐歪歪斜斜，他的打扮华丽而俗气，他的举止粗野狂暴，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自己的亲爸爸。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本质上是好人，他有超人的智力，也渴望爱。可是，他的父亲离开了他。因为面目丑陋，他命里注定得不到爱，于是他就把满腔怨恨发泄到周围所有的人身上。雪莱生活在 19 世纪政治、社会和经济激烈动荡的时代，她创造的这个怪物是时代的产物。弗兰肯斯坦是个古典浪漫主义者，他只是在遭受了许多不公平、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诉诸暴力。

如果男孩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如果他从来就没有感受过父亲的爱，那他的一生都会受到影响。为什么母亲要离开父亲？为什么女人要如此厌恶男人？既然他不可能变成女人，那么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错，有些男人放弃做父亲的责任，遗弃自己的孩子。他们理应受到惩罚。但是我也谴责那些在怀孕阶段就故意剥夺孩子父亲的女人。有意选择用人工授精办法来生孩子是非常自私的行为。迄今为止，大多数男人们仍旧对此保持沉默，但这种现象肯定和近几年中男性暴力行为的增加有关。如果我们在繁殖人类后代的过程中不再需要男人，他们就会成为多余的人，并且像多余的人那样行动。

精神病专家弗兰克·皮特曼说，如果没有父亲的男孩碰上

没有父亲的女孩，“女孩多半会选择那些野性十足、极具诱惑力的男孩。”

在罗伯特·布莱的畅销书《铁人约翰》里，女人势力的不断膨胀迫使成年男子采取行动帮助年轻一代。他们用集体仪式来增强男性的凝聚力，恢复失去的男子汉气概。可教育家兼作家玛丽娜·瓦那对此评论说，“我觉得布莱设想的方案是行不通的。他那可怕的大男子气概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形成的：男女相互之间对性的害怕和厌恶、男人对女性控制下的家庭的蔑视以及过分强调进攻性作为英雄主义和权力的特征，而这一切，会在男女之间形成一条很大的鸿沟……相反，如果两性之间的对立能够得到缓解而不是强化，那么父亲在家庭中的存在就会减轻男性性格中危险的一面。”不管怎样，男孩需要更多地和男人在一起。

今天，青春期男孩从电影、电视、漫画书、电子游戏以及新的现代神话和童话里学习如何做个男子汉。这些男子汉是什么样的人呢？瓦那认为，“人们相信，年轻男子的特点是进攻性——包括性暴力，这种偏见造成了对男人的恐惧。”今天，人们已不再相信巫婆和恶魔，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对男人的迷恋和担心……男孩所受的教育旨在防止他们（像古老的神话和童话故事里所描写的那样）成为诡计多端的骗子或足智多谋的恶作剧者，防止他们学会诱惑，学会玩弄计谋、伪装和骗术。他们从小就玩动作英雄和星球大战之类的游戏；他们学做少年忍者神龟、社会改革斗士、警戒行动者、战士……当然，我不是说骗子比战士或诚实的男人好；我说的是一种趋势，即通过表现超人的体魄和力量的视觉形象，而不是语言和思维的敏捷来体现男性身份。”

调查结果证明，犯人改造所里将近四分之三的少年罪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这类家庭的孩子也更容易中途退学。单身

母亲既要当妈，又要当爹，当然很不容易。不幸的是，她干得越成功，儿子和她之间的隔阂就越大，因为母亲的所作所为使他觉得，女人根本就不需要男人。相反，如果父亲在儿子出生后就积极参与孩子的抚养，父子双方都会从这种关系中得益。格卢克对波士顿地区的 240 个父亲和他们的孩子作了长达 40 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父亲积极参与对孩子的抚养不仅有利于儿子语言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父亲自己在事业上的发展、婚姻的稳定和中年生活的幸福。

如果有父亲的参与，男孩就不会把母亲看成对他的生活拥有绝对控制权的惟一主宰，他也不需要使尽浑身解数来摆脱她的控制和确立自己的男性身份。

对男孩来说，摆脱母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男孩变得粗暴好斗，喜欢自吹自擂、虚张声势。如果做父亲的一开始就让儿子看到，男人不仅刚强，而且温柔体贴，情况也许就会大不一样。如果儿子一开始就认同父亲，他就不会感到自己的男性身份受到女性权力的威胁，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不需要用极端的方式来强化自己的男性身份。

到了青春期，男孩也许会更加尊重、欣赏和理解女孩，更加懂得如何去爱。他会更加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不是设法保持距离，依靠《花花公子》杂志里的美女照片将女人变成纯粹的客体。我认为除了父亲，没有人能够培养出这样的男孩。

心理学家沃伦·法雷尔指出在童年时代男孩和女孩在感情的表露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青春期的到来……促使美国男孩……避免感情的流露。”容貌美丽的女孩成为“天生名流”。男孩子们竞相追求这些女孩，得到她们就意味着拥有某种特权。这不仅对女孩，而且对男孩形成压力。法雷尔认为，“这大大增加了自杀的可能性。”

如今，冷酷无情的男人似乎成了男性的原型。小男孩们最

喜欢的电子游戏和电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想像的世界，一个基本上没有女人的世界。他们在这里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分离和疏远的感觉，这使他们无法理解女孩的需要。

根据格卢克的研究，“如果父亲不仅一开始就为儿子提供有力的社会交往和感情方面的支持，而且在儿子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对他的学业和智力发展也提供有力的支持，那么，孩子就能受到更加全面的教育。”

这项研究在三个关键领域里衡量父母对孩子的支持——社会/感情、身体/运动、智力/学业。研究发现 在男孩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积极参与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父子之间是否会产生竞争意识？儿子在运动或智力方面的成就，以及他那年轻的身体对女人的强大吸引力会不会引起父亲的妒忌？尤其是今天，谁也无法否认男性美正在成为时尚的主流。

为什么男作家很少描写青春期男孩的梦想？也许他们觉得男人不该沉湎于过去的回忆，也许他们不愿挖掘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也许男人觉得年轻人受点儿磨难是应该的。在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俄亥俄州的温斯堡》中有一段关于青春期男孩乔治·威拉德的出色描写。母亲去世后，乔治意识到，童年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在每个男孩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时刻，这是他第一次在人生之路上往回看。也许就是在这—刻，他从童年跨入男人的世界。男孩走在小镇的街上，他想到将来，想像自己在那个世界里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心里燃烧着期望和悔恨。突然间，他在一棵树下停了下来，好像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往事像鬼魂—样悄悄地进入他的意识

个声音好像在向他低声诉说人生的局限。未来开始变得

渺茫。如果他是个喜欢想像的男孩，他就会看到无数的人在他前面行走，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走完人生的道路，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感到一阵看破红尘的悲哀。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仿佛看到自己像一片落叶随风飘过乡间的小路。他知道，尽管他的同伴说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他只能在一个变换不定的世界里生活和死亡，就像一片随风飘的树叶，就像一棵命里注定要在烈日下枯萎的玉米。他有点儿发抖，立刻急切地朝四周观望。18年的生命就像过眼烟云，在人类漫长的里程中，18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他已经听到了死亡的呼唤。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能走近一个活生生的人，摸摸他，也让那人摸摸自己。如果他希望对方是个女人，那是因为他相信女人很温柔，她会理解他。他最渴望的就是理解。

人生最基本的感情是信任和乐观，我就是怀着这些感情离开家乡去上大学的。那里的男孩也和我一样，我们都有那样的表情。不错，我们也有乔治那样的失落感，但是我们更期待能够找到称心如意的配偶。今天的青少年很难感受到那份乐观。他们的父母脸上流露出普遍的忧虑，他们需要为生活水平的下降作准备——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至于两性之间的相互理解，只要看看校园里普遍存在的男女之间的隔阂，就很难对此抱多少希望。

精神病专家彼德·布洛斯写道，“当男孩告别青春期的时候，他会觉得童年时代对未来的无限希望逐渐被现实、被有限的机会和目标所替代；与此同时，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以及自信心的确立使自我实现成为可能。这就是诗人所揭示的人类青春期的处境。”

第六章 女权主义与美貌

“身穿夏装的女孩”

60年代是单身女子的黄金时代。那是性解放的时代，是男人和女人快乐地和平共处的时代。避孕药的出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它给女人带来了更多的独立。

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这种情绪在肯尼迪时代达到了顶峰，而他的死则带走了一代人对新世界的梦想。直到1963年肯尼迪被暗杀，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在他身上寄托了多么大的期望。我们像失去父亲的孩子，因希望破灭而感到痛苦和愤怒。于是，各种各样的革命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嬉皮士反主流文化、麻醉品等等。

肯尼迪是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他是少女们梦中的王子、男孩们眼里的榜样。我们把他视为卢梭笔下的道德典范；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自己的未来。可惜他抛弃了我们，就像抛弃孩子远走高飞的父亲。难怪他死后年轻人会爆发出如此强烈的愤怒。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其他国家都比我们老得多，他们已经饱经沧桑、受尽苦难，精疲力竭。在他们眼里，美国人就像宠坏了的富家孩子，大手大脚，肆意挥霍祖先的遗产。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失去了爸爸，肯尼迪的死使我们失去了一代人的自我形象。

我是在席卷六七十年代的革命风波到来之前来到纽约的。那时，在我居住的上曼哈顿，一切都保留着很久以前的样子。在那些老纽约的家里，成年人和他们的上一代没有什么不同，从照片上看，他们只是在服装的式样上有所改变。起初，我也属于这个世界 它是 50年代的继续。我很幸运能有这段经历，因为它至今仍是我衡量 60年代以来所有社会变化的参照依据。

我是在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中长大的。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有一副好牙齿，有固定的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具有典型圣公会教徒的温文尔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谈吐彬彬有礼。风度和礼貌在那时是绝对重要的东西，对此我至今仍念念不忘。女人历来是礼仪的掌门人，可是后来，我们放弃了这一角色。我们开始大骂那些彬彬有礼地为我们开门和让座的男人，而男人也开始用一种令人讨厌的目光来看我们。“好吧，泼妇 既然你不喜欢以礼相待 那么我爱怎么看你就怎么看！我不是说女人应该对眼下这个不讲礼貌的社会负责，而是想指出革命留下的一些后遗症。

在 6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纽约仍旧显得无忧无虑。我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在上东城租了一套公寓。我们三个都是处女。我们的卧室里有三张大床，一个衣橱，公寓里还提供一种电话服务，它能识别出不受欢迎的男人的声音。格里斯特德食品公司把我们订购的食品送到后楼梯的平台上，公寓的大门口还有管门人。那时还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汽车、噪音和垃圾。店里卖白手套的柜台生意兴旺。

我和我的室友都在起劲地谈恋爱，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直

到我们全都失去了童贞。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用子宫帽，所以迟早会有人怀孕。终于，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陪着漂亮的室友走到第二大街的街角，流着泪看她驾车去做堕胎手术。不久以后她就嫁人了。

虽然我在挑选男友时比较谨慎，但是一上床我就变得身不由主。经过一夜浪漫，男人总是像吃了补药一样精神焕发地去干活，而我却像喝了迷魂汤，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想干，这种状态一直要持续到他再次来电话、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50和60年代，东区的女孩们懂得如何避免竞争。在穿着打扮上，我们避免太招摇；在吸引男友的时候，我们避免大张旗鼓。男人看重女人的美貌，但他们并不想要太具诱惑力的女人。身边有个美丽的花瓶当然可以显示男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但是一旦这个女人成了他的老婆，他就要求她当个老老实实的贤妻良母。没有一个忙于工作的男人喜欢忍受妒忌的煎熬。

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传统的男人并不怎么担心家里的女人。女人们相互监视，不让她们中间的任何人占据别人的份额。在性解放到来之前，好女孩和坏女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好莱坞尤其精于此道，单凭性感外表就能把两种女人分得一清二楚。一边是多丽斯·戴，另一边则是玛丽莲·梦露。人们可以从衣着、化妆、头发、鞋子以及看人的方式上判断一个女孩属于哪一种类型。

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莫过于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宣誓。那天天下着雪，肯尼迪和戴着筒状女帽的漂亮妻子杰基一起走过宾夕法尼亚大街。那是美国梦最辉煌的一刻。他们两人都那样漂亮，一个英俊潇洒，另一个温柔美丽；他的豪言壮语表达了美国人最崇高的理想，而她则出色地扮演了一个好妻子的角色。这就是她的责任：“照顾好我那当总统的丈夫。”至于肯尼迪的风流

韵事以及肯尼迪家族同黑社会犯罪活动的关系，这一切都显得无关紧要。我们需要维护他们的美好形象，为的是保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当杰基在 1994 年去世的时候，全国各地——不，世界各地的人都像她丈夫死的时候那样悲哀。我们再次怀着怀旧的感情呆呆地凝视着那些老照片。他们的神态和样子在我们心里重新唤起那失去的乐观和理想。我们想念那神态、样子和感觉，至于其中有多少虚假的成分，我们并不在乎。

每当我试图回想对 60 年代初纽约第五大街的印象时，我总是想起欧文·肖的短篇小说《身穿夏装的女孩》。这个标题勾起我在年轻时对纽约生活的想像：夏天悄悄来临，大街上，穿着薄薄的布鲁克斯兄弟西装的男人和身穿浅色连衫裙的漂亮女郎在一起溜达。其实，肖的短篇小说是 1939 年发表的，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格林威治村。看来，记忆常常和想像混为一体。不过，有些事情发生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女孩什么时候开始不穿内衣、改穿超短裙；“好女孩”什么时候变成“新女性”；女士们什么时候开始自负盈亏、在两性关系上主动出击。

杰克斯裤子和扭摆舞

我初到纽约的时候穿着打扮和大学时代没什么两样，但是我的运气却大不相同。在北方，人们看我的眼光和南方大不一样。也许这里的男人个子比南方高，也许我身上有某种他们喜欢但我自己却没有发现的东西。不知为什么，读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和哈佛学生的第一次联谊会上，一位英俊的哈佛男生就穿过人群向我走来。我站在那里，装出一副笑脸，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他是体育明星、女孩们眼中的英雄，他那褐紫红色的运动

衫上有一个巨大的“H”。

没想到，我在两性关系上比他老练得多。我已经习惯于长达几小时的亲吻和搂抱，还知道怎样对付南方小伙子的大胆进攻。这位白马王子却不同，他是在寒冷的气候中长大的。我失望地发现，和他在一起时，我的热度比他还高。第二年，当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已经对他没兴趣了。看来，除了一张漂亮的脸，女人还希望从男人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他使我发现，我对男人挺有吸引力。而且我还意识到，应该大胆显示我的个人喜好。不管怎么说，我开始寻找紧身连衣裙。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为了引人注目，表现欲开始在我的生活中占上风。虽然我那时还是处女，但我已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的真实面目表现出来。

初到纽约时，我认识的纽约女孩们在穿着上还是挺规矩的。我们都继承了母亲的衣钵，在穿着上讲究得体，衣服和鞋子都要适合自己的身份，要买那种至少可以穿上几年的“好衣服”。冬天的衣服都放在干洗店里，准备下个冬天再穿，必要时增加一两件新衣服。母亲从小就是这样教我们的。迪奥的新时尚也许在1951年就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但是在查尔斯顿“我们这个阶层”的大多数女人仍旧穿得规规矩矩。

在纽约，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后就去萨克斯和伯格多尔夫·古德曼。我在这些高档服装店里转来转去，寻找能够真正显示“我”的衣服。可是当那位彬彬有礼的营业员走过来时，我却说不出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后来，我在第五大道附近的第五十七街发现了杰克斯服装店，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伯格多尔夫的淑女服不合我的胃口。看来，我对时装真是太无知了。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体型，从来不懂得欣赏自己。直到穿上杰克斯裤子站在镜子前，我才发现自己的迷人之处。

在普奇和库雷热品牌以及超短裙尚未风靡的时候，杰克斯

裤子已经发出了性解放的信号。新的时尚，如细长的羊毛紧身衣和方格布紧身裙子，使匀称的臀部和长长的腿显得格外迷人。对有些女人来说，杰克斯裤子是她们人生的开端，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穿着杰克斯裤子在薄荷酒吧跳扭摆舞真是一大享受，性感的音乐配上性感的打扮，真是绝妙的结合。跳扭摆舞绝不能穿得规规矩矩。当然，并不是所有早年得不到关注的孩子长大后都会变成表现狂，但是不可否认，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就是别人关注的目光，而超短、紧身、透明的时装就是引人注目的手段之一。

我60年代初的那些情人同大学里规规矩矩的男同学很不一样。也许我这样做是有意背叛母亲；也许我想模仿帕特姨妈，进入建筑师、画家和音乐家的圈子。和她们不同的是，我没有结婚的打算，更不用说做妈妈了。结婚和生孩子就意味着到此为止，而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对我来说，纽约是女人的天堂。从住宅区到市中心，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一个女孩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和各种不同的男人在一起。而男人则有比较固定的社交圈，通常都和他们的职业相关。他们喜欢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不论是金融界、广告界，还是音乐界和艺术界，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包括演说、服装、专业知识等等。在社交方面，他们很少脱离自己的专业圈子。格林威治村的人不会出现在上东区的社交场合，华尔街的那伙人也不会去光顾西区电影人的阁楼。

可是女人就不同了！她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陪着某个男人到一个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在那里，她会碰到一些她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人，这些人过着一种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生活，他们会谈论一些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话题，更重要的是，他们会用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眼光来看她。

我和大多数女孩不太一样：我是个来自体面家庭的体面女

孩，青春期成长受阻，处于半开化状态，就像童谣中的汉普蒂·邓普蒂，在摔得头破血流之后试图重新爬回墙上去。男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大学毕业后的新天地里，他们是我生活和学习的导师。尤其是我在西区和市中心遇到的男人，他们和我以前碰到过的哈佛和耶鲁大学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说话干事无所顾忌、率性而为，穿着打扮十分随意，好像从来不照镜子，在他们身上当然见不到布鲁克斯兄弟西装。他们的眼光无所畏惧，毫不掩饰他们对其他人的兴趣。他们不需要假面具，他们脸上的表情坦率真诚。

最有趣的是犹太人。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鼓励你说出来。当你试图表达自己从未说出过的想法时，他们总是仔细地听。他们喜欢辩论，喜欢放声大笑。那是响亮的、发自内心的笑声。幸亏我没有像其他“好女孩”那样作茧自缚，大学毕业后就忙着嫁人。在纽约，我仍旧是个无知的人，我要好好了解这个世界，我要像那些人一样，放松、自信、独立自主。我从这些男人身上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女人。

和情人外出的时候，一过第十四街，我就在汽车里穿上杰克斯裤子。第十四街是住宅区和中心区的分界线。在许多人眼里，住宅区是个极其乏味和令人窒息的地区，他们为自己从未到过那个地方而自豪。那些中心区的女杰们把我称作“住宅区的小妞”，言下之意：我穿得过于讲究。她们的信条是，穿得越少、越简单，越好。当然，少穿或不穿本身就是一种时尚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走在时代的前面，她们比性解放的主流先行了五分钟。她们非常熟悉哲学家诺曼·O.布朗和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的言论，她们主持的所有社交聚会都笼罩在大麻的烟云之中。墨斯卡灵和二甲-4-羟色胺磷酸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致幻剂。我没有参加集体做爱，这主要不是由于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害怕其他女人或男人抢走我的情人。

我之所以有勇气在这个陌生的神秘世界里闯荡，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外貌越来越有信心。虽然我相信自己聪明、机智、有社交风度，但是长期以来，我一直痛苦地看着别的女孩因美丽的容貌而倍受关注和宠爱。在纽约，我开始变得漂亮起来。穿着杰克斯裤子，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和西十三街的那些先锋派人物平起平坐。我容光焕发，伴随着不断增强的自信心，我的模样和神态也变得越来越性感。

有一天上午，9点左右，在沿着东五十四街向西走的时候，我在一个褐沙石的橱窗里看到一件鲜艳的橘红色丝绸衬衫和一条同样引人瞩目的紫红色裙子。我在外面一直等到那家时装店开门，然后进去一看，里面还有一件双面式上衣。就这样，我开始熟悉鲁迪·格恩赖克和高档时装，这就是说，我得开始存钱。当我终于穿上那件彩虹般的衣服，套上那条狭窄的裙子时，我觉得自己就像童话故事里所写的那样，彻底地变了样。也许你不相信衣服的色彩会有那么大的魔力，可是，考虑到性在确立一个人的身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格恩赖克的艳丽色彩和紧身式样确实成了我的标志。我的表现欲在这些衣服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年后，我又在格恩赖克发现了一条白色丝绸紧身无袖长裙，背部开了个大大的V，那个V如此之深，以至于无法在里面穿任何内衣。我那位当建筑师的男友送给我一条雪白的令人眼花缭乱羽毛披肩来配这条裙子。当我穿着这套行头在晚会上出现时，有位年纪比我大的女人对我说，“你以前曾是个漂亮姑娘。”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为外表而引起其他女人的妒忌。

又过了一年，1964年，格恩赖克推出时装史上第一件袒胸泳装。人们普遍认为，4年后在美国小姐选美大赛时发生的焚烧胸罩抗议活动促使女人抛弃了她们的胸罩。其实，应首先归功于格恩赖克的袒胸泳装以及那个令人难忘的模特儿。罗宾·

摩根在《强大的姐妹情谊》(1970)一书中指出“烧胸罩纯粹是媒体的炒作。”女人不一定都买格恩赖克袒胸泳装，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时代的象征。

如今，任何关于自由的言论已成了陈词滥调，但是在当时，对于我们这些初次尝到性自由的人来说，60年代初的大胆色彩和充满表现欲的时尚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东西。

我们抛弃了传统美，就像奴隶砸碎脖子上的锁链。我们废弃了以女人的美貌来换取男人钱财的古老契约。虽然我们当中还没有人读过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神秘》(1963)，可我们已经感觉到那种气氛。60年代出现的超短裙和无胸罩时尚意义深远。正如小说家汤姆·罗宾斯所写：

六七十年代有两样东西应该得到我们的承认：超短裙的闪亮登场和胸罩的悲壮殉难。风靡一时的超短裙和无胸罩象征了对性、文化、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各个领域传统约束的反抗。我们的文化被重新女性化。当无所顾忌的女人们系上那片又短又小的围腰布时……她们传达的就是这个信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超短裙和男人的齐腰长发一样直截了当……女人也许会参加反战和争取民权的运动，但是她们的穿着打扮却表明，没有任何重大事件或天灾人祸能使她们放弃追求时尚……打那以后，超短裙又多次卷土重来。但是我们都知道，时代不同了。

评论经常指出普鲁斯特如何用服装来表现人物的情感；同样，我们也赋予服装丰富的涵义，而服装也反过来为我们服务。在我书房的墙上贴满了过去4年里重新流行的旧时装式样，它们的涵义一点也没有改变。

60年代初的服装、音乐、艺术和舞蹈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形

形形色色的革命。在这个变动的时代，我渴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重新找回在青春期失去的口才。为了练习说话的技巧，我开始在社交场合寻找能够交谈的男人。我注意到，那些口才好、善于即兴演说的人通常都显得坦率自然。我一心想抛弃“好女孩”的刻板 and 循规蹈矩。男人在谈话时轻松自然的姿态使我看到，必须打通头脑和舌头之间的通道。这不是单纯的语言技巧问题，而是思想和言语的一致。并不是所有的男人一开口就妙语连珠，但他们无所顾忌，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并不是无限夸大重新培养说话能力的重要性，虽然这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是对我来说，这是重现找回自我的一个重要开端。我发现，最好的交谈者不一定是情人。那些年纪较大，经历丰富的人常常是最健谈的人。他们有的在缅甸生活过，有的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的为美国新闻署在国外导演过电影。那年头，许多人喜欢在酒吧聊天。记得有一次，我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家酒吧里和一位男士闲聊，我滔滔不绝、毫无顾忌地谈起某个问题。那位男士歪着头，更加仔细地注视着我，“你从哪儿学到这样好的口才？”他表现出强烈的赞赏和好奇心。我呢，则兴奋得脸发红。可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从 11 岁开始，为了做个标准的淑女，我就一直在压制自己。现在，我又重新开始找回失去的自我。

男人常常被描写成自私自利、只知道利用女人的恶棍。其实，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男人中的善人并不比女人少，男人中的恶棍也不比女人多。我之所以要如实描写我对 60 年代男士们的印象，是因为今天我仍旧用同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我常常回想起过去接触过的男人，他们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是情人，有的是我的老师。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两性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爱，是对艺术、音乐、书籍和烹调爱好，还有对建筑和木工活的迷恋。我也爱上了榔头和锯子的声音，要是

听不到这些声音，我就会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他们使我把眼界从书本扩大到现实生活，使我产生了写作的愿望。由于他们善意而慷慨的鼓励、帮助和赞扬，我才有勇气和毅力最终越过那些阻碍我自由发展的障碍。

喜爱男人的女人都知道，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改变。为了显示男子汉气质，他们很早就学会将感情封闭起来。然而长大后，他们最想要的，就是为情感起封、自由地宣泄自己的感情。我和过去的大多数情人都保持朋友关系，因为双方都觉得获益匪浅。

神奇胸罩和强力套装

在那风云突变的 60 年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外表来判断一个女孩。那些指望嫁个好丈夫的“好女孩”看上去都显得贞洁可爱，规规矩矩，给人一种放心的感觉。女人们知道如何为自己做广告，如何在婚姻交易中显示自己的价值：她们要让未来的追求者们看到她们温柔、随和、与世无争，是好母亲的材料。有了这样的妻子，男人们就能放心地到市场上去厮杀，为赚更多的钱而开展你死我活的搏斗。

为了赢得男人的保护以及享受他们的权势，女人精心地包装自己。“没有你，我就没法活！”这不仅是 50 年代电影中常见的台词，也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女人的真实感受。作为这笔交易的另一方，男人们则以一成不变的灰色法兰绒西装和沉重的黑皮鞋来显示他们的经济实力。为了得到这样的丈夫，女人们宁愿长期牺牲自己的独立、冒险机会、才能的发展特别是性生活的满足。

电影明星格利高里·派克和查尔顿·赫斯顿，对了，还有政界明星肯尼迪，都在外表上具备这类男人的特点。他们高大、坚

强、稳健有力。即使是那些外表不那么高大英俊的男人也能给依赖性强的女人带来安全感。离婚对女人来说多半是场灾难，因为大多数家庭妇女没有什么职业技能。不过，在那个时代人们并不轻易离婚，因为离婚也会损害男人的事业。公司喜欢雇佣忠于家庭的男人。直到 1970 年，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离婚丑闻还在底特律闹得满城风雨。为了美艳的女秘书，这位老总居然决定和自己的妻子离婚。那时，通奸对男人声誉的损害比离婚要小，做妻子的也能够容忍有外遇的丈夫。那些扮演第三者角色的女人通常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她们都十分性感。

我第一次和男人做爱之后，就立即对着镜子仔细查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我相信做爱会改变一个人的外貌，可是镜子里的我好像一点也没有改变。那些年里，我已经成为一个在性生活上相当活跃的单身女人。幸运的是，那正是性解放开始兴起的年代，因此我可以无所顾忌，率性而为。

我那些规规矩矩的女友们不喜欢我如此炫耀自己的性本能，但她们并不能阻止我。这是“无法控制的”正如《危险的恋情》中的男主角为自己辩护那样。不过，我也知道其中的风险。有时，在跳完一场疯狂的扭摆舞之后，我的舞伴会擦着额上的汗，微笑着对我的男友说：“她太诱人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男人不喜欢诱惑力十足的女人？那时我还不明白，即使是有钱有势的男人也害怕那些公开炫耀诱惑力的“坏女人”，因为娶了这样的女人就很可能做乌龟。一位事业有成的男人如果连自己身边的女人都管不住，那岂不是莫大的耻辱。

这一切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也许就像古代历史，其实上面说到的这些看法并没有完全消失。今天的女人也许会穿着内衣出去吃晚餐，男人也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炫耀男性美，但是男人在寻找配偶这件事上，最害怕的仍旧是做乌龟。大约 25% 的年轻男子仍旧希望自己的新娘是处女，这个百分比从首次统

计开始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好像是昨天吧，我读到来自一篇来自米兰的评论，那是关于明年冬季的男性时装。从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起，时装世界的旋转门就失去了控制。如今出现了一种叫做“强力装”的新款阿马尼男装，这种宽肩膀的上衣很像格利高里·派克在影片《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里穿的那件衣服。“男人为什么不能显示男性魅力？”阿马尼问。有人认为，促使男人追求形象魅力的是，“女性时尚肆无忌惮地大力推崇的女强人形象，这些女人戴着神奇胸罩、穿着细高跟鞋、披着毛皮披肩、在迪斯科舞厅里狂蹦乱跳。”这就是说，如果女人们如此变本加厉地炫耀她们的性感魅力，男人也有必要采取相应的行动。

“高耸的胸部其实是挂在女人脖子上的一块大石头，”杰曼·格里尔在1970年写道，“男人也许会喜欢她，他们也许会瞪大眼睛盯着她看，但是他们看到的其实不是她。”于是，60年代高耸的胸部成了女人遭受男人奴役的象征，神奇胸罩也在过去的30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今天，在女人们自己的要求下，它们又起死回生。

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外表和内心应该一致；言行不一的人常常会引起社会公愤。“她表面上真像个规规矩矩的女孩！”他看起来一点不像那种抛弃老婆孩子的男人！我们今天仍旧通过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时装之所以长盛不衰、花样翻新，原因就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内心到底还有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例如，对今天的男人来说，什么是男性特征或男子汉的品质？

只要看看“神奇胸罩”和“强力套装”就不难看出，在今天穿着昨天“解构”式套装的男人已无法和穿着六英寸细高跟的女人平起平坐。这种超级高跟鞋将女人的躯体变成一个迷人的S形，使人想起那些被好色的森林之神“占有”的裸体女人。同拥

有硕大的乳房和 S 形曲线的威力强大的女性形象相比，穿着松垮垮的解构式套装的男人看上去就像一群尚未发育成熟的男孩。当“神奇胸罩”出笼的时候，这条消息出现在报纸的新闻版而不是通常的时装专页上。真是不可思议，60 年代初，我不是也有几个这样的胸罩吗？只要在里面塞上两个垫子，就能使胸部变得大大的。

谢谢你，古特马赫医生

在那些年里，我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太容易坠入爱河了；我分不清爱和性之间的区别。当我的容貌变得漂亮起来时，爱和性的机会也成倍增长，危险也随之而来。

在纽约的第一年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我最怕的就是怀孕。每当月经来迟，我就紧张起来，不断地跑到卫生间里查看是否有血迹。可是，只要危机一过，冒险活动又重新开始。

虽然我在其他方面都非常聪明能干，但是在两性关系上却并非如此。我对生活有很多计划和美妙的梦想，但仍旧没有想到结婚和生孩子。我努力工作，按时付房租，从不往家里写信要钱。但是，只要和男人在一起，我的理智就不起作用了。

尽管糊涂，我还是挺幸运的，居然逃脱了怀孕的尴尬。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决定在我写的每一本书里鼓吹自慰的好处。如果有人早一点告诉我，自慰同样可以给人带来性高潮，那我就不会如此依赖男人。如果我知道，一个人可以自得其乐、成为自己性生活的主人，那我就不会如此轻易地屈服于男人的魔力。了解自己的性器官是建立自尊心不可缺少的一课。如果当时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会意识到，女人的性感魅力并不取决于时装店里买来的包装，而是她的身体。

我喜欢干有趣的、有头有尾的活，通常需要八九个月的紧张工作。赚到足够的房钱和交通费后，我就出国旅游，直到把钱花光。到了那时，我就回到纽约，重新找一份工作。我在舞厅和社交聚会上同各种各样的男人交往，不过从来不为找工作而出卖肉体。

我一向单独旅行，因为我从第一次欧洲行学到，男人通常不敢随便接近两个坐在一起的女人。那次欧洲行，我住的最后一个地方是巴黎的一家小旅馆。妓女和她们的嫖客常常光顾那里，夜里，他们常在狭窄的楼梯上打架。那地方很便宜。狭小的房间里有一个洗脸池，折凳上有个金属坐浴盆。我在那里读《丧钟为谁而鸣》；不看书的时候，我就把房间里的一切都画在素描本上。我一面吃花生酱，一面等待新的冒险。我在日记里写道，“我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

每天我都要到福布尔格-圣-奥诺雷街的艺术画廊去买招贴画。除了回家的旅费，我只有很少的钱，于是我就对他们说，我是一家小报的艺术评论家。晚上，我在酒吧里和男人们坐在一起，我们互相亲来亲去，有时热烈，有时不那么热烈。后来我花完了所有的钱，只好乘船回家，心里依旧“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

我迫切希望证实自己的魅力。我对那些对我感兴趣的男人报以微笑，我喜欢他们眼里燃烧着的欲火，并且开始在男人中间挑挑拣拣。我的性冒险越来越肆无忌惮。最后，我意识到，这样下去太危险了。终于，在一天上午，我走进了阿伦森医生的诊所。配子宫帽可不像买新鞋那样令人兴奋。当阿伦森医生用一枝铅笔指着一个人体模型，向我讲解生殖器官的构造时，我手里拿着那个难看的橡皮圆盘，眼睛却什么也不看。

如果我们没有把性欲看成是邪恶的东西，也许我们就会更理智地利用子宫帽，随身带着它，就像带着房门的钥匙那样。可

惜，我们做不到。我打心里讨厌它，鄙视它。我像当时和现在的许多年轻女子一样，在性生活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我们一方面渴望见面，和各种各样的男人做爱；可是一旦和男人有了这种关系，我们就变得像婴儿一样身不由主，完全无法控制自己。

我常喜欢独自一个人去参加社交聚会，这样我就可以在那里自由地试验我的魅力，然后和我喜欢的男人一起离开。我的眼睛自然而然地捕捉那最难猎取的目标——那些眼光大胆率直、对自己的性感魅力显示出高度自信的男人，那是我 13 岁时就梦寐以求却无法得到的男人。现在，我不仅准备和他们做爱，还知道如何引他们上钩。我知道这样的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她乐意和他做爱，这纯粹是因为她喜欢做爱，而不是因为她想把这种关系变成一根绳子，用它来拴住他的心或灵魂。这样的女人最能吸引男人。

但是对我来说，玩这种游戏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的内心深处，驱使我寻找这类男人的真正动力是对父亲的渴望。

在游戏的最初阶段 我总是占上风 直到对方的阴茎、嘴唇、舌头和手将我一次又一次带入性高潮。在黎明到来之前，我已经完全成了他的俘虏 我的全副身心 从头到脚、从里到外 都渴望和他融为一体。就是魔术大师霍迪尼也无法创造这样的奇迹。可惜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没有养成追求共生状态的习惯。

男人一定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身穿性感服装、大大咧咧摆出一副独立姿态的年轻女子在一夜狂欢之后，第二天早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

这种无法控制、难以摆脱的依恋使我感到恐惧和羞辱，它摧毁我的自信，把我变得像个苦苦哀求的叫花子；而他，幸运的王子，则成了我生活中压倒一切的追求。我整天守着电话机，等

待，祈祷，甚至连出门去买瓶花生酱都不敢。说不定他会在我外出的时候来电话？于是我只好忍饥挨饿。那种心情没有人比多萝西·帕克所描写的更为出色：

“上帝啊，请你让他现在就给我打电话吧。亲爱的上帝，让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吧。我再也不会向你提出任何其他要求了，绝对不会的。我只有这点小小的、小小的要求，上帝，这对你来说太容易了，你连小指头都用不着动一动。”

该死的乞求。女权运动应该帮助女人摆脱这种对共生状态的迷恋，教她们懂得爱和性之间的区别。首先，要使她们看到，问题的根子在于，在她们的幼年时代，她们和母亲没有实现健康的分离；成年之后，这种强烈的依赖心理又被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重新唤醒。如果我们不能在性生活中维护自己的独立，工作场所的机会平等又有多大意义？

我们再来看看避孕药的出现给女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避孕药比子宫帽更加安全，它不仅消除了怀孕的恐惧，而且排除了所有妨碍我们享受性高潮的东西。避孕药给我的性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我是个有性幻想的人。

小小的药片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在60年代，避孕药对于女人就像50年前第一部福特汽车对男人那样重要。它使我们摆脱受限制的生活，它为我们提供了自由行动的保障。有了它，我们女人开始在两性关系上主动进攻；我们主动接近男人，引诱他，这真是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是1963年。一天早上，我的情人抱怨，我那该死的子宫帽使他“非常不舒服”。“读读这个。”他递给我一篇文章。那是关于艾伦·古特马赫医生和一种新避孕药的报道。谢谢这位情人，避孕药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的金手镯上挂着一个可开关小地球，我把避孕药放在这

个小球里随身携带。有了这些药片，我走路的样子也神气多了。我的鞋后跟比以前更高，我的眼睛像猎人一样大胆地捕捉男人的目光，我要尝尝男人在猎取女人时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想摆脱被动，不再像彩票那样等着别人来挑，那你就必须主动出击。

“避孕药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将受孕和性行为分离开来，”艾伦·古特马赫研究所主任珍妮·罗索夫说，“根据我们的经验，避孕方式和性交行为离得越远，效果就越好。”我要说的是，避孕药不仅仅和避孕有关；事后想来，它还影响到我对自己的看法，它使我觉得自己成了性生活的主人。

最重要的不是避孕药的化学成分，而是它消除了女人很早就开始形成的对性的刻板态度，消除了我们身体、感情和思想上的焦虑。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虽然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和理解。不过我一向认为性欲就是一种能量，有足够的能量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在夏天的晚上，穿着又轻又薄的海绿色普奇连衫裙在大街上走是多么令人兴奋。裙子里面，我只穿丝袜和吊袜束腰带。要是男人没有盯着我看，我一定会非常失望。我的所有装束都是为了引人瞩目，我觉得自己吸引了所有男人的眼球，在他们心里煽起阵阵热浪。

从四十八街往东就是我们下班后聚会的酒吧。在那里，我这只青春期的丑小鸭终于告别了帆船俱乐部的屈辱，变成了一只天鹅。每天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不管我在哪里，和什么样的男人在一起，我都要打开手镯上的小球，吞下一片避孕药。然后我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去主动接近我喜欢的男人。我抓住一切机会，充分享受避孕药给我带来的充满刺激的生活。

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避孕药的时代意义。伴随着音乐、舞蹈、服装以及弥漫在空气中的革命气息，性解放是60年代时代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避孕药就是性解放先锋们的

护身符。

避孕药使女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性自由。有了避孕药，女人就能摆脱父权和母权的束缚。现在，惟一能捆住女人手脚的不是男人，而是其他女人。“好女孩”的道德规范并不是男人为了控制女人而想出来的，而是女人在那资源紧缺的年代为了相互限制而建立的：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男人，谁也不许比别人多得一个。可是，今非昔比，今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最需要的，是用相互支持来代替相互限制。只有当女人们能够让自己周围的其他女人都享受性自由，避孕药或其他形式的避孕手段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大约十来年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已接近这个目标。我有时觉得，今天的时装设计师们想在复旧款式中重新表现出来的，就是60年代的乐观。许多人相信，平等的两性关系将导致真正的男女平等，就像一对舞伴，各自都可以采取主动，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革命的扮相

60年代是风云突变的年代，我们很难将那些五花八门的革命清楚地区分开来。人们陶醉在革命的狂热之中，各自都把自己的运动看成是最崇高的事业。如果把电视的音响关掉，你就无法知道屏幕上的抗议者们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反战游行者、民权运动大进军者、女权主义者、嬉皮士还是其他尚未命名的革命狂热分子。美利坚大地是一片牛仔裤、T恤衫、靴子、长头发、马尾辫和非洲式发型。如果不是从侧面看，有时很难分清女人和男人。革命者们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竭力为自己打造一种反传统的外表。

尽管如此，传统的生活方式依然存在。60年代的巨大变化最终将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但是在最初的那些年里，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并没有卷入那些上了电视屏幕的事件。他们对性解放毫无兴趣，他们对反主流文化占据如此多的电视频道感到愤怒。嬉皮士、“花童”、1964年的伯克莱学生静坐示威、“杰斐逊飞机”的摇滚音乐、波普艺术发起人安迪·沃霍尔的奇谈怪论“将来每个人都会出名十五分钟”）——新闻媒体对这些事件着了迷，所有的镜头都聚焦于反主流派的喧嚣与骚动，而美国社会的主流则像雾里看花，摸不着头脑。这正是反主流派试图造成的局面。如果你不是我们的人，那就靠边站。圈内圈外，历来如此。

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反战示威者在国旗上啐唾沫、公开嘲笑到越南去打仗的士兵时，那些把自己看成正宗美国人的旁观者们会怒气冲天。同样使他们愤怒的是，他们的孩子正迷恋于披头士音乐和他们的发型以及最新出笼的迷你裙。一些和“美国传统”不相容的东西正在全国蔓延，那些不喜欢这些变化的人则被排斥在时代潮流之外。这在美国社会中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分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女性也加入了“沉默的大多数”。她们和其他遭排斥的人一样，憋着一肚子的怨气。风靡一时的新女权主义不仅诋毁她们的价值观，而且将她们一笔勾销。六七十年代的反抗运动此起彼伏、相互重叠，造反者们成了时代英雄，而那些被排斥在潮流之外的人则无处表达他们的愤怒和反感。就我所知，没有人写过一本对他们的感情表示同情的书。我这里指的不仅是老一辈，还包括许多二十来岁的人：那些自己决定到越南去打仗的年轻人、那些选择结婚和在家相夫教子的女孩。这些传统主义者中的许多人形成了今天共和党右翼的基础。

如果你没有亲眼目睹 1963 年学生非暴力行动委员会

(SNCC)组织的马里兰抗议示威、1965年的瓦茨种族暴乱、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的流血冲突和1969年的五角大楼游行示威。如果你没有唱抗议歌曲、穿奇装异服、吸迷幻药。如果你错过了这一切，你也许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风靡一时的东西会在今天的电视连续剧、电影、音乐特别是滚动变换的时尚潮流中卷土重来。就是我这样的过来人也感到困惑不解。

就在我写此书的时候，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回顾展闪亮登场。我还记得当年《帝国》首次放映的情景。我们从放映厅缓步走到楼厅，一面吸着大麻烟，一面往下看风景，直到安迪出现在我们中间。可是，这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作品。如果你想理解波普艺术的奥妙，就必须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你对他们的作品提出疑问，那就说明你是门外汉，只配靠边站。不管怎样，空洞无物也好，意义深远也好，安迪·沃霍尔又回来了。不仅他的电影又开始走红，而且他那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也一个接着一个在报纸和杂志的长篇访谈录中重新出头露面。30年过去了，他们已显得衰老和枯竭。为什么那些记者要把这些老古董重新挖出来呢？我想，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也许和时装界的复旧热差不多。时装设计师们正在推出60年代时尚的新翻版：库雷热超短裙，沃霍尔的超级明星伊迪·塞奇威克穿的穷小子紧身套衫。

我赞同马歇尔·麦克卢汉全球传播中心主任纳尔逊·塞尔的观点：“服装是皮肤的延伸，就像榔头是手的延伸。”服装也是感情的延伸，包括那些潜意识里的感情。六七十年代的服装都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不是反时装，就是反传统、反越战、反种族隔离、反物质至上。那时的服装是用来表达某种政治观点，今天的服装却是为了引人注目。

我们想从那段历史中寻找什么？对于我来说，我想找出一些线索，我想搞清楚为什么人们要把今天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

60年代发生的事情。

在一篇针对 1995 年沃霍尔电影回顾展的评论中，评论家斯蒂芬·霍尔登写道，“贯穿沃霍尔影片的是一种美学，一种冷漠的窥视癖……影片一再使人感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些内心世界贫乏、为了赢得别人的注意而不惜任何代价的人……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沃霍尔影片中的超级明星视为电视脱口秀的先驱，像他们一样，许许多多的无名小卒都迫切地在脱口秀中暴露自己最隐蔽的隐私。”

我们应该把大街上那些穿着半裸体的服装招摇过市的人也包括进去。像那些参加脱口秀的人一样，为了捕捉陌生人的眼球，她们迫不及待地暴露自己身上“最隐蔽的”地方。可惜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未来的窥视者们已经看厌了所有的东西。要使他们眼睛发亮、大吃一惊，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沃霍尔本人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的天才是发现社会空虚的内核以及人对社会关注的渴望。他的影片揭示那些为了获得别人的注意什么事都敢干、什么秘密都敢暴露的人。他是制作现代童话故事的大师，他使演员们相信，影片里所有的裸体镜头和肆无忌惮的性行为都有深刻的涵义；他还使观众相信，他所有的电影和绘画都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他对女人的鞋子和玩具有强烈的兴趣，他的笔记本里画满了鞋子，他还收藏了一大堆古色古香的玩具。在我看来，这一定和他婴儿时期的经历有关。他的才能在于，他能够在任何人身上发现他自己心里的空虚，并能利用这些发现来为自己服务。

在六七十年代，许多人走得太远，有的由于过分放纵而送了命，但是更多的抗议者和反主流文化者后来却变得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有钱、有名或保守。我的朋友乔安娜在 1968 年因为热衷于各种造反行为在监牢里呆了好几夜，15 年后，她居然成了华

尔街一家大公司的副总裁。1990年，她辞职回家当起了全职妈妈并开始在家里工作。今天，她和小女儿穿起了款式相同的母女装。

那年头，我们一周要参加好几次不同的游行，所以许多人的衣橱里都挂着不同类型的衣服。我的朋友凯特开始在格罗夫出版社工作，该公司出版过“垮掉的一代”干将威廉斯·伯勒斯的《裸体午餐》。她后来又跳到兰登出版社，该公司出版了民权运动积极分子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反战积极分子阿比·霍夫曼和学生领袖汤姆·海登的书。凯特清楚地回忆起我们当时的穿着打扮：“我的壁橱里塞满了短裤和性感的裙子，还有破破烂烂的牛仔喇叭裤、系在腿上的小围巾以及那些皱巴巴的T恤衫。我去参加中央公园集会的时候就穿着它们，而且不戴胸罩。”我提醒她，有天晚上，当我们准备去参加一个集会的时候，有个朋友的父亲吃惊地打量着我们。他用手捧着凯特漂亮的脸蛋说，“你会倒霉的漂亮姑娘。”想起这些，我们都大笑起来。我们这样穿是为了颠覆旧世界吗？才不是呢，凯特说：“性才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每个人都在做爱。我们都吃避孕药。不管是游行还是跳舞，我们都不忘做爱。”

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一面大张旗鼓地反对梳妆打扮，一面却炮制出自己独特的行头。就拿崇尚裸体、迷幻药和性放纵的“嬉皮士”和“花童”来说，他们一面大声歌唱自由和“我行我素”，一面把长头发、救世军的旧制服等等变成集团成员不可缺少的行头。

60年代后期，我和一个摄影小组来到旧金山的嬉皮士大本营海特-阿什伯里。我看到有的人因为打扮得不对劲而被赶出嬉皮士聚会。在那种场合，你可以穿旧衣服、破衣服、脏衣服，或者拿条毯子裹在身上，但是绝对不能穿得像“他们”（中产阶级主流派）。这条规矩的约束力丝毫不亚于老爸老妈乡村俱乐部里

的陈规陋习。用蒂莫西·利里的话来说，“60年代本质上是一种平民主义运动，不过，嬉皮士的那套服装规范比西点军校和富豪聚居的纽约公园大道那些地方还要严格。”

1967年的秋天，一天晚上迈克尔·巴特勒打电话请我到市中心的约瑟夫·帕普剧院去看音乐剧《长发》。迈克尔给了我在新约的第一份工作。当时我从未写过一篇文章，更不用说编辑杂志了，不过迈克尔不加思考就让我当上了一份名为《阳光之岛》杂志的编辑。《长发》大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迈克尔，从那天夜里起，他就再也不穿笔挺的西装了。

《长发》在百老汇首演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这伙人聚集在格林威治村的凯西餐馆。该剧的导演和舞台监督同意，让每个演员自己来决定是否在第一幕即将结束的时候赤身裸体从油布下面钻出来。首演之夜，当演员们一丝不挂出现在百老汇舞台上时，全场观众目瞪口呆。第二天早上，戏剧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兴奋地写道：“新鲜，坦率……十分可爱……在一片汗臭和花香以及热恋的喘息声中，昨夜演出的摇滚音乐剧成功地完成了从中心区迪斯科舞厅开始的长途跋涉……多么新奇，多么新鲜，多么自然……”

《长发》成了戏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有一个时期，世界各地上演该剧的剧团达到创纪录的二十一个。更重要的是，《长发》把同性恋、迷幻药、越战、种族歧视、性解放等极具争议的社会问题带进了流行音乐。裸体和长发并不纯粹是制造轰动效应的把戏。时隔30年，该剧的主题并没有过时。在一个缺乏道德和理智的时代，《长发》把裸体搬上了百老汇舞台，其目的就是为剥去我们身上华而不实的包装，还人以本来面目。

《长发》自称“部落爱情摇滚乐”。其实尽管大家嘴里都在高喊“和平和爱”可这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预言。《长发》派像沃霍尔和其他风靡一时的反主流派别一样，具有颇强的

排他性。

我喜欢 60 年代，但是我也记得在形形色色的小团体中，“自己人”对其他人的冷漠和轻蔑。这种情况类似于女孩之间或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和恋母情节有点相似。这说明，战后富裕社会中长大的一代还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以爱为基础的社会。

60 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令人沮丧的风气，人们开始热衷于佩戴别人的名字或别人名字的首字母。有一天，我一进萨克斯第五大道服装店就看到一大群人挤在伊夫·圣·劳伦特围巾柜台前，疯狂抢购漂亮的丝绸大方巾。那丝巾确实很可爱，可惜上面到处都是“YSL”三个字母组成的图案。为什么要花几百美元把人家的名字裹在自己身上？这跟买条印着别人签名的被单有什么两样？没多久，就连 T 恤衫上都印上了某个人的首字母。

在此之前，我只在姨婆携带的路易斯·维东箱包上见过“LV”这两个首字母。今天，这种以前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箱包到处都是，就连小秘书也会用省下来的钱买个维东购物袋提着上街出出风头。与此同时，维东箱包的质量也越来越差；利润率已经代替产品的档次成为追求的目标。首字母成了产品的象征，要是埃梅斯·古驰或拉尔夫·洛朗的袜子或衬衣上没有清晰可辨的首字母，顾客就会觉得上了大当。其实，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那些字母到底是什么意思。

人们都热衷于成为“圈内人”，拥有某种身份，把自己想像成重要人物；他们刚买下某个名牌商品，就迫不及待地摆出一副超然离群的傲慢姿态，忘记了自己不久前还是个“圈外人”。只要一接触别人羡慕的眼光，他们就陶醉在飘飘然的感觉之中。

正如约翰·伯格所说，“被人羡慕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事情……它给人带来一种单独的自信和安全感。你绝不能和那些羡慕你的人分享你的经验。当别人注意你、对你感兴趣的时候，

你绝不能表现出同样的兴趣，不然的话，别人对你的羡慕就会降温……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偶像式人物或名流都喜欢做出一种心不在焉的样子。为了维护他们头上的光环，他们的眼睛总是看着人群上方的那片空白。”

60年代的革命风暴把许多传统的价值观扫地出门。狂飙过后，尘埃落定。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人开始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填补了以前的空虚。女权主义者曾把男士为女士开门的传统斥为虚伪的礼仪，因为女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实际的权力。如今，我们有了实权，却失去了风度、友善和礼貌。要知道，礼貌虽然免不了虚伪的成分，却构成了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规则。只有在各方都遵守某种礼仪的情况下，才能就和平、和解、缓和、婚姻的维持等问题开展文明的对话。在过去，女人曾是传统美德的护卫者；现在却没人愿意拿出时间和精力来提倡礼仪和文明。相反，我们用“冷漠的窥视癖”和肆无忌惮的表现癖来代替传统的礼貌。

教皇约翰·保罗在他1994年的通谕中把60年代说成是当今世界上所有罪恶的开端，这些罪恶包括家庭的破裂、艾滋病以及同性恋的蔓延。在有些人看来，豪厄尔·雷恩斯为《纽约时报》撰写的社论才是对那个时代更精确的总结：

60年代产生了一种新的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强调个人有责任公开反对不公正和腐败……为结束越南战争这一灾难性的军事冒险而大声疾呼。在60年代，美国的民众用理智来对抗决策者的精神错乱。年轻一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推翻了政府的战争政策……反主流文化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运动，而价值恰恰是保守派最喜欢说的一个词。

性解放和妇女运动

也许是因为妇女运动和性解放发生在同一个时期，我们常常把两者混为一谈，把它们都看成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大进军。我们最初似乎都属于同一个阵营，大家都穿牛仔裤和 T 恤衫，不戴胸罩。从表面上看，我们的活动就像争取民权和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一样，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运动。

直至今今天，许多人仍旧以为性解放是 60 年代女权运动的一个目标。避孕药的出现宣布女人在性生活上获得了独立；与此同时，人工流产合法化运动也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身体。这就很容易使人相信女权主义支持性解放。其实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神秘》(1963) 揭示了传统制度中妇女地位的核心问题。在这个制度中，女人只能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弗里丹从未把男人描写成女人的敌人；相反，她认为男人也是同一个制度的受害者，他们受到大公司、广告商和大学的控制。如果说，女人只能蜷缩在妇女杂志所规定的有限空间里，男人则必须为了履行男人的职责而拼死拼活，过早地死于心脏病发作。

70 年代早期，我在伦敦住过。不论在纽约还是在伦敦，在我认识的女人中，许多人都认为女权主义就是争取性解放。女人的自由应该包括性自由，女人有权在两性关系中追求性欲的满足。如今，我们周围的一切——电影、书籍、服装、音乐、舞蹈——都在鼓励我们成为性感女人。

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当初都把自己视为铁杆女权主义者，一面为妇女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而奋斗，一面追求更加自

由的两性关系。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权决定要不要怀孕。出版商们争相和女作家签约，出版表达妇女思想情感的书、诗歌和文章。我们成了尚未开发的新大陆。久而久之，随着越来越多的女人写书出书、加入劳动大军、反抗、退出或“做她们自己的事”我们开始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女人们不能接受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听到或读到任何有关女人性幻想的讨论。于是我对自己说，既然那么多人人都希望了解女人，特别是女人对性的态度，为什么不写一本这样的书呢？那是 1969 年。由于性解放和避孕药带来的自由，我本人正处在性幻想十分活跃的时期。

可是我不久就意识到，我闯入了一个充满禁忌的领地。我在采访一些在性生活上最具冒险精神的女人时碰了几个大钉子。“什么性幻想？”她们呆呆地问我。她们非常愿意跟我合作，但是她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女人会有性幻想。

在伦敦的那些日子过得很愉快。我常在阿雷图莎或安娜贝拉之类的地方一面喝酒，一面试着和那里的女士们谈这个题目。她们开始挺感兴趣。但是，当一位已婚女人开始向我描述她在做爱时的幻觉时，她的丈夫大为震惊，于是在座的人都不敢说话了。有时另一个女人会打断说话的人，“怎么，你不是对你的性生活很满意吗？想不到你还需要幻想。”

我花了 4 年时间采访各类女人、写文章、在《纽约》杂志和《洛杉矶时报》上登广告最后终于发现，如果我想让女士们回忆她们的性幻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她们谈我自己和其他女人的性幻想。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我们都觉得，在和一个男人做爱的同时幻想着和另一个男人亲热，那是一种和通奸差不多的行为。不过，当一个女人读到或听到其他女人的性幻想时，她的态度就会变得比较通融。在今天，女人的性幻想在文学、电影、广告甚至日常对话里已成为家常便饭，年轻女士们对此也习以为常。

“妇女的解放也将是男人的解放”是早期女权运动的口号之一。70年代，我在大学校园里演讲时常常引用这个口号。可是，有些女权运动的领头人却把男人视为所有问题的替罪羊，她们不仅要男人对女人在社会上遭受的种种不公平负责，而且要他们对女人之间的种种冲突负责。我在大学里演讲时，听众中常有愤怒的年轻女子站起来向我挥舞拳头。“你为什么老是要讲男人的自由？”她们叫道，“他们算什么！”

在70年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眼里，如果一个女人在穿着打扮上试图吸引男人，那就是对妇女之间姐妹关系的背叛。当我在印第安那州的一所大学里演讲时，一位学生对着我大声喊，“你说了那么多的妇女解放，为什么还穿得那么漂亮？”我当时正在大谈男女政治平等，但是我的灰色法兰绒裤子和开士米套衫却是穿给男人看的。

记得在一次聚会上，我和我的朋友、现已去世的女演员琼·哈克特走进一间没人的房间。我们正谈得起劲，几位男士走了进来。他们离开后，哈克特对我说：“男人一进房间，你的神色就变了。”虽然我喜欢她，并且佩服她的坦率，但是我也觉得我们之间缺乏理解。我知道，她是在批评我：女权主义者怎么能一面和女人谈话，一面把注意力放在男人身上？

这样的事我碰到过好多次。可是，对男人无动于衷的女人不见得就是个模范女权主义者。压制自然和自发的反应只能使人变得冷漠和麻木。

女权主义不应成为衡量女人的惟一标准。在过去的20年里，关于性和美的争论不仅在女人中造成分裂，而且加深了每个人心里“好女孩/坏女孩”之间的分裂。

几年前，我在纽约的希伯来男青年会演讲时提到，有些具有表现癖的女人将自己的性幻想付诸实践，做法之一就是“露阴”，不穿内裤张开腿坐在公交车上。当时坐在前排的一群自称为

权主义者的人立即大叫：“对女人有权那样做，男人无权动她一根毫毛！”我说最好把这样的幻想留在自己的头脑里。我的话顿时在那些坐在前排的女士们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她们怒气冲冲地坚持，女人可以做她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而邪恶的男人却不能。

就这样，女权主义最终变成了一种霸道，它使女人能够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为所欲为；它剥夺了男人反击的权力。男人的行为只能暴露他们的邪恶，而女人则永远是受害者。评论家威廉·拉斯伯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权运动的领袖们拒不承认社会在男女平等方面已经取得的显著进步，这不是因为她们看不到这些进步，而是因为她们不愿失去自己的权力。只有持续不断地把女人说成是受害者，她们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

我想问的是，如果我在男人走进房间的时候脸上发热、眼睛发亮、心跳加快，这是否说明我不配参加女权运动？难道女权主义者必须对男人无动于衷？我的朋友哈克特是个愤怒的女人，她常跟我谈起她的童年。她爱自己的母亲，但这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爱。像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她把这些怨气都发泄到男人头上。

在某些女权主义者眼里，如果一个女人喜欢男人，那她就不配当女权主义者。这种排外的做法和小女孩之间的互相排斥一脉相承。

就这样，大量的妇女被排斥在女权运动之外，虽然她们很想参加争取妇女权力的组织。因为她们所理解的权力也包括爱男人的权力、在家工作的权力以及追求美貌的权力。“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对那些渴望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进取心的女性来说，性欲是她们的绊脚石，”杰曼·格里尔在《女性阉人》一书中写道：“在全国妇女组织领导的运动中，这大概是最容易将人引入歧途的观点。”在短短的几年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就像独裁者一样，

将种种清规戒律强加于女权运动之上，禁止任何人越雷池一步。

大约 25 年前，《女士》杂志在创刊号上宣布：“不论在指导思想、目标，还是在精神上，性解放和妇女运动都是完全对立的……所谓的性解放只不过是父权社会用于奴役女人的那条铁链上的一个环节。”这种将女权运动和性解放——或者说性和男人——绝对分开的做法使女权运动失去了大多数妇女的支持。她们赢得了几次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如果女权主义一开始就能够直面性欲问题，它就有可能帮助妇女们学会善待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性生活负责。这样一来，母亲就能教育自己的孩子欣赏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性器官。如果女权运动提出这样的口号，“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身体，尊重我们的性器官，在享受性爱的同时对自己的性生活负责，”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女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怀孕了。

就是禁欲有时也是值得的，如果那是为了在智力和身体上维护完整的自我，直到在成熟后才开始性生活。

如果女权主义能够坚持当初“妇女的解放就是男人的解放”的诺言，那么，男士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运动和他们休戚相关，男女双方都会意识到，父权社会的两性关系不论对女性还是男性都是一条死路。男士们也会看到，妇女走上工作岗位虽然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同时也帮他们减轻了负担整个家庭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更多的妇女以及她们的丈夫拥护女权主义，就会有更多的人打破传统观念，根据自己的天性在家里和工作场所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女权主义、男人和美貌

妇女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唾弃对美貌的追求。首先，穿

着高跟鞋、拿着塞满化妆品的皮包是不能参加游行示威的。更重要的是，在父权制度下，美貌是女人最大的筹码，也是惟一的筹码，而男人却掌握着经济实权。女权主义要推翻的正是这种制度。在父权社会里，脸蛋和身体是女人惟一的资本，靠着这两样东西，她才能获得婚姻、名分、家庭以及生活资料。当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时，你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她一定属于某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在那个社会里，一边是累死累活拼命赚钱的男人，另一边是费尽心机追求美貌的女人。

只要看看小女孩的脸蛋，母亲就能猜出女儿的未来。不过，即使是最漂亮的女人也明白，她的好日子是有限的。在 60 年代女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是 20 岁 过了这个年龄 青春和美貌就开始逐年衰竭。

不难理解，为什么渴望独立自主的女人要把追求美貌视为妇女解放的绊脚石。我们要过独立自主、和母亲这一代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们不再把自己视为男人的战利品。

不过，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女人手中最强大的权力还在于生育和抚养人类的后代。但是，只要女人在生存上完全依赖男人，她的权力就受到很大的制约。女人只能通过背后操纵男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男人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他就能转向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喜新厌旧。许多人爱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尊重妻子在家里的地位，因为这使他想起童年时母亲在家里的权力。夫妻之间常常互称“爸爸”“妈妈”。比如里根总统就称夫人南希为“妈妈”。

女人们不愿把母亲的角色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在她们的意识中，做母亲就意味着作出“牺牲”而不是行使权力。就是在今天，她们也不愿放弃这种看法，因为她们害怕失去对育儿室的绝对控制。

许多女人避免过问丈夫的钱财。直到今天，律师们在办理离婚案件的时候还要常常费尽口舌，劝说那些被遗弃的女人设法搞清楚自己的丈夫到底值多少钱。她们习惯于让丈夫来掌管经济大权。

在我的少年时代，“好女孩”从来不谈和金钱有关的事情，谈论汽车、房子甚至衣服的价钱都是有失风度的行为。女人们一向珍视并善于利用自己的魅力，然而，即使是那些在女权运动中冲锋陷阵的人也不愿坦率地讨论这个问题。在70年代初，她们只是简单地把美貌扫地出门，禁止女人利用或追求美貌，排斥那些浓妆艳抹前来参加集会的女人和那些试图用迷人的微笑来吸引男人的女人。

任何革命在本质上都缺乏宽容性。狂热的排他性将革命者们凝聚在一起，妇女解放运动也不例外。通过排斥那些不够资格的人、看上去不顺眼的人以及政治感情有问题的人，女权主义者把妇女运动变成了少数人的事业。

在60年代后期，我对女权主义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女权运动的主张一开始就在我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反应。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神秘》揭开了女权运动序幕。在那风云突变的年代，我们这些渴望跟随时代的人第一次感到，创新正取代守旧，并成为生活的法则。

女权运动把注意力集中在争取女性在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家里人就嘲笑我把每个硬币都存起来，后来他们又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想和我在放假时带回家的那些“体面”男孩结婚。对我来说，经济上的独立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为我知道，向家里多要一块钱就会使自己少一分自由。

但是我的霍尔斯顿仿麂皮裤子却在参加集会的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不过我拒绝改变自己的穿着。后来，反对追求美

的各种清规戒律越来越多。当漂亮的电影女明星们主动为女权运动提供帮助时，她们却遭到了女权运动领袖们的拒绝。

弗里丹写道，“美国妇女的成长受到了种种限制，使她们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这个问题对我们民族身体和心理上的危害超过了其他任何疾病。”今天重读《女性的神秘》我发现弗里丹并没有摆出一副反男人、反性爱和反美貌的姿态，尽管这些种姿态后来成了女权运动的特征。世上总有一些敌视男人的女人，她们把女人所遭受的所有不公正都推到男人头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女权运动最初并没有把男人当作敌人。许多女人在 60 年代和男人们打得火热，在跳舞和做爱中共度美好时光。到了 70 年代，这些女人就被戴上了叛徒或假女权主义者的帽子。

最后，一切追求美貌、炫耀身体和面孔的行为都成了谴责的对象。那些运动初期参加进来的男士们在 70 年代初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追求美貌总是和两性关系密切相关，在 70 年代初，对男性不分青红皂白的敌视已经在女权运动中占了上风。

可是不要忘记，有些男人也是女权主义者，他们也曾为妇女的平等权利而战斗。有位男士回忆起 70 年代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声援女权主义者参加竞选的集会。“参加集会的妇女有好几百个，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男人，”他说，“发言者们花了两个小时攻击男性社会，她们攻击的方式使我觉得，怎么说呢……神经紧张。最后，那位竞选者跳到讲台上兴奋地大喊，‘现在，让我们手拉手一起唱，今天，世界需要的是爱，爱，爱。’”

在《女性的神秘》出版三个月之后，《纽约时报》才发表了一篇短评，书评的作者不同意该书所作的“笼统的概括性论述”，认为把女人的“抑郁和空虚”统统归咎于文化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可是，到了 1963 年 11 月，《生活》杂志就把该书称为：“一部一举成名的畅销书，它就像一颗催泪弹，彻底搅乱了鸡尾酒会的

交谈和女子俱乐部的活动。”

在父权社会里，“好女孩”在公共场合必须少说话、放低声音说话。玛丽娜·沃那写道：早在中世纪，“人们就认为女人的嘴巴和她的身体一样具有诱惑力。对男性基督徒来说，女人嘴里说出的话都是危险的、不适宜的。”因此，必须像压制女人的性欲一样压制她的声音。

在 60 年代，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这样的情景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但是在 60 年代后期，能够拿着一杯酒和其他女士一起相互倾诉我们青春期以来所经受的种种压抑，实在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

有位女士回忆道，“我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说，脑子里刚想好一句话，谈话题目就变了。”

这就是普通人对弗里丹这本书的反应，而女权运动就是这样在普通妇女中传播开来。1966 年，也就是《女性的神秘》出版后的第三年，弗里丹和一些女士在一次午餐会上讨论有关民权法案中禁止性别歧视条款的实施问题。在这次讨论中，她们决定组建一个“女性 NAACP”（NAACP 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我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NOW’这个词，”弗里丹说，“然后我对大家说，‘我们的组织应该是一个为妇女争取权力的全国性组织，男人应该是这个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那时起直到 1970 年，弗里丹都担任 NOW（全国妇女组织）的主席。她提出的“团结男人”的观点在她离开后就遭冷遇。对于这段历史，我想引用弗里丹在 1983 年出版的《女性的神秘》二十周年纪念版的后记里所写的一段话：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脱离女性和人性的现实来规定什么是妇女的“解放”。作为女人，我们需要爱，有时甚至需要依

靠男人。我们必须改变的是那种把性别差异绝对化的观点，这种观点把男人和女人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人群，只看到相互敌视，却看不到爱……男人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受害者。陈旧的男子汉神话使他们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在这个不再需要冲冲杀杀的世界里，他们觉得自己成了多余的人。

女权运动充分利用了 60 年代的革命气氛和表现形式——牛仔裤、靴子、长头发、形形色色的另类时尚。你可以在同一个下午，穿着同样的衣服、以同样的方式参加两个不同的游行，如反战抗议示威和要求妇女权力的游行。我的朋友莫利在 1968 年的芝加哥流血骚乱中走在最前排，不过她不论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卷发器。1970 年，为了纪念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五十周年，大约有 5 万人在纽约第五大道游行，游行队伍中也有男人。那时，女权运动并没有排斥男人和爱男人的女人。

心理学家沃伦·法雷尔在 1969 年成了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此后的 3 年里，他是全国妇女组织纽约分会董事会的成员。法雷尔提醒我，“男人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妇女运动，他们不是作为个人成为妇女组织的一员，就是加入某个支持女权运动的外围组织。贝蒂·弗里丹和卡伦·德克罗——1971 到 1974 年间全国妇女组织的主席——都一贯坚持把平等看成男女双方的平等而不是仅仅加强妇女的权力。”

自从女权运动把男人从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中驱逐出去后，我们就逐步陷入目前的受害者心态，并且加深了妇女之间的分裂。现代社会中的男子是父权制的继承者而不是发明者，他们同样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不错，男人长期以来掌握财权，但是不难看出，大多数男子都在感情上受到压抑，他们难以表达关爱、温柔、同情等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情感。社会学家杰西·伯纳

德在 70 年代初就指出，男人生活中如果缺少女人，他们的酗酒、自杀和死亡率就会上升。

格洛莉娅·斯坦内姆是继弗里丹之后又一位公认的女权运动领袖。她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这一点。不论是情人还是朋友，男人在她的生活中一直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影响她参加女权运动。要想了解为什么女权运动只字不提外貌在当今世界上的作用，我们最好从斯坦内姆身上找答案。她了解男人，知道怎样利用他们去达到政治和个人目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都得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既然人们可以接受金钱和权力之间的交易，那么女人为什么不能利用美貌来为自己服务？肯尼迪家族的成员什么时候拒绝过利用家族的名望？

1963 年，斯坦内姆需要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来为她的第一本书《海滨指南》作序。那是一本大杂烩式的轻松读物，里面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歌曲、谜语、棋局，还提供各种各样的窍门，如怎样把皮肤晒黑、怎样护理晒脱的皮肤、怎样把沙子堆成小城堡，等等。她找到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他答应了她的请求。他的序言是这样开始的：“我也许是最不适合于写这篇序言的人，可是我喜欢这本书和写书的姑娘。”

他确实写了那篇序言。30 年后，我听说斯坦内姆的情人莫特·朱克曼决定借给《女士》杂志 140 万美元。在此之前，许多男人和女人都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斯坦内姆。

斯坦内姆成了现代女权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如果要发布一张纪念女权运动的邮票，那上面一定有斯坦内姆的肖像。如果我们不了解斯坦内姆，就不可能理解当代女性对男人和美貌的矛盾心理。斯坦内姆是女权运动的领袖和偶像，只要看到她的脸，我们就会回想起女权运动的黄金时代。不容忽视的是，那张脸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 妇女权力的化身。”这是 1969 年 1 月《时代》周刊为斯坦内姆的照片加上的说明。那一期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斯坦内姆的报道。“今天，如果你想参加纽约的社交聚会，最光彩夺目的女伴之一就是格洛莉娅·斯坦内姆，”文章一开始就说，“……那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名字。她不仅是个成功的自由撰稿人……而且是个身材苗条、充满女性魅力、满头金发、皮肤浅黑的漂亮女人。她被描绘成‘思想者心目中的琼·施林普顿’。她穿着合身的轻柔套装和紧身衣服，她的超短裙充分显露出漂亮的双腿。她聪明过人，不用任何花招就能使谈话变得充满活力。”

文章还配有图片。照片里的格洛莉娅坐着，伸出修长的双腿，像个性感女郎。她的服装和姿势都和她在全国各地为女权运动宣传和募捐时的样子大不一样。不过我并不是批评她的双重人格。正如老一辈常对我们说的那样，在某些场合，性感魅力是不可缺少的，它能对有钱有势的男人产生影响，但是女权运动的政治集会却是另一回事。格洛莉娅常在各式各样的女权运动集会上和黑人女权主义者一起发表演说。

她在散文集《蛮横行为与日常反叛》中写道“我们一起在成百次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扩大主要由《女性的神秘》发展而来的妇女运动的范围。”

在格洛莉娅看来 贝蒂·弗里丹的书只针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白种妇女”，因此它的影响力有限。弗里丹虽然最终认可了斯坦内姆在女权运动中的地位，承认女权运动需要一个能说会道的年轻领袖，但她们之间一直存在隔阂。斯坦内姆的美貌并没有妨碍她成为女权运动的新一代领袖，相反，这正是女权运动所需要的。新闻媒体把女权主义者说成是一群牢骚满腹、毫无魅力的女人，她们一心想报复那些曾经拒绝她们的男人。这种说法虽然愚蠢，却在男子主义占上风的新闻媒体中颇受欢迎。

格洛莉娅·斯坦内姆的出现正合时宜。虽然在自传《发自内心的革命》中，她说自己一直无法摆脱记忆中那个矮矮胖胖、丑小鸭似的小女孩，事实上，她在逆境中变得出类拔萃，就像帆船上的桅杆那样漂亮和挺拔。

在《愚公移山：1960年以来的美国妇女运动》一书中，弗洛拉·戴维斯写道：“可以说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两派相互竞争的女权运动——自由民主派女权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后者包括“纽约激进妇女”、“红袜子”、“女权主义者”、“16号牢房”、“面包和玫瑰”以及“SCUM”（粉碎男权协会），她们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经历过民权运动、校园激进主义和反战抗议。“在战术上，”戴维斯说，“她们立足于非暴力反抗——一种用强大的压力来推动革命性变革的手段。”

时势造英雄。格洛莉娅·斯坦内姆正是女权运动和新闻媒体需要的那种人。“我们之间有过很多争论，”弗里丹在1992年的一次访谈中说起她和斯坦内姆的关系，“我确实反对她信奉的那种激进时髦、敌视男性的策略：‘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不需要自行车。’……她到女选民联合会去表示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支持，在演讲中，她说所有做妻子的其实都是妓女。我认为这种说法在政治上是愚蠢的，所以我在全国妇女组织中以及妇女运动的其他场合反对这种说法。我反对那种使妇女运动脱离主流社会的企图，这使我成了格洛莉娅的对立面。”

后来，弗里丹被人指控过分同情男人，她所创立的全国妇女组织变得更加好斗。到了70年代初，格洛莉娅成了女权运动的领袖。

70年代初，许多激进的外围组织都消失了，这些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就加入了全国妇女组织（以及AAUW那样的温和派组织）。这样一来，原先比较温和的组织就开始向极左倾斜。到了70年代中期，全国妇女组织在各地的分部中有50%反对孩

子由离婚夫妻共同照顾。

1970年,《时代》周刊把凯特·米利特的照片放在封面上,还登载了她的《性政治》一书的摘要。同年杰曼·格里尔的《女性阉人》出版。一些女作家和女编辑断言,“要是有一本精美的、在全国各地发行的月刊,就能将大批的妇女变成女权主义者。”1971年,《纽约》杂志介绍了即将问世的《女士》杂志。第二年一月,《女士》杂志的第一期出现在报摊上,八周之内全部卖完。

这时,媒体的决策者们开始重视起妇女运动提出的种种抱怨。“他们开始尊重女权运动,”弗罗拉·戴维斯写道,“与此同时,他们也抛弃了比较好斗的激进派……到了70年代中期,大多数曾经著书立说、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出过风头的激进分子都已销声匿迹。”

在女权运动如何对待美貌这一棘手问题上,没有人比格洛莉娅更有经验。在过去的25年里,这位现代女权运动最出名的领袖成功地,在美貌和“严肃事业”之间保持平衡,在投身女权运动的同时和各式各样有钱有势的男人保持亲密关系。

《纽约时报》妇女新闻编辑夏洛特·柯蒂斯说,“斯坦内姆总是说,她不希望任何人注意她的容貌,言下之意,如果注重她的漂亮容貌,那就是把她看作性欲的对象,但是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柯蒂斯认为,虽然斯坦内姆不喜欢被人看作性的象征,但她似乎以某种方式促使别人这样看她——也许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毫无疑问,在她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斯坦内姆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而且她成功地使人相信,她的容貌和她在社会活动中的成就毫无关系。70年代初,她为自己打造出一种新的女权斗士形象:脱下超短裙,换上牛仔裤,披散的长发掠过半边脸。可是旁观者看到的,却是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的漂亮女人。她披着迷人的长发,戴着时髦的墨镜;她能言善辩,吸引了一大群追

随者。与此同时，她却公开地藐视男人以及其他女人对美貌的追求。强有力的口号加上强有力的包装，她做得很妙，确实是个天才的妇女领袖。

1989年，在开始为本书作调查时，我对斯坦内姆进行了一次录像采访。她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她那和蔼可亲的神态和语调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我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心甘情愿地变成她的俘虏。当我直截了当地问她如何看待和利用自己的美貌时，她用一个小故事来回答我的问题：“那是在60年代，《生活》杂志有一项我很感兴趣的任务，于是我带着一包作品去应聘。接待我的那个男人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漂亮姑娘，而是会写作的人。’就这样，我被打发掉了。”

莫特·朱克曼曾是斯坦内姆的情人，又是纽约最有权势的男人之一。朱克曼在《发自内心的革命》一书中受到不少攻击，这也许是爱上一位圣徒必须付出的代价。朱克曼常对斯坦内姆说，和圣徒在一起过日子比做圣徒还难。后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格洛莉娅终于决定放弃豪华轿车和纽约汉普顿的大房子，放弃在代表女权运动的同时和纽约最有权势的男人作伴。她选择了姐妹之情。

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我相信这些年是格洛莉娅·斯坦内姆最快活、影响力最大的日子。她宣布自己摆脱了对美貌的追求和来自男人的诱惑，全心全意投身于女权运动。不过，我从不怀疑，她的追随者们一向都十分欣赏她用自己的容貌和魅力为她们争得的权利和影响力。

与此同时，海伦·格利·布朗也在大力宣扬她的新牌女权主义。梳妆打扮、谈情做爱、能赚会花，这一切丝毫不影响“世界女郎”把自己变为十足的女权主义者。自从布朗在1965年担任奄奄一息的《世界》杂志主编以来，她从未改变过她的信条。创

了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世界女郎”可以说是布朗的一大发明（请注意她从未从“世界女郎”变成“世界女人”。）

“世界女郎”不是女人的《花花公子》而是《花花公子》的女朋友。“世界女郎”吸引你的眼睛透过那半寸之差看到衣服后面的乳头和……然而，她却不许你把她看成性欲的对象。布朗是否知道，她的女权主义与《女士》杂志的宗旨背道而驰？还是让典型的“世界女郎”广告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我是女权主义者吗？当然是。女权主义就是要让男男女女都过上好日子，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实现自我。要说不平等嘛，肯定存在，但是我们女人正在接近我们的目标……我们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已经有了数以千计的女律师、医生和科学家。我最喜爱的杂志告诉我，平等和成就缺一不可，但是没有必要撇开男人。这就是“女性气质”。我太喜欢那本杂志了。可以说，我就是那个“世界女郎”。

海伦·格利·布朗惟一担心的是杂志的发行量，为此她必须跟上杂志的读者群——成功女性。《世界》杂志的发行量一路攀升至 300 万份，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青年女性杂志”。它的发行量是《女士》的五倍。布朗在《世界》杂志掌管大权长达 32 年，直到 1997 年，74 岁的她才被迫辞职。

格洛莉娅和海伦各自掌管她们的杂志。据我所知，《女士》从未对“世界女郎”的挑战发起反击。好斗的布朗对此一定十分恼火。格洛莉娅明智地避免向美国最吃香的妇女杂志开战：不管怎样，布朗经营的性、时尚、魅力以及五花八门金点子的大杂烩深得女人的青睐，总不能把女人们如此虔诚地购买她们每周一期的圣经归咎于野蛮邪恶的男人。

由于受到自身信条的限制，《女士》杂志常常在生存线上挣

扎。它缺乏幽默，无视女人对美和性的渴望。斯坦内姆把女人对浪漫爱情的追求说成是一种“替代”，她以同样的方式来指导她的追随者们看待女人对美貌的追求。谁都知道格洛莉娅自己就是个爱美的人，不过，政治领袖们总是以惊人的言行不一而闻名于世。

最令人遗憾的是，格洛莉娅式的女权运动不能容纳不同的声音、观点和健康的争论。她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可是她太自以为是。她对不赞同她的人就像母亲对不懂事的孩子，不允许他们挑战她的权威。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不愿再盲目地接受她的绝对主义，不过，当她们试图挑战斯坦内姆的“真理”时，她们的书和文章常遭到媒体的攻击。下面就是她们试图挑战的“真理”之一：

“我们并不是说喜欢色情艺术的女人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斯坦内姆在《性爱艺术与色情艺术》一文中写道“但是必须看到，色情艺术本身危害妇女的安全和平等，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它是女权运动的敌人。”

由于美貌和性密切相关，斯坦内姆对美貌在女权运动中的作用自然是采取同样绝对和不容置辩的态度：“许多男人希望女人成为‘柔软可爱的’小猫和金丝雀，而那些见了漂亮衣服就兴奋不已、整天把心思用在梳妆打扮上的女人正好迎合了男人的胃口。扮演小猫小鸟的角色就是放弃做人的尊严。我们应该阻止这种堕落。”那么，如何解释她自己对美貌和魅力的追求？

多年来，由于美国中部的妇女不认同女权运动的观点，这个运动失去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大多数妇女希望男女平等，但她们难以接受仇视男人的言论和态度，因为她们毕竟不想抛弃自己的丈夫、儿子或情人。这是导致1982年宪法平等权利修正案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女权运动和那些希望按照传统方式生活的妇女中

间隔着一条鸿沟。她们不喜欢女权运动为她们提供的生活方式。比起保守派专栏作家菲利普·施拉夫利的观点来，她们更不喜欢激进派女权运动头面人物的傲慢和霸道。那些女强人就像蛮横无理的 9 岁孩子，谁不听她们指挥就叫谁靠边站。

内奥米·沃尔夫的《美貌的神话》为什么能在全国各地的女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因为这本书为女性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烦恼提供了一份标准答案：是万恶的男人逼迫我们为追求美貌而忍饥挨饿。然而，虽然媒体对这本书作了大量报道，但它并没能阻止追求美貌的狂潮在 80 年代中期卷土重来。就是作者本人也在她的下一本书里改变了调子，把男人描写成可爱可亲的人、女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女人的墨水，女人的血

70 年代中期，我参加了一个由女作家组成的小团体，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个成员家聚会。我们自称“女人的墨水”。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个小团体里既可以看到女权运动最好的东西，也可以看到最坏的东西。最后，这些谁也说不清的矛盾和冲突像个重磅炮弹，彻底毁掉了我们的小团体。

大多数作家整天独自呆在书房里，白天黑夜都生活在想像的世界中。由于专业上的原因，我们对代理人和编辑都有一种近乎天真的忠诚，相信他们像父母一样，总是把我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其实，即使他们喜欢我们的著作、甚至我们本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总是代理人、编辑、出版商三者的共同利益。不难看出，“女人的墨水”这样的组织可以填补多少空白。首先，它为我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空间，我们可以在一起闲聊，寻求安慰，讨论诸如合同和版权等令人头疼的问题以及读书活动等等。

可是，从一开始，气氛就有点不大对头。我们在纽约西区宽公寓楼里的聚会总是给人一种女生联谊会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那里有一种在中学女生中常见的形成排他性小圈子的倾向。比如那些出书比较多的‘明星’们总是不愿同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打成一片。

大约4个月之后，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就爆发了。不过，这不是公开的权力斗争，而是一种更加阴险的暗斗，例如半夜三更的电话串联和秘密会议等，目的在于排挤某个锋芒毕露的女人。

我并不想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因为我也参加过这种秘密会议，不过回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那时我正在写《我母亲/我自己》，可脑子里整天想着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残忍。也许我当时还为自己受到邀请而感到颇为得意呢，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那个被打击的对象——一位金发女郎——到底犯了什么罪。毫无疑问，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这一女人之间无法公开谈论的东西。由于我们从未学会用公开辩论的方式来开展健康的竞争，所以只能用暗斗来排斥异己。

我们都是些老资格的女权主义者，可是我们却不能团结起来维持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在专业领域里有所发展的组织；相反，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摧毁这个组织。那个胆敢向几位头面人物发起挑战的女人是个漂亮的、颇具领导才能的女强人。她之所以遭受打击是因为她打破了禁止竞争的规矩。她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几年前，诺拉·埃弗伦写过一篇关于阴道喷雾器的文章。该产品的推销原理是：总有办法使女人们相信，她们身上的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只要击中她们的要害——恐惧心理、害怕出丑、害怕别人说她们身上有难闻的气味。如果有

谁锋芒太露，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她搞臭，使她觉得自己身上有臭气……大声说话……发怒、公开辩论，对我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只有那些“委员会”里的人才感到害怕。于是，她们非但没有表彰我的积极主动，反而把我说得臭不可闻，属于那种必须使用阴道喷雾器的人。

那是一场由成年女人策划的十分丑恶的内斗。我们怎么也无法将这种现象归咎于邪恶的男人等“外部”敌人。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身的残忍，我们每个人都感受过这种残忍，它在黑暗中燃烧，随时等待着新的受害者。

诺拉·埃弗伦的文章发表后 将近 25 年过去了。经过了一代妇女运动的努力，妇女们在职业和收入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是，我们是否摆脱了对自我形象的过分挑剔和焦虑？只要看看女用喷雾器厂商日益增长的利润就可知道事实真相。

诺拉·埃弗伦的文章《应对》于 1973 年刊登在《老爷》杂志上。埃弗伦所说的“问题”是女性自我形象的关键，她文章中引用了心理分析家纳塔利·谢尼斯的一段话：“这些女性卫生产品进一步加重了妇女和男人对女人的偏见，这类产品的广告用过分渲染的手段丑化女人的形象，把女人表现为天生污秽的生物。它们表面上似乎在帮助她们解决问题，实际上却在暗中损害她们的自信心。”

这段评论仍旧适合今天的情况。今天，妇女可以登上月球或进入白宫，但是要改变她们对自己身体的看法却困难得多。1972 年以来的惟一变化是女性卫生用品市场的繁荣，而对此贡献最大的莫过于那些女研究员和广告文案的女作者。

要使妇女们相信，她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形象都和她们对性器官的看法密切相关，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从婴儿时期开始，母亲就设法将我们的手、眼睛和思想从那个部位移开。

打那以后 压抑、否认和‘遗忘’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在工作场所和男人们竞争，我们有权决定是否和男人住在一起，可是不论在何时何地，我们都感到不安全。正如那位在“女人的墨水”中遭到迫害的女士所说，“人们总是设法使我们觉得自己身上有些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不是过分自信、过分好斗 就是样子难看、气味难闻。”

我们害怕在别人面前出丑、害怕难闻的气味、害怕成为一个失败的女人。比起这些，权力和事业都算不了什么。我们花钱买衣服、美容 可是 面对真菌感染、气味、经血以及各种各样对阴道清洁构成威胁的微生物，时髦衣服、漂亮头发和健美的双腿又有什么用？

某公司设计了一种能使女人在月经期间也能“干干净净”享受性生活的新产品，可是女士们却不愿用它。“什么？要我们在出血的时候用手指把这东西放到那个地方，事后还要把它拿出来 绝对不行！”一位市场研究人员说：“她们拒绝这样的产品，因为要使用这种产品就要搞清楚该把它往哪儿放。她们不愿亲手去弄，不愿碰到经血。”她们也不认为增加几天性生活有多大的意思。“多谢你的好意。我已经习惯了每月 10 天例假，”她们说，“我可不想在那几天里做爱。”

大多数男人对女人为性器官焦虑一无所知。就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感觉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诸位不妨在下次读到女性卫生用品广告中那些警告性文字时，注意一下自己的反应。有关女性卫生用品的电视广告更是无孔不入，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们，不论你多么漂亮、多么精明强干，所有的女人都有一块共同的心病。所以，要对付那些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她们知道她们身上有臭气。

我们常常被“新女性”的外表所迷惑。她穿着诱惑力十足的服装招摇过市：裙子短到两腿分叉处，紧身套衫显示出乳头。不

仅男人被她吸引，女人也一样。她们相信，如此颐指气使、目中无人的女人一定拥有百分之百的自信，她们对自己的生活一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依我看，女士们之所以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花在梳妆打扮上，多半是为了掩盖她们内心的焦虑。我们常常感到困惑：在今天，什么样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是卫生用品广告里那些整天担惊受怕的女人，还是近来出现的“悍妇式女豪杰”？

其实，这只是不同的包装而已。颐指气使的“新女性”和缺乏安全感的小女孩是一棵藤上的两只瓜。不管表面上如何目中无人，我们仍旧没有学会如何对自己负责。例如，在 30 到 34 岁的女人中，计划外的怀孕高达 41%。要知道，这个年龄段的人受了整整 25 年女权运动的影响。这说明，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就必须搞清楚那些深藏在我们潜意识里的恐惧和焦虑。

小说、电影和电视尽可以把女主角们描绘成妖艳淫荡的悍妇、“像男人一样厉害的”冷面杀手和色狼。然而，只要看看那些巨大的性器官清洗器的广告，我们就不难发现，影视技术炮制出来的女超人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样的女性形象是新经济时代媒体的产物。随着我们经济实力的增加，深蓝色的女性职业装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需要更新的包装来显示我们的成功。于是，新一代女强人穿上了阿玛尼套装，脸上除了自信就是傲慢。可是，不管我们如何风光，我们每个月仍旧要流血，仍旧会发出难闻的气味，仍旧要担心弄脏裙子。

当女主角们在银幕上大发淫威，把男人弄得奄奄一息时，女性卫生用品的电视广告却在不断向我们传达女人对自己身体的真实看法：阴道喷雾器、冲洗器、消毒剂、抗霉菌软膏等等，它们个个都许诺，能把阴沟变成美丽的花园。

观众能够接受银幕上的琳达·菲奥伦蒂诺穿着细高跟鞋轻

而易举地杀死男人。其实，真正可怕的是真实的生活。女人在明争暗斗的时候总是面带甜蜜的微笑，口口声声把爱挂在嘴上。哈比式残忍贪婪的女妖无处不在。影片《天堂里的怪物》讲述两个女孩把母亲活活打死的故事。真实事件发生在 1952 年。那时，观众对这种电影没有胃口；可是现在，人们恨不得亲眼目睹这类残忍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影片里，艳丽的女主角差不多总是没有孩子。与其说她是个女人，倒不如说她是个复仇的机器，一颗射向万恶的男性世界的重磅炮弹。她鄙视男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对她的美艳崇拜得五体投地；如果她的自信心受到损害，那么男人就是罪魁祸首。

男人成了俯拾即是的替罪羊，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他们：短暂的职业生涯、短暂的青春美貌、短暂的生育能力——女人的好日子是那样短暂，而这些可恶的男人却拒绝倾听我们的声音。不过，我毫不怀疑，女人真正的对头不是男人，而是其他女人，真正的权力斗争不是在男女之间，而是在女人之间展开。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女人在美貌的竞技场上展开的搏斗。

今天，妇女享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权力，但我们反而变本加厉地追求美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女强人外表掩盖下的虚弱。如果女人要向男人发起真正的挑战，她们最好先解决自身的问题。

“女同性恋”这个词并不能恰当地表现女人相互之间的性好奇。今天的女人就像考古学家，睁大眼睛盯着别人的性器官、乳房、皮肤，一心想在别的女人身上发现自己缺少的东西。女权运动为女人争得了许多权利，可是她仍旧感到不平等，尤其是女人之间的不平等。

即使一个女人得不到男人的赏识，那也无关紧要，女人的赏

识才是她真正需要的东西，因为女人都面临一些同样的问题。不论她选择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她最需要的，是听一位可爱的女伴对她说，她身上的一切生来就完美无缺。

艾丽斯·沃克的《紫色》在1982年获普利茨奖。在这部小说里，西莉在沙格的帮助下，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性器官的美。从那以后，这两个女子就成了情人。

她说，“去，拿着这面镜子照照下面那个地方，我敢说你从来没好好看过，对吗？”

“没有。。”

“我敢说你从来没见过艾伯特（西莉的丈夫）下面那个地方。”

“我感觉到。”我说。

我拿着镜子呆呆地站着。

她说，“怎么了，不好意思看你自己？”她大笑起来：“瞧你多可爱，穿得漂漂亮亮去哈伯家，瞧这身打扮，多香啊。可是你连自己都不敢看。”

“你陪我。”我说。

她咯咯笑了。“好吧，”她说，“没人会进来，放心。”

我躺在床上，拉起裙子，拉下内裤。把镜子放到两腿之间。哟，好多毛。然后是黑黑的阴唇。里面就像一朵湿润的玫瑰花。

“它比你想像得好看多了，是吗？”她在门边说。

“它是我的，”我说，“那个小球在哪里？”

“靠近最上面的地方，”她说，“那个有点突出的东西。”

我看着她，用手指摸了一下那地方，一阵颤抖掠过全身。多么简单。这下我明白了，这个小球有什么用……

“艾伯特和哈伯来了。”她说。我马上拉起裤子，拉下裙

子。我觉得好像犯了什么罪。

一个女人如果对另一个女人产生性幻想，她可以把自己称作同性恋，也可以称作两性恋，也可以称作异性恋。如今，女士们对同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感到有罪，也不感到左右为难。女人们相互之间的兴趣渗透了著名妇女杂志、电影以及克利特和Lesbo-A-Go-Go夜总会的时尚镜头。几年前，当Lesbo-A-Go-Go夜总会开张的时候，有一群年纪较大的女权主义者走进去教训年轻姐妹们，说她们这样做是贬低自己。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时，一位半裸的美人大叫“我是货真价实的女权主义者，这儿哪有什么堕落……我就喜欢让大伙儿发狂，我就喜欢看他们目瞪口呆的样子。”

“女人之所以不喜欢自己的身体，同那个她们从来不敢看的部位大有关系，”心理学家朗尼·巴尔巴赫说“她们以为那个部位非常难看，这种厌恶感在她们心里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分量。在她们的脑海里，丑陋的性器官变成了太粗的大腿、太小的乳房以及身上其他不尽如意的东西。”

在《我的神秘花园》(1973)这本书里我很少提及和女人有关的性幻想。在80年代，不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幻想中，女人对口交的态度和性伙伴的选择都发生了变化。即使那些不想成为同性恋的女人也会梦想另外一个女人的嘴给她带来的快感。男人不了解女人的需求，只有女人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只有女人才能帮助女人摆脱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对性器官的反感。

许多女人都描述过她们在口交时体验到的极度兴奋。口交时的性幻觉经常把人带回到青春期初尝禁果的年代。那时，我们在汽车里、在海滩上、在随时可能被人发现的公共场所，危险越大就越刺激。

大多数女人都在初来月经时就学会了沉默，于是，沉默成了

女人的美德。这每月一次的流血成了我们最大的秘密，没人愿意谈论它。我们默默地学会计算天数，竭力避免任何措手不及的尴尬。我们小心翼翼，再也不像童年时那样天真烂漫。

1970年，《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凯特·米利特的封面故事，将她称作“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毛泽东”。在《性政治》这本书里，米利特阐述了父权制如何把性欲中阴暗、邪恶和污秽的方面都归咎于女人，把高雅的方面，即阳具所代表的生殖力，留给自己：

和父权制站在一起的，是万能的上帝。父权制最有效的控制手段之一是它的威力强大的教义，这些教义规定了女性的起源和本质，把所有同性欲相关的危险和邪恶都归咎于女人。古希腊的例子特别有趣：每当它想颂扬性欲的时候，它就会赞美阳具所代表的强大生殖力；然而，当它想诋毁性欲时，它就会引用潘多拉的故事。父权制下的宗教和伦理道德倾向于将女性和性混为一谈，似乎所有和性有关的罪恶和耻辱都是女人造成的。女人就是性，而性就是污秽、邪恶和生命力的损耗。与此相反，男人才是人，男人才具有人的身份。

不难理解，狂热的革命者常常以不是黑就是白的极端方式看待一切，他们不承认在黑和白之间有任何灰色。可是，25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来面对真实生活中存在的灰色。我们不妨站在这个中间地带重新审视一下那些把女人和性的污秽面等同起来的信条：是谁使这些信条得以长期存在？是我们自己。是女人将这种偏见传给的后代，使我们从小就学会把自己的性器官看成身上最脏的部分。换句话说，只有女人才能改变自己的形象。

男人并不是生来就恨女人，他们对女人的偏见是后天形成的。男人为什么会虐待、强奸或骚扰女人？我们需要找出其中的原因。

那是 1994 年冬季奥运会期间，有天夜里我和丈夫躺在床上观看女子花样滑冰决赛。我们都为女运动员的高超技艺和优美动作喝彩。看过这些精彩表演，我们又转向“周六之夜现场直播”滑稽演员马丁·劳伦斯的独角戏正好开场。

对于这一类“现场直播”节目必须当场观看才行，不然你就会漏掉很多东西，因为做成录像带之后，许多内容都会被编辑删掉。外人很难搞到未经编辑的录像，就是在电视台工作的人也未必能搞到。我曾给一位在 NBC 担任主管的朋友打电话，就是他也很难为我搞到劳伦斯独角戏的录像。可见电视广播公司是如何起劲地防止任何证据落到可能被他们得罪的观众手里。

劳伦斯和其他演员通常在有线电视台表演这类节目，不过这次却不同，这是他第一次在全国电视网表演。男人，尤其是年轻人，正在借用电视广告里的内容来发泄他们对女人的愤怒。请允许我在此引用一段劳伦斯的独白：

瞧，我是个光棍。我是个单身汉。我身边什么人也沒有；我想找个人。

我正在和很多女人约会——有些挺漂亮，不过恕我直言，美中不足的是，你们中间有些人没把屁股洗干净……我也不知道女人怎样才能保持个人卫生。不过，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冲洗器广告时，我就想，不知你们在用那东西之前有没有认真读过说明书。看样子没有。因为我碰到的女士中，有些人发出难闻的气味。“等等，小妞！闻闻这个，这就是你。闻闻你自己！”[然后，对着摄像机：]闻闻你自己！我要立即对女人说：“冲洗！冲洗！”有些女人不高兴，她

不喜欢听这些直截了当的话。……知道吗？我是个男人；我喜欢吻女人。我喜欢从头吻到脚。不过，要是你没洗干净，我就没法吻遍所有想吻的地方……

这段喜剧式的表演用侮辱性的语言来强化男人的愤怒。从那天起，我又注意到许多拉谱说唱乐的歌词，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青年男子已经对女性的权力和女人对他们的鄙视感到忍无可忍。

一场新的两性之战正在展开；男女双方都在寻找新式武器。时装领域成为新的战场。去年，模特儿们戴着母夜叉的皮胸罩，拿着镶宝石的鞭子和刀子，穿着细高跟在台上昂首阔步。几家主要的妇女杂志都刊登了整版时装摄影，上面的男男女女都赤身裸体，好像在做爱，又好像在打斗。这一切都旨在强化危险和暴力，同时还表达一种厌倦的感觉，似乎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无关紧要。易装癖随处可见，人们对此已见怪不怪。

在最近出笼的低热量 Sprite 电视广告片里，一位“职业”女性走进一家酒吧，她坐在一个男人边上，对他说：“所有的男人都是骗子。他们口口声声说爱你，其实根本不爱。他们一面说喜欢孩子，一面却忘记告诉你，他们已经有了两个。他们在戴结婚戒指的手指上裹着纱布，据说是钓鱼的时候受了伤。”她拿起他的酒杯，喝了一大口，然后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他答道：“低热量 Sprite。”她猛然把杯里的饮料泼在他脸上，骂他是个骗子，然后咯噔咯噔地走了出去。生产低热量 Sprite 的厂商告诉《纽约时报》的莫林·多德，这个广告是面向那些敢于“凭本能行事”的“独立”女性。

二十多年前，在一本名为《性自杀》的书里，保守的乔治·吉尔德警告说，如果女人们不回家，如果她们继续留在工作场所，那就会天下大乱，就像六七十年代的骚乱那样。只要想想那场

革命涉及的范围就不难理解吉尔德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预言。我们看到，女人一旦摆脱了父权社会的束缚，就会在许多方面变得“像男人一样”。神秘的女超人、荡妇、身穿皮装的母夜叉、怒不可遏的悍妇，凡此种种，长盛不衰。不过，女人们至少可以发泄自己的愤怒，而不必像以前那样，强迫自己咽下满腔怒火，直到憋出毛病来。

上个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使我大开眼界。那天的“艺术和娱乐”部分在头版报道了新女性“地下漫画世界”。记者罗伯塔·史密斯写道“女性地下世界从1990年开始引起广泛的注意……她们关于女性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描绘贴近大众，心理描写深入细致……从艺术危机到身体功能，一切都成了她们捕捉的对象……夸张独特的绘画风格使这些漫画成为极好的感情宣泄的手段。差不多所有的女漫画家都通过漫画来发泄某种女性的愤怒……迪·马萨的连环漫画中有一套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粗壮的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男人满不在乎地把腿伸向女人的腿。这是大多数乘地铁的女人都熟悉的动作，可是这个女人却干出了其他女人想干而不敢干的事。她猛地抽出一把斧头，咔嚓一下就砍掉了那条不识相的腿……女漫画家的作品证明，女人也有男人那样的愤怒、烦恼和欲望，她们也像男人一样，会做出一些可怕的举动或产生一些可怕的幻想……在她们作品里，女人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可怜虫或供人崇拜的偶像，她们和男人有着同样的处境。”

也许有人会从政治上反对这些作品，不过这些漫画也反映了“新女权主义”的某些特点。她们通过丑化男人和颂扬女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虽然她们缺乏幽默感。不过，喜剧和时尚的结合历来是社会动荡时期的表现方式。在那些经常在滑稽频道上出现的新一代女滑稽演员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女权运动的一些特点。

20年前，我试图在女滑稽演员中找几个不怕受辱的典型。只有菲利斯·迪勒和琼·里弗斯这两个演员够条件。滑稽演员必须在公众面前冒丢脸的风险。新一代女滑稽演员不仅拿性和暴力开玩笑，而且把月经和堕胎也拿来作为取笑的对象。和马丁·劳伦斯不同的是，她们这样做也是拿自己开玩笑。

“人们习惯于轻视那些让别人发笑的女人，认为她们缺乏女人味，”盖尔·辛格说，他认为单口相声对女演员是不适宜的”。辛格是电影《俏皮话》的导演，那是一部关于表演单口相声的女演员的纪录片。女喜剧演员罗宾·泰勒解释道，“当她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时候，她既不像芭蕾舞剧中的美女那样投入男人的怀抱，也不像歌剧里的女郎那样等待自己的恋人……”正如菲利斯·迪勒这位老资格的女滑稽演员所说，“喜剧是一种进攻性的、毫不留情的艺术，它适合于男人，因为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鼓励这种进攻性。而女人却不同，女人从小就要学会温柔、谦虚和彬彬有礼。”男滑稽演员表演结束后，常有一批追随者和狂热的女崇拜者在舞台后面等待他们，可是，“女滑稽演员不论怎样出色和成功都享受不到这份殊荣。”

我见过两个女滑稽演员当着全场观众的面拿月经开玩笑，这真是史无前例。也许你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但是在公开场合谈谈那些平时“说不出口”的烦恼至少可以帮助女人们减轻精神压力。她们谈的是卫生巾的电视广告。在某个推销新式两侧带翼卫生巾的电视广告里，这种卫生巾的两翼居然像鸟的翅膀一样上下拍打，好像马上就要飞到天上去。谈到这里，一位女演员像骑神话中的双翼飞马珀加索斯那样，把一条腿跨在想像中的卫生巾上。“有了 Kotex 卫生巾，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你有月经，”珍妮·勒库特还取笑过这样一段广告。“没错！可是当你坐在教室里的時候，你突然发现自己比别人高了整整 3 英寸！……还记得他们新发明的那种能够用后就可以冲掉的卫生

巾吗？我们都爱上了它，是吗？在抽水马桶里冲那东西，就像冲一台电视机那样容易！”

不过，正如滑稽演员乔伊·贝哈所说，有些笑话男人可以说，女人却不能。“如今有这样一位男演员，他的笑话绝对赤裸裸、绝对肮脏，”她说，“他经常用这样的话做开场白，‘于是 她就开始用嘴巴吸我的阳具，’或者，‘于是 我的舌头就舔到她的屁股上。’……要是这种话出自一个女人的嘴，她一定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样说脏话，不过关键在于女人是否愿意说、愿意听。现在还不行，违反淑女行为准则的言行是要受到惩罚的。

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们致力于证明，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但是我们忽视了男女之间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女性和男性都获得了神秘的力量。人们之所以敬畏那些宣讲生殖力周期的神圣秘密的女人，是因为她们自称是“加利福尼亚的大地母亲”。在一条关于可清洗卫生巾的广告里有这样一段话：“许多女人 [在洗过卫生巾后] 都自发地用洗下的水去浇花园里的植物，她们相信这水能使植物长得特别好。”也许你会觉得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极端，但它至少比另一类广告要积极得多。在那一类电视广告里，你会看到来自麦迪逊大道的妙龄女郎向观众讲述她的可怕经历：她的卫生巾在要紧关头出了问题，于是她只好脱下外衣，把它系在腰部遮羞。

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把我们的自尊心埋葬在羞耻和厌恶之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把经血用作花园里的肥料，但是，如果听任那些利用女性对月经的厌恶来推销商品的广告继续将新一代女性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其结果不是更加令人沮丧吗？

女子网球协会最近拒绝了 Tampax 的制造商坦布兰兹公司

的 1 000 万美元，因为该协会不愿让坦布兰兹公司取代弗杰尼亚的一家香烟公司成为它的赞助商。看来，女人们宁愿和危害生命的香烟为伴也不愿与 Tampax 为伍，因为后者每时每刻都在提醒她们每月一次的流血。太可怕了，雪白的网球装怎能和肮脏的经血连在一起？

很久以前，女性身体曾经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在古希腊城市阿尔戈斯，每年都要为阿佛洛迪特女神举行名为‘Hysteria’也就是‘子宫’的盛大节庆，”巴巴拉·沃克写道，“为了让死去的获得新生，不论是巨石建造的坟墓，还是泥土堆成的坟墩，都设计成‘子宫’的形状。这些坟墓的入口就像阴道，显示出新石器时代的人不惜耗费大量人力和精力用泥土和石头来模仿女性的身体构造。”

早在 70 年代，贝蒂·多德森就因画大幅女性生殖器图片和在课堂上教授自慰术而出名，虽然她的活动从未得到女权运动的认可。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从母亲那里得知，她的性器官很难看。长大后，她一直害怕让男人看到她的下身。直到 35 岁那年，她才甩掉了这块压得她抬不起头来的大石头。她的一位情人对她说，她的性器官很好看。“他拿出一大叠刊载裸体女子照片的杂志，在那里，我看到一些性器官和我一模一样的女子！”多德森说，“这下我终于相信，我很正常。对我来说，那是多么大的转变啊！在我现在教的讲习班里，仍旧有人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性器官！”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性器官很脏，那么，一切和它相关的现象和行为，包括月经、自慰、性交以及避孕等等，都变得十分肮脏。由于性解放和女权运动同时出现，而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又同时参加了两个运动，所以我们习惯于把它们看成是一回事。事实上，女权运动拒绝了肉体、性、男人以及美貌。现在是改变这种做法的时候了。

成功女性的服装

“我没衣服穿!”自从夏娃离开伊甸园后 这话就成了女人的口头禅。70年代,当大批妇女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服装也有了新的重要性。可是,女人们站在挂满了衣服的衣橱前,却找不到一件合适的衣服。

在过去,女人穿漂亮衣服是为了吸引男人的眼睛,现在,当我们希望和男人平起平坐时,却不知怎样穿才好。我们不想被人看作性感女郎,可是,怎样穿才能得到别人的重视?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新的、和我们熟悉的女人完全不同的形象,一个新的自我。我们不仅要改变男人的眼睛,而且要改变自己的眼睛。男人不能只看到我们的大腿和乳房,我们也必须停止和其他女人比穿着比打扮。就在这个时候,约翰·T.莫洛伊推出了“成功女性职业装”。

在今天这个狂热追求时尚的时代,莫洛伊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但是在70年代,他发明的职业女性服装规范却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在70年代中期,我们穿牛仔裤、超短裙、短裤、长裙以及各种各样在式样上和10年前的华丽服装完全不同的衣服。女权运动的宣传和活动成果显著:就业的大门打开了。我们突然发现,没有合适的职业装。

莫洛伊的“成功女性职业装”是一项重大发明,它塑造了第一代职业女性的形象。她们穿着实用的鞋子,夹着公文包,穿着深蓝色的套装、白衬衫,以及像莉莉·汤姆林所说的那样“在脖子上系着一条有点像围巾、有点像领带、有点像花边的东西。”这显然是男性职业装的女性版。职业女性迫不及待穿起的这套行头,确实满足了她们的需要。她们希望别人把她们看成真正的

职业人士、和男人一样能干的“新女性”而不是穿着紧身裤和短套衫的性感女人、穿白靴子的“库雷热女孩”或“霍尔斯顿时髦女郎”。如果你在70年代中期乘飞机旅行，你一定会注意到机上一半左右的女乘客都在仔细研读莫洛伊的书。

今天，我们又重新发掘出那些当年被莫洛伊取代的东西，重新穿上喇叭裤和库雷热少女装。我们怀旧，我们觉得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但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这并不是说莫洛伊做了一件蠢事。他是个天才。他发明的职业装帮我们顺利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并且至今仍受到许多妇女的青睐。

不过，只要有性别差异就会产生吸引异性的欲望。动物会露出它们的生殖器、竖起尾巴、扭动嘴唇、扩张身体、大摇大摆，或者发出某种气味。我们则通过服装来向对方发出信号。今天的细高跟、拉梅靴子和皮胸罩似乎在暗示，两性之间的关系又将发生新的变化。

莫洛伊的职业装表达了一种心态：别把我看成一个女人或发泄性欲的对象，我是来工作的，请认真看待我。乍看起来，这似乎是要弃绝女性视觉形象的评价标准。长期以来，男人和女人都根据服装来评估一个女人，并透过服装来想像她的身体。我们女人也像男人一样有窥视癖。虽然我们直到现在才敢不加掩饰地对男人评头品足，可女人之间的相互窥视和议论则从未断过。女权主义者会在她们的文章里告诉你，“成功女性职业装”完全是针对男人的；其实，它也限制了女人之间在梳妆打扮上的竞争。

约翰·莫洛伊对服装的研究起源于他对教育和学术界男女职业状况的研究。他发现，一个教师能否得到学生的尊重和衣着有很大关系。当他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工作场所时，他发现高层女主管在获得别人的尊重方面有很多困难。于是他得出了一条结论：要成为权威人士，首先必须有权威人士的样子。

莫洛伊向他的读者们灌输这样一条理论：男人穿上那套笔挺的西装就好比在胸前挂上了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我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实业家。”可是 70 年代的女人却缺少这样一块牌子。如果说布鲁克斯兄弟的灰色法兰绒西服打造了一代男性实业家的形象，莫洛伊设计的套装则为职业女性带来了福音。

莫洛伊在全国各地对一系列款式进行了广泛的测试，然后筛选出那些在同事和上司眼里都能得到预期效果的颜色、面料、图案、款式和风格。莫洛伊在职业女性中获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她们一丝不苟地听从他的指导，遵照他罗列的“要”和“不要”来装扮自己。

莫洛伊的书很快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跃居首位，他的追随者们向公众许诺，“有了这套职业装，女人就能更好地在平等的条件下和男人竞争。”今天，也许有人会嘲笑那身服装和那只用来代替女式手提包的公文包，可是在当时，它们是妇女进军职场不可缺少的装备。莫洛伊知道，女人要进入职场，就必须学会抑制自己的虚荣心，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而不是吸引别人的目光上。

然而到了 80 年代中期，女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莫洛伊的解决方案了，她们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更有刺激性。也许她们觉得自己辛勤工作得来的收入使她们有权得到回报。她们发现，用自己赚来的钱随心所欲地购置服装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她们开始选择比深蓝职业装更加时髦的衣服。当她们面对着挂满了漂亮服装的衣橱时，她们就可以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我！”

“不幸的是，时装业妨碍了对女性职业服装的研究，”内奥米·沃尔夫指责道，“这使妇女无法得到男性制服所提供的东西：一目了然的专业身份以及性别的适当淡化。职业妇女重新追求时髦，这当然有利于时装产业，然而女人们却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因为她们需要更多的钱来追求美貌，同时还需要在工作中做

出更大的努力来赢得别人的尊重。”

沃尔夫是否在告诉我们，重新追求时髦的职业妇女只不过是一群无意之中受人操纵的傻瓜？看来，她低估了我们的智力。正如人类学家莱昂·尔·泰格所说“我从来不信那种关于女人被洗脑的理论。这种理论断言女人是广告和电视的盲目信徒，她们轻易被人牵着鼻子走。我认为她们只是在做她们想做的事。过去她们没有多少权力，但她们仍旧渴望美貌；如今她们的权力比以前大多了，可她们对美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莫洛伊的“成功职业装”并不能满足女士们的需求，对此我也有同感。最早使我产生这种想法的是80年代“美甲室”的出现。指甲虽小，修指甲的红火却标志着对美的追求正卷土重来。美甲室的发展极其迅速，至今已有将近35000家这样的小店分布在全国各地。在女权运动之前，只有美容院提供修指甲的服务；如今，不同年龄的女人都想给自己的手指涂上极富感官刺激的鲜红色。“成功职业装”遮盖了女人的性别特征，这种像军毯一样千篇一律的服装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于是，血红的长指甲开始走红。随后而来的，是性感十足的“lingerie”（镶花边的贴身内衣）。

“Lingerie”这个词是无法翻译的。Lingerie不同于70年代前美国人的内衣或“贴身衣服”。那时，美国的商店里摆满了色彩单调、无需熨烫的胸罩和短裤，以及大量式样乏味、毫无感官刺激的衬裙。

直到第一次欧洲之行，我才看到真正想要的东西：性感十足的“lingerie”。在巴黎和罗马，在数不清的小店里，他们可以为你度身定制镶花边的淡咖啡色吊袜束腰带、装饰着小小的玫瑰花蕾的淡蓝色缎子拖鞋。看来，温莎公爵夫人并不是惟一迷恋于漂亮精致的性感内裤、花边内衣以及定型胸罩的女人。

今天，在美国有许多性感 lingerie 的设计师。1982 年开业的“维多利亚之谜”如今在美国已有 601 家商店。费尔南多·桑切斯不愧为顶级设计师。70 年代末，当我第一次在《时装》杂志上看到他设计的用黑丝绒和马拉布制成的睡袍时，它立即在我的潜意识里唤起一阵强烈的欲望。我坐在打字机前，穿着旧毛衣和旧裤子——它们像女职员的蓝色“成功职业装”一样，是我写作时穿的工作服。与此同时，我却渴望天鹅绒、丝绸和缎子给人带来的绝妙快感。虽然在我的生活中似乎没有任何场合需要穿这种衣服，但我仍阳把它买了下来。

我穿着它为朋友们烧菜，上菜。直到今天，我仍旧保留着那件马拉布袍子。

我要像颂扬诗人那样赞美桑切斯。在“成功职业装”最流行的时候，他创造了性感美。他是对的，我们两者都需要。今天，我们仍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追求工作、爱情和性的完美结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大批妇女进入工作场所，她们才对漂亮的 lingerie 产生了如此强烈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职场上的竞争，她们迫切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女性身份。那些人指责时装业引诱女人追求时尚的人其实并不懂得女人的力量来自何方。

还记得我对青春之舞的描写吗？那是比喻青春少女的性觉醒。让我们再来设想另一种舞蹈：早晨，一位成年妇女准备去上班。她拿起深色的职业装，那衣服非常有效地遮盖了她那迷人的曲线，将别人的眼睛引向其他地方，例如她的工作成就等等。然而，在穿上那套衣服之前，她拿起一件黑色的缎子内衣套在身上，然后站在镜子前独自欣赏镜子里那美丽的形象，虽然周围连一个赞扬她的男人也没有。不过，整整一天，她都能感觉到这件衣服的存在，它提醒她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女人。

为什么有些女人为了自我欣赏而不惜花大钱购买昂贵的丝

绸女内衣？这里有一些柔弱然而却值得骄傲的东西。这是一种一人独享的奢侈，是我们用自己挣来的钱买来的。我们通过它来表现自我。我们像需要面包一样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性形象。

在现代女权运动的早期代表中，弗洛·肯尼迪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她有一颗诚心，她拒绝空洞的口号，反对抛弃任何供女人化妆打扮的东西。“指甲油或假睫毛和政治无关，”她在1974年说，“只要有好的政治主张，穿什么戴什么都无关紧要。我可不想让任何人对我发号施令，告诉我应该这样穿，不应该那样穿。我的政治观点和戴不戴胸罩毫无关系。”

记得一次在豪华的四季餐厅举行的集会。我们都穿着牛仔裤和靴子。演讲的内容包括让妇女进入政治权力机构，理由是，女人会自动地把诚实、善良以及和平带给整个世界，因为这是女人的本性。弗洛·肯尼迪再也无法忍受这些空洞的高调，她冷静地站起来说：“让我们停止这些废话吧。”她拒绝剪掉长长的红指甲，并且继续穿她的紫狐皮外套，直到那件衣服“在一次集会上被人偷了（根据她的说法）”

如果我们女人不能更有效地利用美貌，男人就会把它变成自己的专利。女权运动应该着手研究美貌的作用，而不是诋毁和否定它。我们应该在大型讨论会、小组讨论会、专题报告会上对美貌的作用展开辩论。我们需要了解美貌的作用，掌握竞争的游戏规则。

如果我们继续在穿衣打扮的问题上相互攻击，我们就会忘记女权运动最初反对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那些使我们的生活倍受限制的清规戒律。这些清规戒律使我们处处小心翼翼，不敢畅所欲言，不敢随心所欲地穿衣服。多少次，我们在镜子前把胸前的钮扣解开又扣上，拿不定主意到底可以露出多少肉体。我们害怕别人的指摘，尤其是其他女人的闲言碎语。

谁有这么大的权利发号施令，规定女权主义者应该是什么样子？不错，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已回过头去追求美貌。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我们中间的某个人成为注意力的焦点时，有些人就觉得无法忍受？妒忌确实可恶，但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它的存在，才能决定如何对付。今天，我们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能够参加竞选、管理大公司，但是我们却不能容忍像麦当娜和史翠珊那样的大胆和炫耀。

麦当娜创造了自己的形象，她从来不为她那性感十足的表现欲感到羞耻；相反，她赢得了成千上万的崇拜者，他们从她的表演中获得了勇气。当然，一个能赚大钱的性感女人肯定会引来很多人的妒忌。不论她下一步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麦当娜在年轻人中无疑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她们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她们能够认同的、更加诚实的女权主义。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里，一个能够集智慧、美貌和性感于一身并且从中获得巨大好处的女人，自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另一位引起争议的女士是黛安娜·索里。在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明星主持人之前，她曾是白宫的演讲稿撰写人。1987年秋天，《名利场》杂志用整整两页的篇幅刊登了一幅光彩夺目的照片。照片上的索里是个真正的美人，浑身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让她穿着睡袍做出一副懒洋洋的姿态。她的头往后仰，美丽的长发就像一条金色的瀑布。

可是没多久，妒忌和竞争就接踵而来。人们指责索里“太过分”、“太性感、违反”职业准则”。当时她正在谈判一份新的合同。和她同居的那位男士说，她很害怕这样的批评，拍照的那天晚上，她回到家就开始后悔不该受那个安妮·莱博维茨的引诱摆出那副迷人的姿态。

在一次晚餐会上，我把索里的批评者们说成是一群荒唐可

笑的人，并说如果只看报上的那些文章，你会以为索里拍的一定是裸体照。可当时在场的几乎都是媒体和出版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毫不客气地反驳道：“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工作是报告新闻，她应该努力获得观众的尊重和信任，而不是毫无节制地炫耀自己的美貌。那会毁了她的前程！”

事实上，索里随后就和美国广播公司签了一份 700 万美元的合同，大大超过了她过去的年薪。那张照片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你自己来判断吧。至于索里，可惜的是，她不久就剪短了那头美丽的长发。也许这是她的自我惩罚，然而在我看来，值得怀念的正是那种大胆地发挥女性魅力的举动，当然还有那头长发，它为索里的美貌增添了无限风采。也许我们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才能抛弃这些清规戒律。

在此期间，有些人会成为牺牲品。希拉里·克林顿的政治生涯就和她的头发密切相关。希拉里原先对时装一窍不通，有趣的是，她的开窍也和安妮·莱博维茨的神奇镜头有关。希拉里在丈夫刚当上总统的时候仓促上阵，不过她不久就全线获胜，包括美貌这一仗。希拉里·克林顿不是一个普通的第一夫人。她属于这样一代女人：她们看上去和男人一样独立自主、自作主张、积极进取、喜欢竞争，甚至比男人更胜一筹。她的外表充分显示出她的行为方式。如果用软聚焦来拍摄克林顿夫妇，特别是希拉里，那将是对现实的歪曲。

希拉里·克林顿的故事之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她的外貌在媒体的频繁曝光和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这位“不时髦”的第一夫人变成引人注目的漂亮女人？克林顿总统的母亲，已故的弗吉尼亚·凯利曾说，“我常常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叫希拉里坐在我的澡盆边上，让她好好学学怎样化妆。我要让她看看，怎样才能显示出她的天生丽质。什么崇尚自然？她把自己的好模样都藏了起来。可

惜她太忙了，又要完成学业，又要参加公益活动。化妆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

现在却不同了。我想，一个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成功地进入权力中心的女人一定会体验到美貌的力量，就算她没有对此欣喜若狂，也会觉得十分有趣。那些曾在克林顿任职初期为希拉里服务过的形象设计师说，当她在电视演讲开始之前，当设计师为她化妆时，她的眼睛从不看镜子，只顾盯着手里的演讲笔记。

但是，演讲结束后，她一定会听到人们对她的赞美，看到他们的微笑以及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眼神。安妮·莱博维茨为她拍了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一身性感的唐娜·卡伦裙装。希拉里早就习惯于别人称赞她的成就，但是对容貌的称赞会使人感到一种不同的温暖。

我们早就知道希拉里不是理想中的家庭妇女。她是个现代女子，她在政治舞台上奋力拼搏，使尽浑身解数过五关斩六将。如今，她又以一个漂亮女子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她的形象是对传统美德和道德规范的挑战。这正是心理医生的要求。我们早就应该抛弃那种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温和、更有德性的观念。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掩饰美貌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要作用。在男人掌握经济大权的社会里，女人是通过操纵男人来获得权力的。现在是我们走下女神宝座、脱去受害者伪装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可以在晚间新闻里观察美国权力最大的女人如何学会运用她的美貌和魅力。这实在是一件好事。

否认竞争

如果没有经历过 60 年代以前的生活，我就无法动笔写这本

书。60年代改变了一切，包括美貌在女人生活中的作用。女权运动的兴起把妇女从梳妆台前推向职场。为了在男性控制的经济领域里挣到一份属于我们的权力，我们必须放弃传统妇女用美貌从男人那里换取一点好处的生活方式。从60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美貌和男人都成了怀疑的对象。

到了80年代中期，表现欲十足的打扮又卷土重来。电视台的女播音员在报告新闻时穿上了色彩艳丽的上装。1985年的时装杂志刊登了唐娜·卡伦的首次时装展示，包括一套极其性感、极其引人注目的红色羊绒紧身衣裤和包裹式裙子。它们立即在我心里激起一阵强烈的占有欲，就像20年前鲁迪·格恩赖克的紫红裙子和橘红衬衫那样。

于是，美艳取代“成功职业装”再次显示了它的魔力。我们不禁要问：在充满竞争的工作场所，女士们将怎样看待这种新的强调性感的时尚？她们有没有想到这样打扮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她们将如何应付别人的妒忌？男士们对此能否泰然处之？

当女士们穿着紧绷在屁股上的短裙走过男士们的办公桌时，当视觉刺激激发起雄性激素时，男士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怎样才能感受性刺激的同时专心工作？

“在现代工作场所，男人是雄蜂，女人是蜂皇，”卡米尔·帕格利亚写道，“在公司里，男士的服装掩盖了他们的性征，女士的服装则强化了女性身体的特点。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性感服装都不可避免地使女人成为视觉注意的焦点。大多数男士，不论他们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当他们评估一个女人的时候，都会本能地注意她是否有一双‘好看的腿’或丰满的胸部。大多数女士也会这样看一个女人。这并不是因为在人们眼里，女人仅仅是‘一堆肉’（女权主义的指责）而是因为这些特征会使一个女人处于比别人更加有利的地位，从而破坏工作场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衡和稳定。在工作场所，高效率意味着统一

行动，而女性性别特征的强化则会扰乱单调机械的工作进程……因为她把自然王国里的东西带进了狭小的社会组织。”

我感觉到历史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变化，就像 60 年代初那样，我希望能够对此作一番探讨。当时我好不容易写完了一本书，实在不想再为另一本新书在书房里呆上三四年，但是我又无法摆脱出现在脑子里的这个念头。于是我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并开始给一些在著名时装杂志社工作的朋友打电话。

我向他们提议搞一个图片故事，用照片来显示拥有迷人曲线的女士们如何神气活现地活跃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并且在说明文字里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时髦性感的职业女性有很多事情要做：她要应付其他女人的闲言碎语，她要安抚那些被她那诱人的香气搅得神魂颠倒、心神不定的男人，办公室里的一切必须恢复正常状态。她的责任可真不小，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也会觉得难以应付，更不用说一个三十来岁的新手。

“你说的‘美貌的魔力’是什么意思？妒忌和竞争和时装又有什么关系？”杂志的编辑们问道。我不想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一篇长文，于是就另辟蹊径。我制作了一盘 10 分钟的录像 搞了一个电视系列节目，在三个城市举办了研讨会，为一家著名化妆品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还和以丹·扬克洛维奇和马德琳·霍克斯坦为首的市场研究机构 DYC 公司合作搞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调查。

我邀请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在讨论会上讲话，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他们都记得 60 年代性解放和妇女革命之前的社会。我想，也许应该让年轻女士们了解，当美貌是女人手里的惟一资本时，她们的母亲是怎样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生存。

“我对讨论美貌这个题目感到很不自在，因为我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个知识分子，”电影评论家莫利·哈斯克在 1989 年

的第一次研讨会“美貌的力量”上说：“女人和美貌——或者说女人和镜子——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个人、非常独特、非常私密和神秘的关系。”

我之所以邀请哈斯克爾在研讨会上讲话，是因为我喜欢她的文章，并且认为她是个承认和欣赏自己外貌的女士。不错，我也把她看成一个知识分子，但更重要的是，她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女人在拥有美貌的同时是否还能拥有其他的才能和权力？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能同时追求美貌？

根据父权制的陈规陋习，漂亮女人不需要拥有其他才能，即便有，也不应该显示出来。可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思想活跃、能说会道的漂亮女士。我和她们中间的不少人交谈过。我们都感到，即使在今天，过去的一套似乎仍在影响我们。如果一位女士同时拥有美貌和事业上的成功，那她就必须分外小心。

为了对付别人的妒忌，我们从小就学会否认自己的美貌，因此就无法充分体验它的力量、它对人们的影响，也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它。“当然，说谎是一种通过操纵别人来获得权力的方法。孩子们不仅学会说谎，而且学会保守秘密，”哲学家西赛拉·博克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抛弃这种习惯。如果我们想成熟起来，我们就必须放弃以这种方式来获取权力或利益。……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养成一种生活方式，使我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避免试图操纵对方？”

我从博克的著作中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具有母权制倾向的女权主义必须停止那种把竞争和罪恶混为一谈的说教，因为事实证明，现代女权运动本身就是竞争的产物，但这个运动又反过来拒绝容忍不同观点的辩论。母权派其实都是很懂得如何操纵别人的人。

今天的妇女已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而这个市场就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在今天，重弹“拒绝竞争”

的老调即使不是相当有害，至少也是荒唐可笑，因为它捆住了妇女的手脚，使她们无法放手参加竞争。这同我们对待美貌的做法没有多大区别，即我们一直在利用美貌，同时却矢口否认这一事实。同样，有些职业妇女一面拼命往上爬，一面却装模作样、用冠冕堂皇的语言来掩盖自己的不择手段。

男人之间也有激烈的争斗，但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好斗性。在我认识的人中，有非常好斗的女人，只是她们不承认自己好斗罢了；也有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男人，可是这样的男人却得不到赏识，因为这不合男子汉的形象。如果说，男人不希望女人夺走他们的工作，女人也反对男人占据她们在家里的位置。

最叫人受不了的，是那些以爱来代替竞争的许诺。“长期以来，我们女人最起劲的就是相互攀比，看到别人的乳房比自己丰满就觉得不舒服，看到别人的礼服比自己的豪华就羡慕不已。”《女士》杂志的编辑莱蒂·科廷·波格里安写道“比起其他的不良倾向，例如碰到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喜欢以名人显要来抬高自己的身份等等，相互攀比是一种更加普遍的坏习惯，只是我们过去一直不愿承认而已。现在，妇女们开始打破沉默，分享内心的秘密。我们领悟到，我们之间的竞争不是可耻的背叛，而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策略……一旦抛弃这种相互竞争的习惯，我们就能看到更高的目标：女性之间的亲密无间。”

女权主义至今仍在用大妈的口气发号施令：要听话，不许顶嘴，不许相互竞争，做个妈妈喜欢的好女孩。这些拒绝竞争的清规戒律其实是继承了父权社会的衣钵，它们只能使妇女在摆脱父权制的枷锁之后又落进母权制的牢笼。

具有母权制倾向的女权主义最有害的倒退行为就是试图恢复古代那种理想化的母女关系，因为这正好迎合了那种认为女人在道德上比男人优越的信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妇女最需要学会健康的竞争规则的时候，有些女权主义者却在提倡无

竞争的母女联盟。

工作场所的竞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战争。每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必须和其他人争夺有限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男女之间还存在感情上的竞争。“今天，我们之所以感到如此困惑，原因之一就是工作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心理学家和管理学教授利萨·迈内罗说，“从 80年代初开始，公司企业关于服装、形象、外表的标准变得更富有弹性。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工作场所已经成为和异性交往的场合。在我调查过的女职员中有 76%的人说她们曾直接卷入或听说过公司里的风流韵事。”

迈内罗是在我主持的最后一次研讨会“工作场所里的美貌”上说这番话的。那是 1990 年。一年后，我和 DYC 公司完成了为期两年的重点调查和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女性把外貌视为影响她们自我形象的最重要的因素；76%的人将外貌归入十四种个人特点中的前五种，34%的人把外貌放在第一位，先于智力、工作表现和性力。调查对象中四分之三是参加工作的妇女。

迈内罗在她的研究里发现，男女员工都担心，漂亮女人在工作场所会比别人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从而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和 DYC 的调查结果完全一致的。在过去的 5 年里，对美貌、性和外貌在工作场所的作用有过很多的研究。1979 年，马德琳·海尔曼在她的研究中发现，漂亮的外表对男子是一个有利条件，但只能给职务低的女子带来好处。这就是说，如果女经理是个美貌女子，人们就会觉得她女人气太足，从而把她和女性的传统形象如被动、胆怯等联系起来。

到了 80 年代末，有两项研究显示，男子每增加一分吸引力，他的起薪就会提高一千美元；容貌对女子的起薪影响不大，但是在开始工作之后，多一分吸引力就会为她增加超过两

干美元的年薪。到了 1993 年，长相漂亮的职业男女要比其他同事至少多拿 5% 的工资。1993 年的麦考尔 / 扬克洛维奇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参加调查的妇女同意，“大多数人根据外貌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美国妇女希望别人能爱我们本人，”时装评论家霍利·布鲁巴克说：“如果我们长得漂亮那只是一种额外的幸运。这种态度也许和清教传统有关，但是女权运动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倾向，她们使我们相信，女人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外貌，理由是对美貌的崇拜违反了人人生来平等的基本原则。”

我们常说，判断一本书的好坏要看内容而不是看封面，这也许是受了清教传统的影响，但是女权运动对外貌的看法更多地来自女性对竞争的禁忌。

今天的年轻女子已经摆脱了父权制的限制，容貌对她们来说已不是求生存的惟一手段。然而她们仍旧意识到，外貌对她们们的生活确实会产生影响。在我们的调查中，86% 的妇女和 76% 的男子认为，容貌对女人很重要，因为它影响女人的自信心。

美貌、性、竞争，在这三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美貌和性的关系越密切，它引起的妒忌就越强烈，危险也会随之增加。可惜没有人愿意正视这个事实。我们的时装正变得越来越性感，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资助和性相关的科学研究。

面对古典式的美貌，女士们常会产生竞争的欲望。但是，崇尚性解放的女人们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嚣张的、咄咄逼人的美貌却常常在其他女人心里激起一种难以忍受的强烈反感。即使这个女子并不漂亮，她也会被其他女人视为一种威胁，因为男人喜欢性感女郎。男人喜欢和喜爱自己身体的女人在一起，因为这样的女人也会以同样的热情去爱男人的身体。

1993 年，当大明星芭芭拉·史翠珊出现在克林顿的就职典

礼上时，她穿了一条十分精美雅致的深色裙子，上身露出一点儿胸槽，下面的开叉一直开到膝盖。安妮·泰勒·弗莱明立即在《纽约时报》“专栏版”里发表了一篇恶毒的评论。最让这位女作家受不了的是：“史翠珊让我们看到在那若隐若现的职业装、虚张声势的外表和无懈可击的社交技巧的掩盖下，隐藏着一个不折不扣的荡妇。”

如果史翠珊的裙子没有开叉，如果她没有露出那部分腿和胸部，那她的职业装大概就不成问题了。不幸的是，她的穿着打扮同时发出两种不同的信号，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混淆激怒了文章的作者：“那条开叉在对男士们说：别看我们模仿你们的穿着打扮、口口声声要进入你们的领地，放心好了，骨子里我们仍旧是你们的性感女郎、你们的 MTV 梦幻女孩……这套衣服向我们显示，社会如何使女性丧失独立性，沦为新的性奴隶，一群甘愿被男人压在底下的荡妇。”

显然，史翠珊的裙子不仅发出了美的信号，而且发出性的信号。我的感觉是，史翠珊看上去棒极了，她的打扮是美貌和智慧完美平衡。但是弗莱明却看到了相反的东西。在她眼里，史翠珊的那身打扮“向美国妇女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关于美国女性的信号”。然而在我看来，她的服装向男士和女士们传达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弟兄们，认出你们的衣服了？我只是借用而已，不过，我给它加上了你们没有的东西：女人的腿和乳房。”史翠珊成功地发挥了她的多才多艺来塑造一个既优雅又性感的形象。她实在是个值得赞扬和仿效的典范。

作家诺曼·梅勒一辈子都和漂亮女人在一起，一辈子都在写漂亮女人。当有人在一次访谈中问他，女人追求美貌是否是为了男人，他答道：

不。女人穿漂亮衣服也好，做头发也好，都是为了给其

他女人看。她们之间的竞争可厉害了。它使我想起 60 年代初的爵士乐手，他们把听众甩在一边，一门心思相互较劲，他们的演奏一天比一天花哨，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向对方炫耀自己的绝技。如今，女人也是这样追求时髦。在几百个女人中，总有那么几个领头的，其他的人则像奴隶一样跟在后面。她们一面相互攀比，一面抱怨男人越来越浅薄。男人追求漂亮女人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所有的女人都 在拼命追求美貌。要想摆脱这种没完没了的追逐、守着一个贤妻良母过日子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其实，放弃追求美貌的女人不见得有德性。对女性最有害的警告莫过于劝她们不要像“邪恶”的男人那样竞争。我们需要在工作场所展开健康的竞争，只有这样的竞争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应该看到，有些人由于遗传、性格、家庭背景等原因比别人更富竞争性。如果把避免竞争说成是女性的美德，那就是对这些人不公平。

在《发自内心的革命》一书中，斯坦内姆敦促妇女们放弃竞争，要像聚在一起缝被子那样建立起相互协作的关系。“自尊和才能来自学习和突破个人的局限，而不是想尽办法把别人比下去。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学习和合作都能给我们带来满足以及相互之间的感激之情。当每个人都能做到自我完善、无私奉献的时候，一个新的范例就会产生出来：环形的关系模式……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一个环形，我们的目标就是完成这个循环，而不是摧毁别人……如果我们把自己工作的组织和机构也看成一个环形，我们就会把卓越的工作和相互合作视为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相互竞争。”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斯坦内姆引用了阿尔菲·科恩关于竞争的怪论：“卓越的工作不仅不需要竞争，通常还需要排除竞

争……我们之所以竞争，是为了克服我们对自身能力的怀疑；这是对自卑心理的补偿。”

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生活的观点。当我们迫切需要学会竞争的时候，女权主义却在向我们兜售“环形模式”。当然，我们没有必要鼓吹竞争，因为竞争意识在幼年时期就已形成。当我们意识到将要失去我们所珍视的人或物时，我们就会感到强烈的焦虑、恐惧和愤怒。这就是竞争，而那个可能从我们手里夺走心爱的人或物的人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即使在恋母情节出现之前，孩子也会对任何将母亲的注意力从他身边吸引过去的人或物产生竞争的欲望。孩子的目标是，把母亲的注意力从父亲和兄弟姐妹身上或从工作上拉回到自己身上。

这些侵扰行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幼年时期的经历会影响我们长大后对竞争的反应。可以说，在恋母情节出现之前，我们只知道全力反抗。在恋母情结出现之后，性进入我们的竞争意识，随之而来的是内疚和对报复的恐惧。于是我们不得不学会对竞争加以约束和限制。协调成了我们的目标。

在斯坦内姆的“环形模式”里，“发展就是相互支持相互联结。”女权主义用这套观点来代替健康的竞争精神，要我们重温小时候母亲的训导：“相亲相爱，一视同仁。”那时我们并没有相信这种话，现在就更不会相信了。大多数母亲不知道如何培养孩子健康的竞争意识，因为她们自己也不懂得。

然而，我们在工作场所看到，人在本质上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不同色调的灰色。我们身上都有好的地方和坏的地方。竞争不是男人的专利，也不是品行高尚的女人所能排除的东西。我们常会碰到几个人争一份工作或一份合同的情况。欺骗和伤害别人的做法当然不行，“环形模式”也不行。惟一可行的是努力做得比别人更出色，努力证明自己比别人合适，用这种方法来赢得那份工作或合同。这才是安全、健康的竞争。女士

们必须学会这种竞争方式 使它变得更好 但绝不是取消竞争。

我丈夫在担任《华尔街日报》执行总编的时候，他开创了聘用和提拔妇女担任高级职务的先例。有些人干得比别人出色，但是在碰到批评和竞争的时候，很少有人能从容应对。于是他只好把她们叫到办公室里面面对面谈话，有的人还常常要哭鼻子。这些女士们很有冲劲，但是却受不了一点批评。她们把批评当作惩罚。

这是因为上司的批评唤醒了我们幼年时期的恐惧。我们知道，竞争和积极进取并不是社会所推崇的女性行为方式，因而也得不到母亲的赞许。小时候，我们害怕母亲的责备，害怕因违背母亲而失去她的爱。这种恐惧一直伴随着我们。即使到了 30 岁、40 岁，在遭到上司的批评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受到母亲责怪的小女孩那样恐惧和伤心。于是在短短的 10 分钟之内 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变成了哭哭啼啼的弱女子。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常使男性上司摸不着头脑。其实，问题的根子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论那些使女人沦为二等公民的外部原因，现在是我们承认自身问题的时候了。

我对内奥米·沃尔夫的书《美貌的神话》感到失望 因为她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探讨竞争这个妇女运动避免谈论的主题。相反，她利用虚假的统计数字，把女人对美貌的追求归咎于“邪恶的男人”。她的书处处表现出受害者的姿态，这只会使年轻一代继续把男人视为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看不到女性世界自身的原因。

在男人眼里，竞争和建立协作关系并不矛盾，因为他们相信两者都能创造机会。女人却不同。在工作场所，我们不仅害怕公开竞争、不善于公开竞争，而且在建立协作关系上也很成问题。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很少互相帮助，因为我们害怕别人会赶上或超过我们。我们之所以如此焦虑不安，是因为在我们眼

里，资源和机会都是有限的东西，如果让别人多拿一份，那我们就会少拿一份。

这并不是说，男人相互帮助是因为他们都是善良和慷慨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相互协作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和感激之心。今天你帮助了别人，明天他就会用各种方式来报答你。我们不相信这些，因为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体验。在我们眼里，对手就是敌人，正如康涅狄格女子垒球队的教练所说的那样，在比赛结束后，输了球的姑娘们往往会耿耿于怀，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敌人。

如果一个男人在比赛结束后不懂得和自己的对手握手言和，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喝一杯，那么他就会被视为一个不合群者，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学会竞争的规则。只有学会这套规则，人们才能依靠共同的努力开展竞选、合作，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在协作上，男士们做得比我们好，因为他们大多对竞争性已习以为常，并且懂得互相帮助的重要性。

例如，比赛后双方运动员要互相握手，因为握手能够平息怒火、重建友谊、消除失败带来的失望和痛苦。这样，失败的一方就会把对方的胜利变为加倍努力的动力，争取下一次反败为胜。如果像我们那样，失败后就憋着一肚子的怒气，那只会使人变得刻薄和狭隘。

我们需要更多的对话、发表不同看法的自由以及公开和健康的竞争。在工作场所，我们可以互相争论、为争夺一个新的合同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但这不应该妨碍我们在一起共进午餐。工作场所的竞争性不同于传统的女人之间的关系，为了不妨碍整个系统的顺利运转，我们必须学会在冲突过后言归于好。当然，相互协作也会带来危险，合作者在变得强大之后可能把我们打败 但是这个风险值得去冒 正如最近一期《财富》周刊封面上的一句话：“失败了。那有什么关系？”

第七章 镜子里的男人

外公的衣橱

小时候，外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他的梳妆室也成了
一个极其神秘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按照他的要求布置得十分
典雅和考究，空气中有着淡淡的高档皮鞋和古龙香水的气味。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所有的人都爱外公，但也对他抱着几分畏
惧。他是我崇拜的对象，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人。

我对母亲衣橱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因为我差不多每天都
要在那里翻找零钱，然后就到布罗德街上一个老头开的小店里
去买冰淇淋或邮票。我把那些印着异国风景的邮票都贴在集邮
簿里 那是外公在我 9 岁生日时送给我的礼物。

那天早上，外公破例让我爬到他的床上。我坐在一堆枕头
中间，和他一起打开那本大大的皮封面集邮簿。那里面已经放
了许多外公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收集的邮票。我的漫游癖大概就
是那时产生的。母亲的衣橱却没有这样的神秘感。我爱母亲，
但不打算像她那样在体面舒适的家里安安稳稳地过体面舒适
的生活。我想做一个像外公那样靠自我奋斗起家的人。外公当年
在匹兹堡白手起家创建了自己的合金钢公司。在大萧条中，他

失去了所有的财富，但是后来又东山再起。

夏天，我们常到外公在尼亚加拉河边的住所度假。在八月炎热的下午，我常常溜进他的卧室，然后拉开一道门，进入一间四壁都装饰着镶板的房间。那是他专门用来放衣服的地方。灯光从隐蔽的角落里射出，照亮了一套套做工非常考究的西装。红木衣橱的抽屉里放着一叠叠用最精美柔软的面料制成的衬衣，还有一排排的帽子和晨衣，在垫着天鹅绒的小抽屉里，有戒指、链扣以及其他的男用饰件。

墙上镶着镜子，还挂着很多照片，上面都是外公珍贵的东西——他的马、房子、游艇，还有家里的人。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一件在邓希尔服装店设计的蓝色水手短外套，以及与此相配的灰色法兰绒裤子和名牌便鞋。这是外公在购买最后一艘游艇“公爵夫人”时为他五个子女定购的衣服。他们都讨厌穿着这套衣服在安大略湖上游戈，可是我却恨不得自己马上长大，成为这些衣服的继承人。对我来说，外公传下来的任何东西都是无价之宝。

我的房子里还挂着一幅外公的肖像，那是外婆画的，她是外公的第一个妻子。那时他还是个英俊的年轻人，红头发，很像作家 E.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年轻时的样子。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外公已经年老发福，看上去很像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那年，他在秘书和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我们这个安静的镇子上，住在森普特要塞宾馆。他穿着一套白色亚麻布西装，戴着巴拿马草帽，嘴里叼着雪茄。我第一次看到像他这样的男人。

全家的人，包括孙子辈和他的成年儿女们，都对他毕恭毕敬。母亲和姨妈在他面前都变得十分温顺。她们爱他，渴望得到他的尊重，但也害怕他的厉声训斥。他对子女所做的一切都不满意，从当海军将军的舅舅在猪湾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到母亲站立的姿势——“站直了，挺起胸来！”他命令道。当全家人都集

合在乡村俱乐部时，外公显得特别得意；所有的人都打扮得无懈可击，每个人的身高都不低于五英尺八。

我特别喜欢外公的潇洒和自在、他的开怀大笑和充沛的精力。我发现，要得到他的喜爱就不能畏缩，要毫不客气地爬上他的膝头，给他一个有力的吻，并且讲个故事给他听。我向他显示我在学校里得到的全优、奖金和勋带。他多么喜欢看到我的成就啊！很久以前，我就决定不再向母亲报告我取得的任何成就，因为我觉得她对我漠不关心。我把成绩报告卡都寄给了“科尔伯特老爹”（外公喜欢我们这样叫他）。他会向秘书约翰口诉一封充满了称赞和鼓励的回信。这就是他对我的奖励。

我高中毕业时，外公送给我一套哈特曼箱包，还许诺大学毕业后让我到欧洲去旅游。“要买最好的，”他对我说，“这笔钱永远值得花。”在那个时代，“好”东西就是高质量的东西，名牌箱包都是经久耐用的箱包。10年后的哈特曼箱包就差远了。

女人能否通过男人的眼睛来看自己？当然可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二十多岁时为自己打造的形象实际上是在按照外公喜欢的那种女人来设计的，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在挑选服装的时候，特别注意面料和式样的美观以及引人瞩目的效果。我的穿着和家里的其他女人都不同。她们比较保守，一点儿也不像我这样张扬。在这方面，我是外公的嫡系。

如今，当男人们也开始在外貌上下功夫时，也许会有更多的年轻女子像我一样，注意观察自己所爱的男人如何看我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渴望引人注目，但是像我这样从小得不到足够关注的人并不少见。正因为小时候在家里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外公才变得如此重要。是他填补了我生活中的空白。

60年代，外公到曼哈顿来时从来不事先通知我。他通常从皮埃尔饭店或广场饭店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何时何地和他共进午餐或晚餐。只要接到他的电话，我就会取消原先的计划，精心

挑选服装，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见他。一进门，就看见他站在屋子中间，张开双臂迎接我，自豪地把我介绍给他的男性朋友们。最让他高兴的是我是个“有工作的姑娘”而且到欧洲和加勒比地区去办过事，这些都使他的朋友们对我刮目相看。

午餐后，外公抽着雪茄和我一起逛街。我们去萨尔卡或邓希尔，那是他最喜欢的男子服饰用品店。一进门，我们就受到盛情接待。店里的人让我们坐在舒适的椅子上，送上一杯白葡萄酒，然后向我们展示商品。外公对精美物品有特殊爱好，他对一切神秘的细节都感兴趣。他点燃一枝新的雪茄，看着店里的人从秘室里拿出他想看的東西，比如一块料子。这些东西只有他，查尔斯·科尔伯特，才感兴趣。他常和店里的经理聚精会神地研究衣服上的一个翻领，问我对领带、运动上衣、餐服或衬衣料子的看法，教我如何从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上看出裁缝高超的技艺。

与此同时，他会自豪地对经理重复他在其他人面前说的话：“我的外孙女是个有工作的姑娘。”当那人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时，他就显得十分得意。看到他那高兴的样子，我微笑着搁起二郎腿。确实，外公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的自食其力就是从他那学来的。

70岁那年，他卖掉了自己亲手创立、又亲手重建的公司。那天下午6时，他用平常那种命令式的口气给我打电话，叫我在广场饭店和他一起吃晚饭。我告别了身边的男友，乘出租车横穿市区。外公正在房间里穿衣服。他面带倦容，但仍显得兴致勃勃。

我们坐在又大又深的沙发里，一面看着窗外中央公园淡绿色的树丛，一面为他的成就干杯。他难以想像，没有了工作、责任和权力，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外公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干活，他不仅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负担父母的生活。他的父亲是个

大好人，把人看得比钱更重要。客户要是缺钱，他就放弃向他们讨债，结果他老是破产，最后只得靠儿子生活。自从他卖掉公司以后，外公的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他像许多男人一样，退休以后就觉得无所适从。

不过，那天晚上他的状态极好。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单独在一起。他为自己给子孙建立的信托而感到自豪，还逼着我问他信托将如何运作。但是我一想到任何和他的死亡有关的事就感到心寒，于是就求他讲讲年轻时如何在匹兹堡同梅隆和卡内基一起在威廉·佩恩饭店吃饭、在越野赛马中较劲以及喝非法酿造的烧酒之类事。

他回想起第一次为求职去参加面谈的情景。那天他迟到了，只好一路狂奔，在经过铁丝网栏杆时把新皮鞋都划破了。他还回想起他和歌手德洛里丝的约会，她后来成了鲍勃·霍普的妻子。他记得在迪凯纳这个匹兹堡上流社会的俱乐部里，在通往女宾部的楼梯上，总是站着一个穿白衣服的接客员。

我们喝酒的时候，一位听差在外面敲门。外公急忙叫我躲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他怕那位听差把我当成“坏女人”。毫无疑问，这是老人家的幻觉在作怪。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跳舞。当我们走进波斯厅时，外公把一张钞票塞在总管手里，对他说：“约翰，这是我的外孙女，你一定要好好招待她。”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全家在感恩节来此聚会的时候，约翰就站在这扇门旁。他把我们带往一张位于舞池边的桌子旁，我们可以在那儿看埃塞尔·默尔曼（也许是博比·戴林）的表演；大人们一面喝马提尼酒，一面吃蛙腿及其他食物。我最讨厌的就是蛙腿。约翰一定不记得当年那个相貌平平、嘴里戴着牙齿矫正架的小女孩了，因为他似乎不太相信我是这位风度翩翩的老先生的外孙女。

那天晚上，外公和我喝香槟酒，吃牡蛎和龙虾，跳各种各样

的舞。他老人家是个真正的跳舞高手。那天，他把我搂得太紧了点；吃饭时，他把手放在桌子下面我的腿上。我一再把手移开，心里感到一阵难过，外公是在庆祝他生命的最后一幕啊！

“在这个家庭里，你是惟一能够看到他男子汉魅力的人。”几年后，在外公去世之前，我的继外祖母对我说。她还告诉我，外公是个非常风流的人。他喜欢漂亮女人，结过三次婚。尽管如此，他仍旧是个天主教徒。用他第三个妻子的话说，他是“棕榈海滩最吃香的男人”。

如果说，外公在晚年把我看成一个富有性感的女子，我敢肯定，我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女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是他的后代，他是我的典范；我希望活得像他那样潇洒，那样有声有色。正因为如此，我喜欢和男人在一起，我不认为他们比女人更坏。

养家活口的人

直到最近，大多数人都认为“真正的男人”必须是个能够养家活口的人。男人挣的钱越多，为家庭提供的物质财富越丰富，他就越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至于他的个性如何，是冷漠，还是热心肠，那都无关紧要。

一代又一代的男孩就是在这样的信条影响下长大成人。可以说，它就像洛克菲勒中心外面那位肩负地球的巨神阿特拉斯，对社会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其他的角色都处于次要地位。而女人则只能成为照顾别人的人。在这样的父权制社会里，孩子即使在童年时幻想过不同的生活，他们长大后也必须面对现实，放弃原先的梦想。

可以说，社会在衡量一个男人的时候是不考虑他的外表的。

他的成功和价值体现在他所拥有的娇妻美女、子孙后代、豪华住宅和高档汽车上。不管他们是胖还是瘦、是秃头还是满脸胡子，我们只在他们脸上看到一样东西，那就是权力，而权力本身就有巨大的吸引力。

当一个男人挽着一个美貌女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的，是她的毛皮大衣、她的鳄鱼皮手提包、她的漂亮脸蛋和身材。在对她作出一番估价之后，我们对他的地位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也许会称赞她的华丽服饰，但我们真正尊重的还是他。

女权运动使大批妇女进入工作场所，我们也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自己。在保持传统女性领地的同时，我们也抢到了一部分曾经属于男人的地盘。与此同时，我们继续用传统的方式来判断男人的社会地位，看他是否拥有漂亮的女人。

“男人之所以要寻找漂亮女人做自己的配偶，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心理学家戴维·M. 巴斯写道，“他们还用她来向竞争者和潜在的情敌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巴斯用许多男女合拍的照片来进行他的研究。这些照片里的男人分别和外貌各不相同的女人在一起。他的结论是，“如果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能够吸引一个绝色女子，人们就会猜想他一定是个有权有势的男人。”心理学家苏珊·哈特作出这样的推论：“男人的吸引力通常和权力、地位、财富、职位联系在一起。拥有这些东西的男人即使在外貌上不具备传统男性美的特征，人们也会认为他有魅力。”有家妇女杂志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就“谁是美国最性感的男子？”这个问题做了一次调查，其结果证实了哈特的推论，最高得分者是其貌不扬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

在父权制社会里，像外公那样有钱有势的男人颇有点孔雀的气派，他们讲究穿着，喜欢高档服饰和做工精良的鞋子，但是这种炫耀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场合。在 19 世纪西方工业社

会里，只顾外表而没有出色成就的男人是得不到尊重的，即使默默无闻也比摆空架子强。有些高级军事将领如戈林和巴顿确实以爱出风头闻名于世，但是普通人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男人和镜子拉开了距离，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倒退。在资本主义到来之前，在资产阶级尚未兴起的年代里，男人的服装比女人更加华丽。在 18 世纪，男人穿着打扮是为了让别人注意到他们本人，穿得越讲究就越能得到别人的赞扬。然而，到了 18 和 19 世纪之交，男人开始弃绝时髦、精致和华丽的服装，他们穿着深色的西服进入资本主义的工厂。男人垄断了公共权力，而将拥有美貌这一私人权力留给了女人，当然，这种权力仍旧处于男人的控制之下。

从表面上看，男人似乎占了很大的便宜，不过，让身边的女人来扮演花瓶的角色，而自己却置身于镜头之外，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太乏味了？我的老朋友，精神病专家理查德·罗伯蒂勒有一次说，“男人喜欢别人用赞赏的眼光凝视自己身边的女人。在潜意识中，我们男人和女人一样具有强烈的表现欲。不过，我们的虚荣心只能在别人欣赏她的美貌时才能得到满足。”

“间接的赞赏似乎不能给人带来足够的满足。”我答道。

他耸了耸肩膀。“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男人对女人对美貌的垄断感到愤怒。男人喜欢漂亮女人，但他们也妒忌她的美貌。”

从健康的自恋这一角度来看，父权社会的这一套对男女双方都有害。它鼓励妇女成为男人的装饰品，尽管她们的美就像一朵鲜花，只能持续一个相当短的时间。我们有时会怀念过去的时代，觉得它比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要好，但是我们忘记了对性别角色的刻板规定是如何扼杀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

男人不能也不愿承认女人的美貌是如何使他们感到软弱无力和无所适从，因为这会使他们在父权社会里失去立足点。因此，必须对女人加以驯化，对女性美中的性感成分加以中和，这

样，男人就可以把小女人留在家里，放心地离开家到工业革命的战上去搏杀了。

对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来说，最没面子的事莫过于做乌龟了。妻子就是丈夫的财产，这话听起来很粗俗，但是他确实要在她身上花很多钱。不论她和什么样的男人偷情，管子工也好，邮递员也好，都会使她掉价，就像一张昂贵的奇彭代尔桌子，要是桌腿上有了裂纹，就会使整个桌子的价值大打折扣。一个男人如果和一个同别人有过性关系的女人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那他就会遭到别人的嘲笑。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结婚后压制她的性欲，鼓励她穿长裙子、做贤妻良母，拒绝把她看成一个性感女人。

男人常常抱怨，蜜月过后，女人对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就没了热情，其实男人也一样。当一个爱家的男人和自己孩子的母亲在一起时，他很难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随心所欲。于是他只好去找妓女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妓女是一种和贤妻良母完全不同的女人。

对女性性感的压抑虽然减少了夫妻之间性生活的乐趣，但也使丈夫的日子好过多了。搬到郊区后，做妻子的白天只有其他女人做伴。这给男人们带来不少安慰。

在女权运动到来之前，社会是按照保障经济发展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清除那些妨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人们相信可以从外表来识别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坏女人”（如拉娜·特纳在电影《邮递员总是打两次铃》中塑造的人物）之所以能够破坏社会结构的稳定，是因为她在穿着打扮上突出女性的诱惑力，并以此来动摇现状。每当这类人物在电影里出现时，音乐就带上了色情的味道，向那些穿得规规矩矩来看电影的女士们暗示她们早已知道的东西：放荡女子将会夺走她们的丈夫。每当格洛丽亚·格雷厄姆或玛丽莲·梦露走在某个小镇的“大

街”上时，所有的男人都会被她们迷得神魂颠倒，整个镇子也会被她们搅得鸡犬不宁。

虽然我也在这样的传统下长大，然而我觉得自己既不是破坏别人家庭的放荡女子，也不是贤妻良母式的人物，而且我也不把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成功人士作为心目中的男人。在纽约，我发现了另一类更具吸引力的男子。他们蓬乱的头发、散漫的动作、随心所欲的穿着以及抽烟或喝酒的样子都使人感觉到一种男性的魅力。女孩们知道这些人没有多少钱，但是却无法抗拒他们的魅力。他们思想活跃，热情奔放，他们懂得如何欣赏女性。当他们的眼睛看着你时，那双眼一下就能发现你的迷人之处。这样的男子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成功人士。由于职业的限制，大多数男人的生活范围其实都像女人一样狭小；大多数人都身不由己，早早走上了社会为他们规定的道路。

在女人眼里，男人拥有所有的权力，其实大多数男人都在为了养家活口而疲于奔命，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乏味、越来越按部就班，除了发财致富，他们放弃了所有其他的追求。对希望过安定生活的女人米说，这些西装革履的资本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无疑是理想的配偶。

而我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这对母亲来说始终是个谜，虽然她从来不曾为我担心过。放假时，我把各式各样的男友带到母亲那里，有音乐家、作家、画家、无固定职业者。母亲从不问我为什么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西装革履。她从不对他们评头论足，只是偶然说，“他是犹太人，对吗？他们都是些聪明、有趣、性感十足的男人，我想母亲对此也有同感。

对每一个爱过的男子，我都送给他一件礼物，这也是外公给我的礼物：我教他们对着镜子欣赏和打扮自己。当然不是穿他们厌恶的西装革履，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挑选最好的服饰。我喜欢唤醒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如何从丑

小鸭变成美丽的天鹅。那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如果一个女人赞赏并鼓励男人的自我欣赏，男人是不会轻易忘记她的，他会像盼望阳光那样渴望她的赏识。由衷的赏识就像一份珍贵的礼物，使爱这个词成为有血有肉的概念。“啊，我的爱，你的目光使我陶醉！”我们女人自古以来就是美的向导，成熟的女人能使男人看到，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

我曾把一位作家带到裁缝那儿，从而奇迹般地改变了这位清人对他自己和我的看法。我们一起在罗马度假。他的手提箱里只放了一件上装和几件替换的衬衣和牛仔裤，剩下的空间都塞满了写作用的本子和书。我发狂地爱上了他，一心想给他增添几分魅力，把他和我拴在一起。一天上午，我宣布要带他去见马斯特罗亚尼服装店的裁缝。“就当这是一次经历吧，以后说不定还可以写写呢。”我劝他。

我们先在皮亚萨·纳沃那不慌不忙地享受了一顿马提尼午餐。饭后他仍旧像个新郎一样神经紧张，因此我们决定步行到裁缝那儿去。我们走进一个庭院，走上一段狭窄的楼梯，进入一套昏暗的房间，百叶窗半关着，挡住了下午的太阳。裁剪桌上放着几匹摊开的布料，高高的架子上也堆放着一匹匹的料子。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院子里喷水池的声音。

“Buona sera(Hello)。”裁缝亲切地和我们打招呼。他的助手开始给我的男友量尺寸。察觉到顾客是个从未到过裁缝店的人，大师傅说起话来语气特别温和。

我的情人是个十分傲慢的人，从不轻易显露内心的任何不安，可是那天，他却像个未经世面的处女，被人慢慢地、十分老练地诱上了钩。他爱上了镜子里自己的影像。而我则像外公一样，热衷于当个窥视者，看着他的防御土崩瓦解。我发现，大多数男人在照镜子的时候，都像小男孩一样显得很不自在。这也难怪，因为他们平时缺乏练习。

“男人在照镜子的时候眼睛看着别的地方，很少正眼看自己，”《老爷》杂志曾引用一位镜子推销员的话，“他似乎害怕被人发现 好像照镜子是不光彩的行为。”早年的经历使我感觉到 男人同样渴望别人赞赏他们的外貌。我理解那种被人忽略的孤独感。

当上装和裤子完成的时候，我的男友已经习惯于裁缝店里的一切，包括试穿、上别针以及在三面大镜子里欣赏自己的立体形象。他就像一只在池塘边观看水中倒影的动物，狂热地爱上了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像。他和裁缝成了好朋友，临别的时候，他们又说笑话，又抽雪茄。

这就是我给男人的礼物，不过，我只把它送给那些欣赏并且希望分享我的表现欲的男人。我不希望男人把我当作他的花瓶，我宁愿将他引向健康的自我欣赏。那些借助漂亮女人来炫耀财富和权势的男人总有一天会妒忌自己身边的女人，或者喜新厌旧，寻找新的女人。如果我们害怕被男人抛弃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通过我们的眼睛看到自己的影像，发现自己的魅力所在。

“窥视癖”和“表现癖”只是在最近才悄悄地进入高雅谈话。专家们提醒我，这两个词只能用于描述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即用窥视或暴露来代替性。不过他们也承认，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肉体，而我们却仍未找到恰当的词汇来表示这种愈演愈烈的半裸体趋势。推动这一趋势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男子重新加入美貌桂冠的争夺战。

“现在 这些词的使用范围比以前广多了，”罗伯蒂勒说，“男人无疑有更强的窥视欲，女人对自己的肉体则显示出极大的表现欲。如今有些男人开始注重外表，炫耀他们的身体，但这种倾向只是近期才发展起来，而且只涉及男人中的一小部分。”20年前，行为科学的权威们警告我，只有男人才会有窥视癖。于是我

这个多年来一直睁大了眼睛盯着男人看的女人就只好保持沉默了。

今天，有些明智的女人开始面对这一事实。朱迪斯·塞弗承认，“毫无疑问，女人也有窥视欲！只要看看女人是如何起劲地相互观察。如今还有专为女人制作的色情录像。”威廉·H·马斯特斯强调在精神疗法的术语中“表现癖”是用来指一种男性病症。但是大多数行为学家认为，这两个词——“窥视癖”和“表现癖”——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语言中。我们当然不能在披着肮脏雨披的男性“露阴者”和穿着透明衣服逛大街的女士之间划等号，但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之间毫无关联。

在70年代凯特·米利特谈到夏洛蒂·勃朗特如何在《维列特》这部小说中表露出她对男性美的迷恋：“勃朗特也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女作家，她在书中承认男性美对女人的强烈震撼。”那么女人为什么害怕谈论男性美对她们吸引力看来，我们垄断美貌的决心一点也不亚于男人维护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努力。金钱的力量是如此显而易见，一旦它的所有权发生任何变化，人们立即对此争论不休。美貌的力量同样强大，但是几百年来，我们对它的作用却视而不见。

在父权社会，美貌成了女人的专利。男人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就无法拥有他们渴望的漂亮女人。这就导致了许多针对女人的粗暴言行。我们经常在文学作品中读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在母亲的宠爱下长大的男孩，从小就习惯于把母亲视为美的化身，但是成年后他没有钱去赢得他爱慕的美人，于是爱慕转变为愤恨，他决定煞煞那些漂亮女人的威风。同样，能干的女人也常常怨恨失败的丈夫，用种种方式向他发泄心中的不满。

即使那些身边有美女作伴的有钱有势的男人，他们也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别人赞赏的是她的美貌，而不是他本人。要打消女人的气焰，惟一的办法就是蔑视她们。不过，那些站在街角上

对女人说粗话的男人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

想像一下，妇女就业以及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是如何改变男人看自己的方式。要知道，一个人即使在理性的层面上承认权力的平等，潜意识里却不见得能够接受这种改变。时尚的千变万化反映出我们对男性和女性的看法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大家都在试图寻找一种适合于自己的形象，这不仅仅是在穿着打扮上做功夫，而且涉及到更深的心理层面。我们需要确立自己的身份 包括视觉形象 否则我们就会丧失自信 and 安全感。

传统的男女分工虽然使男人不堪重负，使女人变得愚钝，但他们都知道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如今，男人却很难回答自己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墨水来探讨妇女的角色、妇女的生活以及妇女面临的问题，而男人却一声不响地埋头苦干，拒绝谈论自己的问题。也许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女权主义会烟消云散，右翼共和党会恢复他们过去的地位。这进一步助长了女人对男人的反感。

只要想想日益增多的没有父亲的家庭、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吸毒和伤害行为，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失去这么多的男人、这么多的父亲？

我们从小就渴望爱，渴望引人注目。如果得不到这一切，我们就会感到愤怒。那些在大街上恶言恶语嘲笑漂亮女人的男人其实是在发泄他们的愤怒。然而，不管是天生的虐待狂，在大街上盯着女人看的男人，还是那些半裸的美女，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内心的饥渴其实由来已久。

女人眼里的男人

30年前，女人是如何看待她的丈夫或情人的？毫无疑问，

他既不是供她满足性欲的对象，也不是漂亮的花瓶。她依赖他，靠他养活，她把自己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她希望他能成就她自己无法成就的事业，给她带来她自己无法获得的荣耀。在她的眼里，他高大强壮，多多少少带着一些英雄的色彩。

他也许已经体态臃肿、肌肉松懈、过早秃顶、过早衰老，但这些都不会损害他在她心目中的形象。重要的是，他每天必须按时回家。而她的工作就是照顾他、做饭给他吃、为他烫洗衣服。如果他回来晚了，如果她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一只从汽车旅馆里带出来的火柴盒，或者听到其他女人关于他在外寻花问柳的窃窃私语，她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对性的需求，而是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改邪归正，重新成为她的靠山，使她的生活不至于土崩瓦解。

直到 50 年代中期，电影中结了婚的男女还睡在各自的单人床上，丈夫从早到晚都穿着成套的西装。在《穿灰色法兰绒装的男士》、《让“海狸”去干》、《迪克·范戴克献艺》甚至《蜜月情侣》里，做丈夫的看上去都是可信赖可尊敬的体面人物。这些电影强调男人作为家庭顶梁柱的角色。只要男人能够使一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谁也不会问：“他老婆怎样看他？”

男人的杂志讲的都是商务和政治；女人的杂志却教读者如何给晚上的家庭生活加点儿神秘感，如何点蜡烛，如何做焙盘菜。女人最大的不幸就是失去自己的男人。为了避免这一厄运，她绝对不能“为所欲为”。当她需要幻想或逃避现实的时候，她就读哈利坤浪漫爱情小说。从 1906 年起，这类小说就开始为女人提供理想男人的形象。在 50 年代、60 年代以及 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法男士”是女人梦寐以求的男人，凯瑟琳·奥尔说，“他高大强壮，仪表堂堂，他喜欢沉思默想，至于他那深不可测的头脑中想些什么，女人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他要么拥有一个庄园，要么是个医生。在那个时代，医生是个令人羡慕和敬畏的人物。不过，在小说里，他还有着某种神秘的深沉，

那是因为他承担着很重的压力。当然，他很富有。他们永远非常富有。”

不管他是谁 胖子杰基也好，阿尔法男士”也好，他必须是个能挣钱的男人，不然就毫无意义。如果一个女人自己没有收入，她就不会去空想什么英俊性感的男人，这种男人也许令人心动，但却十分危险。丈夫若是另有所欢，做妻子的就可能失去一切。《后街》这类 40 年代的电影讲述一种深受观众喜爱的故事，那就是一个女人如何成为男人性感魅力的受害者。这类故事告诫观众，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个能够让她过上好日子的男人，其他东西都无关紧要。

电影和平装小说为女人提供了虚构的浪漫经历，但是专门针对女性的色情服务却没有，于是浪漫音乐就被用来填补空白。由于女人总是把性和男女关系联系在一起，浪漫（罗曼蒂克）就成了性的同义词。

直到 25 年前，人们仍旧不相信女人有性幻想。那么，既然女人感兴趣的只是男人养家活口的能力，男人还有什么必要为了吸引女人而修饰自己的外表？于是，男人就成了想当然的窥视者，只有女人才炫耀自己的外貌。今天，男人也开始注重外貌，这一现象说明，由于妇女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她们开始注意男人的形象。

芝加哥大学于 1994 年开展了一项名为“美国社会的性关系”的调查研究。据统计，30% 18 岁到 44 岁和 18% 45 岁到 59 岁的女子觉得“观看对方脱衣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50% 18 岁到 44 岁和 40% 45 岁到 59 岁的男子觉得观看对方脱衣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今天 男士们发现女人比过去更重视男人的性吸引力，沃伦·法雷尔说，“但是女人在看男人的时候，仍旧把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放在首位。”有些女人厌倦了工作场所，她们可以选择

回家做家庭妇女或在家工作。但是大多数男人却没有这种选择自由。他们看到，那些在公司里和他们竞争、有时挣钱比他们还多的女强人们在衡量男人的时候，仍旧只看他们挣钱的能力。

不错，在有的家庭里，妻子挣的钱比丈夫多，但是研究证明，这种情况经常导致婚姻或男女关系的破裂。即使妻子不在乎丈夫挣钱的能力，做丈夫的也无法心安理得地过下去。如今比较愿意花钱买化妆品和服装的是年轻男子，这部分人是男性时装业和美容业争夺的目标。那么，女人会不会赏识这些新型的美男子呢？

与此同时，西部英雄成为哈利坤浪漫爱情小说的新主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两性关系的发展趋势。今天，西部牛仔成为虚构作品中最受欢迎的英雄，他的形象风靡世界各地，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数百万书籍的封面上。在巨大的平装书市场上，爱情小说占了整个销售额的 46%。全世界有五千万爱情小说的读者，在这些人中，平均每人每星期至少要读一本爱情小说。根据巴恩斯 & 诺布尔公司的估计，平均每个读者每年要在这些书上花费 1 200 美元。不难想像，这类小说满足了一种多么普遍和强烈的饥渴。

“他的形象向女人显示，他是个强有力的男子汉，他能够保护她。”凯瑟琳·奥尔说。这似乎和传统社会的男子角色没有多少区别。奥尔认为，小说中的西部牛仔不是普通的牧场雇工，他往往拥有大量的土地。“他向那些已婚或单身女人——她们的平均年龄是 42 岁——发出这样一个信息：他能够把她们从令人窒息的现实生活中解救出来。他不仅十分富有，而且身强力壮，最重要的是，他全神贯注地向她献殷勤、向她求爱、跟她说话。女人若是没人陪她说话就没法活，男人则相反。爱情小说的读者们最爱读的就是对话。幸运的是，富裕的牛仔有很多雇工为他干活，他可以离开牧场，一心一意向她求爱。”

找一个既能挣大钱又能陪她说话的男人，这仍旧是每个女人的梦想。在现实生活中，男人做爱以后就翻过身去呼呼大睡，他们的性高潮来得快去得快。如此三分钟热度怎能满足女人的需求！她需要长时间的亲密无间，她要他搂住她、跟她说话。对女人来说，性交前后的甜言蜜语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即使在性幻想中，语言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是长时间的亲密交谈打消了她的疑虑、点燃起情欲之火。哈利坤的能说会道的牛仔阔佬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我们女人经常指责男人，说他们只看到我们身上的某些部位，在他们眼里，女人只不过是乳头和屁股这类东西的组合。那么，浪漫小说是怎样描写它们的男主角呢？这些男性形象和男人眼里的女人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不错，这些小说的封面上有男人的照片，女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如今，越来越多的女人愿意并且有足够的财力去“看”男人，看他们的胸肌和臀部。

我们已逐渐习惯于观看 X 级成人影片中的裸体男人感受视觉刺激引起的强大电流如何通过我们全身……几年前，知名女作家萨利·蒂斯代尔在文学圈子内外引起了一场轰动。她在著名的《哈珀氏》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我说下流话》的文章，大言不惭地讲述她如何经常光顾专门提供 X 级录像带的商店，以及她在这些店里的经历。想想吧，一个女知识分子居然喜欢色情艺术！那篇文章引起的轰动效应促使蒂斯代尔将它扩展为一本书。

我们女人正在从窥视中学习窥视。在 70 年代女性的性幻想中男人是无法辨认的。“我不知道他是谁，”我的调查对象常说，“我看不到他的脸。”这就是说这个不知名的男人是个“没有脸的陌生人”，他不会对她的行为说三道四。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他“强迫”她，干完以后他就消失了。因此她可以毫无顾

忌地向他显示她那隐藏着的野性和色情的自我。她把整个过程称作“强奸”(但是却没有任何痛苦和羞耻的感觉)这样她就能心安理得地原谅自己的想入非非。今天,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看男人;而他们也感觉到我们凝视的眼睛。于是他们开始往头上抹发胶,苦练健美,炫耀鼓起二头肌。

有些女人鄙视那些一面看着《花花公子》和《顶层公寓》杂志里的裸体女人,一面自慰的男人,似乎这是一种肮脏和缺乏男子气的行为。绝大多数女人绝不会在她们的性幻想中看到男人手淫的场面,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不需要她,他可以和他的阴茎自得其乐。记得有一次,我在半夜醒来,发现我的情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淫。我顿时勃然大怒。几小时前,我们还在做爱,现在他居然避开我去和他那个东西干起这种事来!他以这种荒唐的行为无耻地背叛了我。看着他肚子上那滩粘糊糊的精液,我感到一阵恶心。顷刻之间,他在我眼里矮了半截。

我常想,男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自慰,原因之一是为了摆脱小时候母亲向他们灌输的反对性行为的清规戒律。

“在我们对性的嗜好中,有些可能来自遥远的过去。”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写道,“有些男人喜欢窥视,有些喜欢看色情图片或影片……事实上,男人的性幻想经常被形形色色的视觉刺激所激发。这种倾向也许和男人大脑比较发达的空间感有关。女人则喜欢浪漫爱情小说和电视肥皂剧之类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慢慢吞吞的色情。也许这是由于她们对语言的敏感。”

《世界》妇女杂志最近又刊登了一幅高度性感的裸体男子照片,这大概是自伯特·雷诺1973年一丝不挂闪亮登场以来第十二幅男性裸体照。显然,主编海伦·格利·布朗注意到那部近期大受欢迎的可口可乐电视广告片:几位女士从办公室的窗子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街上一位体魄像健美运动员一样强壮的建筑工,她们一面傻笑,一面谈论他发达的胸肌。她们对此会不会产

生类似于男人看裸体女人时的反应？

色情电影作者坎迪达·罗亚尔对此给予肯定的回答：“我发现许多女人喜欢看男性生殖器。她们也许不会对自己的男人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她们对自己也不愿承认。但是研究人员曾做过一些测试，他们给一些女子装上感应器，然后让她们看不同类型的色情影片。在观后的谈话中，大多数受测者都说她们并没有感到特别兴奋，但是感应器的记录却显示相反的情况。这就是说，她们下意识地否定了自己的身体反应。”

迄今为止，女人最强烈的幻想之一仍旧是“强迫性”的性行为：一个突然出现的男人以强力逼她就范，而她则扮演一个“无罪”受害者的角色。我们女人常常抱怨，男人的眼睛只看到我们的肉体。那么，对于幻想中的情人，我们看中的又是什么？是他的体力和阴茎。我的问题是，我们幻想中的男人同《花花公子》杂志上的裸体美女有什么两样？当麦当娜和莎朗·斯通等性感女神用她们的身体向男人发起进攻时，她们的行为同那些在办公室里用语言对女士们进行性骚扰的男人有什么两样？

我想起一个过去的情人。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开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晚饭时在场的还有另外五个人，我当时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男人。直到第二天，我才注意看他，并且立即注意到他的性器官，于是便感到一阵强烈的性冲动。

在60年代中期那时我正在巴勒莫西西里岛首府为一家杂志写一篇关于旅游的文章。日子过得很平静，直到一天上午，那位和我一起旅行的摄影师建议我和一位建筑师同坐一辆车，因为那天我们要去他的宾馆，这样做更加礼貌。我很不情愿在大热天出门并且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坐在一辆车里，不过我还是同意了。

于是我就和这位陌生人一起，坐着他的阿尔法-罗密欧沿着西西里海岸飞驰。车里的空气炎热沉闷，他不会说英语，我只

说一点点意大利语。马达轰鸣，他的车在狭窄的路上越开越快，上坡下坡、急转弯，把各种各样的车都甩在后面。我开始注意他那双操纵汽车的手、晒得黑黑的手臂上深色的汗毛，顿时想起那些曾经给我带来极大快乐的男人的手和手臂。当他那古铜色的穿着凉鞋的脚猛踩加速器的时候，我才抬起头来看他的脸、他整个人——我意识到，在夜晚到来之前，我和他将作为情人。

毫无疑问，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身上那些具有男性特征的东西——手、脚、手臂。于是我精心策划了一场相互配合的诱惑。就这样，最初的印象引发了我和他长达一个月的激情旅行，从西西里到罗马、再到阿马尔非海岸和卡普里，而他的妻子则一路拼命追赶。

在我的眼里，开车的男人就像骑着骏马的王子。我在少女时代就习惯于在汽车里、免下车餐馆里、免下车电影院里以及海滩上谈恋爱。在每次性爱冒险的起始阶段，对方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尚未个性化的男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可能渐渐地把他视为一个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个人。但是，任何烈酒或浪漫音乐都不能像一位开着车的男人那样燃起我的欲火。

在巴勒莫的飞车旅程中，我的反应就像一个突然从昏睡中惊醒的女人。10年后，我在一篇短篇小说里把这类冒险称作“汽车恋爱”。

男人饥饿的眼睛

职业上的高度分工决定了男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需要浪漫小说，不需要情意缠绵的梦幻仙境。他们在追求异性的过程中必须表现得坚决果断，而不是温情脉脉。女人喜欢征服型的男人，而不是相反的类型。在两性关系中，男人一直是行动的一

方。女人也许会抱怨男人的霸道和笨拙，但是对男人而言，性力是男性身份的重要标志。

女人可以嘲笑男人对阴茎的迷恋，厌恶那些一面看着裸体女人一面手淫的男人。可是，要是男人的阴茎坚挺不起来，要是他看见床上的裸体女人无动于衷，那么女人何时才能指望享受性的极乐？在不适当的场合勃起或射精固然是令人尴尬的事，但是想像一下 阳痿会给男人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父权社会鼓励女人对性的无知，这使女人在性生活中只能扮演令人乏味的被动角色，同时也维护了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女人们既不看自己的性器官，也不看男人的性器官。妻子把丈夫视为依靠的对象，而丈夫则把妻子当成纯洁的女神。与此同时，男人们在色情表演和妓女身上寻求在家里得不到的感官刺激和性欲的满足。男人喜欢看裸体女人的图片，因为那是人的天性。有的人说看裸体女人有助于使男人大脑和性器官之间的神经系统畅通无阻。

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 在艺术界有一个时髦的画派 它在遵守维多利亚时代刻板规矩的同时，煽动男人的窥视欲。这个流派包括一些当时最有名的艺术家：蔡尔德·哈萨姆、罗伯特·范·沃斯特·休厄尔、约瑟夫·恩格尔哈特以及查尔斯·卓别林。在他们的作品中，美丽的裸体女子躺在河岸上、绿色的田野中、阳光下的白色巨石上或枝叶茂盛的大树下。她们天仙般的身体好像是大自然的产物。我们最爱去的纽约艺术家咖啡馆里有一幅有名的壁画，上面有许多裸体的年轻男女在草地上和小溪里快乐地嬉戏，大自然就像是他们的家。

这些世纪之交的杰作可以让一个父权社会的绅士以艺术爱好者和赞助者的身份在皇家美术馆里大大咧咧地观看裸体女人，在满足窥视癖的同时继续倡导女性的圣洁。其实，这些画里的裸体女子总有些“不真实”的地方。不错，我们可以看出乳房

和两腿之间的 V 形凹陷，不过，她们婀娜多姿的身体显得软弱无力，好像没有骨架子似的。

在今天，这些画里的裸体女子似乎很难激起观者的欲望。有趣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艺术家们总是遵循当时普遍接受的规矩来满足人们观看裸体形象的需要。在工业革命的早期，男人必须集中所有的精力来挣钱养家、创办实业，但他也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发泄他的色情想像。他没有时间去追求自身的美貌，而且社会也不允许他这样做。至于追求性刺激，那是维多利亚女王禁止的东西（从而使她的朝代成为现代历史中最淫荡的时代之一）。

在男人眼里，女人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好女人”，也就是贤妻良母，她们的圣洁填补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和冷酷无情在男人心里造成的道德空虚；另一种是“坏女人”，也就是那些能够使男人的性欲得到满足的女人。这两种类型——贤妻良母和性感女神——是水火不相容的，要想把它们合二而一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需要一个避风港来暂时躲避市场上的罪恶和竞争，为此，他必须至少在公开场合认同和遵守家庭道德规范。毕竟，他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是由圣洁的母亲和高高在上的父亲抚养大的。

于是，油画里那些不太真实的裸体美女就为饥渴的男士们提供了美味的视觉大餐。在男人们经常光顾的俱乐部和酒馆里，他们可以看到这些画的廉价复制品。窥视者们可以在那些贴在墙上的裸体女人身上获得一些安慰。

我试图想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在结束了一天繁重而令人厌倦的工作后，怎样在色情白日梦中寻求解脱。布拉姆·迪克斯特拉在《变态的偶像》一书中写道，“19 世纪末的男人最不愿接受的就是让女人掌权，即使把女人视为自然的化身，他们也不愿让她来指手画脚。他们必须掌管一切，这是他们的权力。”

亨利·德吕蒙使他们深信，男人‘最伟大的使命就是为生活而斗争’。女人即使是自然的化身，也只能在微风中轻轻地飘来飘去。因为走就是行动，就是掌握主动权。”这就是我们在那些画里看到的情景。

在迪克斯特拉的书里，有一幅名为《睡》的油画的复制品，上面有几个穿戴华贵的女子躺在一棵树下。“在画的右上角，”迪克斯特拉写道，“爬着一个奇特的小怪物，半像商人，半像虫子，长着一双男人般凹陷的眼睛……有自我污染的倾向……其实，这只奇怪的生物……似乎只会远距离地凝神注视树下那些自得其乐的漂亮女子。他的下半身好像已经融化掉，他似乎象征性地再现了窥视癖的本质。”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社会都将男女性别角色刻板地限定为窥视者和窥视的对象。男人是窥视者，虽然那种具有自慰性质的幻想和行为会被人瞧不起，可男人有权这样做。女人是性幻想和性行为的对象，她们在三四十年代演变成《老爷》杂志上的“瓦尔加斯女郎”。这位长腿女神并不比皇家美术馆的裸体美女更具真实感，不过，她和那些印在画历上的廉价姐妹们仍旧为男士们提供了自慰的工具——供男人放心使用的裸体美女。

50年代，《花花公子》创始人休·赫夫纳大胆地搬出裸体性感女郎“玩伴”，让她们和那些患有窥视癖的男性伴侣建立直接联系。这些女人同意通过她们的眼睛，和男人交流各自的性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变得更大胆。她的神情似乎在说，“瞧，我和你一样喜欢性。”可以说，“玩伴”的出现对女人来说也是个进步，因为她宣布女人也有性的欲望。这并不是说“好女孩”一开始就会认同这位裸体性感女郎；但是大门已经打开，女人可以更大胆地承认自己对性的需求。

1979年，《花花公子》杂志邀请名牌大学的年轻女生们报名竞选为《花花公子》摄影师们当裸体模特儿。这件事引起了女权

主义者的愤怒。名牌大学的“好女孩”们居然愿意拍裸体照，这一现象本身就证明了女人的表现欲。

“玩伴”虽然大胆放肆，但她只出现在杂志里，对男人并不构成威胁。就是那些在花花公子俱乐部里招待男士们的“花花公子俏妞”，也是只能看而不能碰的。她们必需遵守俱乐部制订的厚厚的《规则手册》。这些规矩像《女童子军手册》一样严格，它们不仅保护“俏妞”不受好色之徒的侵犯，同时也保护了男人。

有些女权主义者仍旧把“玩伴”和“顶层公寓的宝贝”视作女人的堕落。20年前，她们包围了花花公子俱乐部；今天，她们又写文章痛斥色情作品，即使作者是女的，她们也不放过。

她们诋毁拍裸体照、写色情文学、买色情录像带的女人。这些气急败坏的禁欲者们是上世纪末贤妻良母式家庭修女的嫡系后代。她们不喜欢看到性感女性的美貌和吸引力，因为她们禁止自己追求这样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同意她们的看法。

很久以前，她们也尝到过性的刺激和快感；要想在一生中避开这种感觉是不可能的。过去只有邪恶的男人才能使她们想起自己被压抑的性欲；如今，性感女郎的挑衅更戳痛了她们的神经。

许多男人仍旧喜欢像他们的爷爷和外公那样暗地里独自寻求性欲的满足。他们喜欢在母亲漂亮的卫生间里自慰或者观看屏幕上的女人自慰，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刺激，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些带给他们更多的快感。

当男人开始意识到自身魅力的时候，他们看女人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不会像从前那样，用充满饥饿的眼睛盯着漂亮女人。我不知道女人是否喜欢这种变化，她们会不会怀念那些曾经如此放肆地盯着她们看的眼睛。

我要举双手欢迎男士们加入争夺美貌桂冠的大赛，欢迎他

们在时装领域里重新夺回二百年前我们的男性祖先曾经享受过的荣耀。不论时装如何花样翻新，不论是复旧派还是未来派，时装的设计总是走在理性认识的前面。

正如安妮·霍伦德所说：“时装更多地显示出我们真实的愿望而不是证实我们说出口的东西。”看来男士们已经厌倦了女人的装腔作势和道德说教。他们也许可以容忍女士们在工作场所和他们平起平坐，但是，要他们在作出种种让步的同时继续为女人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承担责任，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也不客气地反守为攻。“我可以给你这个 给你那个，”他们说，“不过现在轮到我来从你这里拿走一点东西。我要让你看看，男人如何利用美的魔力。”

我们渴望男人的眼睛。不过，如果他们的注视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心里那种洋洋得意的感觉就会变成忿恨。那么，多长时间的注视才不至于从彬彬有礼的赞赏蜕变为粗野无礼的视觉骚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就是女人说了算。女人们无情地谴责那些盯着她们看的男人，同时又对那些对她们视而不见的男人恨得咬牙切齿。其实，男人的眼睛之所以盯着漂亮女人，多半是出于他们对美的渴望。他们就像一群饿汉，两眼盯着商店橱窗里香喷喷的糕饼。

长期以来，男人把美貌留给了女人，但美貌仍旧是许多男人向往的东西。爱美是人的天性，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赞赏。在过去，男人需要欣赏女人的美貌，正如女人需要男人的钱来养活她们。不幸的是，女人由于厌恶自己的身体，并拒绝让男人尽情地欣赏，于是男人只好去找妓女，看杂志里的裸体女人，以此来释放压在心里的渴望和愤怒。应该看到，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害了他们自己。

大多数男人花钱上妓院并不是为了发泄性虐狂的淫欲；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表现得像个受虐狂。随着妇女进入工作场

所，男人虐待女人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我们不应忽视或原谅男人的粗暴行为，但同时也要看到他们面临的压力。随着职业女性中早衰和心脏病的增加，也许我们对“没心没肺的男人”会多一点同情。

“交媾的凝视”

在过去，女人要是抱怨男人向她们挤眉弄眼，没人会把这当回事。如果男人都对女人无动于衷，那么谁还会去追求女人、娶她们为妻，为她们提供生活保障？女人穿戴打扮就是为了吸引男人的眼睛，而男人也乐得扮演窥视者的角色。问题在于，没人告诉男孩们应该怎样看，没人教他们看的礼仪，也没人帮他们了解女人的感受。我们害怕被男人撇在一旁，提心吊胆地等待他们的挑选。我们也许讨厌他们的眼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抓住他们的眼球而梳妆打扮。

让我们来听听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那充满理智和同情的

凝视也许是人类最独特的求偶手段。人的眼睛会说话。在西方文化中，眼睛的互视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常常目不转睛地对可能成为配偶的人凝视两三秒钟，这时瞳孔会变大——这表示他们对凝神的对象极其感兴趣。然后他们会垂下眼皮，把目光移开。

难怪有这么多的传统文化要求妇女戴面纱。看来，眼睛的互视会产生强烈而直接的效果。凝视的目光会激发大脑中的原始部位，产生两种反应中的一种——接近对方或

避开对方。你不可能对别人凝视的目光无动于衷；你必须有所反应。你也许会报以微笑并开始和对方交谈。你也可能会有意避开对方的目光并慢慢向门口移动。不过在此之前，你很可能会摸摸耳朵、扯扯衣服、打个呵欠、摘下眼镜摆弄一番，或做出一些其他无意义的动作（即“替换手势”）来减轻心里的焦虑感，因为此时此刻，你必须决定如何对付对方向你发出的邀请，是逃走还是和对方一起玩这场游戏。

行为学家将这种注视称作交媾的凝视，它可能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说，最先发起求爱行为的既不是性器官，也不是心或大脑，而是眼睛，因为凝视的目光常常会引出对方的微笑。

男人凝视的方式和女人不同。费希尔认为，男人的这种习惯来自他们的祖先。远古时代，在非洲的草原上，人类的男性祖先常常要在树丛后面隐伏大半天，警觉地睁大眼睛，试图发现一头到水源处饮水的野兽。男人的大脑处理空间行动的方式和女人不同。我们女人直到最近才开始认真观看，这也许和男子重返时尚舞台有关，或者是因为我们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审视对方。

作家兼编辑苏希·布赖特认为，女同性恋者特别懂得如何看女人，如何把她们里里外外看个透，因此男士们在看女人的时候，也需要掌握一套诀窍：“大胆地看她。从头看到脚。你可以把目光停留在任何你喜欢的地方。当她注意到你在看她时（只要你真的盯着看，她一定会注意到），设法抓住她的眼睛。紧紧地抓住。这时每一秒钟都会变得像一分钟那样长，但是千万不要把眼睛移开……此时此刻，你就会知道，她对你是否感兴趣……如果她对你感兴趣，你的凝视就会使她感到一阵狂喜，因为你的眼睛告诉她，此时此刻，你的心里只有她……对男孩和女

孩来说，最初的那一眼虽然只意味着一种愿望，但它却预示了即将到来的一切。如果我能用这双奇特的绿眼睛吸引异性恋女孩，那么你一定不会有任何问题。”

不过他仍旧会碰到一些问题。女士们不仅需要男人的关注，也非常看重其他女人的眼光。女人的目光和男人的目光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女人一直是美貌的审判官。我们穿戴打扮不仅是为了吸引男人的目光，也是为了得到女人的赏识。

男人对美貌女子的饥渴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他们总是在寻找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这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美，他们需要拥有漂亮的女人来填补内心的匮乏。聪明的女人知道如何把男人当作美的对象来欣赏，并使他看到自己的可爱之处。这样一来，他就不敢轻易离开她了，因为他离不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就像一面奇妙的镜子，失去了这面镜子，他就会重新变成一具单调乏味的灰色形体。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金钱并不能温暖一个人的心，只有眼睛才有这样的魔力，而男人在街上拼命寻找的，正是这样的眼睛。

如果我们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关注，那么长大后，我们就不会把视线都集中在女人身上。如果父亲不在身边，我们就会变得过分依赖母亲。就拿 D. H. 劳伦斯来说，不论在小说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中，他对女人都怀着近乎疯狂的自相矛盾的感情。这种感情源自他和母亲之间极亲密的关系，而他的父亲却被排除在家庭生活之外。有位传记作者曾说，劳伦斯怀着厌恶和鄙视描写他作品中的某些女人，这些女人其实就是他自己，他厌恶自己、厌恶自己对母亲无法摆脱的依恋。在他和其他女人的关系中，劳伦斯不能忍受任何竞争对手。在他和弗里达的夫妻生活中，他发狂地妒忌弗里达和前夫所生的儿子，这种病态的妒忌常常使他暴跳如雷，对自己的行为失去控制。劳伦斯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所显露出来的“真实”自我常使那些研究他的人感到

困惑。

在父权时代，男孩通过观察学习“看”女人的礼仪。没有人会告诉他，世上有这样一套窥视的礼仪，但他可以观察自己的父亲和其他男人是如何观看和评论从他们面前走过的女人。不过，成年男子无法告诉他那些被他们审视的女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教给年轻人的，就是放大胆子盯着看。是女人们自己暴露出她们内心的焦虑和恐惧。

当一个在母亲的绝对控制下长大的男孩突然意识到，他已不再是女性的控制对象，他的眼睛可以使一个女人成为他的俘虏，他的目光可以左右她的喜怒哀乐时，他会得到怎样的启示？与此同时，他还意识到自己将担当起养活一家人的责任。这就是说，他已经开始重新看待自己的父亲。当他意识到男性的种种权力时，他就会满怀信心地从一个被控制的对象成为一个征服者。

今天，女人不仅保持了传统社会里女人的权力，而且获得了经济上的权力，并且开始扮演起窥视者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开始反击。他们发挥善于合作的优势，大举进攻美貌这一女性的传统领地，和女人争地盘、抢镜头。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时装设计师搞出来的，而是两性之间的进攻和反攻，是通向两性之间权力平衡的一个发展阶段。

在过去，年轻女子可以向男人炫耀自己裸露的身体，对他饥饿的眼睛则“假装”视而不见。她可以从他神魂颠倒的失控状态中感受到自己拥有的魔力。卡罗尔·德切利斯·希尔在他的小说《亨利·詹姆斯的午夜之歌》里，如醉如痴地描写了一位年轻男子如何在窗外观看一个年轻女子光着身子在镜子前玩弄自己的乳房。在此之前，他曾救过这个女子的命，那时她正在公园里梦游。

眼前的景象使他感到一阵晕眩 **... 耀眼的金光、玫瑰

以及那雪白的乳房……然后，她的手伸向乳房，指尖向上移动，手指像剪刀一样合拢、张开……然后，她抬起头，看着镜子，镜子里的她正好面对着他……少女后退几步，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她有没有看到，他正在看她？……她知道吗？……不知怎的，他相信她一定知道，此时此刻，他正在窗外的黑夜里看着她。他的呼吸一下停了下来——他看到了她的乳头。她背朝着他凑近镜子。镜子里，她的脸正对着他微笑。刹那间，美貌和欲望就像两支利箭深深地刺痛了他。

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发挥和享受女性的魅力。然而，母亲的阴影仍旧笼罩着我们，使我们无法充分享受这种自由带给我们的真正快乐。于是我们再次把矛头指向男人，要他们对女人面临的困境承担全部责任。我们一面穿着裸露癖十足的服装在公司里炫耀自己的肉体，一面以性骚扰的罪名控告男人 砸他们的饭碗 让他们吃官司。

我们至今还缺乏用来称呼有裸露癖女人的贬义词。在北卡罗莱纳州和密西西比州，男人在窗外偷看女人是违法行为，而女人却可以偷看男人。尽管如此，引诱男人窥视的女人却到处可见。我们穿着露出很多肉体的衣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我们站在窗子边上脱衣服，想像着来自隔壁的男人的目光……

与此同时，我们却痛恨那站在人行道边上盯着女人看的男人，因为他的眼光唤醒了我们心灵深处的自我厌恶。该死的家伙！这里哪有什么拜倒在睡美人脚下的白马王子？在他那邪恶的目光下，我们在出门前的精心打扮都变得一文不值，剩下的只有被羞辱的感觉。于是我们想起了母亲的警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别太张扬！”

为什么追求美貌会给我们带来危险？格林兄弟写过很多警

世故事：傲慢的美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她的继母和同父异母姐妹因为妒忌而虐待她；她常常诱惑男人直到把他们拖死；她的亲生父亲也无法抵制她的诱惑。童话故事里的小精灵或小动物常常警告少女不要穿得太漂亮。母亲或其他女孩也警告我们，美貌会引起别人对我们的怨恨和排斥。

人行道边的那些家伙仅用他们的眼睛就可轻易剥去我们漂亮的包装，他们好像在说，“你自作自受！”其实，他们只是看看而已。至于他心里想些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的恐惧来自心灵深处。当我们把街上的经历告诉另一个女人时，她就会同情地说，“男人就是这样。”不过，我们是否还应该告诉对方，我们当时穿着敞开的衬衣，薄薄的半透明织物显露出乳头和臀部的曲线？

也许，我们之所以仇恨这类男人的眼光是因为它触及到我们最敏感的东西：我们渴望暴露但又害怕暴露的东西。他的眼睛就像一部照相机，在那快门打开的一瞬间，我们在胶卷上留下了什么样的形象？我们的衣服是否太紧，胸罩是否太突出？于是，我们开始后悔出门的时候没穿外套。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男人在想什么，可是他的眼光却在我们心里引起了无限烦恼。我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看他一眼，却害怕他看到了我们内心隐藏的欲望。我们仇恨他的目光，然而我们的身体却渴望男人的关注和抚摸。说到底，是我们把自己隐蔽的、见不得人的欲望投射到男人身上，并反过来指责男人无耻和道德败坏。

幻想中的做爱

只有在幻想中，我们才敢摆脱种种顾忌，大胆地想像自己的

身体如何使男人发狂，如何为我们带来性的极乐。

在幻想中和我们做爱的男人不是“情人”，然而他给我们带来的快感却是真实世界里的男人所无法做到。他让我们感受到几分钟的自爱。我们的身体使他发狂，这使我们能够暂时摆脱对自己性器官的厌恶。为了体验性的极乐，女人必须把男人想像成野兽 因为没有一个“好男人”能够战胜母亲的影响。

男人在他们的性幻想中并不把女人想像得十分下贱。在心灵深处，他们并不像有些女权主义者想像的那样，只是一群邪恶、卑鄙、满嘴脏话的粗汉。绝大多数男人梦寐以求的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真心喜爱他们的身体，在做爱的时候迁就他们，或者扮演一个诱惑者的角色，使他们打消疑虑、确信自己深得女人的赏识；她渴望做爱，而不是把爱情当作一顿充满浪漫情调的晚餐；她喜爱他的阴茎，喜爱它的样子和气味；她把他的精液当作甜蜜的甘露，恨不得吸干最后一滴；她在各个方面都和真实世界里的女人不一样；她像他一样，把她的身体看成一座神殿，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等待着他的嘴去探索。

男人最爱幻想的，是两个女人当着他的面相互亲热，她们像他一样，既是人，又是野兽。和她们在一起，他用不着像对待真实世界里的女人那样必须煞费苦心才能哄她们张开腿接受他的崇拜。有时，这些幻想中的女人会邀请他加入。如果这个男人格外幸运或者特别有钱，也许他会试图在真实生活中实现这样的色情梦。

父权社会的异性恋男人最不愿想像的就是和另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女人可以随意想像和另一个女人的亲密关系，但是异性恋男人必须从里到外是个彻底的异性恋者。一个“真正的男人”必须有一个女人，而且他必须养活这个女人。妇女走上工作岗位使男人突破了原来的局限，对自己的角色有了新的看法。

大多数男人并不认为是女权运动迫使他们回到镜子前。还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影响和改变了男人的生活。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在 20 世纪，女权主义是一种“新经济”。随着男人观念的开放，我敢想像，他们对性别角色的看法也会变得像女人那样灵活。

我的研究显示，年轻异性恋男子的性幻想中已经开始出现其他的男人。和老一辈人不同的是，他们对此并没有犯罪的感觉，只是幻想中的男人通常身份不明，同实际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看来，想像的翅膀不会永远在禁区之外徘徊。

工作场所的美貌：求爱还是性骚扰？

25 年前，当妇女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将给工作场所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会在工作场所吸引男士们的眼睛，从而像海伦·费希尔所说的那样，“激发他们大脑中的一块原始区域”？美貌和性密切相关，当我们把这种美貌带入工作场所时，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应。“成功职业装”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它起到了某种防护作用。然而，当性感时装和高跟鞋重新获得女士们的青睐时，男士们被迫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根据女权主义的法规，女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她们的身体，而男人却不能有所反应。那么，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心平气和地和漂亮女人一起工作，对她们没完没了的引诱、困扰或拒绝无动于衷？

我们应该使女士们意识到，引人注目的性感服装在工作场所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应该使她们懂得，服装也是一种语言。可惜，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我们激起她们的愤怒，为她们提供反击性骚扰的法律武器，鼓励她们用这个武器来对付男

士们作出的任何使她们觉得不舒服的反应。女权主义拒绝考虑这样的问题：对于性骚扰，女人是否也有责任？她们穿衣、走路和说话的方式是否向周围的男人发出过一些连她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信号？

性骚扰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仍需要时间来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性骚扰以及如何惩罚这类行为。毕竟，在工作期间结婚的单身女子中，有 80% 是和她们在工作场所认识的男子结婚的。我们有必要分清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性骚扰。在大街上、酒吧间或社交聚会上，如果一个男人用粗鲁的或使人感到受侮辱的方式注视一个女人或对她说话，她可以避开他，不同他交往。但是办公室是一个封闭的环境，那里的人每天都要见面，任何小小的火花都可能引发一场感情冲突，任何令人不快的眼光、语言和接触都可能反复出现。

我们把原始丛林的法则带进了人工营造的空间，这给男女之间的交往带来了新的问题。每个人都在赚取自己的一份收入，每个人都怀着欲望、愤怒、妒忌以及竞争的心态和周围的人交往。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各种各样的情感都在同事们的眼皮底下展现出来。

“妇女的自由也会变成男人的自由！”这是我们 25 年前提出的口号。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男人怎样理解这个诺言。我们也不知道男人怎样看我们。我们羡慕男人之间那种无拘无束的伙伴关系，希望他们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我们虽然还没有和他们平起平坐，但已经从他们手里争到了相当可观的份额。然而，这并没有使我们放松进攻的姿态，相反，我们的敌对情绪更加高涨。比如，迄今为止，对性骚扰的讨论都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所有的责任都该由男人来承担？再如，当有人提出女人的厌食症问题时，我们为什么不从自

己身上找找原因，而一味指责父权社会？

作为女人，我们生来就渴望吸引男人的注意，渴望成为他们选中的对象。这是本能，是遗传基因所决定的。男人的凝视使我们脸红心跳，男人的目光可以在我们心里引起兴奋、羞辱和愤怒等强烈的感情。我们最得意的时刻就是当男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而不是其他女人的时候；这时，我们就像戴上了选美大赛的桂冠那样欣喜若狂。

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一阵恐惧。我们害怕失去控制，害怕遭到羞辱。于是我们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以此作为盾牌来保护自己。我们虽然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但是在感情上，我们仍旧停留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手里有了权，却仍旧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无辜的受害者。我们看不到自己所起的作用，却把一切使我们感到不愉快的东西都归咎于邪恶的男人。

朱迪斯·塞弗说，“在许多情况下，性骚扰涉及到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性欲。她们想，‘我必须严加防备，我必须步步为营，因为男人都是管不住自己的人。’其实，她们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有性欲的女人并以此而感到自豪：‘我的精力、成就和创造力都离不开性欲所产生的能量。’

“我在主持一些关于工作场所两性关系的研讨会。最大的问题是，在工作场所存在着充满挑逗性的高度个人化的性关系。大多数女子都和某个男子有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们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协作。这种情况常常涉及到能量的转移。不过，不论是工作上的友谊还是个人之间的友谊，不论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关系，作为女人，必须意识到性欲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如果不加引导，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两人一起工作到深夜，一起去参加一次会议，或者两人中的一个突然感到某种需要，这时，那些原先用在工作上的性能量会突然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变成性的表示，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性骚扰。

“女士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男人头上，她们不承认自己的性欲也在起作用。除非使她们看到，性欲是人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则她们永远不会意识到它的作用。我认为人的精力有两个组成部分：体力和性力。我们必须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培养对性的控制能力。长期以来，我们不相信人可以控制自己，我们不相信男人在兴奋的时候能够管住自己。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控制自己，男人同样能够做到。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占上风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性行为 and 性冲动是无法控制的。男人对女人感兴趣的的就是性。所以我们必须像警察一样对此进行管制。’

“这就是为什么女士们总是把自己看成受害者。其实，男人并没有把我们变成受害者。我们的文化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不愿正视自己的性能量，我们不愿承认，在工作场所的强奸和性骚扰中 我们自己所起的作用。”

已经有人开始讨论或写书探讨男性所承受的压力，但是他们的声音太弱小，无法改变我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万宝路西部硬汉形象。

公众对男子气概的理解仍旧深深地植根于坚忍不拔沉默寡言的硬汉形象。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寥寥无几的男士站出来抱怨女人对男人的性骚扰。这样的男人会被人瞧不起，就像那些控告女人欺负他们的男人一样。即使是我们这些口口声声提倡男人进入育儿室的人，当我们看到胸前兜着婴儿的男人时，也会感到不太舒服。我们希望男人爱自己的孩子，做个好父亲，可是，要是男人怀里都抱着孩子，谁来为我们到战场上去当炮灰？这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自相矛盾。

在今天的年轻男子眼里，他们的工作场所显然不是斯坦内姆及其姐妹所描写的那种权力无限的男人任意欺压弱女子的地方。今天工作场所的两性关系不论对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新的挑

战。“人们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研究性别的成长心理学家埃莉诺·麦科比说。“你无法确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是作为异性去吸引对方，还是仅仅和他保持同事关系。问题往往出在这里。”

沃伦·法雷尔谈到男人如何看待女人在工作场所的性感服装、性感化妆和挑逗行为：“男人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一种邀请，他们认为，这表明对方希望他们作出某种和工作无关的反应。这就使得他们不那么看重女人在工作上的意图。”

正如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所说，“繁殖后代是大自然母亲最基本的产品，而美貌则是推销这一产品的手段。繁殖离不开对异性的吸引力。”

美貌女子的同事们知道，任何一个异性恋男子都很难保证不受她的诱惑。她是法雷尔所说的“天生的名流”，男性客户会自动地为她提供机会，男性上司会冒着引起别人反感的风险，格外热心地指导她、保护她、帮她脱离困境。法雷尔的研究显示，如果上司是个漂亮女人，男性雇员们就会担心，这个被人宠惯了的天生名流是否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担心她不懂得平等待人，因为她一定习惯于为所欲为。他们还担心，一个听惯了好话的人是否能够容忍任何批评。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女士开始谈论或写书描述职业女性的生活。“不错，在担任高层主管职务的人中，女性比男性少得多，不过，女权主义者不愿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部分是由于女士们自己的选择。”《独立妇女论坛》的顾问 律师劳拉·A·英格拉哈姆写道，“有些人认为妇女处处遭遇到无形的性别歧视障碍，同时它还使她们成为永久的受害者。这种观点违背了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最初捍卫的事业：男女机会平等。女性在就业和提升方面的机会平等并不等于保证她们在决策层占据一个规定的百分比……在 1992 年，23% 的公司资深副总裁为女性，1982 年为 14%。从 1979 年到 1993 年，女性的工资增加了

119%……只要在各个行业实行真正的公平竞争，女权运动的真正目标就能实现……有些女权主义者老是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想像中的玻璃天花板，她们为什么不看看，职业妇女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

在父权社会里，只要男人的银行账号里有足够的钱，他的秃顶、啤酒肚以及松懈的皮肉就变得无关紧要。不论他的外表如何病态，只要他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他在女人眼里就成了不可战胜的超人。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愿相信，男人也容易受到伤害。

在过去的 25 年里，女性健康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成了发展最快的医学领域。“在 20 世纪的后半段，女人的寿命比男人长 10%,”安德鲁·卡达尔博士写道，“可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从古代到 20 世纪初，男性的平均寿命一直是略长于女性。到了 1920 年，美国妇女的预期寿命比男人长 1 年(54.6 对 53.6)。从那时起，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到 1930 年的 3.5 年、1940 年的 4.4 年、1950 年的 5.5 年、1960 年的 6.5 年……到了 1990 年这个数字达到 7 年(78.8 对 71.8)……我们开始相信女人天生就活得比男人长，因为她们具有更强的生理适应能力。可是这种适应能力在现代医疗系统建立之前的上千年里从来就没有显示出来。如今，这个医疗系统却遭到了女性健康倡导者的攻击 她们谴责这个系统忽视了女性的健康。”

每天早上，我们一面喝咖啡，一面泰然自若地读着报上男性暴力行为的最新统计数据。可是，要统计女性的暴力行为却不那么容易。儿子很少告发母亲，大多数做丈夫的也不愿告发妻子。

不过，也有一些男人开始站出来说话。最近早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新闻：有一位 28 岁的男子，25 年前，他的两个弟弟出生后没多久就死了，验尸官诊断为婴儿猝死。多年来，他一直对当年验尸官的报告心怀疑虑。最近他获准将尸体掘出重新检

验，终于弄清事实真相：25年前，是他的母亲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小儿子。当时法官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近期的例子有苏珊·史密斯。这位南卡罗莱那的母亲溺死了她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妨碍她和情人共度良宵。她很快就被捕入狱。看来，人们开始相信，美狄亚式残杀自己亲生孩子的女人确实存在。

男人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我们可以从诺曼·梅勒这样的老一辈男人嘴里得知他们的愤怒和对女人的恐惧。在一次访谈中，梅勒对麦当娜说，“如果女人有朝一日夺取所有的权力——要知道这是完全可能的事——你就会看到一个像斯大林或希特勒一样厉害的女暴君（我接触过一些早期的妇女解放积极分子，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构想出这样一个女人）。她们会把上百个男性奴隶像奶牛一样关在一起，每天挤他们的精液，然后储存在精子库里供她们延续种族。在任何时候，只需保留一百个男人就够了。男人对女人怀着很深的恐惧。别以为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啊那是女人的乳房那是我的枕头我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其实他们知道，在那温柔的乳房下面，隐藏着冷酷和厌恶。只要他们对女人有一点点了解，他们就会知道，和女人打交道就像攀登悬崖绝壁一样危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我敢说男人凭直觉就可以感觉到女人的可怕。”

梅勒的这段话忽略了一点：害怕女人的不仅仅是男人，女人对女人同样怀着很深的恐惧”。

当年女权主义预言，到了妇女掌大权的那一天，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了。“如果国会代表中的一半都是女性，并且女人也能当上总统，格洛莉娅·斯坦内姆在1970年写道“那么这个国家的傲慢和好斗性就大大减少。过去人们总以为暴力和征服是大丈夫气概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街头暴力，才会有越南战争……在今后的50年里女政治家

们将改变我们对男子气概的理解，使它变得不那么强调进攻性，从而更适合于我们这个处于原子时代的过分拥挤的星球。”

斯坦内姆预言，女性将为权力机构带来更多的同情心。可是只要看看珍妮特·雷诺、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以及克林顿的高级顾问苏珊·托马塞斯的政治生涯就不难发现这些政坛女杰并没有证实斯坦内姆的话。同样落空的还有斯坦内姆关于女性外貌的预言：“有了正常的职业，妇女的自我感觉就不会如此严重地依赖青春和美貌；当第一条皱纹出现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精神崩溃。”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今天，随着收入的增加，我们花在时装和化妆品上的钱也越来越多。不论是新手还是那些沿着台阶逐级向上爬的人，不论是穿套装的还是穿超短裙的，工作场所的女士们都竭力使自己变得更漂亮、更年轻。时装设计师们自然竭力迎合女士们的需求。不过，青年男子也不会等闲视之，让女士们在他们面前任意炫耀，然后以性骚扰的罪名把他们告上法庭。他们将以男性美为武器发起反攻。

男人将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加入竞争。他们不会像女人那样为了防范妒忌而否认和掩盖自己的意图。他们将充分利用男性武器库里所有可以利用的东西——从专业技能到个人魅力，从公文包到英俊的外表——来帮助自己赢得合同和权力。消费者心理学家迈克尔·R·所罗门说：“当你掌握所有的资源时[就像男人曾经拥有的那样]，你是用不着担心自己的个人魅力的……但是随着大批妇女获得工作场所的管理职位，过去的权力平衡就被打破了。”为了夺回失去的优势，男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手段，他们注意到诱人的外貌给女人带来的种种好处。

有一项研究发现，在所有的城市中，亚特兰大的男人最舍得花钱买衣服，就连时髦的纽约也比不上。有一位服装业经理告

诉《新闻周刊》，“亚特兰大是一个推销员和区域经理的城市，‘这类人必须给人以尽可能好的印象。’”正如哈特·沙夫纳 & 马克斯公司在一条广告中所说，“合适的服装”也许不会帮你谈成每一笔交易，但是不合适的服装会让你轻易丢掉饭碗。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男人对时尚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工作场所穿的服装。男子时装协会的诺曼·卡尔告诉《新闻周刊》男人正在为“公共场合的自我和真正的自我”准备两种不同的服装。女士们对这种说法不会感到陌生。

当英俊潇洒的男士们在董事会上把所有的眼球都吸引到他们身上时，当他们大大咧咧地运用自己的魅力从女上司那儿获得提拔时，女士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相信男士们的成功会强迫我们去学习如何把美貌引入竞争机制。

镜子争夺战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抱怨男人看女人的方式。今天，美貌已不再是女人的专利，昔日被我们指责的窥视者们如今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和男人分享经济大权，我们就得放弃自己原有的那部分特权。

男人并不是今天才开始追求美貌。很久以前，他们就像孔雀一样爱美，像孔雀一样喜欢炫耀。他们装扮自己的历史比女人长得多。只要看看过去的五百年，在大多数时间里，男人的躯体和脸都被视为美的典范。如今，他们又重新找回那久违的美感，因为他们发现，这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回报。

拥抱时尚的男人不像我们那样对异性的眼光怀着自相矛盾的心理，他们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吸引力。“在设计上，男人的性感服装把吸引女人、唤起她们的欲望作为一个重要目

标。”洛伊丝·班纳写道，“那时的欧洲人认为，爱情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感情，而眼睛和视觉印象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丽的容貌是引发爱情的导火线，而美貌就是看上去令人愉快的外表。”

几百年来，男人们目睹了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他们对这种令人讨厌的现象眼开眼闭，因为女人之间的相互妒忌和监视使他们能够放心地从事经济活动。

今天，年轻男子们意识到，“漂亮的外表也是成功的手段。”一种新的竞争正在两性之间展开，年轻女士们已经感觉到她们面临的危险。

不过，男人也应该对女人的狡猾有所警惕。有位女经理告诉我，她曾经聘用过一个衣着十分讲究的男子。“他算什么？一副空架子而已。”她轻蔑地说。她本人也挺漂亮，金发碧眼，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我们正为她的获奖举办午餐会。

她说话的口气明显地流露出对那位美男子的妒忌。他居然胆敢侵犯她的领地，于是她就把他给解雇了。这不能不使我们担心，随着越来越多的女人进入管理层，那些在她们手下工作的男人会不会遭到传统女性同样的命运？在过去，漂亮女人不是常常被认为是智力低下和缺乏进取心？

如何看待对美貌的追求已经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这种追求已经成为经济领域的一股强大动力。漂亮的外貌已不仅仅是女人用来吸引男人的资本。男女时装都像万花筒一样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变换，时装模特儿正在成为文化楷模。

当男性服饰业的账本显示，男人在购买更多的衣服和化妆品时，广告商和制造商们就会立即警觉起来。他们比普通人更早感觉到潮流变化的方向。男性杂志的广告向读者大众发布信息，激发他们的想像力，让他们看到双排钮上衣如何使他们显得更加结实，更加肌肉发达，更加年轻。

当有名的伯格多尔夫·古德曼服装店在他们位于第五大街的女装店对面开了一家昂贵的专为男性顾客服务的分店时，那儿的经理告诉我，他得给他的推销员们上课，教他们如何鼓动男士们花1000美元买一套衣服。男性时装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那么，男人是否像女人那样舍得花大钱买衣服？答案似乎是肯定的。5年后，伯格多尔夫的广告宣称，“若是没有风度，雄心壮志只会演变成咄咄逼人的蠢相。”

不过，男人对美貌的看法和女人并不完全相同。对他们来说，是否追求美貌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得不到别人的赞赏，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女人却很少显示出这种独立性。律师苏珊·托马塞斯也许是个例外。这位大名鼎鼎的希拉里·克林顿的“执法干将”被人们称为“散了架的旧鞋子”。她披着乱糟糟的头发，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啪哒啪哒地进出于华盛顿的高层权力社会。也许正是因为像她这样的女人实在太少了，《华尔街日报》才特别提到她的不修边幅。

男人的形象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眼球。大街旁的广告牌上，穿着卡尔文·克莱因性感内衣的英俊男子和辛迪·克劳福德的巨幅照片同样引人瞩目。年轻男子开始有意识地为了赢得别人的赞赏而装扮自己。

在过去，男人若是在镜子前花费太多的时间，别人就会怀疑他是个没出息的小子。我的熟人中有一位非常英俊的美男子，他不仅具有天生的古典美，而且在专业上也是第一流的。有次我请他谈谈自己的体会，他答道，“别人很难相信我有多大本事。”现在他已经50岁了。也许正是别人的怀疑促使他成为知识界著名的反对派人物。他的一位好友曾说过，任何一个像他那样漂亮的男子都会遭遇这样的偏见。不过，他的儿子也许会摆脱这样的命运。

大多数男子在穿着打扮上都比较谨慎，他们不希望这类追

求妨碍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的成功。《小姐》杂志的一位编辑写道，“异性恋男子最害怕的，就是被人怀疑有同性恋倾向。事实上，我们男人和女人一样，对健美运动员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故事，因为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崇拜他，而不是我们；为什么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名声、金钱和女人……在我们看来，这家伙好像根本不需要什么奋斗目标，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然而所有的好运气都落到了他一个人头上。”

这话有点道理。大多数异性恋男子对穿着打扮仍旧心怀疑虑，担心别人说他们不像男子汉。确实，是同性恋社会公开地赞赏并发展了 60 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的男性时装。没有一个同性恋男子不知道美的魔力；发射视觉信号是同性恋男子求爱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不过所有的男人都得感谢 60 年代那种大胆、浓烈、不拘一格的男性时装。正是由于那个时代的大胆创新，今天男人中的大多数，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才能穿上色彩柔和漂亮的羊绒毛衣。如今，异性恋男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富丽堂皇的拉尔夫·劳伦专卖店里游逛。这里的高雅服饰以款式和色彩的大胆新颖而闻名于世。男士们不仅购买服装，而且用拉尔夫·劳伦风格的产品装饰他们的住宅和办公室。

男士们不仅打扮自己，而且开始在传统的禁区里寻求更多的满足。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请不要大惊小怪。我们早就看惯了男人的喜新厌旧，为了年轻漂亮的女人而抛弃自己的妻子。今天，这个新人也许不是女的，而是个年轻漂亮的男子。

直到最近，同性恋的嫌疑仍可能对男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只要在梦中或幻觉中看到自己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他们就会惶恐不安地去找心理分析家。但是，谁能保证，在自己的记忆中没有保留童年时期集体玩弄生殖器的情景？谁能保证自

己在少年时期没有迷恋过高年级男孩运动员一般健美的体魄？男性异性恋社会的刻板规矩迫使男孩们放弃这类梦想和回忆。但是，谁能从潜意识中把它们清除出去？

去年，《滚石》杂志的创始人、出版业大亨詹恩·温纳离开妻子儿女，和一位男时装模特一起偷偷地住在纽约东部一家时髦的高档旅馆里。这件事确实成了不少人的热门话题，但并没有引起任何轩然大波。要是发生在 20 年前，公众的反应就会大不一样。如今，公众的反应是温和的，他们只是感到有趣而已。毕竟，出版、电影和音乐等行业里的最有权力和财力的人中有些是同性恋者。长期以来，男人的美貌总是和同性恋联系在一起。随着美越来越多地进入男人的生活，同性恋的处境也越来越好。

同性恋者在时装设计业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当我们看到穿着华丽服装的美貌女子时，我们常常会想，“她多迷人啊！”很少有人会想，“天哪，这衣服一定是同性恋设计的！”看来，我们的社会仍旧不承认同性恋者对美的鉴赏能力和他们为美化我们的生活所做的一切。不过，我们至少已经允许男人重新注重自己的外表。

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什么比金钱更有说服力。有些人也许会私下里诋毁巴里·迪勒和戴维·格芬，但是他们在影视娱乐业创造的巨额财富使那些憎恨同性恋的人羡慕得发狂。这些同性恋者的巨大成功使社会不得不在许多方面改变对他们的看法。这种转变也影响到人们对男性时装的看法，因为这个领域基本上处在同性恋审美观的完全控制之下。对那些在穿着打扮上刻意引人注目的男人，我们不再轻易地给他们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如果迪勒、格芬或温纳等同性恋名流愿意赏光出席我们的晚宴，我们也会觉得十分荣幸。

正如电影、文学、色情幻想以及现实生活所证实的那样，同性恋的主题虽然仍旧具有犯禁的刺激性，但已不像从前那样令

人畏惧。

在昨天夜里播放的警匪片《激情似火》里，男主角罗伯特·德尼罗和阿尔·帕西诺在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中变得如此难解难分，以至于拿不出多余的热情来留给他们生活中的女人。在最后的较量中，帕西诺射杀了德尼罗。临死前，德尼罗向帕西诺伸出手。在黑暗的旷野里，帕西诺握住德尼罗的手，直到他停止呼吸。我们看到，帕西诺虽然赢了，但德尼罗的死使他倍感孤独，因为只有在对方的眼里，他才能看到自己。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穿着打扮都十分抢眼。

随着女性在经济领域里竞争力的日益增强，女人的权力范围也不断扩大。她们不仅在工作场所和男人争夺饭碗和控制权，而且试图将男人的言语行为置于她们的管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将如何看待他和女人之间的性关系？自古以来，女人都是男人争夺的战利品。男人在两性关系中的表现如何，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他的早年生活，即他在幼年时期和父亲、兄弟姐妹以及母亲的关系。

父权社会的男子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母亲在任何方面对他有任何影响。但是，那些把美貌看得极其重要的同性恋男子却比较容易意识到母亲的影响。10年前，我的朋友迪克对我说起他的过去。在当时，像迪克这样的人肯定会被视为同性恋。可是现在，我觉得他的故事和所有的男人都有关系。

也许你还记得，迪克的母亲是个大美人，然而她对年仅4岁的儿子却妒忌得要命。她难以忍受小迪克惊人的美貌，于是就抛弃儿子和丈夫离家出走。打那以后，她只是偶尔回来向前夫要钱，迪克和她的会面也很短暂。不过，迪克却向她学到了不少。“别人总是对我说，我很像她。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爱我。不过，我观察到她如何利用她的美貌。从她那里，我学到了如何利用我自己的容貌。我想，好吧，如果她对我如此漠不关心，那

我就让她尝尝我的厉害。”

迪克彬彬有礼，非常讨人喜欢，不过他也是我认识的人中竞争意识最强的一个。13岁那年，有次他去见母亲。“那时她刚和她的情人从墨西哥回来，他说：“他们两人穿着相同的有红色饰带的白衣服。我乘母亲离开客厅的时候和她的情人调情。我故意逗他，摸他的肩膀和手，他也亲热地拥抱我。他一面吻我，一面命令我，‘不不张开你的嘴！’这时她走了进来。

“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如此怒不可遏。她把我撵回家，却保留了那个情人。不过，在这场竞争中，我是得胜的一方，我敢肯定她也是这样看的。当时我很担心，不知她将如何报复。从那时起我和她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直到完全终止。”

他的母亲不仅拒绝见他，而且拒绝和他通电话。上次母亲节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想这是因为她害怕和你竞争，害怕再次输给你。”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说，“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我那样做只是为了报复她对我的冷漠。”

“可是那次你确实赢了。”

女人对有自恋倾向的男人总是心怀疑虑，她们不相信这种男人能够养家活口。这种怀疑是从她们的女性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如今，许多女人有了自己的房子，收入超过了男人，有的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一把自卫的手枪，有的在餐馆里一面付账，一面露出乳房给孩子喂奶，但是她们仍旧不愿放弃过去对男人的偏见。

“妇女解放运动必须注意，过分激怒男人可能导致他们杀害女人，”马格雷特·米德说：“你们已经把他们逼得差不多要发疯了。如今青少年男子正越来越多地诉诸暴力，他们似乎想告诉女人：我们将充分利用那些你们还没有用过的手段。玛丽娜·沃纳指出，电影和电子游戏之类的现代神话向男孩们显示，真正

的男子汉必须拥有强壮的肌肉和高大强健的体魄。武力已成为“男性权威的源泉”。

面对青年男子中日益增多的暴力行为，崇尚母权的女权主义者不去追根寻源，反而鼓吹向犯罪者索取监狱“使用费”和重返社会的改造费，这种做法只能适得其反。“男人需要很多的关照，”心理学家琼·斯蒂芬森写道，“我们不能指望男人来监管他们自己，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承担责任……男人不喜欢相互监管。除了那些组织严密的男性团体，男人不像女人那样相互之间保持密切的感情关系……这就是做男人的代价。”

精神病专家威拉德·盖林有一次告诉我，“如果一个男人在他的童年时期、中学时期或大学时期没有同任何人有过亲密的友情，他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才能或精力。工作会消耗他的全部精力，他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孤独感。”在我的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和许许多多的情人，我从来没见过任何男子在成年之后和另一个成年男子建立起新的亲密友情。

我丈夫对我谈起他19岁时出过的一次车祸。他受了伤，车子也撞坏了。伤好后，他的父亲把自己的车给了他，还建议他用那笔保险费去旅行。“请个朋友和你一起去。”父亲说。可是儿子要求父亲和他同行，父子俩从来没有分开过。他的父亲是个非常成功的人，他拼命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常常工作到深夜。

他们去了好几个城市，包括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城和旧金山。一路上，他们谈业务、谈政治、谈新闻，但是从来不涉及个人生活和感情，从来不涉及内心世界。

在我们刚相识的那些日子里，他常把自己过去的的生活描绘成“分割成许多相互隔离的小块”。后来我看到他在东京居住时收集的古代日本家具。那些精美的柜子里有很多很小的抽屉。这使我想起他说过的话，他把感情埋在心里，就像藏在一个个小抽屉里那样。

要是母亲和女儿一起旅行，情况就大不一样。她们之间的谈话不可能不涉及自己的感情生活。当然，男人并不是生来就不愿流露自己的感情。这不是女人的过错，也不是女人可以改变的。只有男人自己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比起妇女争取工作权和参政权的斗争，成年男子的这场革命更加艰难。

对一个成年男子来说，要在记忆中寻找几十年前那个敏感的自我，重新挖掘出残留的儿童时代的温情，并以此来引导儿子走一条不同的感情生活之路，这绝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不论是弗洛伊德，还是五花八门的男性杂志，都不能帮助男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重新触摸那些“非男子汉”的感情创伤。父亲是男孩最信赖的榜样，如果今天的男孩不能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学到一些经验教训，那么将来的男性犯罪率就可能继续上升。

罗伯特·布萊兄弟会和“洛守诺言者”教会等男性组织已经开始行动。《女士》杂志曾派遣一名女记者装扮成十几岁的男孩，偷偷潜入“格守诺言者”组织的一次集会。这位记者事后撰文称赞该组织的宗旨，“如果我们想按照我们的愿望改造社会，就必须支持男人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提倡相互关爱和平等待人。”不过她仍旧忘不了加上一段充满嘲笑口气的开场白：“喜气洋洋、脂粉气十足的男士们像挥舞指挥棒那样舞动着色彩鲜艳的‘格守诺言者’旗子……不知我走起路来像不像那些两腿间长着男权象征物的家伙。”

想像一下，如果男孩在长大后都能保持小时候对情感的承受力，而不是处处压制自己的感情，摆出一副不动声色的铁板面孔，他们的样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你们垄断了繁殖的权力、生育的权力、带孩子的权力……如果你们还要试图夺走我们手里剩下的那点东西，”电视明星蒂姆·艾伦说，“那么愤怒的男人就会为保护他们仅有的那点儿地盘而采取非常激烈的举动……”在这个日益中产阶级化的世界

里，女人不仅夺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而且正按照她们的标准来重新规范社会生活。那么，男人将处于什么样的境地？艾伦继续道：

孩子出生了——老婆走进房间，“噢！”——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房间里亲热，就像一个小孩在梅西百货公司里盯着那些从未玩过的玩具。这真叫人受不了！瞧他们两个；“啊”——他们叽叽咕咕，多么亲热……而我却成了无关紧要的小男人。我必须找些理由让他们想到我……“我只剩下一点点东西，我只能呆在一个小角落里。我得时时揣摩你的心情，留心你在外面工作是否顺心；就是做爱也必须小心翼翼！”我的老婆孩子过去常说，我生来就是个勇士。不错，我是个勇士……可是事实上，你根本就不需要我的存在。好吧，见你的鬼——我不仅要存在下去……而且要建立一支大军；我要把你打得落花流水！我是说，如果你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就会这样做。如果你想和我大战一场……“你打错了算盘！”因为我比你更能战斗。

其貌不扬的富豪和依附权贵的美女

我和一位朋友坐在洛杉矶的一家餐馆里。突然间，她碰了我一下。这时，一个身材矮小、穿着一身蓝色西装的秃顶男人走了进来。我们知道，此人刚买下一家航空公司。别看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他站在那里却像个巨人，因为他很清楚，我们都知道他拥有巨额投资、豪宅、私人飞机，这一切都使他配得上身边那位绝色美人。她带着一只精美的埃梅斯皮包，阳光下，她那美丽的金发像皇冠一样闪闪发光。

“他的青少年时代一定是不堪回首。”我对朋友说。他从头到脚都在告诉我们：那时他是个被女孩们拒绝的男孩。80年代后期，我曾这样试探一位工业巨头的后代：“请谈谈你的青少年时代。”这并不是出于恶意。要知道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完全理解，他之所以拼命工作，就是为了永远告别青少年时代遭到的羞辱。矮小秃顶的商界巨头在青少年时代对自己的奋斗目标比足球明星们还要狂热。他们也许整个周末都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埋头读账单，与此同时，那些到处有人捧场的小明星们却在球场上大出风头。默默无闻和妒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最后，他们终于反败为胜，成了赢家。

80年代中期是这些人的黄金时代。他们成了杂志上的封面人物，还有他们年轻漂亮的妻子。美丽的长发是这些女人的招牌。即使面孔算不上特别漂亮，那头长发也给她们增添了无穷魅力。“头发就是一切。”我的一位朋友常说。这些阔太太们有钱让美发师每天给她们做头发。那年头，美发师和服装设计师是爱美者生活中最最不可缺少的人。

对于那些相貌平平的富豪们，他们的漂亮妻子并不仅仅是战利品。这些女人也工作，她们不是拥有自己的公司，就是没完没了地举办慈善舞会。这些活动都以炫耀奢侈豪华为特征。例如，马尔科姆·富布斯在丹吉尔斯和索尔·斯坦伯格在汉普顿斯的生日宴会均耗资百万美元。与会者个个穿着豪华艳丽的奇装异服。宴会从头到尾热闹非凡，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兴奋和紧张。汤姆·沃尔夫的《名利场的焰火》最准确地抓住了那些场合的特征。

那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金钱成了社交场合公开谈论的热门话题。价格成了晚餐桌上谈话的主要内容：公寓的价格、衣服的价格、夏季别墅的价格。即使你不提问，别人也会告诉你，他们花了多少钱购买这些东西。根据我的记忆，从70年代末开

始，这种在社交场合炫耀财富的恶劣风气就开始泛滥，传统的礼貌和谦虚则被抛到九霄云外。

也许是越南战争和水门丑闻使我们对善良和美德产生怀疑，于是我们只能求助于花样翻新的时尚来掩盖我们内心的空虚和尴尬。

长期以来，美貌女子都是被男人用来向外界显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然而到了 80 年代中期，至少在曼哈顿及其他大城市里，美女们开始追求自己的财富。女权主义使工作成为一种时髦，富豪的太太们也不甘落后。她们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显赫的成功。这就是说，像乔吉特·莫斯巴赫这类专找阔佬做丈夫的美貌女子要有她们自己的公文包，要以商界名人而不是花瓶的身份来接受媒体的采访。对她们来说，在四季或勒西尔克豪华餐厅的午宴上若是没有她们自己的客户，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50 年代巴比·佩利之类花瓶式的社交名流如今已销声匿迹。

这些女人并不是因为缺钱才如此起劲地经营自己的公司。《时装》、《都市》和《哈珀氏集市》等杂志都报道过她们排得满满的日程表。她们每天从早上 6 点起就开始忙碌：会见私人培训师，美发美容，然后由私人司机开着轿车送她们去公司。不知为什么，人们似乎对她们格外重视。然而，女权主义的领导者们却从来没有触动过她们，既没有赞扬，也没有诋毁，尽管她们这种工作兼游戏的日程表其实是女权运动影响的产物。如今，要是有人在社交聚会上问一个女人：“你干什么工作？”而她却答不出来，那将会使她感到非常恼火。

于是出现了“超级夫妻”：通常是一位离了婚的男人选中一位比他年轻很多的漂亮女人。他们是媒体的宠儿。和他的第一个妻子不同的是，这位新娶的娇妻并不喜欢在家给他带孩子。她宁愿用其他方式来为他的形象增光添色。她的社交本事通

常比他大，她告诉他应该加入哪个俱乐部，应该为哪个慈善机构捐款，应该出席哪个社交聚会，以及如何举办社交聚会。不用说，她也教他如何穿着打扮。

她常常代表他说话。由于她比他漂亮得多，照相机的镜头总是对着她。人们一看到她的照片就会想起他的名字。这种合作关系的先决条件是，她的出头露面不能有损于他的形象。必须给公众留下这样的印象：有这样迷人的女人为他增光添彩，那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每年的一月一日，他们都要坐在一起共同策划，保证夫妻双方的业务和共同的社交活动能够协调一致。

当然 妻子的资产肯定没有丈夫的‘财富 500 强’那样雄厚，但是对丈夫来说，她的美貌和社交才能却是一笔无价之宝。这些工商巨头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创造财富，以至不知道如何使用吃鱼的叉子和记事卡，也不知道加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重要性。不过他们最终都迫不及待地等着这家世界闻名的博物馆接受他们上千万美元的捐款，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成为董事会的一员了。

就这样，我们面前站着一个矮小的秃顶男人，他穿着深蓝色的西装，虽然是定制的，但同别人的西装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丝毫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有人告诉我们，他是谁，也就是说，他拥有多少财富。我们的眼睛再次转向他。这回，我们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不再显得那样矮小，他的头上似乎有了一圈耀眼的光环。我们想起来了，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啊，它不仅经常出现在报纸的财经版上，而且出现在所有期刊的社交专页上。现在我们明白了，那位身材高挑的美貌女子为什么要投入这个男人的怀抱。这是一笔交易，是财富和服务之间的交换。

这些美貌女子中的许多人即使不嫁人也能活得很好。她们

在公园大道上有自己的套间。她们完全可以和年轻英俊、兴趣相同的男子在一起。然而，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女权运动之前还是之后，研究结果都表明，不管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女人总是想找经济实力比她更强的男人。

“从几十项研究中获得的证据表明，在现代社会中，美国女人远比男人更看重配偶的经济实力。”心理学家戴维·M. 巴斯写道。巴斯提供了 1939 年、1956 年和 1967 年的数据。只要比较一下这些调查结果就可看出，美国女人和男人在衡量配偶方面的这种差别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就是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巴斯在 80 年代又作了一次类似的调查。他让调查对象“按照他们各自选择配偶的标准排列十八种个人特征。和几十年前一样，女人看重配偶财富的人数比男人多一倍”。在 1994 年和 1995 年，巴斯又作了一次调查，他用报纸和杂志上的征婚广告证明，在婚姻市场上，女人看重的是财富……女性征婚者要求对方拥有财产的人数是男性征婚者的十一倍”。

巴斯和他的同事们把他们的调查扩大到六大洲和五个岛上的三十七种文化。他们再次发现，“不论在哪个地区，不论是什么样的种族、宗教信仰、政治体制（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婚姻制度（形形色色的多配偶制和一夫一妻制），女人都比男人更加看重配偶的经济实力。总的来说，女人看重经济实力的人数比男人多一倍。”

我个人对这个调查结果感到非常失望。我的心理学同事们也许会说：“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了吗？”我曾希望，妇女收入的提高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使我们能够摆脱经济上的依赖心理，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男人。奇怪的是，巴斯的调查似乎证实，比起收入较低的女子，那些最成功、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子“更加强烈地希望自己的配偶有很高的收入”。

在女人眼里，富人的秃头和大肚子不同于穷人的秃头和大肚子。不错，富人的经济实力可以改变我们的眼光，在金钱的陪衬下，丑的也会变成美的。不过，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女人之所以如此迷恋权势，男人的银行账号之所以对女人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我们从小缺乏独立性有关。小时候，我们依赖母亲，母亲拥有所有的权力，在我们眼里，母亲是最“美”的人，离开她，我们就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足够经济收入的妙龄女子要嫁给又老又丑的富豪：她们需要一个比她们强的男人来占据母亲在她们生活中的地位。

但愿有一天，年轻漂亮的女士们不再选择比她们大 20、30、甚至 40 岁的男人来做她们的配偶，而是转向那些和她们在各方面都更加相配的男子。说句直话，当一个年轻女人和皮肉松懈的老人躺在一张床上时，她的脑子里怎能不幻想一个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男人？就拿我来说，男人的外貌在我眼里从来就不是头等重要的东西，不过，即使在收入很少的情况下，大腹便便、性力衰竭的男人也绝不会进入我的视野。也许，当妇女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开始在她们的潜意识中产生影响时，她们就会更加强烈地希望和自己相配的男人一起生活。到那时，我们也许会看到真正的转变。

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历史事件像女权运动那样深刻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然而，女权运动本身今后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今天却成了问题。今天上午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女权主义者后代的文章。她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多年来，她们的母亲拼命工作，心力交瘁，很少时间和她们在一起。这些女孩长大后不再希望过母亲那样的生活，不再渴望母亲所追求的那种经济上的独立；她们想在父权社会的女性角色和女权主义的理想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如果在她们这代中有足够多的人支持这种看法，她们就可能改

变女权运动的方向。

眼下我们看到的，是在男女之间进行的一种新的交易。如果说，那些矮小秃顶的富豪们把理财的诀窍传授给了他们的年轻太太，那么，年轻太太们也让她们的丈夫学会了如何打扮。这些熟悉高档时装的太太们深知埃梅斯领带、沙尔韦衬衫、定做的西装、亨茨曼或丘奇皮鞋等高档商品的涵义。用不了多久，做丈夫的就领悟到服饰品牌如何显示一个人的身份。

记得有位矮小的富豪，他每次碰到我，都要对我从头到脚仔细观察一遍：“谁给你做的头发？”伊夫。“这条连衫裤太好看了。谁设计的？”杰弗里·比恩。“这只包是谁的牌子？”普拉达。“这双鞋一定是费拉加摩。”对。”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他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到伊夫去理发。“我也去好吗？”他问。于是，他加快步子和我同行，他的司机开着奔驰轿车慢慢地跟在我们后面。我不禁想起影片《鲁莽》里的卡里·格兰特和英格丽·褒曼。“你有多高？”五英尺十。”我说。

显然，他试图熟悉各种品牌并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表。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他终于能够实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梦想，大胆地接近过去不敢接近的女人。他在曼哈顿南面的一个镇上积聚了大量财富，他的妻子是个传统女人。

他收购了好几家有名的公司，这些公司都用个子很高的漂亮女模特做广告。他花大量的钱收集这类模特儿，就像以前的富豪们收集赛马场上的骏马。不用说，今天的模特儿就是昨天的纯种马。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受过时髦女士的调教，还保留着一些讨人喜欢的天真和不加掩饰的好奇心。后来，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那张圆脸，还有他身边的大美人——我就想，他是否真的喜欢这个女人？

总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妻子，再娶一个更加能干、个子更高、更吸引人的女人为妻，她将是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出头露面

的女人。这是最新版的“新权力交易”：野心勃勃的女士需要男人的钱来帮助她们满足自己的权力欲。

既然双方都工作，都有经济实力，那么随便哪一方都可在任何时候离开对方。也许他们永远不会有孩子，也许他们性别相同，但是经济上的独立使双方都能在爱情的名义下利用手里的权力来控制对方，这样一来，婚姻关系就变成了心理学家迈可尔·文森特·米勒所说的“亲密的恐怖活动”。

社会学家菲利普·布卢姆斯坦和佩珀·施瓦茨写道：“在新的婚姻关系中，妻子越是雄心勃勃，婚姻关系就越不稳定。这并不是说，雄心勃勃的妻子一定会这山看着那山高。更多的情况是，做丈夫的不愿和这样的女人一起生活。在那些关系破裂的夫妻中，我们发现，妻子越是雄心勃勃，丈夫希望结束婚姻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短短的 25 年里，女权主义重新改写了女性生活的标准模式。在过去，对一个女人来说，男人的外貌、年龄或人品都是次要的东西，最要紧的是找个有能力养活她的人，从而避免落到孤苦伶仃遭人鄙视的境地。那时候，美貌女子绝少成为“老处女”。如今，再也没有人用这个词了。当我们看到漂亮的单身女子跑到精子库去要求人工授精或穿着时髦的孕妇装大大咧咧地到处走动时，我们也不再惊得目瞪口呆。不过，当她到精子库去购买精子的时候，我敢保证，她对精子的提供者所具备的遗传特征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没有人要矮个子提供的精子。”精子库的一位发言人说。他们不接受身高低于五英尺六的人提供的精子。

1987 年 11 月设计大师克里斯琴·拉克鲁瓦特地从大洋彼岸飞来纽约，为美国巨富们的太太设计服装。新闻媒体对此则大肆炒作。再也没有比这一事件更能反映 80 年代中期的庸俗和浮夸了。我们可以在《纽约》杂志刊登的朱莉·鲍姆戈尔德

的文章里找到关于这一事件的最精彩的描写。鲍姆戈尔德指出，拉克鲁瓦特的时装使人想起垂死的没落贵族的反抗。“自从18世纪法国贵族被押上断头台之后，如此刻意炫耀贵族身份的豪华服装好像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拉克鲁瓦特带给那些新型交际花的服装看上去十分荒唐可笑，而且价格惊人，一套衣服售价高达15 000美元。但那些阔太太们却争先恐后地购买。

正如鲍姆戈尔德所说，“拉克鲁瓦特服装的奢侈豪华将社会永久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他恢复了紧身胸衣和袒胸露臂的式样，他喜欢怪诞、俗气和早已过时的东西……并把这种爱好传给别人。他的眼光彻头彻尾地不合时宜，但是他能使老得没牙的东西看上去颇为现代和前卫。穿着他的衣服似乎可以在火山口上跳舞。”

不知那些为拉克鲁瓦特的复古式豪华女装掏腰包的男人们有没有对他们太太的荒唐打扮产生过丝毫疑虑。他们很可能什么也没说，因为他们相信太太比自己更了解社交场合的奥秘。典型的80年代富豪除了投资以外什么都不懂；他从来就没学过桑巴舞等时髦玩艺儿。在社交场合，他得完全依靠太太的指引。她教他如何穿戴，或者请个形象设计专家来做他的顾问。形象咨询服务在80年代开始走红，并且随着商业活动的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

今天，国际市场上的角逐迫使美国商人和企业家力图在形象上也胜过他们的欧洲竞争者，这进一步促使男人注重自己的外貌。

如果一位公司总裁准备到意大利去参加一次会议，他的顾问就会告诉他，在欧洲工商界，一个人的外貌在他的商务交往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国际形象咨询业生意兴隆，他们不仅为工商界人士挑选衣服，而且帮他们选择鞋子、链扣和领带，教他

如何在用餐时使用一整套豪华餐具。

“今天，当男人们围坐在会议桌旁的时候，他们非常仔细地相互观察，”形象顾问卡米尔·拉文顿说，“他们希望和重视礼仪和外貌的人打交道。”

有趣的是在 80 年代的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男士和女士都开始对自己呆板的职业装感到不满。在这个时期，“美国男人突然大量花钱购买高档服装以便与欧洲人日本人比高低。”拉文顿说。

与此同时电视连续剧《迈阿密的罪恶》风靡一时唐·约翰逊在此剧中的时髦打扮鼓励小伙子们在时装领域的各条战线都成为先锋。职业装、休闲装、夏装、冬装——男人的衣橱越来越大，里面的东西在品种和数量上一点也不比女人的逊色。今天，好莱坞明星、体育明星以及工商界的巨头们，都成了男性时尚的领头人。他们的形象被媒体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男性大众效仿的榜样。即使买不起他们那身昂贵的包装，人们也会设法买套便宜的翻版。

拉文顿的形象训练其实是先从眼神、握手、姿势和仪态开始的。“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正视对方的眼睛，这样你就能观察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件事是观察对方的穿戴打扮是否整洁得体：头发有没有修剪过，脸有没有刮过，衣服是否合身（就是说衣服是否是定做的）还有领子和领带最后还有鞋子。

“服装显示出一个人拥有的权力。在国际市场上，当你走下协和飞机去和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打交道时，如果你穿着露出一截小腿的短筒袜而不是那种专供经理穿的长筒袜，对方会注意到这类细节。大公司的决策人在穿着和行为上都遵循一定的模式。”

男人对美貌的追求不仅表现在服装上。根据美国整形外科研究院的报告，在全国所有的整容手术中，男性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10%提高到 1993 年的 24%。男人的整容不仅包括面部和腹部的脂肪，还包括胸部和阴茎等等。越来越多的男人力图美化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

男性美的未来掌握在女人手里

20 岁那年，我接到一位律师的通知：我继承了一笔遗产。“谁给的？”我问。“你父亲。”他说。我这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

几年后，多特姨妈对我说：“你爸爸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是匹兹堡最英俊的男子。他一到场就会把别人的眼光都吸引过去。”母亲后来告诉我，他是个好色的花花公子。

怪不得我对漂亮男人不感兴趣。这些男人的身后总是跟着一群试图把他们偷走的女人，他们的脸上多多少少显出三心二意的迹象。我要找的是全心全意崇拜我的男人。作为报答，我会让他们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一个全新的自我。我喜欢看我的男人穿衣和脱衣，我的眼睛就是他的镜子。男人只知道扮演窥视者的角色，却从未学会如何欣赏自己。在我认识的男人中，有些人在穿衣服的时候从不晓得照镜子。

在 80 年代初，当我第一次遇到我丈夫时，他被我引人注目的打扮所吸引。当我们一起在街上走时，他注意到别人对我的注视。为了让他也对穿着打扮感兴趣，我把他带到伯格多尔夫时装店去做衣服。当裁缝给他量尺寸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看他如何在镜子里看自己。

他好像从来没见过镜子里的那个人。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他有六套韩国制作的一模一样的蓝色西装。打那以后，为他购买衣服成了我的一大乐趣。每天早晨，他都要穿好衣服站在我

面前等待我的判决。他只信任我的眼睛，其他女人的眼睛他一概不相信。我唤醒了他的虚荣心，我成了他不可缺少的一面镜子。

我并不担心他会得意忘形，因为男人的传统角色在他心里已是根深蒂固。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不论自己穿得多么挺刮，他更感兴趣的是别的男人如何看我。这说明女人的传统角色在男人心里也同样根深蒂固。

有的男人对我说，要想吸引女人的眼睛很难。作家盖伊·塔利斯说，当他和妻子在第五大道上走的时候，“我注意观看那些经过我们身边的女人，她们的眼睛只看她，对我连看都不看一眼。”得不到别人的关注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是不利的，这无疑加剧了男人看女人时的饥饿感。我的朋友盖伊是个非常善于打扮的英俊男子，可是女人们就是不看他。她们从小就没有学会欣赏男人。

不过，有些年轻女子已经把眼睛转向男人，虽然这仅仅是开始。“关于窥视的早期分析理论认为，眼睛像嘴巴一样，总是拣好东西吃。”罗伯蒂勒说：“当一个人看到美貌女子，他的眼睛就会抓住她，津津有味地品尝，从这个形象中得到满足。这个过程很像吃饭。”

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女人喜欢看女人。在我的问卷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貌对女人很重要？”大多数参加调查的女人在回答时都把男人放在所有原因的第五位。而男人在回答为什么追求美貌这个问题时，却把女人放在所有原因的第一位。

如果男人进入育儿室，他们会不会在孩子的记忆里留下男人的模样、气味以及肌肤的感觉？这些记忆会不会使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像留恋女性身体那样本能地渴望接近男性身体？不错，男人不能怀孕，男人也没有乳汁，不过，男人进入育儿室必将

为男女关系带来最大的活力。

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来自女人的身体，性感女郎裸露的身体都会在我们心里激起对婴儿时期的眷恋。我们羡慕女友丰满的乳房。在女人的性幻想中，我们把别人的乳房当作自己的枕头。如今，母亲照顾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对女性身体的眷恋也相应减少，甚至于，幼年时期由于缺乏母爱而产生的愤怒变成了对自身的厌恶。我们更加讨厌自己的身体：松垂的手臂、肥大的臀部，还有那肉鼓鼓的肚子。丰厚的年薪并没有给我们的潜意识增添一分温暖。

在那些对着裸体女人像自慰的男人眼里，女权主义者看到的只是可耻的堕落。然而，她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罗伯蒂勒过去常去表演脱衣舞的滑稽歌舞剧院。他说，“外行人以为，男人观看裸体女子跳舞是为了玩弄和羞辱她们，而女人在那些可恶的男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体纯粹是为了赚钱。其实这是一种爱的集会。我们男人是崇拜者。表演脱衣舞的女子在男人眼里看到的是爱慕和崇拜。在男人眼里，那些让他们观看的女子都是女神。这些女子代男人实现他们炫耀自己身体的梦想，满足他们被压抑的表现欲。”

“难道没有嘘哄的场面？”我问他。

“偶尔发生这样的情况。不过这会引起其他观众的不满，他们会把起哄的人赶出去。脱衣舞女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恋爱关系，也许比性关系更重要。”

没有人能像女人那样促使男人跨入美和性的殿堂，因为最初就是女人把他挡在大门之外的，现在是我们把这种机会还给他的时候了。如果他相信我们的诚意，如果他在我们的关注下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美，那他就会成为我们忠实的伴侣。如果母亲——他生活中的第一个女人——禁止他爱自己的身体，这一禁忌将会影响他的一生。如果小时候他被告知，触摸阴茎就

会有生命危险，那么即使在长大后，恐惧、痛苦和愤怒仍旧会伴随着他对爱情和性的渴望。妓女知道他的幻想，但是他的妻子拒绝满足他的渴望。如果女人能给男人更多的机会，和男人分享生育女和追求美貌的权力，她们就会获得永久的回报。

今天，年轻男子已开始卓有成效地利用外貌来为自己谋取优势。对这一发展趋势，女人已无法继续视而不见。男人不会像我们那样忸忸怩怩地掩盖自己的表现欲。这并不是说，男人比我们好。不过，他们确实是更有经验的竞争者，他们并不担心，一旦出类拔萃就会被其他男人抛弃。

我们应该观察男人如何在竞争中利用自己的外貌，这也许会鼓励我们重新审视女人在竞争中遇到的问题。当男人发现，经济实力并不是男性身份的惟一标志时，他们也许会乐意扮演工作场所之外的其他角色。至少，漂亮的外貌和别人的赞赏会给男士们带来更多的满足，这样他们就不会把金钱和成功作为惟一的人生目标，也不会完全靠窥视女人来满足自己对美的渴望。

如果更多的女人学会观看和欣赏男人，那么，由此而来的快感就会使女士们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要没完没了地诋毁男人的窥视欲？难道我们不能尊重他们对美的渴望，把他们看成合作伙伴？

如果女人在挑选配偶的时候更加看中男人的外貌，男人就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不过，如果我们相信妇女杂志里的东西，那么两性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更多的麻烦：“首先 美貌就是力量 男人很久以前就享有这种力量。”《如果他比你漂亮 那怎么办》的女作者写道“其次 美男子完美的身体对我来说从来就是不祥之兆。它是暴风雨降临之前的宁静……那风暴就是女人可怕的妒忌之火……”

将来，精明强干的高收入女士会不会相信自己有资格找一

个魅力十足的男人为伴？当别人的眼睛都盯着他而不是她的时候，她会不会觉得心安理得？同样，当她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时，他会不会接受这种新的权力再分配？

历史是由经济的发展来决定的。如今，男人不需要为了生存和野兽搏斗，也不需要依靠体力来战败敌人，男人的作用正在不断地演变。

当然，许多追求美貌女子的男人仍旧相信，他必须养她，负担她的一切费用。许多女人也继续厌恶那些把精力用于追求自身美貌的男人，她们担心这样的男人会心安理得地指望她来供养他。当男人的自恋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女人就开始惶恐不安。因此，她们心目中的男人仍是那种能够挣大钱的角色，至于他的秃顶和大肚子，那就无关紧要了。

《今日心理学》报道了一项关于男人外貌的全国性的调查：“女人对男人，不管是有胡子的还是没有胡子的、行过割礼的还是没有行过割礼的、高的还是矮的，或者在外表上有其他不合标准的地方，她们通常是不太挑剔的。”但是调查报告也指出，有些拥有足够的收入和财产或者认为自己很有魅力的女子对男人的外貌有更高的要求，“这是个新的、更加直言不讳的少数派，她们公开表示要和外貌比较英俊的男子结合的强烈愿望……这次调查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那些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有魅力的女子更看重男人的相貌和性力。这些女子的年龄稍高于平均年龄（接受调查的平均年龄 38 岁），体型较瘦……收入也较高，将近半数年收入超过 3 万美元。”

进行这项调查的研究人员沃伦·法雷尔还说，“当男人和女人意识到自己被别人视为美的对象时，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美貌女子可以单凭她的容貌赢得男人的青睐、跻身于社会名流。美男子虽然也会听到许许多多的赞扬，但是要得到社会的尊重，他仍需做出成绩、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换句话说，当他由于经济

上的失败而遭到成功女子弃绝时，他会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供对方满足性欲的人。这是美貌女子和美貌男子之间的显著区别。”

如今，男人最害怕的是这样一类女人：她们不仅漂亮，而且非常成功。有些成功女子认为男人是由于她们的成功而对她们产生反感，但是法雷尔的研究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和流行的看法相反，女人越成功，她对男人的吸引力就越大。但是男人知道，比起那些没有什么成就的漂亮女人来，成功的漂亮女人更可能拒绝他，因为她没有他也能过得很好。她会像简·方达那样将他逼得喘不过气来。他必须成为她的电影制作人、总统候选人或者亿万富翁。女士们抱怨，‘男人不喜欢成功的女人。’这不符合事实。如果他对她不感兴趣，那他就不会害怕被她拒绝。”

没有人喜欢遭到别人的拒绝。传统择偶原则是取长补短：男人有金钱和房产，女人没有；女人有美貌，男人没有；男人需要漂亮女人来为他增光添彩。如今，男人自己也开始追求美貌，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光顾整容医生的诊所。“到我这里看病的人中，认为自己身体形象有问题的男人越来越多。”纽约的饮食失调诊所主任斯蒂芬·罗马诺医生说：“他们是运动强迫症患者，还有滥用类固醇的人。”自从1987年以来，经常锻炼的男性人数已经增加了30%以上。

我们都喜欢看漂亮女人；健美的男性身体同样能给人带来视觉快感。今天的男人，尤其是青年男子，不仅渴望漂亮女人，而且渴望像她们那样风光，像她们那样，走到哪里都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在1994年的一次调查中，6000个年龄在18岁到55岁之间的男子被要求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六个中选率最高的答案中，有三个和外貌有关：对女人有吸引力、富有性感、相貌英俊。决断力和自信心等传统的男性气质则排在第八和第九位。调查结果还显示，56%的男子同意，“如果别人注意并谈论我的外貌，我会感到高

兴”(在二十多岁的男子中，这个比例占了 69%);6 年前，只有 48%的男子赞同这句话。

男人的爱美之心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他们从自己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喜爱炫耀和赞美的基因。

我们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历史。从古代到 18 世纪末，男人一直是镜子的主人，他们也是时装的主人。男人不仅利用自己的外貌来寻求爱情和性的满足，而且利用它来达到其他的目标。

安妮·霍兰德描写过 16 世纪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一次高峰会议。“在场的人个个穿得珠光宝气，有的在金丝织成的布上镶满了红宝石，其他的人则穿着镶着钻石的银丝服装。所有的衣服上都镶着白鼬皮，所有的披风都有 20 码长。每个人头上都戴着漂亮的羽毛。人们把那次会议称作金服银饰大赛。服装就像诗歌里的比喻和修辞一样充满了象征意义，衣袖上那些用金丝和珍珠织成的图案都是为了在别人的眼睛里产生强烈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就说明，你比对手差了一截。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竞争。还有他们的家庭、同伙、随从等等，他们必须比别的家庭、同伙和随从穿得更华丽。”

根据最近发表的一篇名为《妇女新的顶梁柱》的研究报告，55%的妇女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达到或超过 50%。有人认为这项研究对近 14 年来妇女对工作、家庭和社会的看法作了最全面的调查。妇女的平均工资虽然只有男人的 73%，但是从 1974 年到 1994 年，全部由女性负担的家庭数增加了 114%。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参加调查的妇女中有 48%表示，即使不缺钱用，她们也会选择全天或半天工作。

问题在于，随着妇女经济实力的增强，她们对男人的选择会发生多大的变化。沃伦·法雷尔说，男性美的未来主要掌握在女人手里。他强调的是女人的作用。

看来，今天的年轻男子不会继续屈服于女权主义的要求。在职场上，他们将毫不客气地和女士们争夺饭碗，在穿着打扮上，他们也不会老老实实地等待女士们的批准。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习惯于看到英俊的男人和不太漂亮的女人在一起，收入少的男人心安理得地和收入高的女人在一起。当然，愿意和老态龙钟的阔佬结为夫妻的妙龄女郎永远不会消失。财富和美貌的结合将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男人已经开始追求和利用美貌，这个趋势将继续下去，它将和女性在经济上的崛起一样，影响未来的男女关系。

“男人都想成为强有力的人物，”约翰·莫洛伊说，“只要让他们看到，外貌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影响力，他们就会把外貌看成很重要的东西。”反过来说，男人会远离任何使他们成为弱者的东西。在1675年，法国女裁缝们向路易十四请愿，要求允许她们制作女人的服装，因为男人对时装的兴趣越来越小了。和男裁缝不同的是，女裁缝们在设计上缺乏大胆创新，只是没完没了地锦上添花。时装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魅力，变得愚蠢可笑；男人的服装逐渐变得简单实用。

在《性与服装》这本书里安妮·霍兰德提到18世纪末男性服装的变化。那时，裁缝们发现了古希腊人体雕像和人体各个部位的比例。在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影响下，男性服装“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我们在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弗兰克林的肖像画上看到的那种窄肩膀大肚子的衣服被一种更为简洁的式样所取代。新的服装使男人看上去具有古代勇士的体型，垫肩使肩膀变宽，长达足跟的裤子使腿看上去变长。“西装是从19世纪50年代末一种宽松直统的日常服装演变而来的，它和男礼服大衣不同。”

19世纪中叶，随着现代纺织业和服装业的发展，美国东部生产的服装通过商品目录的营销方式销往各地，使全国的男人

都穿上了式样相同的衣服。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欧洲来的移民潮为服装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穿上了蓝色哔叽三件套。离开工作场所就很难辨别他们的职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士挽着穿夏装的女郎就成了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男女形象。

迄今为止，我们女人还没有意识到男人在穿着打扮方面所具备的才能。在垄断美貌二百年之后，我们即将看到真正的孔雀开屏。我们总以为男人不懂得怎样穿衣服。别太自信。“男人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学会把服装作为一种表现和传达意义的手段。”写过好几本男性时装专著的女服设计师艾伦·弗勒瑟说，“女人利用时装来传达思想感情，但是男人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如今，我们可以经常在服装店里看到 1 000 美元以上的西装。80 年代之前，这样昂贵的男装是卖不掉的。现在，男人开始购买更高档的服装来显示他们已经获得或希望获得的成就。他们对服装的态度已变得更加开放，而社会对此也给予热情的鼓励。”

“显然在西方服饰发展史中男性时装是发展得最快、最性感的服装。”霍兰德写道：“这包括 12 世纪后期男性服装的时装化。这种强调现代性的变革确立了服装发展的方向。”

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以前只有男人才能从事的工作领域，我们也穿起了男人的衣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女人穿上了男人的长裤，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脱下。现在，我们不仅穿着裤子上班，而且穿着裤子到最高档的餐馆用餐。

在女权主义盛行的年代，我们女人越来越多地穿起了男性化的服装。“在 20 世纪后期，女性在穿着上终于开始全方位地模仿男人。她们把男人的服装改造成适合自己的式样，并反过来极大地刺激了男性服装的发展。”

1968年在音乐剧《长发》举行首演的那天晚上，剧院里男性观众的穿戴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尼赫鲁上装、天鹅绒裤子、丝绸围巾、项链、珠子、单耳环，等等。一年之后，我去了伦敦。在那里，我常去希腊街上的一家服饰店，那儿有西娅·波特设计的极其华丽的绣花睡袍、女袍和宽松的裤子，有女人穿的，也有男人穿的。有趣的是，今天早上的报纸报道了米兰时装展的男装系列，男模特们又穿起了尼赫鲁上装和肥裤腿的裤子。“当服装业期待着女士们心甘情愿地重新穿上细高跟和紧身衣时，《纽约时报》的时装编辑写道“他们也鼓动男人放弃他们已经变得像毛衣一样舒适的西装。”她接着重申了霍兰德的观点：“新的男性时尚毫不掩饰地盗取了过去只有女性时装才强调的诱惑力。”

男人不像女人那样害怕走极端，也不像女人那样害怕因过分炫耀而遭到同类的排挤。如果他听到我们小声说“你真帅。”他就会注视着我们的眼睛，大大咧咧地接受我们的赞扬。

“今天，男人和女人都在不断地变换他们的角色，”霍兰德说“几个世纪以来，男人第一次向女人学习如何装扮自己，而不是女人向男人学。”

如果让我来改写古老的童话故事，我就会把今天的男人描写成睡美人式的王子，他需要一个迷恋男性美的女人用她的热吻来唤醒他。

第八章 性器官与自我形象

阴茎：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传统的以女性为主的家庭教育中，男孩从小就从母亲的那里得出这样一条结论：位于两腿之间的那个部位是全身最见不得人的地方。由这样的母亲带大的女孩们大多一辈子都和母亲站在一条线上，但是男孩却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对抗女性控制的共同愿望使男孩们走到一起。他们把阴茎视为男性的象征，以此来显示男性的独立身份。

男人为什么要把这样多的精力倾注于阴茎崇拜？这是因为要摆脱婴儿时期就强加于他的女性影响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尽管女人对阴茎的鄙视和嘲笑严重地伤害了男人的自尊，他们并没有以同样的厌恶来看待女性的身体。不幸的是，女人们对此非但不表示感激，反而更加起劲地诋毁男人对自己性器官的喜爱。

狂热的反男权主义者热衷于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攻击男性。安德烈娅·德沃金就是一个典型：“男性就是暴力，男性的代表就是阴茎。因此，阴茎或精液就代表着暴力。”

在长达 25 年的调查研究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告诉我他曾

有过暴露自己生殖器的性幻想，但他们谈到梦见这样的女人：她狂热地爱他的阴茎，包括它的样子、气味以及它射出的精液。只要碰到这样的女人，世界各地的男人都会欣喜若狂，快活得两眼放光——瞧，她喜欢我！在男人的眼里，阴茎是他身上最可爱、最珍贵的东西：它就是我，我就是它。大多数女人都讨厌他的阴茎，最多把它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如果他最终碰到一个真正爱它的女人，那真是莫大的幸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母亲对小男孩阴茎的严厉看管反而使他意识到阴茎的重要性。正如神话故事和电子游戏所显示的那样，监管最严的东西通常是无价之宝。小男孩逐渐发现，他的阴茎不仅非常重要，而且能够给他带来极大的快感。就这样，禁忌和快乐成了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

“难怪那么多的男人会患上阳痿、早泄、勃起困难之类的毛病，”朱迪斯·塞弗说，“他们的母亲从小就向他们灌输对阴茎的恐惧。做父母的拒绝承认孩子有任何和性欲有关的感觉，拒绝和孩子谈论任何和性有关的事情。性被视为肮脏、罪恶、令人恶心的东西。由于这种从小形成的罪恶感和恐惧感，许多男人一辈子都无法闯过青春期对性器官的过度关注和由此而产生的焦虑感。这样的男人早年都不懂得自慰。要知道，自慰就是一种练习。如果一个男孩从发育的时候起就学会自慰，那他就能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性器官。自慰使男孩有机会仔细观察自己的性器官，熟悉它的变化和反应。自慰是男孩最好的老师。”

如果一个男人每天晚上和一个女人躺在一张床上，而那个女人却讨厌他的身体，这对他的男性自尊将是多么大的打击。尽管如此，男人们仍旧竭力忍耐，而女人则不断地指责男人对爱情三心二意、瞒着她们嫖妓女，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男人为什么要去找妓女？因为妓女知道男人最想要的是什么。

在男人的色情幻想中，没有什么比口交的地位更重要了。

“在男人眼里，口交是爱的最有力的表现。”金西研究所的名誉所长琼·赖尼希说，“口交对男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它对女人的作用。如果一个女人能够接受、喜爱并赞赏男人的阴茎，他就会觉得他的整个人都得到了对方的承认、赞赏和爱。”

当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他也许曾经弄脏过母亲给他铺上的洁白的床单，这时候，他一心想着的不是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而是如何摔开女人的清规戒律。当他在卫生间里自慰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把母亲的漂亮毛巾弄脏。他把对母亲的愤怒埋在心里。在他的潜意识里，深藏着对母亲/女人爱恨交加的感情。请注意，在男人的施虐受虐狂式的性幻想里，很少出现虐待女人的情景，相反，他常常看到自己为了得到一点儿小小的满足要像奴隶一样拜倒在女人的脚下。

女人对阴茎的厌恶和鄙视只能导致男人的冷酷和麻木。为什么这么多做丈夫的会在夫妻之间发生争吵的时候离家出走？因为离家的痛苦对男人来说已经算不了什么。他们从小就受够了女人的管制，他们在女人那里遭受的羞辱和痛苦使他们不再期待生活中的美和温情。

其实，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我们作出一点赞赏的表示，男人们就会感激不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男人欣赏漂亮女人那样赞赏男性身体给我们带来的美感？我们为什么要拒绝给他们相应的回报？确实，有些男人的窥视行为出了格，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恨女人。不幸的是，我们拒绝看到他们美好的地方，继续顽固地把他们最珍视的东西视为罪恶的根源：“在女人的想像中，阴茎成了男人的武器，”杰曼·格里尔在《女阉人》一书中写道，“它的作用是攻击女人的身体，给她造成伤害。”

不论女人怎样看待男人的性器官，我们都指望男人来改变我们对自身性器官的厌恶。我们不妨读读特伦斯·麦克纳利的

剧本《月光下的弗兰基和约翰尼》中的一段 然后问问自己 有多少女人像男人崇拜女人的身体那样崇拜过男人的身体：

强尼：打开你的睡袍。

弗兰基：不。为什么？

强尼：我想看看你的 pussy。

弗兰基：不。为什么？

强尼：它很漂亮。

弗兰基：不可能。你骗人。

强尼：真的。知道吗？你有一个很好看的 pussy!

弗兰基：我讨厌这个词，强尼！

强尼：好吧，那东西！求你打开睡袍让我看看它。只要看一眼。 15 秒钟.....

（她终于同意了。强尼看过后拉起她的手热烈地亲吻，然后把它紧贴在面颊上摩擦着。）

男人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如此厌恶自己的性器官，我们也无法理解这种厌恶如何影响了我们对身体其他部位的看法。我们推开男人饥饿的嘴，避开他们崇拜的眼睛；我们骂他们是贪婪的猪。也许最初我们曾相信过他们对我们的赞美和崇拜，但是随着两人之间的关系从相互吸引转变成“爱情”，我们就开始期待男人承担起照顾我们的责任。接下来就是结婚、生孩子，就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在夫妻之间，性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剩下的只是各自对家庭的责任。

同样，我们也无法理解男人为什么要到妓女那里去寻求那种没有爱情的性交。不错，男人向往过爱和性的完美结合，可是现在他们只得接受两者的分离：在家里，他们接受由婚姻关系确定下来的爱；在妓女那里，他们寻求用金钱买来的性。

我试图想像男人的困惑。他的阴茎好像过着独立的生活，它的行为不受理智的指挥，它和大脑的某个部位有着直接的联系。不错，有些男人非常喜欢他们的阴茎，并且为此而感到自豪，但是也有人常常为了它而惶恐不安。如果一个人的阴茎不符合标准，那他就会遭到其他男人的蔑视。

性教育专家贝蒂·多德森说，在她碰到的男人中，只有少数人真正满意自己的生殖器，真正喜欢自慰。“在写第一本书时，我想在书中加上男性生殖器的图片，用它来教育男人，可是出版社无论如何不同意。女人的图片可以，男人的图片不行。推销员们拒绝卖这本书。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对自己的阴茎怀着某种焦虑，不是担心它不够强，就是担心它不够大。我为男人开过几个班，想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性器官多么美，可是在这方面和他们进行对话根本就不可能。”

我在60年代爱过一个男人。当我们相遇时，他因受不了管头管脚的妻子而离家出走。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更加热衷于性，他尤其喜欢炫耀自己的阴茎。

关于他的早年生活，斯坦只告诉我一件事：她的母亲撕毁了他贴在床头的一张黑尼斯丝袜广告。也许正是这种早年的禁忌导致他对越轨性行为的特殊爱好。他喜欢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在海滩、餐馆的桌子底下以及游泳池等人多的地方做爱。60年代是冒险的时代。他是我碰到过的最能说会道、最博学、最有魅力和最耐心的男子，一个天生的教师。我紧跟着他，渴望甩掉“好女孩”的刻板和规矩。

斯坦给我留下的最后记忆是他站在纽约大街上的情景。那是夏季里的一天，他站在第五大街和第五十五大道交汇的街角上，放开喉咙大声喊：“看着我！”他指的是他的宝贝阴茎。也许他再也不能忍受人们对他的视而不见。他只穿一条卡其布裤子，没穿内裤，下身的轮廓极其显眼。没有一个行人能够理解

的苦恼，没有人意识到他到底想要他们看什么，可是我知道。我们不久就友好地分手了，彼此之间怀着感激之情。斯坦后来上了旧金山附近的一座山，他在山顶上继续教授密教经典里的恋爱术。

在那些年里，有不少男人不穿内裤，据说是为了解放他们的阴茎。人们在提到 60 年代的时候通常把它和女性表现欲联系在一起，其实男人也像那些不戴胸罩的女士们一样，试图打破那种把男性定义为“养家活口者”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女人能够意识到男人生活中的种种限制，也许我们就不会对他们的苦恼如此无动于衷。大多数男人都习惯于默默地忍受痛苦和烦恼，因为抱怨和诉苦有损于男子汉的形象。

“女人对男人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地步，即使是那些光着身子为男性杂志拍裸体照的女人也不例外。”盖伊·塔利斯说，“70 年代，我常去洛杉矶的一所豪宅去找赫夫纳。一天，我正在看一份新到的《花花公子》，这期的杂志上印着一个非常漂亮的‘玩伴’。就在这时，那位‘玩伴’小姐走了进来。我拿着一杯白兰地，在图书室里和她聊了起来。当然，她身上穿着衣服。不过，由于我刚看过她在杂志上的照片，所以对她就有了不同的视觉印象。

“我问她，当她在摆出姿态让摄影师拍照时，是否想到过这张照片将会对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要知道，每个月都有三四百万男人读《花花公子》杂志。

“她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好吧，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明确点。’记得吗，当时我正在为《邻居的妻子》这部书收集材料。我对这位小姐说，‘这本杂志在全国各地到处可见：小镇上，路边的汽车旅店里，假日旅馆里。现在我和你在加利福尼亚，我们说话的时候，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正是半夜，在乔治·华盛顿大桥边的一家假日旅馆里，某

个男子在晚餐后带着这本《花花公子》走进自己的房间，他躺在床上 阴茎勃起。此时此刻，他正一面看着这些照片，一面自慰。他马上就要进入性高潮状态。他马上就要伸手去拿纸巾。实质上 他是在和你做爱。’

“她说，‘你这话真叫人恶心 太恶心了。’

“我说，‘很遗憾 可是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男子很可能就是我，因为我刚见过你的照片，我觉得你确实非常诱人。如果我有足够的精力，我很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不仅是我，还有其他的几百万男人。’

“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这个美人儿在赫夫纳那里告了我一状。第二天 赫夫纳给我打了个电话，‘盖伊 你昨天晚上太不像话了 居然对她说那种话。’我说，‘我可没做无礼的事。你这样说是对我的侮辱。你利用男人对自慰的需要赚了上百万美元。你是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第一个利用自慰赚取上百万美元的人。你就是靠这个才发财的。’这番话他当然听不进去。

“我不认为拍裸体照的女人和其他女人有什么两样。即使是男人对自己也知之甚少。我们找不到一个研究男子性生活的权威。亨利·米勒、约翰·厄普代克以及菲利普·罗斯都写过色情内容，他们是文学领域里的色情艺术家。他们写的是小说，他们可以把自己藏在虚构的人物后面：‘这不是我，女士们先生们，这不是我。’男人不像女人那样把自己性生活里的东西都写出来给别人看。我们对男人的性生活实在是一无所知。”

男人对自己性器官的看法对他的自我形象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有人在一次访谈中问琼·赖尼希 在性生活中 男人最担心的是什么 她答道：“阳痿是男人的一大灾难。”她还提到其他方面的问题，如疾病、同性恋以及性高潮等。接着她吸了一口气 补充道：“还有阴茎的尺寸 这对美国男人来说绝对重要 可以说比性命还要紧。”

海明威在《不散的宴席》中触及到男人对阴茎的焦虑。在这部作品里，F. 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告诉海明威，除了妻子泽尔达，他从未和任何女人有过性关系。泽尔达曾对他说，他“永远不可能使任何女人快活”，当初和他好的时候，她担心的就是这事。“她说这是尺寸问题，”菲茨杰拉德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看自己了。我得搞清楚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于是海明威建议他们一起到男厕所去一次。回到餐厅后，海明威对他的朋友说，“你的状况好极了……完全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知道吗，你从上面往下看，所以它就显得短了。到卢浮宫去看看那些塑像吧，回家后再从镜子里看看你的侧面。”

“可是那些塑像不一定精确。”

“它们很不错。大多数人都会拿它们作标准的。”

“可是她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

“叫你抬不起头来。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迫使男人就范的办法。”

可是菲茨杰拉德从未真正相信过海明威，至少不像“老爸”描写的那样。要知道，在他们两人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不知海明威在说这故事的时候，是否也像泽尔达一样，想把菲茨杰拉德弄得“抬不起头来”？

不论在更衣室里还是在厕所的小便池边，男人总是不忘和他身边的其他男人比谁的阴茎大。小男孩最注意的是父亲的阴茎。只要想想男孩的年龄，这种比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它对一个迫切需要男子汉榜样的男孩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如果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能像母亲那样接近，孩子眼里的父亲形象就会融合身体和情感的各个方面，从而变得更加完整。这样孩子就不会像演员兼作家蒂姆·艾伦在下面这段里所描写的那样，对父亲的阴茎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

爸爸有时带着我和哥哥弟弟去撒尿。你只有这么一点儿大。爸爸把他那东西伸了出来。好家伙，它像条大鲸鱼一样一下窜出来，你的却像棵小蘑菇，用两只手才好不容易把它拽出来。可是老爸那东西——哟！好一个长满了毛的大怪物——“噢，上帝！”我们逃出卫生间，“你看到没有？天哪，那么多的毛！”我们开始祷告：“但愿我永远不会变成那样！”

在女人眼里，两腿之间的一切都是肮脏的。为了摆脱女人的管教和训练，男孩们希望在父亲那里看到男性力量的显示。可是，由于父亲和孩子之间长期存在的距离，孩子在初次看到父亲的阴茎时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如果父亲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和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儿子对男子汉的看法就会更加全面，父亲的阴茎也不会使他们感到如此震惊。男人要消除对阴茎的焦虑，以平常心来看待自己的性器官，还得从建立早期的父子关系做起。

第九章 改变年龄的双重标准

婚外恋的是与非

1980年1月，一场大火把我的房子和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第一次婚姻，统统付之一炬。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这场大火既是终点又是起点。

毫无疑问，我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具有什么代表性，但它确实是时代的产物。

60年代和70年代是现代女权运动的黄金时代。我们追求性自由、经济上的独立、美貌和妇女的权力，我们敢想过去不敢想的事，敢说过去不敢说的话。

有些人说，今天美国社会的许多毛病都起源于70年代的放纵。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不错，当时确实有极端化的倾向，但那是对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所引起的道德危机的过激反应。今天的女权主义也许已经陷入了概念的泥潭，但是在70年代，这个词毫无疑问意味着思想、言论、行动和写作的自由。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体会到，学会相信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展自己的生活范围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当我和我的第一个丈夫初次见面的时候，正是我在情场上

最成功的时期。男士们排队等着和我跳舞，多年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可是生活总是捉弄人。当太多的眼睛盯着我、太多的人向我求爱的时候，我开始感到害怕。我怕乐极生悲，再次遭到命运的打击。

于是，我放弃了曾经如此向往的情场上的荣耀，和我的第一个丈夫结了婚。他是个英俊的知识分子作家，他的童年是在一个缺乏爱的环境中度过的。我在他玩世不恭的外表下看到了一颗孤独的、渴望关爱的心，于是我引诱了他。不过我并没有真的爱上他。

结婚之前，我在本能的驱使下只身去了罗马，在那里我可以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找个意大利情人。我希望能在意大利男人的怀抱里重新考虑我的婚姻。在罗马，我收到了他从美国写来的信。信里有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潜意识里的渴望，使我怦然心动：“我的眼睛永远不会离开你。”

爱的凝视——这多年来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它使我想起那些曾经使我深深感动的文艺复兴前的绘画、那道将圣母和圣子的眼睛连接在一起的金光。

对我来说，他的诺言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我像饥饿的婴儿渴望母亲的乳汁那样渴望爱的凝视。他的眼睛从来不看别的女人，而我最害怕的就是眼光游移不定的男人。“你的模样使我从此心满意足。”他说。听到这话，我心里就像吃了定心丸那样舒服。

我像一个钻进母亲怀抱的孩子一样尽情享受他的目光。我的女友们对我羡慕不已，她们试图和他调情，但是都没有成功。他把我看成他的宝贝，我把他看成大知识分子和依靠的对象——不是经济上的靠山，而是爱的靠山。不过，这样的爱总有一天会令人窒息。我开始避开他的目光去和别的男人约会。

事实上，是我，而不是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我喜欢这个角色。每当我收到出版商寄来的支票，我就交给他。这使我感到极大的满足。

我对自己的婚外恋并不感到得意，但它是我婚姻的产物。我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性的满足，因为在我和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起强烈的性欲。不错，在我们之间有爱，有依恋和亲近，但是，充满激情的性生活只能产生于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人之间。只有当正负两极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才能激发性欲的火花。可是我和他却陷入了如胶似漆的共生状态。这种温情脉脉的亲密关系使我感到非常舒服，但却不能给我带来性的满足。

大多数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赞同女人的婚外恋。但是没有人比那些已经完全放弃了性生活的女人更恨通奸的女子。近来，随着女性经济地位提高，女人的婚外恋也越来越多了。从前，当女人在生活上完全依赖男人时，婚外恋会给她带来极大的危险，大多数女人对这种性冒险连想都不愿想。她们的性欲之火在结婚之后，特别是生过孩子以后，就很快熄灭了。

丈夫鼓励妻子以自己的母亲为榜样，像母亲那样度过一生。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搏斗了一整天后，他希望能在家里看到一位圣洁的贤妻良母，而不是风骚的性感女神。

相反，许多女人却对丈夫在外寻花问柳眼开眼闭。她们知道，“另一个女人”能为她们的丈夫提供从她们这里得不到的东西，而她们对这些东西早就失去了热情。有趣的是，那些“允许”丈夫在外面偷情的妻子常常从丈夫那里赢得了更多的爱。在这种双重标准的保护下，他们的婚姻不仅没有破裂，而且越来越甜蜜。

在我的婚姻中，男女双方扮演了相反的角色，但我仍旧希望别人把我的丈夫看成家庭的顶梁柱，而不是靠老婆养活的人。

这成了我的秘密，我的朋友即使知道也从不提及，我也从来不向别人吹嘘自己养活丈夫的能力。

“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你的成功？”单身年代的朋友们常常问我。可是，她们不知道我的心事：要是我不顺从他，他还会那样深情地看着我吗？我的丈夫就是我的母亲，我需要从他那里得到小时候从未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关注，而他则对我的婚外恋假装一无所知。这一切，都使我越发觉得离不开他。

事实上，是他依赖我，而我的婚外恋则同这个事实有很大关系。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和许多在外寻花问柳的男人一样，我心里明白，即使我的婚外恋被他发现，我也不会因此而饿肚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处处小心。当我在夜里回到家时，当我发现丈夫还在等我时，当我看到他的微笑时，我对他的爱有增无减。

有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喝酒。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的酒瘾已经很重，可是那时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呢？在那个年代，似乎所有的人都喝酒。而且我相信，只要他愿意，只要他爱我，他就有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喝酒。可是他没有。我竭力使自己相信，我们的婚姻十全十美；我觉得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他。看到他在屋里独自喝酒，我只好大哭一场。最后，他总算放弃了酒瓶，但常常在自己的屋子里独自呆上一整天。而我则继续付房钱，并且继续在外面和情人约会。

长期以来，我都让他扮演一家之长的角色，而我则甘当一个天真的不懂理财的小女人。我把得到的版税支票都交给他。后来，当我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时，我在他面前反而变得越来越小。他成了普鲁斯特式的“纯”文学艺术家，而我却只能炮制他所说的“用来糊口的小书”。这就是我们之间达成的交易。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感谢那场火灾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有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对我说，“这样的灾难常常会使你失去

记忆。”而我却反而恢复了记忆。我需要一场大灾难来毁掉眼前的一切，使我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大火扑灭以后，消防车的水龙留下了一摊摊漂浮着灰烬的黑水，它们似乎在对我说，“不要再扮演小女人的角色了 振作起来 从头开始！”说实话 要是没有那场大火，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全不同的生活。

火灾之后，我们住进了一家旅馆。我着手处理所有的善后事务 清除废墟和烧焦的家具 整理幸存的书本、手稿、母亲结婚时用的瓷器以及外婆留下的绘画。我整天和承包商、建筑师、保险公司打交道，当然，还有出版社的编辑，我和他们一起策划为我的新书到各地去做促销。我向推销人员发表讲话，给他们打气。我穿着一件从火里抢出来的旧衣服，身上发出一股焦味。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起床时头昏眼花，失去平衡，一下跌倒在地板上。“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医生说。

于是我不动声色地给我的下一本书定下了更高的价钱——我们需要钱。但我同时又暗地里希望出版商拒绝我提出的价钱。我太累了。可是他们同意了，这使我无话可说。

我像个老兵一样迅速进入战斗状态，重新调动起少年时代求生存的才能。结婚以后，我把自己变成了典型的小女人，一个为了维持婚姻只能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偷情的小女人。可是少年时代的我却是个勇敢诚实的女孩，我的人格是完整的，而不是分裂的。为了生存，我要重新找出当年的精神武器。科学家说，我们有两套记忆系统，一套记忆普通的信息，另一套记忆情感信息。情感记忆系统的进化也许和它的生存价值有关。它使动物能够回想起那些对它们造成最大威胁的事件和场合。

如今大火吞没了所有的东西，面对着一堆废墟，我又重新唤醒了记忆中那个勇敢的小女孩。我踏上了为期两个月的旅程，为刚出版的书做促销；我动笔写出了下一本新书的第一页；我监督房子的重建；我和 NBC 全国广播公司 签下了为期两年的合

同我和丈夫开始分居。

苏珊·奇弗写道，“当女人在理性的环境下进行某项专业工作时……她们有可能对家里一些非理性的状况产生疑问。”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婚姻的失败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还是原来的他。改变的是我，而不是他。

这时我又有了一次婚外恋。我对此既不炫耀，也不否认。我等待丈夫对此作出反应。我的新情人是个木匠。自从他来我的新房子里做木匠活，我就被他吸引住了，几个月后，我们就成了情人。对，一个木匠。在许多女人的幻想中，木匠是最受欢迎的情人。这件事就这样发生了，我们谁也没有事先策划过。也许我像男人一样，在做出了一些成绩之后，就觉得自己有权和漂亮女人共度良宵。

那天，我刚结束了一周横穿全国的新书促销活动，回到正在修建的住所。我和建筑师谈了一会儿，然后他离开房间去打电话。这时我抬起头看见了他，我的木匠。他长得真帅，干起活来特别认真。我走过去，伸出双臂拥抱了他，并且吻了他。此时此刻我心里充满了感激和赞美，不错，我觉得自己有权这样做。

那个周末，他陪我一起去旅行。我们去了旧金山、芝加哥和洛杉矶。我看着快活的情人，感到一阵满足，心想，也许这就是男人带着女人旅行的感受，也许这就是有能力给你所喜欢的人买礼物、和他分享财富的乐趣。

星期天，我们驾车去科德角，躺在海滩上听1980年新出的浪漫歌曲：《她从我生活中消失》、《坠入爱河》、《你是我的最爱》。啊，多么难忘的歌曲，它们至今仍在我的耳边萦绕。它们不仅使我想起那次婚外恋，而且唤起我对青春期那些浪漫夏天的回忆。不过，在科德角，我是发起者，我是行动的主角。我们都竭力使对方感到快乐。

但是我也知道，这样的关系是不牢靠的。他比我年轻。他

的青春活力和浪漫的音乐把我带回到青春期的梦幻世界，可是我必须面对现实。我知道，我有责任保证我们两人都从田园诗般的梦境中回到现实世界。

我并不是因为木匠年轻才选他做我的情人。他身上有些独特的东西吸引了我：他的神态、他的温文尔雅以及他干活时的全神贯注。男人的财富和权势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使我心动。一个有能力养家活口的女人为什么要去依附老态龙钟的富翁？我只在看到真正吸引我的男人时，才会冒着被拒绝的风险主动和他接近。不过这次我并没有冒险，我感觉到他的眼睛在看我，我知道，他是不会拒绝我的。

生活告诉我，除了青春少女的美貌，女人还有其他吸引人的东西。我们习惯于把美貌看成是年轻人的专利。长期以来，整个社会都向我们灌输这种看法，因为这样一来，就能使女人们安分守己，老实地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如今，我们在职场上的成就改变了我们看自己和别人看我们的方式。当男人面对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成功女子时，他也许会注意到她的年龄，但是他会更多地感觉到她的精力和活力，他会希望和她分享，就像女人过去一直想分享男人的财富和权势那样。

但愿女人能像男人那样，相信自己的外貌和成就能够保持长久的吸引力。在女权主义时代长大的年轻男子特别容易对那些既能干又性感的女人产生敬畏感。是我们女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加顽固地维护父权时代的观念，把中年女性看成没人要的豆腐渣。既然那些年老体衰、其貌不扬的大亨们能够不受年龄限制、如此长久地保持他们头上的光环，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

我和木匠后来还是分手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那个夏天学到的东西。如果不是那场火灾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经济上的压力、第一次为了挣钱而写作，也许我会继续像玩偶之

家的小女人那样生活，永远也不会鼓起勇气建造一个成熟女人的新家。我们总以为好女孩不应该把钱作为生活和工作的动力，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经济上的成功促使我改变了原来的自我形象，我不再把自己看成一个离开男人就没法活的小女人了。

从火灾到离婚中间相隔了6年。在这6年中我写完了那本关于妒忌的书，还独立负担自己和丈夫的生活。书写完后，我就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许多过去的男女朋友都对此愤愤不平。

“你已经有了一个这么好的丈夫。”有位男士教训我。他在餐馆里看到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虽然我知道这位说教者自己就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他的话还是让我不由自主地脸上发烫。这事差点儿没把我给气得发疯，我恨自己居然会因为羞愧而脸红。要摆脱“好女孩”清规戒律的影响还真不容易。

“女性具有语言才华、敏锐的直觉以及交际和谈判的技术。有了这些优势，再加上释放出来的睾丸素，女性就会在国内和国际商业舞台上越来越引人注目。”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写道。对此我要加上一条：如果我们能鼓励妇女像男人那样不受年龄的制约，在人到中年之后还能继续大胆地利用自己的美貌、性感当然还有专业技术我们的成就就会更大。

我并不想低估年龄的双重标准对我们的影响。我要强调的是，这类偏见的根源要到我们自己身上去找。我们在衰老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把自己看成凋败的花朵、黄昏的落日、一钱不值的豆腐渣。我们的眼睛只看到皱纹和缺陷；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同龄人身上的缺点，把诋毁他人当作最大的乐趣。难怪女人一到中年就在男人面前成了弱势群体。今天我们仍旧认为，男人只想和年轻女子一起生活、一起上床。这就是说，在我们看来，男人对女人的智慧、经验、经济实力以及在两性关系上的主动性全都无动于衷。

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放弃“和男人划清界限”的

口号，应该看看我们能从男人那里学到点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女人只能向女人学习的观点，那就是作茧自缚。

回归少年时代，让妒忌见鬼去！

女人总是在被动地等待，而不是主动地追求幸福。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岁月无情地摧毁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年复一年，焦虑、恐惧和怨恨在我们脸上流下了永久的标记。

我总是非常守时，不，我总是比别人早到。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习惯，一定是因为我从小就害怕迟到，害怕失去什么，害怕别人会因此而抛弃我。直到今天，每当要出门的时候，我总是比丈夫先穿好衣服，然后坐着等他。

我们年纪轻轻就开始在恐惧中生活，我们害怕时光的流逝，害怕自己一天天变老。这种非理性的恐惧证明，我们仍旧像母亲一样，生活在等待之中。有多少女人在等待中度过了一辈子，直到她们的丈夫离家出走。当她们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老太婆的时候，她们只能问自己：“难道这就是命运留给我的一切？”这和女性在过去 20 年里获得的成就相比，似乎很不协调。

如果我们由于年龄的增长而把自己看得越来越低，那么，银行里的存款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被动和等待的生活态度，那么，房子、裘皮大衣、欧洲豪华游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敢说，“男人一直到死都能保持他们的吸引力，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争取工作权利那样大胆地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答案是，我们不愿向自己发起挑战，我们害怕遭到其他女人的排斥。如果一个女人到了五十来岁还有不止一个情人，像年轻女子那样炫耀自己的性感，或者收入比其他女人高出一大截，

那么别的女人会怎样看待她呢？老牌女权主义者们最大的成功就是把女人生活中所有的痛苦和烦恼都归咎于男人。如果有人使大家意识到，女人的许多烦恼根子都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她就会遭到众人的唾弃。

“女人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她的眼睛永远也离不开自己。她的脑子里无时无刻不晃动着自己的形象，”评论家约翰·伯杰写道：“不论何时何地，不论她在房间里走动，还是为死去的父亲哭泣，她总是忍不住要想像自己走动和哭泣的样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大人就不断地教她审视自己……她既是观察者，又是观察的对象，这就是她作为女人的两重身份……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女人的生活是否成功，取决于她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而且归根结底取决于她在男人眼里的形象。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别人如何看她，而不是她自己如何看自己，她心目中的自我被别人眼里的她所取代。”

伯杰的这番话写在 25 年前，但是仍旧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这种永无休止的自我审视消耗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它蚕食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暗淡无光。

男人不像我们这样时时刻刻想着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他们从小就学会主动进攻，而不是消极等待。即使是胆小害羞的男孩，他的眼睛也是看着前方的目标，而不是左顾右盼，时时注意别人对他的印象。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当他从母亲的汽车里钻出来跑去参加生日聚会的时候，母亲不会像对待小女孩那样，一次又一次地为他整理衣服或头发。他不用时时担心自己的穿着和举止。当青春期到来的时候，男孩们争先恐后、毫不客气地争夺自己看中的女孩。

女孩等待，男孩行动。社会鼓励男孩在青春期继续发挥他们的领导能力、速度、幽默和主动性，并将这些才能用在他们和女孩的关系上。在两性关系中，男孩享有主动权，而且他的主动

性得到整个男性世界的支持和鼓励。而女孩则必须放弃这些品质。女孩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和男孩交换，那就是美貌。

我们心目中的男孩常常具备了我们在少儿时代曾经引以为荣的那些才能。但是在青春期到来的时候，我们却只能等待他来追求我们，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他转向别的女孩。愤怒和焦虑开始在我们年轻的脸上留下痕迹。难怪多少年之后，我们对此仍旧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借助整容手术去掉这些痕迹。

如今，我们已过了成熟的年龄。现在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了。不论我们是 30 岁、40 岁、还是 60 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消极等待下去，等待幸福自己找上门来，等待梦寐以求的事情自动发生。除了恐惧，我们还会失去什么？

格洛莉娅·斯坦内姆最近在回顾 25 年前的女权运动时说，“共同的经历发展成我们之间的姐妹情谊……共同关心的问题形成了我们政治觉悟的基础。”不过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共同关心的问题必须得到现代女权主义的认可。每个人都要和群体步伐协调，既不能落在别人后面，也不能走在别人前面。为了避免相互竞争，姐妹们必须防止任何形式的自我扩张。

今天，当年的年轻女子已经进入中年，但她们仍旧依照这套规矩来监控自己的行为。别看我们表面上比前辈更加富有、更加漂亮、更加性感、更加自信，但我们仍旧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

我们应该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们要敢于冒险，在更大的舞台上演出人生戏剧的第三幕。

“共同的经历”这个主题虽然有时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但是也会妨碍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应该成为年轻一代的榜样，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度过人生的第三阶段。

中年人是发展最快的消费群体。这个群体中的男男女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活得更精彩，更多地工作和娱乐，更多地享受性生活。根据今天的一篇报道，

“美国人不仅活得更长，而且更少受到慢性病和残疾的困扰……在过去的 10 年里，65 岁以上老人常见病的数量减少了 11%。”人工合成的雌激素和睾丸素、日新月异的化妆品和健身器、无所不能的整容外科，所有这一切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继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健康漂亮的外表。这与其说是为了永葆青春，倒不如说是想活得更长、更精彩。

没有人比女性群体更能影响一个女人对生活的选择。如果你觉得你的女友们不喜欢你的大胆尝试，那就离开她们去寻找新的朋友。当你看到一个年龄比你大的女子活得比你更精彩，看上去比你更年轻、更漂亮，请不要气得咬牙切齿。你应该赞赏她，把她作为你的榜样。

“过了更年期的女人能够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抵得上它。”玛格丽特·米德说。越来越多的女人正在认识到这一事实，这将使我们有勇气抗拒种种偏见，重新发掘出自己的力量和才能。

法国名记者和编辑多米尼克·奥里已经 86 岁了。她曾写过一本书《O 的故事》。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她说她把这本书作为一首爱情诗献给一个男人，她爱这个男人，同时又害怕失去他。这本书的灵感来自她在将近 50 岁的时候对青少年时代性幻想的回忆。“我能做什么？”她说，“我不会画画，也不会写诗。我怎样才能吸引他？……我既不年轻，又不漂亮，我必须寻找其他的武器。单靠肉体的吸引力是不够的。对，我的武器就在头脑里。”当她把这个主意告诉她的情人时，他答道，“我敢肯定，你绝对不可能做那样的事。”真的吗？她说，“让我来试试。”

《O 的故事》不仅于 1954 年问世，而且一版再版，长盛不衰。最有意思的是，五十多岁的奥里发现自己完全有办法把情人牢牢地拴在裤腰带上，因为她有一种神奇的本事——重新唤醒青少年时代的性幻想：“那些入睡前的冥想……在那里，你可以感

受到最纯洁、最热烈的爱 最可怕的屈服……”

今天的中年妇女是幸运的。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有权力、更有冲劲，更加自信。我们在经济上也更加强大。美国有四千多万中年女性，其中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有经济实力的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现在是我们重新找回早年曾经拥有的那些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时候了。今后的生活虽然无法预料，但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现在的条件。今天，不论我们想干什么——找个情人，还是完成一件我们特别想干却始终没能鼓起勇气去干的事——我们都可能在自己的记忆中找到许多宝贵的资源。

“只要我们愿意，那个少儿时代热情洋溢、充满理想和活力的自我就会重新复活。”杰曼·格里尔在《变化》这本关于绝经的书中写道，“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否认或延缓这一变化，而是为了加速这个变化，那么，我们就会想出更好的策略来过好这一困难的过渡时期。它将使你重新找回早年的自我。少儿时代的你还没有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你是那样快活、那样健康、那样天不怕地不怕。可惜青春期把你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现在，你将重新变得快活、健康、天不怕地不怕。”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用最尖酸刻薄的语言嘲笑、侮辱和诋毁中老年妇女、巫婆、老处女、独自生活的女人、手上有斑点嘴唇上有皱纹的女人。人们在老丑婆和母夜叉的形象上倾注了他们对女人及其力量的所有反感。不仅男人用这种方式来惩罚女人，女人也用这种方式来打击她们的同类，诋毁那些不甘平庸、试图爬得更高、跑得更远、活得更潇洒的女人。就这样，我们相互约，在诋毁别人的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生命。

没有任何东西比美貌更能在女性中间引起竞争，但是公开

的较量却一直女性世界最大的禁忌。女人什么时候才能像男人那样，把竞争看成一种自然现象，并且学会一些能够使竞争变得更加无害、甚至令人愉快的游戏规则？哪里有美貌，哪里就会有竞争。如果女性希望把美貌带入中老年，就必须学会竞争。现在学虽然晚了点，但总比不学要好。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看到一个又成功又漂亮的女人，我们不是向她学习、把她作为自己的榜样，而是妒忌她、诋毁她。我们迫不及待地到处打电话，窃窃私语，散布流言；我们串通一气，竭力把她搞臭，把她拉下马，使她无法超越我们。只要看看那些热播的电视剧，看看年轻美貌的职业女性如何相互诋毁、把对方置于死地，便可对女人之间的狠毒略见一斑。这类情节之所以如此吃香，是因为密谋者们狡诈的微笑和百发百中的暗箭可以使观众妒忌的心得到抚慰。要是那个令人妒忌的女人最终变成一个母夜叉式的人物，观众同样会感到心满意足。我们很少看到女人之间健康竞争的榜样。

可悲的是，当我们看到其他女人比我们多享受一点好处时，我们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不能容忍女人中间有任何鹤立鸡群的人。这种人在我们心里唤起的不是激励，而是妒忌。我们竭力惩罚她们、让她们尝尝乐极生悲的苦头。

《玛丽·克莱尔》刊登过一篇关于芭芭拉·史翠珊、玛丽·马塔林、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琳达·瓦克纳和莱斯利·亚伯拉罕森等成功女性的报道，它的题目是《男人的克星，六个女强人的成功秘诀》。编辑和记者似乎都有点儿吃不准如何描写这些有权有势、知名度极高的女性：把她们写成女英雄还是巧取豪夺、贪得无厌的女恶棍？

关于超级明星史翠珊，他们说：“不论是出于妒忌、大男子主义的偏见、还是实事求是的观察，人们都把她看成一个专横跋扈、以我为中心的人。”关于沃那科集团的总裁瓦克纳，他们引用

了她痛斥男性经理人员的话“你们都是些不男不女的太监！她咆哮道，“天晓得你们的老婆怎么受得了你们！你们这些毫无男子气的废物！”她还说“我真想有个孩子 不过我不打算领养小孩 我要领养一个丈夫 他可以生一个孩子。”他们还引用了政治活动家马塔林的话：“不管在工作还是享乐的时候，我都不喜欢没有冲劲、没有进取心的人。”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是著名电视连续剧《诡计多端的女人》的作者兼制作人“她声称 当她听说别人把她说成是泼辣强干的女人时，她感到喜出望外……‘其实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这样的成功女性并不多，但是这并不妨碍许多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诋毁她们，丑化她们。看了这类报道，谁还会把这些令人生畏的女人作为仿效的对象？这类文章在报道她们成就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她们的粗暴和盛气凌人。可见，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还得时时保护自己，防备其他女人的妒忌和怨恨。年轻女子需要活的榜样，但是这样的机会总是被人毁掉。

我最受不了那些女记者，她们不厌其烦地攻击史翠珊、简·方达和希拉里·克林顿 并对她们冷嘲热讽 如针对希拉里在总统就职仪式上的穿着打扮、史翠珊斗胆在哈佛肯尼迪中心作的演讲。

几天前 电视台重播了 1994年的史翠珊专题节目。这是我第一次观看她在洛杉矶的首演盛况。当她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走上舞台 开始唱‘我们好像从未分离’时 我像当时在场的观众一样，被她的魅力所震撼。几年前，她的经理马蒂·厄利克曼回忆起史翠珊早年在纽约的经历。那时她找不到演出机会，因为没有人喜欢“那样的声音”。她没钱付房租，只好随身带着一张折叠床，在别人的排练房里过夜。

30年后，有家妇女杂志把她称作“耗尽男人精气的狐狸精”。就算确有其事，难道我们就应该把她一生中获得的巨大成

功一笔勾销？

如果我们不能像对待男性英雄那样对待女中豪杰，如果我们不能模仿她们的优点、忘记她们的缺点，她们的勇气和长处就不会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我们也永远不会找到能够激励我们的榜样。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她们的阴暗面，以此作为恨她们、妒忌她们的理由，其实最让我们无法忍受的是她们巨大的成功。

我们宁愿邀请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吃午饭，也不愿赞美一个不仅在事业上一往无前，而且在性生活上也敢于冒险的女人。我并不是说，我们都应该像她那样生活，但是她的冒险精神无疑是女性的一大进步。

难怪成功女性很少充分肯定自己的成就。她们感觉到其他女人的妒忌和怨恨，为了保护自己，她们故意贬低自己的成就。

男人不能阻止我们充分享受争得的权利。但是女人却能。女人的相互制约能有效地阻止任何女人变得比別人更强大。难怪那么多有成就的女人仍旧觉得自己得不到应有的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自由说我们想说的话，做我们想做的事，穿我们想穿的衣服。事实恰恰相反。我们仍在抱怨父权社会限制了我们的发展，哀叹青春和美貌一去不复返，指责邪恶的男人把我们看成一钱不值的垃圾。可是，难道这一切都是男人造成的吗？

当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行使职权，当周围的人都尊重我们的成就时，我们感到自己是个独立的女人。可是，为什么当我们碰上其他女人挑剔的目光时，当我们看到她们在窃窃私语时，我们就立刻觉得自己矮了一截？我们为什么不能专心做自己的事，不去理会她们的妒忌？如果我们在感情上是独立的，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人告诉一个 50 岁的女人她在感情上仍旧依赖别人，她也许会觉得这是对她的不敬。但是大多数女人确实如此。

我们一生都在锻炼分离和独立的能力。即使我们在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失去了这种机会，或者在结婚后继续使自己处在小鸟依人的状态，我们仍有希望改变自己，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现在就采取行动。

比起我们的前辈，今天的中年女子拥有很多有利的条件。1995年，50岁以上的美国人已接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2000年他们的人数将达到7500万。一个世纪前，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7岁，如今大多数妇女将活到80岁以上。我们有充足的精力和经济实力来创造中年时代的新生活，重新找回我们在青春期失去的东西。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担心的事情也越来越少。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不再需要扮演“好妈妈”的角色。我们可以享受更多的性自由，我们可以放声大笑、穿自己最喜欢穿的衣服。想想吧，我们为什么要节食，为什么要三天两头跑健身房？还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我们的身材？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每当随心所欲地痛快了一阵之后，我们就开始担惊受怕：昨天夜里，我是不是喝得太多了，跳舞跳得太晚了？我有没有出洋相？我的表现是不是太风骚？要知道，女人太张扬就会遭到众人的唾弃。很久以前，人们是用火刑来清除这样的女人。

“有些女人仅仅因为长得太漂亮就被当作女巫烧死。”德波伏瓦写道。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为了杀鸡吓猴：烧死那些不安分的女人，以此来强迫其他女人控制自己的性欲。即使我们朝思夜想、渴望同某个男人做爱，我们也不敢接近他。最使我们害怕的，是来自母亲和其他女人的指摘。为了赢得她们的爱，我们只好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

有人也许会想，活到这把年龄，为什么不能把镜子甩开？——“谢天谢地，现在我终于可以放松了。让我的头发慢慢

变白吧！”——如果这样真的能给你带来快乐，那当然是好事，但是你首先必须问自己：在看到其他女人继续炫耀她们的魅力时，你心里会不会燃起妒忌的火焰？我们是第一代进入中年后仍有能力追求美貌的女人。长期以来，除了电影明星或者拥有巨额财富的女子，大多数女人在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就会自动撤出和别人争芳斗艳的战场。现在，我们把美貌带进了一个新的年龄段。可惜我们对此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年龄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死亡却随着寿命的延长离我们越来越远。绝经期过后我们还可以活好多年。如果我们把最卓越的女性作为自己的典范，那我们就能把 50 岁后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让我们把妒忌这条毒蛇从心里清除出去。勇敢卓越的女性理应得到更多的东西。如果你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穿了一身使她显得更加年轻的衣服，或者和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在一起，你应该佩服她而不是诋毁她。她就是你的未来。

贝蒂·弗里丹在她那本关于衰老的书里写道：“从各种调查研究和我自己的访谈中得出的大量证据显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过了不惑之年之后，就越来越多地走上了回归自我的道路。”我很佩服这本书表现出来的乐观精神。我在读她的书时就想，对啊，45 岁以后，我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少年时代的我了。“年龄本身能不能成为……一种冒险呢？”弗里丹问道。“我们可以着手干一些我们过去从来没敢干的事，过我们想过的日子……在人生的第三阶段，我们可以自由地轻装前进。这个变化很可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关系到人的生存和进化。”

战胜性恐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虽然夺得了经济上的权力，却没能

战胜对性的恐惧。这是因为 20 年前，我们没有把性和男女经济平等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我们不愿触及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不愿承认自己对其他女人性感魅力的妒忌，以及这种妒忌在我们中间引起的仇恨。这种仇恨所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了女性美在经济上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今天，如果有人责备我们仍旧像小女孩一样处处离不开母亲，我们多半不会承认。什么？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有过多少情人，我们的衣橱里挂着多少诱惑力十足的衣服？我们和母亲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我们绝不会像她那样变成毫无性感的老大妈！

然而我们确实面临这样的危险。一个人能否战胜对性的恐惧，是衡量她有多少独立性的标准。每当我们触摸自己的身体、和男人做爱、穿上引人注目的性感服装，我们都感到一阵兴奋，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对母亲和女性世界的挑战。可惜这样的感觉总是昙花一现，而我们也始终未能成为自己性生活的主人，因为我们害怕在女性世界里成为孤家寡人。和男人的性关系使我们看到了独立于女性世界的希望。可是男人不能和我们一起生活在亲密无间的共生状态中。只有女人才能做到，只有女人才渴望这种共生状态。

我们一开始就指望男人来改变我们对性器官的看法，唤醒我们对性的渴望，克服我们对性的恐惧——“你要让我快活！”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事，但我们却责怪男人没有履行他的责任。我们也许爱他，甚至和他结婚，但是不满和妒忌却使我们对婚后的性生活缺乏热情。于是，我们让他靠边站，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也许，我们会找个情人，以此来证明自己在性生活上的独立。然而，如果这只是为了重温青春期的浪漫和刺激，我们最后仍会像个犯了家规的孩子那样乖乖地改邪归正。

对许多女人来说，婚后的性生活就像房子、汽车一样，变成了男人的财产。和丈夫上床只是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所有的快乐都是他的，而我们只是屈从他的欲望。于是，我们愤愤不平，我们怨气冲天。

于是，我们走上了母亲的老路，特别是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许多 20 年前性解放的急先锋在怀里抱上小宝贝以后都回心转意：“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母亲当初会那样！”她们不仅自己放弃了对性的渴求，而且禁止女儿把她的小手放在两腿之间。就这样，她们种下了中年女性种种烦恼的种子。

好巫婆/坏巫婆

我们总以为，一个人只是在青春期到来的时候才开始有性欲，因此我们也当然地认为，当月经停止的时候，性欲也会随之消失。其实，更年期的到来只是标志着生育期的结束，而不是性欲的消失。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人们相信更年期的女子性欲最旺盛。在上几个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可以看到年纪较大的女人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动进攻的角色。请看 12 世纪的名著《典雅爱情的艺术》：“至于满足那种本能的情欲，年轻男子更喜欢年龄比他们大的女人，而不是和他们同龄的年轻女子。”洛伊丝·班纳在《盛开的鲜花 中年女子 权力 性》一书中引用了一部 16 世纪的自传：“一个性力不足的男人是不能去追求寡妇的，他必须设法使她相信自己一贯阳气十足。”

我喜欢这样的成熟女子：她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个情人是如何笨手笨脚，她能够教男人如何不慌不忙地到达性高潮的顶峰，因为她比任何男人都更老练。她的脑子就像一台录象机，录下了她所有的浪漫经历，不论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这些

精彩画面在她的脑子里越积越多，她一次又一次地回放，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得滚瓜烂熟。男人若是有这样的女人做教练，那真是莫大的福气。班纳指出，在 17 和 18 这整整两个世纪里，人们都认为中年女子的性欲极其旺盛：“就是她们不太漂亮的外貌也带上了某种不寻常的、色情的成分……标志着一生中新的风流时代的开始。”

性欲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失。可是在过去，为了使自已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我们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在父权社会里，为了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女人的性生活必须受到严密的控制。整个社会结构都是为了保证男人能够安心在外面赚钱，而女人的性力则被限制在生儿育女上。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人怀念“过去的好日子”，并且希望保持父权社会的清规戒律。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已经拥有的经济实力能不能使我们在进入中老年的时候，也能活得像男人那样潇洒？“大多数男人和更多的女人——特别是那些害怕变老的年轻女子——嘲笑年龄大的女人。他们粗暴地对待那些不加掩饰地显露自己性欲的中老年女人。”多丽丝·莱辛在她的小说里写道。在这本小说里，65 岁的女主角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年龄只及她一半的男人。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米希科·卡库塔尼写的关于这部小说的书评，这篇书评是一个将艺术和生活混为一谈的典型例子。“莱辛在《又是爱情》里讲的故事粗制滥造、令人难以置信。”卡库塔尼写道：“她想让我们相信，一个已经 65 岁的女人居然还像个发情的母马那样欲火难熬；不仅如此，她居然会成为好几个年轻男子爱恋的对象。”

卡库塔尼的这番刻薄话明显地流露出她对莱辛和小说女主人公的妒忌。这位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书评家说起话来就像个小孩，拒不承认自己的母亲是个性感女人。不知今年四十多岁

的她到了 65 岁以后会变得怎样。

女权运动至今已有 25 年，可我们仍旧像从前一样，把老夫少妻看成司空见惯的现象，可是要是有人把这种关系倒过来，我们就认为是大逆不道。这只要想想伊斯特伍德和斯特里普、雷德福和法伊弗所扮演的那些角色，或者现实生活中的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和花絮新闻记者克劳迪娅·科恩的浪漫故事，就可见一斑。女权运动的真正目的在于造就敢于打破常规、敢于特立独行的女人。不错，在思想和商务活动领域有不少这样的女人，可是在性生活的领域里却很少。卡库塔尼那篇书评的结论是，“在莱辛的早期作品中，女主角复杂的自我意识是通过细致的感情描写来表现的，作者用这种方式来揭示人物所处的社会。由于某种原因，在《又是爱情》里却找不到这样的描述。这就使得这部小说不仅显得肤浅造作，而且充满了胡编乱造。”

重读苏珊·桑塔格在 1972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使我不禁想起那些困扰女人一辈子的烦恼：

“女人越老就越显得令人讨厌。”桑塔格写道，“松垂的乳房、皱巴巴的脖子、斑斑点点的手、稀稀拉拉的白发、木桶般的身段，布满了青筋的腿——她身上所有的女性特征都变得令人憎恶。在我们的想像中，这种可怕的转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就像《最后的地平线》这部小说的结局所描写的那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在跟随情人离开了香格里拉之后，在几分钟之内就萎缩、干瘪、变成了一个丑陋的老太婆……当一个女人开始变老的时候，她所遭到的最严酷的惩罚之一，就是别人对她那日渐衰老的肉体开始感到本能的反感……在我们的文化中，在那些和审美和色情相关的感觉中，最最根深蒂固的就是对老女人的厌恶感。”

正如桑塔格所说，女人身上的女性特征在人们眼里总是处于两个极端：妙龄女郎那令人神魂颠倒的诱惑力以及干瘪老太

婆那令人厌恶的丑陋。在 1500 年至 1800 年之间 大约有九百万女人被当作女巫惨遭杀害。教会把女人的性欲和诱惑力视为一切邪恶的根源，把女人看作诱惑男人堕落的罪魁祸首。 1486 年，教皇授意出版了迫害女巫的手册《锤杀女巫》（*Malleus Maleficarum* 宣称“所有的巫术都来自肉体的淫欲 而女人的淫欲是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这本手册明确地告诉世人，不论是美貌的还是丑陋的，女人对男人都有着异乎寻常的诱惑力和控制力。

我们总以为所有的女巫都是干瘪老太婆，其实，极具诱惑力的年轻女子也会被人视为女巫。当时人们不理解男人为什么在看到美貌女子时会产生勃起和梦遗等反应，也搞不懂男人为什么会得阳痿的毛病，他们相信美貌女子一定和魔鬼有交往。在许多人眼里，女人更容易受到魔鬼的引诱，因为女人缺乏理性，她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到性本能的驱使。女人越老就越容易成为魔鬼的信徒。

“当女人开始变老的时候，她身上的女性特征就使她变得越发邪恶，”洛伊丝·班纳写道，“她成了往返于魔鬼和人类世界的‘掮客’……‘魔鬼把老太婆派到他自己不能去的地方。’人们认为这些女人都参加了一个巨大的秘密色情网，她们指挥那些年轻的女妖 *succubi*（睡梦中与男人交媾的女梦淫妖）和年轻的男妖 *incubi*（男梦淫妖）派这些梦淫妖去勾引人、引诱更多的人加入对魔鬼朝圣。”

今天 女人的命运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我们聪明、富裕、有才华、有能力。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能改变中老年妇女的性形象。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像女巫的面孔，渐渐地，我们的心也变得冷若冰霜。我们不再相信自己 对男人还会任何有吸引力。上床前，我们一定要先关灯。我们害怕男人看到我们的皱纹，我们不相信男人看不到我们的皱

纹。在我们眼里，他们都是些说假话的老手。“见鬼去吧，美貌和做爱，你们给我带来的只有烦恼。40岁也好，50岁也好，至少我可以回到母亲那里，我可以太太平平地做母亲。”

科学证明，女人在过了更年期后，性欲的下降比男人慢得多。然而，许多女人仍旧把绝经看作性生活的终结。

“一个人只有在发挥了自己所有的潜能时，才能成为完全的人，”贝特兰写道，“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仅要实现真正的自我，而且要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和别人建立关系。”

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白雪公主》和《灰姑娘》这样的童话故事里，男女主人公们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考验，目的在于实现自我。故事的情节安排是为了最终证实，他或她是“值得爱的人”。但是，除了一些模糊的、对未来幸福生活的保证，故事并没有提到灰姑娘或白雪公主对王子的感情。这使人感到，故事里似乎缺了什么。“这些故事把女主人公带到了幸福爱情的大门口，”贝特兰写道，“却只字不提，要实现婚后的幸福生活，男女双方需要什么样的品质。”他们需要通过一场新的考验：他们必须战胜对性的恐惧。这个主题出现在那些和动物新郎有关的故事里。

“童话故事显示，我们最终都将面对一个过去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难题——用心理分析的语言来说，就是摆脱对性的压抑。”贝特兰说。女人为什么要在黑暗中做爱？她们为什么不喜欢观看男人的身体？我们最初带着好奇甚至兴奋的感觉偷看男孩的身体，可是，一旦我们把爱和性混淆在一起时，它们就成了死敌，不是前者毁掉后者，就是后者排斥前者。若是陷入这种情况，我们的爱情生活就在本质上出了问题。贝特兰指出：“爱可以改变我们的感觉，它能够使那些我们原先感到危险、讨厌，从而竭力避开的东西变得无限美好。”

只要想想《美女和野兽》这个故事。它属于动物新郎一类的

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女主人公勇敢地战胜了自己心里的恐惧，由于她的爱，野兽也变成了美男子。这类故事使孩子们看到，他们并不是惟一对性有恐惧感的人，别人也受到同样的困扰。“当孩子们看到，故事里的主人公最后发现，她的性伴侣非但不像她所想像的那样可怕，而且是个非常可爱的人时，他们的焦虑也会随之消失。”

贝特兰提到罗马尼亚童话故事《中了魔的猪》。这个故事虽然不那么广为人知，却充满了颇为现代的女性英雄气概。故事里的女主人公被迫嫁给了——头猪。每天夜里，这头猪就会变成一个男子；天亮时，这个男子又变成一头猪。那姑娘后来听信了巫婆的话，用一根绳子捆住那男子的腿，满以为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变成猪了。可是她错了。她的猪/丈夫生气地告诉她，除非她“穿破三双铁鞋 磨钝一根铁杖”走遍千山万水去找他，不然就永远别想再见到他。

“他从她眼前消失了。她走遍天涯海角，甚至到月亮、太阳、还有大风里面去找他。每到一处，都有人给她一只鸡吃，并且提醒她把吃剩的鸡骨头收起来……最后……她来到一座很高的城堡前，那就是她丈夫住的地方。”为了爬上那座城堡，她用收藏的鸡骨头制作了一架梯子，最后还砍下自己的小手指来补上梯子的最后一级。就这样，她终于找到了他。刹那间，笼罩在王子身上的妖术烟消云散，公主和王子重新结合。他们继承了公主父亲的王国，昔日的苦难使他们成了明智的君主。”

在童话故事里，通常是一个老女人、后母或巫婆用妖术使王子变成一只丑陋的野兽。这似乎在暗示，女主人公对两性关系的焦虑并不是来自自身的经历，而是外界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可以没完没了地争论到底是谁在女人心里种下性焦虑的种子，但是很少有人质问，女权运动有没有帮助妇女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女人所拥有的魅力，有没有帮助妇女和男人建立起相互

信任的关系。

我们必须把性纳入女权运动。今天，我们就像美女与野兽之类童话故事里的姑娘，我们站在洞穴的入口处，可是却没有勇气走进洞穴去寻找幸福。那些以为只要把男人从生活中清除出去就能免受性恐惧折磨的人是在玩一场自欺欺人的游戏。其实，我们对性的恐惧早在异性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就已形成。今天，当我们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寻求新型的两性关系时，男人在我们眼里却成了敌人。

可是，即使把男人作为一切烦恼的罪魁祸首扫地出门，我们也无法摆脱年龄给我们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恐惧感。更严重的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对性以及一切和性相关的东西的厌恶和恐惧，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很可能成为种种不负责任的性行为的受害者。

斯坦内姆和格里尔等女权运动头面人物近期发表了一些关于中老年妇女的言论。她们的话读起来实在令人沮丧。她们当年都年轻漂亮、性感十足，都是敢说敢干的女中豪杰。可惜她们在谈论年龄问题时，当年的激情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当女权运动把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她们是大胆的开拓者。她们告诉我们，只要大多数人都有共同的愿望，世界上就没有改变不了的东西或做不到的事情。她们说得对。我们克服了一切障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信念和信心使我们做到了我们的母亲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们改变了贤妻良母的传统形象。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另一道难题：如何改变中老年妇女的自我形象，如何在这个形象中保持我们的性魅力。女权运动把性和美貌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实际上是躲避现实。我们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真实感情：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斯坦内姆这样一个魅力十足的女子来代表女权运动？她和一些大人物的性关系早就成了人人皆知的新闻。

斯坦内姆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女权运动富有传奇色彩的女王。可惜，没有一个具有传奇色彩女主人公能够征服性这个神秘的领域。

在一次和盖尔·希伊的谈话中 斯坦内姆说：“性以及对快感的追求曾经在我的生活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有时整整两天，除了上床就是吃饭。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荷尔蒙的变化还是因为我比以前更成熟了。”

这话令人困惑。斯坦内姆应该知道她说的任何话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她仍旧把自己的成功说成是对性的超越，并且希望其他女人也能走这条路。这说明什么呢？难道我们应该在生命的第三阶段放弃对性生活的兴趣，并把这看成是天赐良机？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年轻时的斯坦内姆吧，那时她对女权运动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当她成为女权运动的代言人时，她的美貌打破了媒体散布的关于女权主义者的偏见，她使成千上万的女性放心地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像男性卡车司机那样穿着靴子和工作服。”斯坦内姆的传记作者卡罗琳·海尔布伦写道。

在我看来，斯坦内姆的美貌不仅使许多女性感到放心。她被选为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一事件本身就说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不论是难看的还是美貌的，都有意无意地承认，女人的性魅力确实很重要。在 70 年代，我们也许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暂时把注意力移向别处。但是选择斯坦内姆做代表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我们仍旧把美貌带给我们的力量看得非常重要。到了 80 年代，我们又开始劲头十足地追求美貌。内奥米·沃尔夫试图在《美貌的神话》一书中把这种现象归咎于邪恶的男人，可是她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想想吧，是谁把斯坦内姆这样美貌的女子选作女权运动的领袖？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是谁使斯

坦内姆直到今天还能保持她那迷人的风采？难道不是她自己的选择？

没有任何女权运动领袖具有格洛莉娅那样的影响力。她才华横溢，在媒体上频频亮相，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她用不着费多大劲就可以知道 年龄、性、美貌 这些问题对女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即使在人生的第三阶段，她的风韵也丝毫不减，仍旧是那样可爱、那样性感。

如今，格洛莉娅居然说她对性感魅力已经毫无兴趣。这真是不可思议，特别是在希伊的采访之后，61岁的格洛莉娅打扮得漂漂亮亮，让摄影师为她拍了一张动人的肖像照，这张照片刊登在拥有 2000万读者的《人物》杂志周年纪念专辑上。她是该杂志选出的 50 个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在这个时候宣布自己对性从此不感兴趣，这对别的女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她从来就没有公开把性和她为之而奋斗的女权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她并没有真正战胜女性对性的恐惧，而是像贝特兰所说的那样，“把性视为危险和肮脏的东西。”

今天的女性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更高。1992年在美国有 4300万妇女的年龄达到或超过了更年期，这个数字在 2002年将再增加 600万。这些妇女在经济上独立，不论在外貌还是举止行动上都比上一代显得年轻。这就促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性欲和性生活？

“四十几岁到六十几岁的女子常常会变得比以前更加有冲劲和进取心，盖尔·希伊在《无声的行程》中写道“，而男人则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过去被压抑的温柔和软弱的一面。女子的卵巢虽然停止了分泌雌激素，但是卵巢的皮层里仍旧持续不断地产生少量雄性激素即 睾丸素。大约 50%的女子在过了更年期之后体内睾丸素的水平相对比较高，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年女子常有的指手画脚、管家婆式的行为方式。与此同时，男人

体内的睾丸素水平则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降低。”

“更年期前后性欲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因人而异。雌激素水平虽然会对性欲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远远不及各人的自我感觉和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前国立健康研究院院长伯纳丁·希利指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雌激素虽然对女性阴道分泌以及性器官的功能有明显作用，并且有可能对情欲产生影响，但是真正对性欲起支配作用的是雄激素即睾丸素。由于雄激素对雌激素的比例在更年期及更年期之后的提高，因此，处在更年期或更年期之后的女子的性欲反而会增加……在我这个做医生的女人看来，性，尤其是更年期的性涉及到头脑、身体和环境。”

这项研究成果证明，斯坦内姆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她认为，“在 50 岁之前，女人是供人满足性欲和繁殖后代的商品，50 岁则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摆脱生育的负担并不等于性欲的消失，相反，它为 50 岁到 60 岁甚至 60 岁以上的女人提供了更多性冒险的自由，它使我们有可能以一种新的心态来看待两性关系。

在 60 岁生日的时候，有一位采访者请斯坦内姆谈谈她对性的看法。“我现在什么也不在乎。这种感觉真好。”斯坦内姆答道。“我们的读者会感到很失望的。”采访者说。“他们不应该失望，”斯坦内姆答道，“你自由了。你的脑子可以自由自在地想其他的事情。你不再因为妒忌和竞争而烦恼。”

有趣的是，当斯坦内姆退出性爱的舞台时，她开始集中火力对付竞争性。通过公开宣布自己对性爱已不再感兴趣，她向别的女人发出一个信号：她们再也不必为了她和她的情人们而忍受妒忌和争风吃醋的折磨。可是，如果其他女人——特别是那些和她同龄的女人——继续追求性的满足，继续炫耀自己的魅力，继续和男人上床，那么，斯坦内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性和美貌那样在女人之间引发激烈的竞争。当帕格莉娅那样能说会道的性感女人开始和她唱反调、推销另一种牌号的女性主义时，斯坦内姆立即情不自禁地跳出来应战。

她的信徒苏珊·法吕迪等人则接过她点燃的火炬，向凯蒂·罗伊芙和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等新冒出来的挑战者们发动猛烈进攻。“她们这种牌号的女权主义是注定要破产的，”法吕迪气愤地写道：“因为她们不想推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不想创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她们感兴趣的只是自我表现、自我崇拜。”

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看到其他女人享受性的快乐那样使一个女人火冒三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坦内姆和法吕迪的死敌——右翼父权主义者——同样憎恶新牌女性主义。对女性性力的恐惧使他们站到同一条战线上。

25年前，另一位美艳的女权主义者杰曼·格里尔写道：“崇尚革命的女士们可以参加妇女解放组织，在大街上和警察搏斗，可是你有没有听说过她们中间的任何人在大街上撩起裙子游行？……女人的阴道是人间乐园、圣女头上的光环、神秘的玫瑰、金子做成的方舟、通向天堂的大门……”

格里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她真是光彩夺目、风头十足。她浑身焕发出性的活力，她使我们大受鼓舞。她不仅说话大胆泼辣，而且毫无顾忌地运用她的十八般武艺：甩动一头美丽的长发，丰满的乳房抬得高高的，露出一双漂亮的长腿，屁股扭来扭去。今天，她的言语行为仍旧像以前那样具有轰动效应。不过在那本关于更年期的书《变化》里她却明显地流露出自相矛盾的心情。

这种变化是令人痛苦的。获得自由的女人就像刚刚卸

掉脚镣的囚犯，走起路来跌跌撞撞。过多的抛头露面曾使她吃过苦头，如今的默默无闻又使她不知如何适应。她现在才意识到，不论何时何地，不论在商店里、车库里，还是在公共汽车上，她曾经是多么依赖别人对她的注意。现在，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如果不大声喊叫，蜂拥向前的人群就不会注意到她的存在，而她就只能永无止境地等待下去。

她在书里描写自己和女友在法国的一家餐馆里就餐时，邻桌几个和她们同龄的男人如何贪婪地盯着那些年龄比他们小一半的年轻女子们，而对她们这两个中年女子却视而不见。那情景把她的女友气得发狂。

不错，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是，即使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让自己充分享受青春美貌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们常觉得自己太惹人注目；我们常指责那些盯着我们看的男人只对我们的肉体感兴趣。我们的自我残缺不全，这包括所有那些内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品质——心态、价值观、自尊心、自信心……如今人到中年 只要我们相信自己 感觉自己 我们就能焕发出更加成熟的性感魅力。

《变化》出版后，《哈珀氏集市》刊登了一篇关于格里尔的文章，还附上一幅她的照片。在那张照片里，她光着身子垂头丧气地坐着，灰白的长发遮着半边脸，干瘪的乳房像布袋一样垂挂在胸前，怀里抱着一只猫。不错，确实像个女巫。令人不解的是，在书里，她赞扬的是女巫阻止男人的能力而不是女巫的性吸引力。格里尔曾经如此大胆地在男人面前炫耀她的诱惑力，然而她的书却令人不安地显示出一种摆脱男人、摆脱成熟的女性魅力的倾向。其实，真正的格里尔并不像照片上那样萎靡不振。当她在我们这儿的书店里签名售书的时候，她看上去相当漂亮，相当生气勃勃。

她那天的演讲和她的模样很不相称。她讲起话来就像个恶狠狠的“坏女巫”，气势汹汹、咬牙切齿，声音里流露出强烈的怨恨。我真想抓住她狠狠地摇几下，拿面镜子让她好好看看自己，然后问她，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还不够漂亮吗？难道仅仅因为男人不再像从前那样怀着窥视者的强烈欲望来看你，你就应该转身反对他们？你曾经在许多地方以善于展示自己的魅力而出名，集智慧、青春和性感美于一身。你从来不满足于仅仅保持一个聪明的头脑。

也许我并不真正了解格里尔，但是我对她仍旧抱着希望。她太重要了。我的助手在看了她的书后哀叹，“老天爷，她们又在自寻烦恼了。她说的‘她们’是指那些人到中年便陷入自我怜悯的成功女士们。”格里尔看上去棒极了。我那45岁的朋友莫伊拉说，格里尔签名售书的时候，她也在场。“可是我真受不了她说的那些话。像她那样成功的人怎么能说出那种泄气话？但愿上帝不会在7年里把我变得像她那样。”

如果我们不能成为令人信服的典范，年轻人在看到我们精疲力竭、怒气冲冲的面孔时就会越来越远地离开我们。当然，并不是所有年轻时代的风云人物在进入中年之后都会变成这样。就拿52岁的前家庭计划主任费伊·沃特顿来说吧。10年前，我对她作过一次录像采访。她说，她从小就在一个极其重视外貌美的家庭里长大。每当我在其他女士们面前提到沃特顿，不论她们和她是否有私交，她们都赞扬她的美貌、她在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她对女权运动的投入，所有这些都非常珍视，像保护一笔巨大的遗产那样精心维护。

但愿格里尔能够重读一遍她的《女阍人》中的一段：“我们必须把两性关系从有权者和无权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性者和无性者之间的交易中解救出来，使它成为不同的人之间的平等交往。”

漂亮地显示我们的实力

在父权社会里，女人年龄越大就越掉价。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中年女性虽然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收入却越来越高。这就是说，我们应该重新看待自己的价值。在一个崇尚成功的文化环境里，我们完全可以以一种新的形象为自己做广告。

我们都喜欢接近成功人士，特别是富有魅力的成功人士，希望分享他们的光和热。对女人来说，美貌和成就的结合，就像高质量的产品加上吸引人的包装。只要保持自信心，我们就不怕没有朋友或情人。心理学家朱迪斯·罗丁是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在她 50 岁那年，一位男性同事是这样评价她的：“她是这样一个人，她搞到的资助越多、名气越大，就越发迷人和有魅力。”罗丁确实非常漂亮。她是个母亲，结过三次婚。她的同事对她的评价使我们看到，美貌和成就如何相辅相成。

今天，我们可以充分享受现代女权运动的成果，并把这些成果带进中老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而不是躺倒在地等待死亡的日子。

如果我们不能为自己挣得男人在中老年时期所拥有的那些特权，我们的经济实力又有多大意义？不过，男人不可能使我们拥有这样的特权，因为我们不相信他们。年轻时，我们就怀疑男人对我们的感情，更不用提 45 岁或 70 岁的时候了。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美好的自我形象。要有一个充分发展的自我，我们需要相互鼓励；我们必须停止诋毁其他女人，把别人的成就作为衡量自己的基准。

我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男人，这副眼镜染上了由老爸、

财富和权力组成的混合色彩。即使是一个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男人，我们也认为他有权来挑选我们，这就是说，他能够左右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最有钱的男人拥有最漂亮的妙龄女子，这是父权制度下的交易。可是今天，我们掌握的经济实力使我们有权改变这种交易方式。男人可以挑选他喜欢的女人，但是我们已没有必要依赖他的财富和他对我们的评价。一个人是否有魅力并不依赖别人对她的看法，而是取决于她的自我感觉，取决于她是否相信自己拥有这样的力量。

在过去，年龄大的女人之所以被视为女巫，主要是因为她强大的性力引起男人和其他女人对她的恐惧，而不是因为她干瘪枯竭、毫无性感。根据洛伊丝·班纳的说法：“在中世纪女人之间相互攻击时常把对方称为‘婊子’或‘巫婆’。每个女人都可能成为婊子，每个女人都可能成为巫婆。”

如果从现在起，我们能够在从内而外打造出新的中老年女性形象，我们就会实现一项实质性的转变，成为第一波现代女权运动的真正代表。这样，年轻一代就会看到，精彩的生活不会随着青春的消失而一去不复返。如果我们继续因男人的眼睛不再像以前那样盯着我们而愤愤不平，那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将前功尽弃。否认美貌的重要性是毫无用处的，因为美貌一向都很重要，但是衡量美貌的标准是可以改变的。要改变青春对美貌的垄断，我们就必须显示成熟女性的创造性、智慧、才干和魅力。

哀叹社会对中老年女性的冷落就是对过去 20 年女权运动的否定，其实质是继续把女性的价值和花瓶的角色联系在一起。今天，对青春美的崇拜再次成为主流，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青春时尚再次复活。这说明，我们没有能力创造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成熟美的形象。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并不取决于我们的穿着打扮，而是

取决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风度、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我们要以新的形象来迎接中年时代。我们没有必要硬把自己的身体塞进少女的紧身裤和紧绷的 T 恤衫，这只能说明我们害怕中年的丰满和美丽。

迄今为止，饥饿的眼睛只习惯于盯着一种人：年轻人。不错，人的眼睛永远在自发地寻找青春之美，因为繁殖后代永远是生物的本能。但我们并不是仅仅为传宗接代而活。我们是有内涵的女人，我们相信自己年龄越大就越有吸引力。当别的女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她们看自己的方式就会改变，她们会透过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自己。一旦观念更新，我们的眼睛就会看到一个赏心悦目的形象。

一个潇洒自如的人年龄再大也会魅力无穷。今天，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喜欢安详幽雅的气质。青春期的美貌可以吸引一大群人，但是很少给人带来安详和平静。美丽的少女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她害怕岁月的流逝，因为她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保持自己的价值。

不错 我们也许比她大 20、30、甚至 40 岁。但是，要是我们妒忌她的话，我们就是忘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忘记了那时我们有过多少烦恼和困惑。

和 19 岁的少女争奇斗艳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已经不再加入那个传宗接代的基因库，不再参与那种为了寻找配偶繁殖后代而展开的竞争。我们不希望让别人来挑选我们；相反，我们要让自己来挑选别人。现在，我们可以采取主动。

那些关于性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年递减的神话是为了限制女人、强迫她们安分守己。“年龄不会影响女人达到性高潮的能力”，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 1994 年写道，“有一项研究表明 性生活活跃的女子达到性高潮的频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上升，这种上升的趋势可以维持到八十多岁。”

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也许你的脑海中会出现一具在性极乐状态下兴奋得发抖的老女人的肉体。多么令人恶心的巫婆啊！可是，不要忘记，即使是三十几岁的女人也会在自己身上看到“老女人的肉体”，并且相信自己身边的男人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我们之所以遭冷落，罪魁祸首还是我们自己。

我的大多数女友都是年过 50 的人，但她们看起来就像三十来岁的人一样生气勃勃。当然，这并不是说，她们看起来像三十来岁的人一样年轻。电影及百老汇音乐剧《日落时的大街》中的女主人公诺尔马·德斯蒙德在原先的剧本中是个 50 岁左右年老色衰的电影明星，她再也没有机会在银幕上亮相。这部影片摄于 1950 年。在今天，我们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是我们的眼睛发生了变化，还是中年妇女们自身发生了变化？我看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不过后者更重要。

舞台版《日落时的大街》的作曲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援引过一些好莱坞太太们的话，“我们都是 50 岁的人，我们个个都很漂亮！”今天，50 岁根本算不了什么，劳埃德·韦伯说：“可是当初他们拍这部影片的时候，50 岁的女人已经是老得可怕。”

俗话说：男人四十是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妇女研究中心的学者戴比·泰恩谈到，男人过了 45 岁反而显得仪表堂堂、更有气度，而同样年龄的女人则被视为年老色衰。在我看来，如果单看外表，45 岁的男人中仪表堂堂的其实很少，但是一旦我们了解到他们是谁、他们干成了多少大事，他们的形象在我们眼里立刻变得高大起来。“四十多岁的女人正处在一生中最好的时期，”戴比·泰恩说，“不幸的是，这恰恰是她们开始被社会打入冷宫的时候。”

我更欣赏卡罗琳·海尔布伦对女性、美貌和年龄的看法。“也许只有在老年，至少是过了 50 岁以后，女人才有可能停止扮演那些社会限定的角色，并利用这个机会改变自己曾经如此看

重的女性气质。”海尔布伦把玛格丽特·米德作为这类妇女的典范。“记得那次和姨妈在餐馆里吃午饭。她问我，‘你为什么不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我抬起头来看着玛格丽特·米德，她身高只有5英尺，体重180磅……可是她身边总有那么多的人，包括年轻男子。我决心变成一个像她那样的人。”

米德常被许多女人视为拒绝向年龄和社会偏见低头的典范。在她的自传里，米德把更年期的到来和生育期的结束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它为女人提供了“特别好”的机遇：“她们的创造力一下子被释放出来——她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始画画、写作，或者重新走进学校的大门。”关于米德的容貌和性生活，她的女儿写道，“她看上去更漂亮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法比亚尼为自己添置定制的衣服。看来，她又开始了新一轮浪漫爱情。毫无疑问，她在专业上也实现了新的突破。”

心理学家乔治亚·威特金参加了我在1989年主持的一次研讨会。她说，“化妆品行业的那些广告总是在喋喋不休地告诉女人如何为别人打扮自己。为了写《女性压力综合征》这本书，我曾和1500位女士谈过话。我发现，她们每人每天平均要照17次镜子或其他类似镜子的东西。从化妆打扮到逛商店看橱窗，她们随时随地都在观察自己。如果她们看到明亮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和双颊，她们就会对自己说，‘我还年轻，我看上去很不错。’我们需要美，这不仅是为了别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自己。虽然年龄一天天增长，只要我们仍旧觉得年轻、强健和漂亮，我们就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年轻、强健和漂亮的外表。”

在那次研讨会上，有许多来自一家著名化妆品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男性。电视记者南希·柯林斯问这些经理们为什么总是用二十来岁的女子来做抗皱霜的广告，他们回答说这是消费者的喜好。打那以后，40岁以上的模特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化妆品广告里。只要能增加销售，化妆品公司的

经理们并不反对使用年龄较大的女模特。当然，如何塑造我们的形象，关键还在我们自己。

我们口口声声谴责男人把我们当作花瓶，其实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遭冷落和失去对别人的吸引力。如果一代女性都能从小培养自己的才能和自信心，在更年期到来的时候，她们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即将到来的变化。

有了牢固的价值观，我们就不会害怕遭到别人的冷落。回想一下我们的少儿时代。那时我们无忧无虑地发挥自己说话、运动、学习的才能；我们一点也不在乎聚光灯是否总是照在我们身上，离开它我们反而觉得更加自由。

我们这一代不可能在有生之年改变年龄的双重标准，但是男女之间已经能够分享原先由各自垄断的权力。

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更加自主地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这种人。我们的脸上会有皱纹，但不见得比同龄的男人更多。我们会失去年轻时的美貌，但是男人所拥有的那些品质——智慧、精力、管理能力、还有性力——也将成为我们终身拥有的财产。

谁都不想变老，但是我最反对的是虚度光阴。我希望今天的少女们把最卓越的女性作为自己的榜样。我希望今天的女孩们从小就能看到不同年龄的杰出女性都能像同龄的男人那样受到社会的尊重。岁月流逝，但是我相信最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好巫婆”的穿着打扮

今天的裁缝们面临着—项重大工程：在美国，每年有几百万妇女跨过 50 岁这道门坎。我们这一代女性比前辈更加富有，而且我们的财产是自己挣来的，不是来自死去的丈夫。我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我们希望自己看上去就像

我们所感觉的那样：有活力，有性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自主。

我们要让世人看到新一代“好巫婆”的新形象。不过，我们并不想像傻瓜一样穿上少女的服装。安妮·霍兰德告诉我们，服装用它独特的语言向我们说话。好女人总是说，“人品比外貌和穿着打扮更重要。”不错，但是努力做个好女人并不妨碍我们显示自己的性感和美貌。

“我们已经厌倦了每时每刻都要求自己做个好女人，”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如果你磨掉女人身上所有的棱角，那就等于把她们推回到 19 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时的好女人就是绝对的天真无邪，除了做贤妻良母之外什么权力都没有。”

作为女性，我们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类型，这个新类型的出现给服装设计师们出了一道难题。从来没有人觉得中年女性应该有独特的形象。在过去，她们大多呆在家里，既没有政权，也没有财权。小时候，我那些同伴的母亲们没有一个能把她们的性感魅力保持到中年。青春期是她们最美丽的时候，但她们必须把童贞一直保持到结婚前夜，然后就是生儿育女，原先的性感魅力也随之消失。当下一代妙龄女子登上时尚舞台的时候，她们的母亲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只有最伟大的电影明星才能在时装设计师的帮助下保持她们成熟女性的性感魅力，而摄影师奇妙的照明和光线则使这些明星们洒脱迷人的气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把这类电影称作“虚幻的世界”，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女人。

今天，当我们进入中老年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55 岁到 64 岁的女士们在收入上比 30 年前同一年龄段的女性高出 41%，65 岁以上的女性则高出一倍。我之所以强调收入，是因为时装设计师们总是跟着钱走。我们不能怪裁缝们没能满足我

们的需要，他们毕竟不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女人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如今有了新的含义：当一大批女人进入中老年的时候，她们找不到一个从里到外都值得仿效的成熟的典范，她们也找不到合适的服装！

时装评论家霍利·布鲁巴克在提到 70 年代时写道：“今天，我们在 70 年代的再循环中可以发现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历史的发展似乎成了对过去的反射……在我看来，重新利用过去的服装式样似乎要比发明新式样要容易些。复古也好，改头换面也好 都是为了逃避现实生活。”

大多数试图重新发掘六七十年代时尚的裁缝们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今天，他们一边听着那时的老歌，一边重新设计那个时代的时装。也许他们希望，只要重现那个时代的模样，我们就能恢复那个时代的活力，摆脱束缚我们的陈腐观念。时装设计师只能根据人们的需求来设计服装。作为新一代中年女性，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设计师们也不知道如何满足我们这类人的需求。

“对那些经历了几十年的热闹场面、对赞美的声音和目光早已习以为常的女人，冷落和孤寂可以变成毁灭性的打击。”心理学家丽塔·弗里德曼在 1986 年写道。对于今天的年轻女子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内在的贫困和对未来的恐惧，因为她们很难找到值得仿效的中老年女性形象。

通过提倡及时行乐，女性杂志进一步加重了她们对年龄的焦虑——抓紧时机炫耀你的青春之美吧，等待着你的默默无闻的未来。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年轻人成了媒体的主宰（戴安娜·弗里兰把这称为“青年大骚动”），琼·施林普顿、佩内洛普·特里和特威吉的形象占领了时装杂志，而大量涌现的音乐、艺术和文学作品则为这些形象提供了精神内涵。

早期女权运动的声音与沃霍尔绘画、“滚石”音乐、“青年大骚动者”的 T 恤衫和长头发融为一体；新的时装潮流和民权运动、堕胎权运动以及反战运动齐头并进。

不过，过去有些好的东西也被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扫地出门。我们是最后一代经历过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我们不把那个时代的文明礼貌保存下来，它们就会销声匿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老电影，要重新搬出过去的时装式样。

我们必须为“好巫婆”打造新的形象。今天，我们仍旧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一个 50 岁的女人和一个同样年龄的男人。当我们初次看到一个 50 岁的漂亮女人时，我们很可能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但是，一旦有人说出她的年龄，她在我们眼里的形象就会立刻变了样。

同样，当我们活到五六十岁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也失去了信心。

我很理解，为什么女人们一到中年花在服装上的钱就少了：我们找不到能使我们引人瞩目的服装。即使那些所谓的成年女性杂志也硬着头皮挤上青春期文化这条单车道，被清一色的少女形象所占领。

《时装》杂志读者的平均年龄是 32.4 岁。为什么这类时装杂志的编辑、设计师和摄影师不能为读者中的大多数策划出适合于她们的时式？亚历山大·利伯曼是《时装》杂志的出版商孔戴·纳斯特出版公司的创意主管，他为这个公司干了五十多年。就在他退休之前，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简短地交谈过一次。对这位享有很高声望的出版界知名人物，我心里充满了敬畏。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成年人的杂志不能显得更加老成一些，就像他本人在三四十年前所设计的那样，显示一些生活经历丰富、见过许多世面的成熟型美人？

“那种只能讨家庭主妇喜欢的杂志是没有销路的，”他用

蔑的口气教训我：“不要总是生活在过去。”我站起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对他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在《女性的性变态》这本书里 精神病专家路易斯·卡普兰对女性表现欲的根源提供了一套非常有趣的解释。她从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开始：

表面上，埃玛·包法利的举止和穿着都严格地遵循某些强加于女人的刻板模式，其实她很可能是个女性的 *homeovestite*，或者说，一个不能确定自己的女性气质的女人，一个害怕公开承认自己的男性进取心的女人... … *Homeovestism* 这个概念意味着性别模仿，它比表现欲这个词更适用于解释女人如何为了把自己作为一件值钱的性商品而穿着打扮……精神病医生和公众都经常不假思索地把脱衣舞女、拍色情电影或色情照片的女子称作有裸露癖（表现癖）的人。但是裸露表演所带来的满足……只是吸引一些女人干这一行的原因之一。成千上万的女人之所以穿着内衣内裤，披上很薄的面纱，或穿上其他半裸的衣服做出各种明显的或暗示性的性诱惑姿态，主要是因为她们希望以此来保证自己不会被别人遗忘和抛弃。她们觉得自己的存在受到了威胁。色情演员因恐惧而产生的对身体的迷恋可以追溯到小女孩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爱而产生的焦虑……像文化偶像玛丽莲·梦露这样的女人其实是一个被禁锢在美丽的躯体中的囚徒，她的全部生命力就在于使自己成为女性性征的代表。这样的女人对男人有强烈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但她们最终只能为男人服务，受男人的控制。

我喜欢卡普兰对女性裸露癖（表现癖）所作的较为广义的解释，她把成年人对别人眼球的迷恋和她们幼年时期对“凝视”的

渴求联系在一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育儿室里发生的一切不只局限于喂养和照看孩子，而且影响到孩子长大后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今后的年轻人还会继续贪婪地追求别人的眼睛，渴望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存在，甚至不惜用暴力来达到引人瞩目的目的。那些在幼儿时期没有得到足够关爱的孩子长大后仍旧会害怕被人冷落和遗弃。对他们来说，具有裸露癖特征的服装和言语不仅是一种时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写作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虽然一向以“好女孩”自居，可在暗地里却憋着一肚子气，强烈地希望能够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这和我从小失去父亲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了父亲，就没有人把我看成掌上明珠，也没有人来弥补母亲对我的忽视，更糟的是，父亲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该死的谜。回想过去，我开始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地写那些和性有关的、别人避免谈论的东西，为什么总是打扮得如此引人注目。我被传媒界的高雅女士们称作专拣肮脏题目做文章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指责对我的伤害已经越来越小，不过“好女孩”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像孩子追寻母亲的眼睛那样继续把性作为写作的主题。

埃里卡·容在她的自传《五十岁的恐惧》中痛苦地回忆道，“直到现在我还不敢回想《五十岁的恐惧》所引起的仇恨。那些私下里承认深有同感的新闻界女士们公开地指责这本书……她们的恶毒的攻击对我造成的伤害比男性评论家厉害多了。”

早在70年代初我就认识了埃里卡。我们两人都在那时出版了有关女性性欲的书，她写的是虚构作品，我的是非虚构作品。我对她写的东西深有同感。年龄的增长给人带来的一大好处是你开始不那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你不再处处担心：“邻居们会说什么？”我或许不会像从前那样穿紧贴在身上的衣服来

炫耀自己的身段，可是我的头脑却更加不受约束。年轻的时候，我渴望炫耀自己的性感和魅力，同时又担心别的女孩会说什么。当《我的神秘花园》出版时，我像埃里卡一样遭到了女友们的突然进攻，而陌生人中却有不少支持我的人。我是顶着女友们的鄙视来写女性的性欲的。

作家中自杀、精神崩溃、忧郁症和胃溃疡的比例超过其他群体。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中，还有不少死于酗酒。为了获得读者的共鸣，作家必须挖掘和暴露自己最深层的感情，唤起对过去最可怕的回忆。我们中有那么多人过着隐居的生活，对人生的洞察常常在我们心里激起强烈的感情。“要是我把满腔怒火都毫无节制地发泄出来，理查德·罗德说：“大概整个世界都会被我毁掉。”弗吉尼亚·伍尔夫说：“我肯定会发疯。”拜伦、雪莱、麦尔维尔和柯尔律治都患过各种各样的躁狂抑郁症和情绪抑郁症。日耳曼式的狂怒通常是婴儿的狂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为婴儿的无限权力。

卡尔·伊泽德专门研究非言语的交流。他说，愤怒在脸上的表现就是紧锁的眉头、怒视的眼光和紧绷着的嘴唇。当愤怒受到压抑时，脸上就出现了一种“掩饰性的表情”。在我的记忆中，这就是母亲那一代“好女人”普遍拥有的假面具。她们日复一日地压制和掩盖自己的感情，这使她们过早地显得衰老。女人最恨的就是越来越干瘪的嘴唇。今天，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装假牙、在嘴唇上注射胶原蛋白。值得注意的是，最热衷于注射胶原蛋白的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

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强烈地渴望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可见性。道德主义的说教已经退居二线。“自然坦诚、干净利落、不加修饰的外表之所以具有感染力，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显示出一种道德的力量。”霍利·布鲁贝克写道：“我们赞赏那些有勇气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女子，说到底，是她们的勇

吸引了我们。’确实 我们仍旧保留着这样的传统 因为它是建立在新教主义伦理学基础上的。不过，我更倾向于另一种勇气：敢于冒险打破道德规范 的勇气，敢于浓妆艳抹的勇气，敢于露出大腿的勇气，敢于袒胸露臂的勇气，敢于大大咧咧地去做整容手术的勇气。

我们佩服琼·科林斯，因为她泰然自若地展示自己的诱人之处。她让我们轻松自在地欣赏她。她的泰然自若能够将别人心里的妒忌转化为赞赏。我很怀疑那些以圣贤自居而对整容手术持反对态度的人。讥笑别人靠整容手术来改头换面与过去那种诋毁女人在公开场合吸烟的行为没什么两样。

我不相信芭芭拉·布什真的喜欢她的白头发和褪色的珍珠。我一向觉得她是个心怀愤怒和妒忌的女人。当我看到美容化妆品行业在广告中利用女人的妒忌心来推销商品时，我感到特别高兴——公开的妒忌总比暗地里的妒忌要好。当广告包含了文化中隐蔽的成分时，它就上升为一种艺术：“他们说男人越老，脸上的线条就越显出个性，而女人脸上却只有越来越多的皱纹……真的吗？”玉兰油电视广告里的女人愤愤不平地说，“我不打算心甘情愿地变老 我要竭尽全力，寸步不让、寸土必争。”

我们总想一边追求美貌，一边做个像母亲那样的“好人”。这就使我们成了攻击的目标，因为在有些人眼里，改变“自然赋予”的容貌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个 50 岁的女人用整容手术使自己变得比以前漂亮，她就会担心别人说她闲话。这种感觉和少女时代的焦虑一脉相承。在青春期，如果一个女孩同时和多个男孩要好，她就得当心其他女孩的反应，这会迫使她在男孩们面前有所收敛。我们也许想做抽脂手术，或者把头发染成赤褐色，但是我们又不想损害自己的好名声，或者引起其他女人的反感。这一切是多么荒唐可笑。为什么我们要让别人来判断我们的道德品质？对美貌的追求总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尤其是上了

纪的女人，与世无争的年龄似乎并不妨碍她们妒忌别人的美貌。

在我们的记忆中，仍旧保留着老祖母的形象：满头白发，像枕头一样又大又软的胸部。她们从来不会妒忌任何人。对那些得不到母亲照顾的孩子来说，奶奶或外婆就成了他们的母亲。当我们走在家乡的老街上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悲伤。我们怀念那些和睦相处的人，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放松，用不着拼死拼活和别人争个高低。我们好像又闻到奶奶身上的那薰衣草的香气，又摸到她那柔软起皱的皮肤。也许我们是最后一代拥有这种记忆的人。如今已很难找到这样的老奶奶了，白头发和松软多肉的手臂已经过时了。

其他文化对待美貌和道德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像我们这样矛盾重重。他们并不把追求美貌看成一种愚蠢的行为。不论追求者年龄有多大，他们都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相反，美貌是他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有着更悠久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黎很难找到漂亮服装，只有一队队衣衫破旧、等着领救济食物的人。然而，即使是那些参加抵抗运动的法国女人们，也想尽办法打扮自己。巴黎女人用旧报纸和鸡毛做帽子，用拣来的降落伞上的绸子制作结婚礼服。别人非但不鄙视她们，反而对她们的创造力大加赞赏。

在一张著名的战时照片里，一些法国女人坐在理发店里吹风，因为电力实行限量供应，店里就让几个男人踩脚踏车提供动力。这并不是虚荣心的恶性膨胀，而是生存本能的表现，女人的美貌就像卢浮宫和夏特尔多教堂那样值得竭尽全力加以维护。

归根结底，女人能不能变得更强大、更有吸引力，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眼力。女人越是努力地追求性和美貌，就越容易失去女性世界的爱和容忍。只有当我们这一代中年老年女性成功地在性和美貌的王国中占领一块属于我们的地盘，年轻一代才会

放弃她们的疑虑和反感。到了那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完全改观。这是现代女性的长途跋涉，敌人就在我们自己心里。

解开爱和钱之谜

钱给女人带来的自由可真不少。有了钱，她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单身或结婚，工作或不工作，享受或奉献。她可以在不依赖男人的基础上和他们建立性爱关系。女权运动一贯主张男女经济上的平等，但却忽视了经济和感情独立之间的关系。独立不仅意味着自己拿钱付账单，而且要让钱来帮助我们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实现感情的独立。

即使是收入高达六位数的女人，她们对待钱的态度也摆脱不了母亲的影响。小女孩乱花钱是为了模仿有钱的成年人，她们甚至用这种方式来欺骗自己。确实，如果有了钱，我们就不会那样害怕失去母亲的宠爱。可是，当我们真的有能力为自己付房租和购买避孕用品的时候，我们却不知怎样保护自己。这就是说，我们在感情上仍是个依赖母亲的孩子。

我小的时候，女人之间总是避免谈钱的事。我衷心赞美妇女经济上的独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权力和责任。我全力拥护德克萨斯前州长安·理查兹在德克萨斯女子中学的演讲。也许就是那次演讲使她失去了再次当选的机会。她的对手小布什在听了那次演讲后找到了攻击她的炮弹，他指责她提倡年轻女子在经济上自立，声称这违反了美国人的传统。

“你必须问自己一个重要问题，”理查兹说，“这个问题不是‘我长大以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我是谁？’‘我要怎样来对待我的生命？’你不能依靠一位白马王子来照顾你，使你感觉到自己的可爱……在现实世界里，一半左右的婚姻以离婚

告终。70%以上离了婚的妇女落到贫困的边缘……当你陷入困境的时候，惟一能够依靠的人就是你自己。生活中所有值得拥有的东西都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而报酬并不总是唾手可得……如果说在我们面前仍存在着前进的障碍……那就是我们不愿意直面钱这个现实问题……你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德克萨斯人决不同意我们的领导者对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传播这样的信息，”小布什指责理查兹鼓吹不要家庭。“我们的领头人应该提倡建设家庭，而不是拆家庭的墙脚。”令人沮丧的是，如此放肆的歪曲居然能帮助一个人在竞选中获胜。布什很明白，他要唤醒的是我们在幼年时期就已形成的对安全感的渴望。也许有些人确实生活得很安全，但是如果向学校里的女孩们灌输这种安全感，那就是向她们兜售谎言。如果以为只要把女孩们都培养成像婴儿依赖母亲那样依赖男人的女人，我们就能恢复传统的家庭，那纯粹是幻想。

正是由于意识到母亲在经济上的依赖性，我才决心在长大后走一条和她相反的道路，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但是我不希望今天的孩子也经历同样的过程。相反，我希望做父母的能够努力让他们的女儿看到自立能够给人带来的好处。布什之流利用人们的怀旧心情，其实他所描绘的过去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看来他也不会赞同我所说的父亲和母亲共同带孩子的主张。

一个在经济上依靠别人的女人也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但这是很难办到的事。用别人的钱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给钱的人完全是出于爱；实际上，也许后者的代价更高。在经济上依靠别人就会使对方获得管教我们的权力，至少他们会这样认为。随之而来的还有恐惧，万一明天财源断了，那会怎样？

一个传统社会中的已婚女人会断然否定她对丈夫的权力怀有任何怨恨。她对婚姻关系的理解——丈夫挣钱供养家庭 她

在家生儿育女——是从小在母亲膝下形成的：如果她听母亲的话，做个守规矩的好女孩，将来就会得到梦想中的白马王子。就这样，15年，20年，做女儿的牺牲了自己的独立性、主动性、表达能力以及领导别人而不是被人领导的愿望，直到某一天，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在他身上依托着她的存在、她的整个人生，她不可能没有他，离开他是不可想像的事。即使当他在他的大衣口袋里找到附近某家旅馆的账单，她也不愿想到任何分离的可能性。

这就是传统的女人，她们相信的是传统的生活方式。现在想起来，我对那个时代的许多东西还是挺留恋的。60年代的革命使妇女有机会选择经济上的独立，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在这里，重要的是选择的自由。我们不应该诋毁那些选择在家工作的妇女。

那些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朋友们和我一样，把那些年看成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代。这和我们经济上的独立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母亲之所以过早地显得衰老，主要是因为感情上的压抑。如果做丈夫的在外寻花问柳，邻居的妻子们就会跑来像对待死者的遗孀那样安慰那不幸的女人：“男人就是这样。”她们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嘴角的皱纹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深。忍气吞声、对命运的共同屈服将她们连接在一起。在内心深处，每个女人都暗藏着一肚子怨气。于是，有的患起了偏头疼，有的开始酗酒，癌细胞也开始在体内增生。

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妇女走上工作岗位，随着妇女工资的不断提高，年龄的双重标准将逐渐消失。有了足够的自信心，我们对自己的形象也许就不会那样挑剔，也不会害怕自己的身价会随着年纪增长而不断跌落。我们会变得更加优雅自在，这正是男人欣赏的品质。

说到底，女人要相信自己的魅力。当她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像时，她看到的不是那些细小的皱纹，而是一个完整的形

象 这个形象包含了她的一切——包括她的成就和才华。

男人的经济实力越强，他和女人的关系就越大胆。他肯定不喜欢遭到拒绝，但是这不会妨碍他继续采取主动。他知道钱的力量，因为他从小就看到男人如何运用金钱给他们带来的权力，女人如何依附于有钱的男人。我们至今还没有见过相反的情况。女人拿来和男人交换的惟一商品往往就是美貌。

可美貌昙花一现，因人而异，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商品。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这个西施在另一个人眼里也许就不那么诱人。为此，女人们一向把美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她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它那短暂的生命而难过。根据最近一次在 18 岁到 70 岁的美国妇女中进行的调查，有将近 50% 的人对自己的相貌不满意 而在 10 年前，不满意者只占 30%。这就说明，我们在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自然而然地实现感情上的独立。

20 年前 当我们为男女同工同酬而奋斗时 许多人相信 有了经济上的自由，我们就会在精神上获得新生，就能摆脱肮脏的金钱交易，成为和男人完全不同的人。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当女人拥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和男人一样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得比男人好，比男人更慷慨、更圣洁？其实，性别的差异并没有使我们变得更加善良，在道德上，我们和男人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世界上有好男人，也有坏男人，有好女人，也有坏女人。

“女孩应该学习打字 将来一旦需要 就可以派上用场”——在过去，女孩们常听到这样的建议。可是，在放弃了勇气、进取心和表达才能之后，学点儿打字技术又有什么用处？事实上，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未来丈夫身上的女孩很少学打字。

做个依靠丈夫的小女人确实能使人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可是，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女人的青春和美貌也逐渐消失。虽然在理智上不愿承认这样的事实，但是在潜意识中，我们的母亲

知道，在两性之间的交易中，她能够用以交换的价值正在一天天减少。这些都成了小说和电影里常见的主题。在看完这类小说和电影后，她也许会想：感谢上帝，这样的不幸永远不会落到我的头上。可是在睡梦中，可怕的幽灵出现了。正是这种朦胧的焦虑和恐惧使我们的母亲过早地显得衰老。

男人并不是成心骗女人上钩。热恋的时候，他们同样希望两人永远相爱，白头偕老。但是生活中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每当丈夫的眼睛看着别的女人时，“我爱你”之类的诺言就失去了原先的甜蜜。与此同时，做妻子的仍全心全意地守着自己的丈夫，别的男人对她的兴趣也越来越少。当孩子们长大成人离开家庭之后，她的人生就失去了目标。

办理离婚案的律师们常常要费很大的精力来使那些被丈夫抛弃的女人明白，如果她们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她们的丈夫就会带走所有的财产。“不，不，他一定会想到我的。”她流着眼泪重复这样的话。这是她多年的信仰，为此她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他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钱虽然不能给我们带来一切，但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拥有自己的账户和独立的生活来源能使我们吃得更香，睡得更好，活得更健康。

小时候，我也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人一样，从来不谈钱的事，只是悄悄地把剩下的零用钱存在我的玻璃储蓄罐里。后来我决心离开家寻求独立，因为我不愿过那种依赖别人的生活。当时，我虽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依赖别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已经看到了钱的作用：一边是外祖父的自由和别人对他的尊重，另一边是依靠别人养活的女人们焦虑的面容。

孩子的接受能力远远超过了父母的想像。我意识到，一个不能负担自己生活的女人只能像母亲那样愁眉苦脸地过日子。我看到外公自由自在地来往于世界各地，每次从遥远的海港回来时，都给母亲和姨妈带来漂亮的礼物——印着毕加索绘画的

巴黎丝绸头巾、装饰着红缎子的马德里白色牛皮箱包。我怎能不向他老人家看齐？我希望像他那样神气和自信。对于少年时代的我，他是最合适的榜样。

看到我放在书架上的玻璃储蓄罐，母亲脸上露出嘲弄的微笑。姐姐和我不一样，她常把自己的零用钱乱丢乱放。母亲虽然有些恼火，然而不善理财毕竟是她们的共同点。共同的依赖性把她们更加牢固地拴在一起。

性成熟后，爱和钱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我开始努力摆出一副性独立姿态，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女人能够吸引各种各样的男人。不过，我对有钱的男人不感兴趣。他们只想让别人看到他们银行里的钱，似乎钱就能代表他们的一切。而我想抓住的，则是那躲藏在钱后面的有血有肉的人。我可不想和那些头脑僵化、感情贫乏，用金钱把自己严严实实遮盖起来的男人在一起。

我并不想要很多的钱，但是要有足够的钱来保证我的独立生活。如果我能使一个男人相信，我所爱的不是他的钱，而是他最本质的东西，他就会明白，我可不是那种随便什么女人都能替代的人。我有足够的能力养家活口。我所追求的不是一个能够养活我的男人，而是永恒的爱。

记得在 70 年代中期 我参加过一次关于“婚姻和女权主义”的专题小组讨论会。当时有四对夫妇，包括我和我的前夫。当我谈到赚钱养活自己对于我这个女权主义者的重要性时，听众中有人大叫：“女权运动不是教人怎样赚钱！”可是，为什么许多妇女在 70 年代要放弃婚姻、离开家庭去“寻找自我”呢？因为她们觉得传统的婚姻和家庭使她们无法自由思想，更不用说自由行动了。妇女大规模的离家出走当然包括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寻找传统婚姻关系无法为女人提供的自由。

如果有人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定期从他的银行账户上为你付款，那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可是这样一来，你就和一个依靠大人来养活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了。当婚姻关系碰到麻烦时，钱总是引起激烈争吵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深入探讨女人在经济上的依赖性所带来的后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许多女人仍旧觉得这样过挺不错。她们不想有自己的银行账号 因为这样做等于对丈夫说“我不需要你。”换句话说 这样做就会冒失去丈夫的风险。这正是小布什之类的人所倡导的，他们把妇女的依赖性美化成一种珍视家庭的价值观。

他们代表了父权制的残余。他们不顾一切地否认过去 20 年里妇女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男女双方作为独立的个体组成新型家庭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许多夫妻仍旧选择勉强凑合的家庭生活，因为他们害怕失去眼前的东西。

应该看到，家庭妇女在家所干的一切和丈夫拿年薪的工作同样重要，她们应该像在那些工作场所工作的人一样拿一份工资。做丈夫的应该从自己的收入中分出一部分给在家工作的妻子，并且把这笔钱存在她的名下。这无疑会增强她的独立意识，因为这份收入是她应得的报酬。她的孩子也会把她——一个既有爱心 又有独立性的母亲——视为女性的典范。

许多妇女如今都在外面工作，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她们都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女人。不过，如果一个女人自己不能挣钱来购买食品和付房租，那她就只能依赖别人——父母、丈夫、救济组织。当然，许多女人也许宁愿过小鸟依人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比单枪匹马创建自己的财富更轻松些。女人之间仍旧避免谈论“肮脏的金钱”，似乎这有损于女性的形象。我想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强调女人要有自己的收入，并不是要求大家都去发财。自己挣钱是独立的基础，有了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将经济上的独立内在化为感情和心理上的独立。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钱对女人感情和心理解放的积极作用，不妨把它用在你喜欢的男人身上，自己掏腰包请他吃顿好饭，尝尝掌握主动权的滋味。这也是一种学习，因为你现在做的是你母亲从来没做过的事。

很久以前，我有一个情人，他和我都喜欢在酒吧喝酒。我坐在柜台边，他靠着柜台站在我身旁，我们边喝边聊，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每次一进门，他就往柜台上扔几张钞票，然后就喝酒聊天，把其他的事都交给酒保。酒保从来不来打搅我们，我的男友在离开时也从来不看找回多少来钱。“闭着眼睛乱花钱的笨蛋……”你也许会这样说。可是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我喜欢他和酒保那种潇洒自在的神态。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

女人很少有放松的时刻，尤其是在餐馆里付账单的时候，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事了。此时此刻，她们脸上常常露出一一种令人不快的紧张和拘谨。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像男人那样自在呢？

25年前，我们宣布，我们不需要男人在餐馆里为我们付账、为我们开门、为我们点香烟。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永远破除男性比女性优越的神话”。坦白地说，我喜欢让男人为我让座、端椅子，但我也喜欢由我来付账单、照看他的衣服或烧饭给他吃。只要是心甘情愿，不管做什么都会给人带来满足感。

在我看来，真正的女权主义不仅要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而且要主张男女在打造自我形象方面机会平等。我们要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实现人格的独立，从而改变我们的言行举止和神态，让我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泰然自若。

当一个女人为男人付账单的时候，她的行为是否违反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规律？餐后他们是否应该到男方的住所去？她是否应该在性行为上采取主动？如果男方采取主动的话，她是否有权控告他犯了约会强奸罪？我记得自己在餐馆为男人付账

单的时候招待们脸上露出的各种表情。根据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的说法，男女之间在求爱时提供食物的形式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虽然有些雌性动物会在求偶时给雄性动物提供食物，但是在人类的求偶过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男人为女人提供食物：“求偶时的喂食很可能在恐龙时代就有了，因为这对繁殖后代有重要意义。通过给雌性动物提供食物，雄性动物显示它们捕食和繁殖后代的能力。”

可是，越来越多的女人正在成为挣钱养家的人，女性的角色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自我形象是否也应该有所改变？付账单的人不应该是被动的、扭扭捏捏的、不愿负责任的人。付账单就是掌握主动权，这并不是说付账单的目的一定是想和对方上床。但是，如果付账单的女子确实是在餐后去了对方的住所，对方会怎样想？他应该如何解释她的行为？毫无疑问，在花钱请一个男人吃饭之后又到他的公寓去，这样的行动本身就意味着她是主动的一方，她应该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承担责任。强奸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妇女有工作、有收入，她们花钱请男人上馆子，她们穿着露出很多肉体的衣服，这些，不能不使我们对“约会强奸”之类的说法产生怀疑。

在 NBC 明天的世界”节目里 汤姆·斯奈德总喜欢这样打断我的发言，“是啊 是啊 南希 可是 为什么我们男人一定要先请女士们上馆子？为什么我们不能马上去做爱？”汤姆大概不会对海伦·费希尔关于“求偶礼仪”的说法感兴趣 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女士们的收入正在日益逼近男人的收入。那是 1981 年，女权主义者正大力提倡妇女自立，但是许多女人仍旧在约会时让男人为她们付账单。她们把这看成女人的特权。男人不仅要拿钱请女友吃饭，如果女方怀孕，男人还必须负责她 9 个月的生活费。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女性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曾如此羡慕的男人手里的主动权在今天已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当我们主动接近一个男人，主动为他安排一个愉快的夜晚时，我们就会体验到行使这种权力快乐。我们不再需要焦急地等待，我们可以给他打电话、请他上馆子、按照我们的计划度过一个夜晚。我们可以冒险尝试，即使遭到拒绝也不会完蛋。

钱不是万能的东西，但是它能够帮我们解决生存问题，使我们免受饥饿和恐惧的折磨。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像男人那样悠然自得 畅怀大笑 怎么想就怎么说。瞧 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衬衣比外套还长，头发乱得像堆草！然而这恰恰是他的魅力所在：他一点儿也不在乎别人怎样看他。说到底，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男人从来不像女人那样为自己的外貌担惊受怕。

王子、艺人、裁缝、婚礼：找回失去的自我

火灾发生两年之后，我遇见了现在的丈夫。我同他一起度过的日子是一生中最愉快的。如果不是那场大火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们就不会走到一起。一想起这些，我就忍不住打个寒战。如果不是那场大火，我就不会在那天晚上打开门的时候认出我梦寐以求的王子；如果不是那场大火唤醒了少年时代的我，我也不会如此大胆地去追求他。

那是 8 月的一个下午，他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通常是由留言机代接的，不过他打来时，我正好走过电话机。那天我心情不太好，脑子里充满了关于妒忌的回忆——我正在写一本有关妒忌的书。我拿起听筒，一个男人温和的声音提醒我，几个月

前，他曾在一次晚宴上碰到过我，那次聚会是为了庆祝一位朋友新拍的电影。他问我想不想出去喝一杯。我原计划晚上呆在家里，可是刚过4点就有些坐不住了。后来他告诉我，“要是你拒绝我的话，我就会这样安慰自己：时间太晚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报纸主编居然害怕遭人拒绝！我为此大受感动。要知道，最容易打动我的就是那些貌似谦卑的冒险家。”

其实，直到门铃响的时候，我还没想起他是什么样子。我打开门：一头黑色的卷发，头微微低着，像个害羞的男孩。我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男人。我们坐在露台上，他一边喝啤酒，一边谈着墨西哥的财政状况。下午的阳光在公园对面第五大道的摩天大楼上慢慢地移动，给一排又一排的玻璃窗染上火焰般的朱红色，直到太阳最后消失在哈德逊河口的地平线上。

“谁在弹钢琴？”他问。我告诉他，那是彼德·艾伦。这时，我们听到断断续续的歌声。“他在写一部音乐剧。”我说。彼德正在唱《救救我》。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要救的正是彼德自己。

天黑后，我们乘出租车去东区的一家餐馆。吃饭时，我们继续谈一些和个人无关的事情。当我们出了餐馆走到麦迪逊大街上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仅此而已，但我立刻明白将会发生什么。我心里一阵激动，竟然在碰到两位好友的时候想不起他们的名字。

回到家里，我给他倒了一杯酒，唱机里响起罗伯塔·弗拉克的歌《就是我》。我开始吻他。火灾之后，我什么都不怕了。大火烧掉了“好女孩”的外壳，我又成一个喜欢冒险和主动进攻的人。我的王子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睡美人那样被我唤醒了。

知道吗？被女人诱惑是男人最常见的性幻想之一。男人喜欢闭上眼睛，想像某个女人主动和他做爱。要是碰到这样的女人，他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坠入爱河，用不着汗流浹背、摆出一副主宰一切的架势。那天夜里，我拉着他的手，把他带进我的

室。这里的一切，从墙壁到地毯，都显出一种迷人的裸体色调。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告别了其他几个女友。一周以后，他动身去欧洲创办一家报纸。我们约好每天通电话，每两三个星期见一次面。3年后我写完了《妒忌》这本书。又过了两年我终于办好了离婚手续，然后就着手准备和他结婚。那是个多么难忘的婚礼啊！

在世界上最华丽的夜总会里，在旋转式舞池的上方有个很高的舞台。诺曼和我的婚礼就在那里举行。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我们有意选择如此引人瞩目的方式举行婚礼，它和我们婚前婚后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主持人宣布我们结为夫妻时，彼德·达钦的交响乐队开始演奏，舞池开始旋转，大厅四周的金色窗帘徐徐升起，曼哈顿的美丽景色展现在我们眼前。豪华的宴会、欢快的舞蹈、巨大的婚礼蛋糕。彼德·艾伦带着他的乐队和歌手们登台献艺。他们又弹钢琴，又跳舞。彼德把他的上装扔到空中，赢得一阵又一阵的欢呼。没有人能像彼德那样让人高兴。

婚礼过后，诺曼和我回到康涅狄格州的家里。在那个美好的7月里，我不断地要他为我描述婚礼的每一个细节。不错，当时我也在场，但是我的记忆变得一团糟。例如，我怪他没有陪我跳舞。“什么，我和你跳了整整大半个晚上！”他抗议。

这确实是一次辉煌的婚礼。不过，还有其他令人难忘的东西。我迫使自己回到房间去，把那些感受写下来。一周后，我写了一篇关于一个南方小镇女孩的短篇小说。诺曼看过后，面带笑容对我表示感谢。

“为什么？”我问。

“难道你写的故事不是应了我在婚礼上献给你的祝酒辞吗？”

“你念过祝酒辞了？”

下面就是我丈夫的祝酒辞，我想把它献给所有在少儿时代曾经勇敢过的女士：

当南希还是个查尔斯顿的小女孩时，她已经成了一个喜欢冒险的孩子王。她带领小伙伴们在镇上最高的围墙上奔跑。“加油！加油！”她向伙伴们发出挑战。她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吓倒她。

今天晚上，站在这举世闻名的彩虹厅楼梯上，面对着你们和整个纽约，我体会到小南希当年对她的小伙伴们产生的影响。拉着她的手，跟着她，我觉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勇敢，活得更加有声有色。最亲爱的南希。和你相遇、和你结婚，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我最大的追求。展望未来，我心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那里不会有恐惧，也没有后悔。让我们为我们的婚姻，为我们共同的人生，为攀登更多的高墙和创造更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干杯！

现在我明白了当初为什么没有听到这些话。这不仅仅是因为婚礼上的一切太令人兴奋，更重要的是，他说的都是我多年来最渴望听到的话。也许成年的南希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一礼物的准备，可是少年南希却听见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回到房间里去写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她一直在对我说话，我写的每一本书里都有她的影子。

婚后的那个秋天，我实在不想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东西。几年来，我第一次让自己享受悠闲。我看书、散步、翻阅杂志和朋友们共进午餐。可是不久，我又变得坐立不安起来。我开始为一本新书做调查研究。

写书好比旅行，我们通常先有一个大纲，但这并不是一张详细的路线图。书的主题会抓住我们，把我们引入原先没有想到

的领域。我们跟着它，相信它是个比理智更加高明的向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首先选择主题。有时，我们会放弃一个主题，因为它触及到我们的心灵深处，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它，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最后，也许是在梦里，我们被告知必须重新挖出那些埋葬了多年的东西。

艾萨克·B.辛格最好的作品都是在床上写的，而且都是在凌晨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我的潜意识总是在睡梦中坚持不懈地显示那些我在白天拒绝考虑的事情。例如，我第一次结婚后，睡眠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在此之前，我的睡眠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不论白天发生什么事，我一躺下就能很快睡着。可是，自从和一个不合适的男人结婚之后，我就患了失眠症。我做过催眠术，服过安眠药，可是全没用。有一天，我对我的老朋友和老师罗伯蒂勒说起失眠的事，他坦率地对我说，“你和丈夫陷入了严重的共生状态。你害怕睡眠 因为你怕熟睡后会失去自我。”

和诺曼在一起我感到心满意足。我不再追求华丽的包装。在我身上，诺曼看到了 10 岁的我，他爱的就是那个年龄的我。那时，我根本就不注意自己的外表。我有时觉得诺曼比我更了解这个 10 岁的小姑娘。白天，我有时会忘记她，我会给自己戴上一副假面具；到了夜里，我就会做起噩梦来。昨天夜里，我就梦见自己和诺曼一起驱车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们随身带着几个手提箱。当我打开这些手提箱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它们个个都是空的。我放在里面的漂亮衣服全都不见了。

我们的周围是一个非常俗气的乱糟糟的小镇，在这种地方是肯定买不到“像样的”衣服了。可是若不把自己打扮得“完美无缺”我是绝对不能去参加婚礼的。诺曼建议开车送我回家拿衣服，可是路上要花 8 个小时，这样一来我们就肯定赶不上参加婚礼了。我呆呆地站在街上，守着一堆空空的手提箱。周围是

狂欢的人群，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为了几件衣服而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随意，为什么不能放弃华丽的包装，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显然，我对自己缺乏信心，我害怕出丑，我需要亮丽的服装来伪装自己。

“旅行时携带的行李是一堆罪恶的东西……它们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弗洛伊德写道。有道理 弗洛伊德还说：“行李常常在梦里成了做梦者性器官的象征。”羞辱，失去控制，弄脏衣服——这些都是我常做的恶梦，是潜意识作的怪。我和许许多多的女人一样，都成了无处不在的女性卫生用品广告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试着想像世纪末的维也纳：一天早晨，这位伟大的学者从睡梦中醒来。他坐在床上，记下自己潜意识的踪迹。“遗失的行李，”他写道，“是失去身份的象征。”有道理！不论在梦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总是摆脱不了丢失行李的恐惧，这是因为我怕，要是没有那些华丽而引人注目的衣服，我就会遭到别人的冷落或拒绝。

我对行李的担心可以说由来已久。从十几岁的时候起，我出门时总是带上过多的行李。当我面对一张白纸，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我不知道如何开头。于是我就试探着写上几句：“我是个渴望引人注目的女人。别人的目光就像空气和食物一样是我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多地感到摆脱这种目光的需要。”写完这些话后，我就开始清理楼上的壁橱，把那些几乎是全新的衣服都拿下来，装满了一个又一个纸板箱，发送到亲戚和朋友家去。我希望在结束这本书时，壁橱里的衣服之间能够保持不少于两英寸的距离。可是，这样做就能使我变得好一点吗？

事实上，诺曼爱的女人就是他在祝酒时称赞的那个女孩，可我自己却没有百分之百地接纳她、把她看作真正的自我。她曾经毫不掩饰地向周围的人敞开自己的胸怀。人们喜爱的是她

本人，而不是她身上穿的衣服。她的生存之道比我后来学到的任何东西都更顶用。她以善良、幽默、创造性和讲故事的本事来吸引别人，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爱。可不是吗，10岁的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别人的爱。

也许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生的早期，我们长大后就把小时候的生存法宝都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如果我们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明智，我们的耳边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响起一些熟悉的和音，把我们带回那遥远的纯真年代，帮我们找回那份失去的自我。

我不是一个只靠外表来维持自我的人。我的内心有一张照片，它一次又一次帮我度过生活中的难关。我丈夫在婚礼上的祝酒辞为我打开了一扇窗，使我看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每当成功地渡过难关时，我就想起了她。

长长的腿，身穿旧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梳着两条小辫子。她身上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直到她看到我，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才注意到她。她向我走来，那样生气勃勃，谈笑自若。她拉着我的手，讲故事给我听，毫不怀疑我对她的喜爱。我没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虽然她并不怎么漂亮。

“我陪你回家。”她说。我们在国王大街上走着，经过格洛丽亚剧院。那里正在上演音乐剧《复活节游行》。她告诉我，这出音乐剧她已经看过两遍了。街对面是一家面包房，从前我们常在那里买果冻面包圈和巧克力泡夫，那是我们看音乐剧时最喜欢吃的点心。然后我们走过贝尔克百货店，那是我曾经偷过东西的地方。我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她，可是她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正站在阿莫罗斯（多情的汉子）住过的那幢房子外面。这个雅号是《查尔斯顿新闻信使报》给他起的。他是本地有名的唐璜式风流人物，特别喜欢在半夜里潜入别人家里，不声不响地爬到女人床上，拥抱着亲吻一番后又悄悄离开。阿莫罗斯只去那些最好的

房子，他对那里的一切都熟门熟路，就像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样。

“还记得妈妈为防备阿莫罗斯在家装的那个报警器吗？”我的小伙伴问道。那还用说。那天，电工在母亲床边装了个开关，电线穿过窗子将开关和外面的报警器连在一起。那玩艺儿发出的声音足以惊醒整个查尔斯顿。有好多次，当我坐在母亲床上时，我的手就开始发痒，忍不住想去碰那个开关。后来，可怜的阿莫罗斯终于被逮住。虽然当局从来就没有把他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众，我们都知道，他是查尔斯顿名门望族的后代，他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不用说，他很熟悉当地上流人家的房子，因为他在那些人家作过客。

再往前走，我看到那个悬挂在人行道上由研钵和杵组成的施韦特曼药店标记。标记下面，靠着商店的大玻璃橱窗，站着马尔科姆、吉米、比利和汤米。我想起帕特姨妈的话：“抬起头，挺起胸！别忘了，戈尔德温家的女孩们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不过我随后想到，我的小伙伴只有 10 岁，还没到谈情说爱的时候呢。她好像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那些男孩们，一转身就进了门，还向我招招手。透过玻璃橱窗，我看到她靠在柜台上，要了两杯果仁巧克力圣代冰淇淋——就是那种上面浇核桃仁糖浆的，那是我们的最爱。

那些男孩们看上去还像小孩子。他们像那时的我一样，对渐渐逼近的青春期毫无准备。两年之后，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将为自己买一只 ID 手镯（我们称之为奴隶的手镯）它的一边刻着马尔科姆的名字，另一边刻着汤米的名字。不过，她始终不敢把这东西戴在手腕上。

我们手拿着圣代冰淇淋，走到布罗德大街，向左拐，经过一幢漂亮的 19 世纪豪宅。不久前，就在这幢房子里，一位住在二楼的牙科医生为她装了一副牙齿矫正架。虽然她现在并不在乎这副架子，两年后，她就会讨厌它，并且在笑的时候设法用上嘴

唇遮住它。又走过几幢楼，我们停在一家小店的橱窗前，小时候我常在这里购买和交换邮票。我想告诉她，总有一天，她会有机会到这些邮票所代表的国家去旅行。其实，她早就在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那一天了。她可真是乐天派。

我们走到街角的邮局，然后向右转，经过希伯尼恩大厦。她不久就会来这里参加那个可怕的拉卡夫人办的舞蹈班。在特拉德大街，我们来到一幢浅红色的高房子前，窗子上装着蓝色的百叶窗，二楼有个琴房。小时候，我拒绝学钢琴，因为“她们”两人（母亲和姐姐）都会弹琴。那时我多傻啊。我不该对母亲和姐姐生那样大的气。

我转过身，她已经走了。我正想喊“等等，别走啊”，这时，我听到她在叫“南希！南希！”我想起来了，进入那扇大铁门，走过那幢小小的供客人住的房子，爬上那棵无花果树，就可以登上旁边的那堵墙。我看着她飞快地爬上那堵三层楼高的残墙，很久以前，那里曾是一幢破旧的豪宅。她在墙上奔跑，尘土和破碎的砖头从她脚下哗啦啦地往下掉。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妇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向她大喊大叫。想起来了，就是这个老太，把一条多伯曼猎犬放出来，那狗在墙根下和我赛跑，在密密的树丛里乱窜。

从那堵老墙上，她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子，那是母亲带着姐姐和我一起住的地方。还有那只外形像地球的玻璃储蓄罐，里面装着半罐硬币。我想向她发出警告。青春期不久将会到来，为了随大流，她将放弃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去追求那并不属于她的美貌。千万别这样，我大声喊。当然，警告是没有用的，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使我们有所醒悟。这就是她将要走的路。尽管如此，10岁的她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她将救我脱离困境，伴我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看啊，妈妈，我站在墙顶上！”



南希·弗莱迪，当代美国畅销书作家，其著作以新颖、大胆而著称。除本书外，她的其他著作还有《我与妒忌》、《我母亲/我自己》、《我的隐秘花园》和《禁忌之花》等。

全球发行 **80** 万册

为什么我们会疯狂地追求美貌？为什么我们会对比我们美的人不由自主地妒忌？在这部被称为“具有革命性”的著作中，著名女作家南希·弗莱迪回顾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末美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包装决定一切”的时代，“形象包装”（即外表）似乎变得比正直、善良、诚实以及健全的心智等内在品质更加重要；然而在潜意识里，当代女性（和男性）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矛盾重重，充满了焦虑、困惑和恐惧。本书涉及的内容广泛，立论新颖，直指人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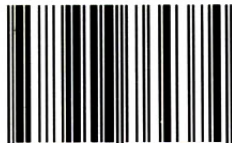
我们也许已经赢得了自由、独立和男女平等，不过，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同时，我们也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女性的身份……在这本期待已久的书中，一代女权主义宗师南希·弗莱迪就如何看待女性的需求和欲望提出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观点。

——《每日邮报》

本书作者是一位聪明而富有同情心的女士。她认为当代女权主义者对男性不分青红皂白的诋毁只会损害女性的自身利益。她指出如今有太多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他们被剥夺了男性形象对儿童成长的有益影响。作者肯定男性气质，并用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年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女士们需要像弗莱迪这样理解她们的人来为她们写书。

——《星期日泰晤士报》

ISBN 7-80676-437-2



9 787806 764374 >

ISBN7-80676-437-2/G·240 定价：29.00 元